

目 录

法国的阶级斗争	1
(1894年8月)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49
——回答让·饶勒斯	
(1895年1月10日)	
财产的起源和进化(摘录)	72
(1895年)	
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	151
(1896年12月)	
交易所的经济职能	177
(1897年2月)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9
(1899年12月)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	207
(1900年2月25日)	
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212
(1903年)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294
(1904年3月16日)	
上帝的信仰	325
(1906年1月)	

在法国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355
(1908年10月)	
认识问题	361
(1910年)	
报刊索引	383
人名索引	385

法国的阶级斗争

(1894年8月)

(一) 贵族和资产阶级

法国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1830年起,法国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相互争夺权力的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家庭纠纷,而现在不同了,它具有了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拿破仑的英雄史诗以滑铁卢失败而告终,法国贵族和资产者把这当作挽救命运的胜利,对此大加庆贺。这时已经丧失了封建特权和变得政治影响不大的贵族随着路易十八的上台而重新获得了政权。当然,它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单独进行统治,而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分享国家的领导权。帝国时期已经停止的政治斗争在议会形式下重新开始了。贵族力图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秩序,而资产阶级方面用尽一切力量排挤贵族,以独占政权。随着1830年的革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宣告结束。1830年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局势的绝对主宰。贵族最终被击败了,不仅如此,它最终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它的所有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再也分不开了。从前彼此敌对的两个阶级的成员化干戈为玉帛,联合成友好的同盟,以便通过投机和金融诈骗来剥削工人阶级,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

(二) 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 之间的政治斗争

从1830年起,实际上再也谈不上政治阶级斗争了。政权始终掌握在资本家阶级一个阶级的手里;路易-菲利浦时期,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时期和1871年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情况都是如此。政治斗争一直只是同一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直到最近几年,还没有另外的阶级争夺这个阶级手中的权力。1830年之后,自由派声称,不再存在阶级了。他们当时是对的。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灭亡,而那些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时还处于形成状态,还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1848年6月和1871年3月先后两次爆发了威胁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大规模起义。这两次起义是被压迫阶级的猛烈反抗。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也可以说,它的行动是盲目的,本能的,是由于受到形势的逼迫。六月起义者和公社保卫者象古代的奴隶一样完全是为了暴动而暴动,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他们所提出的要求甚至同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六月战士发难,不是要求资本,而是要求劳动权。其实,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任何财产,正是为了把他们束缚在劳动上;资本家不是用奴隶主的鞭子,而是用饥饿来迫使工人为了可怜的一点工钱而进行最劳累、最沉重、对健康最有害和时间最长的劳动。成为巴黎主人的1871年公社保卫者对资本主义财产表现得非常崇敬。公社本来应当占领法兰西银行,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派人在银行大门口警卫,以保护资本家老爷的财宝。尽管如此,银行还是背叛了公社,向梯也尔提供了他供养围攻巴黎的士兵和宪兵所必需的数

百万费用。起义政府专门开了几次会议来讨论两个公告，一个是延期三个月支付期票，另一个是在三个月之内废除房租。1848年的资产阶级和1871年的凡尔赛分子谩骂、诽谤和攻击这两次无产阶级起义，硬说它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果这两次起义取得胜利，或者至少坚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末它们最终必然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那时它们不自觉地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资产阶级把六月和三月的起义者说成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在对这两个词的意义一无所知的公众心目中败坏他们的声誉。因此这是纯粹的诬蔑之词。但是这种诬蔑最终会成为实情。1848年起义者会要求得到资本，从而完成自己对劳动的要求，而1871年的公社保卫者必定会夺取起初受到公社保护的资本家财产。与此相似，中世纪的民间的异教徒是从批判教皇的宗教权力开始，结果攻击了教会的世俗领地和一般财产。他们虽然考虑的是灵魂和天堂的利益，却开始致力于肉体和人间的利益。所有曾经震荡过社会的人民运动，——无论是希腊和意大利国家的内战还是中世纪城市的流血斗争，宗教改革的斗争，还是近代的起义——都包含着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问题。

曾经是巴黎两次起义的见证人并积极参加过在它们失败后进行的镇压的梯也尔先生能够两次宣布：“社会主义被消灭了”。因为即使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些起义的预想的和有意识的原因，那末看来它也必定会是这些起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不是人们预料的和追求的。

(三)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

实质上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六月起义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

动,虽然从 1830 年到 1848 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时期存在出色的和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宣传,甚至“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和一些最著名的改革家在 1848 年以前提出的并为他们的门徒所传播的社会理论既不符合他们希望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工人阶级的需要,也不符合它的利益。

各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们否定革命的传统。他们不满足于象已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那样单纯宣布一下,“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走得更远,谴责 1789 年的革命是狂热病的发作,因为它的流血斗争只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摆脱一切束缚,从而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他们从反动的观点出发批判现存关系,并且仿效教权派和贵族用中世纪来对抗现代社会。这使他们在工人的心目中成为可疑的人。虽然工人们也吃了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苦头,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贫困归罪于革命;他们以为,革命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是因为阴谋家歪曲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大革命本身是好事,而人类的贫困只有在人们决心实现一次新的 1793 年的情况下才能够消除。因此,他们开始不信任社会主义者,而倾向于那些为了通过革命途径建立共和制而搞密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路易-菲力浦在位时期的秘密团体从工人中间招募了大批积极成员。布朗基由此相信工人不信任社会主义者,这个事实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使他在帝国时期不再传播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并劝说自己的朋友不要从事社会主义宣传。

各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对革命的厌恶使得他们坚决拒绝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甚至谴责经济领域里的斗争。他们害怕一切激烈的宣传活动,如果说他们相互争论自己的社会药方的优点,那末他们在劝告工人不要考虑政治和不要举行罢工这一点上却是非常一致的。无政府主义鼻祖之一、现在被人奉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权

威的蒲鲁东,最初重复布里索的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使得善良的资产者惊骇万分。后来他却创造出一个天才的思想:号召工人罢工,但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他的这个逻辑是了不起的,不愧为最正统的官方政治经济学。因为提高工资必然会使物价上涨,所以工人作为消费者所损失的要比他作为生产者所得到的大两倍或三倍;相反,因为降低工资会使物价下跌,所以工人作为消费者所得的要比工人作为生产者所损失的大两倍或三倍。

社会主义改革家不懂得,他们伤害了工人的政治本能,并且在想要保障群众的未来的福利的口实下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当前的利益。他们对周围的现实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沉溺于自己的空想,并对称地安排自己的理想社会。他们不自觉地为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资本家一掌握政权,就竭力把政权垄断在自己的手里,只给那些拥有一定的、相当可观的收入的人选举权。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从事政治很满意,正象现在资本家对那些建议无产阶级放弃利用普选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到称心如意一样。他们对社会主义者不同意罢工也同样感到满意。取缔一切工人组织曾经是革命的最初的法令之一;从那时起,资产阶级严禁工人组织任何旨在提高工资或罢工的团体。据我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们在1848年以前——至少在欧洲大陆——就懂得并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同样也懂得罢工的重要性,认为罢工是保卫工人的生存,使之免受他们的剥削者的压榨,组织无产阶级,使之同资本家阶级对抗和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

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们之所以不考虑工人的政治本能和他们的当前物质利益,是因为他们在改造社会的问题上对无产阶级不抱任何期望。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是畜群,资本家是它的牧

人。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和呼吁书中诉诸一切社会阶层的有产者；他们力图让这些有产者相信，依靠他们的帮助就能够实现他们预言的奇迹。罗伯特·欧文的在亚琛召开王公和资本家的代表大会并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未来社会的计划的主张同法国空想主义者的愿望和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傅立叶、圣西门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鼓吹资本、才能和劳动的联合，即资本家、学者和艺术家以及工人的联合；可见，他们认为后者不论在才能上和资本上都是贫困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证明，有产者在改造社会中不会失掉任何东西，不会有任何强盗去侵占他们的资本，他们的利润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改革家似乎只是希望改善资产阶级社会，其目的是首先给资本家带来利益，其次附带也给工人带来利益。他们希望社会摆脱它的最激烈的对抗和不协调。但是他们期望消除的弊端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无法根除的。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必然结果，而它们的发展为改造社会作好了准备。社会主义者寻求社会和平并希望消除任何冲突的原因。

傅立叶、圣西门和其他改革家所招募的信徒几乎全是看不起普通工人的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的最有教养的阶层。除了少数例外，在他们周围还集合了一些认为社会对自己的贡献估价不足、重视不够和酬劳太少的有教养的人。这是一些精神上堕落的人，他们逐渐变得老练和成熟起来并成为大胆的企业家、奸滑的商人和不怕任何风险和丧失良心的投机家。例如，——只举这伙人之中的一个人为例——果丹先生在吉兹（埃纳省）按照傅立叶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法伦斯泰尔。他开办了一个搪瓷器皿厂，让大批工人住在一座宽敞的玻璃房顶的四角形宫殿周围的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除了住处，工人们在这里还得到一切消费品（肉类、布、食品杂货等等），可以上剧院看戏和参加音乐会，有子弟学校等。总之，

果丹先生关心工人的一切精神和肉体的需要，不仅如此，由于他的高明的傅立叶社会主义，还赢得了很大的利润。他得到了人类慈善家的声誉并作为百万富翁和欧洲名人离开人世。当然，不能让老师为他们的学生的行为负责。但是，为了使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能够吸引精明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必须用对社会环境的尖锐批判和伟大空想主义者所预言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图景来掩盖资本主义理论，这些学生正是抓住这些理论，并用自己的未来的行为和活动，用自己经营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惊人的本领来阐明这些理论。

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当然只能给那些被正在发展的机械大生产的竞争挤垮了的手工业者以精神上的满足并使那些沽名钓誉的和不安分的资产阶级堕落分子的贪欲如愿以偿。相反，它不可能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它极端蔑视工人阶级的本能和需要，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改善无产阶级地位有实际意义的改革。1848年革命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们由于没有意识到本身的阶级利益，没有明确的目的和领袖而听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有了工人们从路易-菲力浦那里夺得的政权；他们听凭资产阶级把这个政权变成一个堡垒，以便从那里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宽宏大度地决定“用三个月的贫困来为共和国服务”，象乖孩子一样，天真地去听临时政府成员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进行的社会主义说教。大家知道，这个政府为了安抚资本家，按照银行家古德肖的建议提前支付了国债的利息，但是拖延向储蓄银行支付欠款，因为没有钱！1848年曾经欺骗过工人的社会主义流派的首领路易·勃朗，1871年成为梯也尔摧毁巴黎和公社的伙。

当三个月的贫困结束之后工人们向共和国要求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共和派用枪弹、混合委员会和流放来回答他们。1848年革命埋葬了空想社会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的名字被人

遗忘，他们的著作，除了个别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外，再也没有人看了。只有互助论这种反动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社会主义还继续存在。他们象船舶失事的遇难者紧紧抓住船的残骸一样，绝望地死抱住自己的经济独立性，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在他们的脚下动摇和瓦解。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借助于低息或无息的互助信贷来对抗大机械工业的强有力的竞争。他们象现在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向国家要求这种贷款。在德国，舒尔采-德里奇曾经希望通过信贷合作社向他们提供这种贷款。

(四) 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虽然 1848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已经分化成为无数的种类和亚种、学派和小学派，但是总的说来信奉者并不多。它没有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只吸引了一些手工业者和资产者。因此，资本家阶级没有理由对这种社会主义感到惶恐；它把这种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看成是奇特的圣徒，无害的幻想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信奉者本身也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的怪人。他们装束稀奇古怪（例如，圣西门分子穿的衣服的扣子在背后，在穿衣服时好让同伴帮忙，借以证明联合的必要性），帽子特别大，留着大胡子等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互相争夺统治权，好象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者。六月起义使它们看到还存在着一种与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它们看来是一切怪物中最可怕的怪物。资本家象相信福音书一样相信一切报刊所散布的关于起义者的拙劣而又无耻的诽谤。报纸宣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分财产。资本家信以为真。个人主义的资产者千方百计想把一切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对他们来说，分财产——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曾经冒充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拿破仑亲王，现在为了拯救社会免遭共产主义之害而为资产阶级效劳。不懂得组织政党和启发工人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成了波拿巴主义野心家手中的政治工具，他利用这个工具推翻了共和国和建立了帝国，以“**维护秩序、家庭和财产**”。社会主义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给反动政党提供了武器，它们借此来阻碍政治发展和镇压无产阶级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帝国的最初几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原因是建立了动产信用公司、土地信用公司和其他现代信用机构，建设了铁路，农业有了发展等等。这个繁荣局面使人忘记了六月起义和这次起义给资产阶级人士带来的不安。那些还记得暴乱的人把它看成是由特殊原因引起的特殊事件，认为用不着担心它会重演。同样，社会主义也被人遗忘了，不再有人提起它。人们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怪物，就象路易-菲力浦当政初期资产阶级曾经热烈拥护的国民自卫军一样。

但是，拿破仑第三没有忘记，他是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政治表现登上王位的。当工商业萧条的年代来临的时候，动产信用公司的破产造成的大批银行倒闭使得资产阶级一切阶层的人纷纷破产的时候，共和派又抬起头来并向帝制展开了进攻。于是，拿破仑认为这是重新点燃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有利时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应当互相厮打；而政府可以作为兴高采烈的第三者坐山观虎斗和享受靠计谋获得的安宁。拿破仑出于这种打算恢复了从政变时起已经废止的集会权，但是只限于讨论经济问题的集会。警长必须禁止一切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这种限制的结果同他们预定的目的恰恰相反。拿破仑把政治变成禁果，反而引起公众的热烈兴趣。相反，公众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和漠不关心。而皇帝本来打算使经济问题成为公众注意中心，以便唆使工

人反对资本家，把共产主义和平分财产的“赤色怪影”召唤到惊恐的资产阶级的眼前。

工人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听说社会主义了，甚至连这个词的意义也不了解，可是“共和国”、“自由”等等字眼象响亮的号召在他们耳际鸣响。演说家们在集会上为了迎合听众的热烈兴趣，不去抨击企业主和资本，而是抨击政府，并且在演说中影射皇帝和皇后，有时直接攻击他们。演说家们不去描述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的贫困和公有财产的美好，反而浪漫主义地诉说政治压迫的可耻、自由的欢乐，共和国和革命的伟大。为了重新使政治生活平静下来，拿破仑决定再次禁止公共集会。但是已经晚了，——巨石已经往下滚动了。

从上个世纪的大革命以来——不算六月起义和1831年里昂暴动——第一次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在此之前，参加政治斗争的只有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这一次工人们参加了运动，他们冲击帝国政府，为共和国而斗争。工人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共同行动。工人阶级遵循事实的逻辑进行活动，不自觉地遵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这第一次政治行动表明，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者的反政治策略是行不通的。无产阶级迫于形势所采取的行动使资本家更加确信，不再存在阶级了。他们陶醉于一种甜蜜的幻想：工人们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把有产者看成是自己的“天然的”领袖，并忘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马前卒。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不反对成立国际，相反，参加国际，企图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象马志尼一样把国际当作反对帝国的工具。而国际实际上证明自己是这样的工具。当茹尔·法夫尔和共和派领袖们向政府献殷勤，得到政府宠爱的时

候，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高傲地和轻蔑地驳回了皇帝的代表鲁艾^①的建议。他们明白，首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政治关系上实行变革，为了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地位，必须推翻帝国并建立共和国。

但是，当时人们能够提供给工人的社会主义还不是能够满足工人并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以互助论的形式，以蒲鲁东在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动的理论中已经深入阐述过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工人的面前。它以自由的名义公开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力，以及美国南方各州为了保持奴隶制而脱离联邦的权利。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如象瓦尔兰和马隆，都曾经是蒲鲁东的互助论者，他们在国际的一些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些反动和傲慢的言论。托伦、利穆津、舍马勒和其他蒲鲁东分子抱有特殊的野心，妄图领导国际的运动并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强加给国际，虽然他们甚至不能为工人所理解。他们总是以少数票反对共产主义提案。帝国的倒台使工人阶级感到措手不及，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巩固的组织 and 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它的奋斗目标除了建立共和国没有别的。被近年来的政治鼓动推到前台的少数工人和手工业者也缺乏社会主义信念。因此，1870年资产阶级共和派象1848年把奥尔良派排挤掉一样平平稳稳地取代了波拿巴分子的地位。工人们，甚至国际会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870年9月4日，在法国只有一个在政治上起作用的阶级，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固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六月起义的大规模的重演，它清楚地表明，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都

^① 欧仁·鲁艾(1814—188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历任部长、参议院议长，第二帝国垮台后逃离法国，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首领之一。——编者注

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阶级斗争。凡尔赛成为资本家利益的体现者。在那里聚集着一切政党的代表，他们在事件面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此相反，公社的巴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现代阶级斗争以其最尖锐和最可怕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1848年的无产阶级起义曾经象雷电一样突然地和不祥地在地平线上闪亮一下便消失了，没有留下痕迹。在第二帝国时期，六月起义者象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一样被人完全遗忘了。而公社，虽然它只是巴黎人的一次起义，却震动了整个民族并使工人们确信，在巴黎城下进行了一场争取他们的最切身事业的斗争。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而这个感受是无法磨灭的。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必定加深这种感受并教育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促使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组织成为政党。

(五)工人阶级组织成政党

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使法国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从1863年同英国缔结贸易协定时起缓慢发展的大机械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法国工业不得不解决一个困难的任務，它必须医治好战争给它的三分之一国土带来的创伤，它必须拿出钱来建立庞大的武装，建立庞大的军国主义组织，最后它必须填补由于割让1870年以前法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阿尔萨斯而造成的空白。几年的工夫，它就解决了向它提出的任务。在全国各地工厂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它们消灭了小工业并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过去实际上只是在法国东北部的若干城市这个唯一有巩固的机械大工业基础的地区才有工业无产阶级。战后过了十年，在全法国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

六月起义埋葬了空想社会主义，公社最后结束了蒲鲁东主义

的互助论。傅立叶分子和圣西门分子变成大的工业和金融企业的老板，而互助论者进了参议院，如托伦，或到更糟糕的地方去了，如夏尔德伊、弗里布尔、皮埃尔·德尼。一些人参加了新的社会主义运动。

国际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完成了重要的任务。它的成果该收获了。惊恐的资产阶级想象国际是一个强大的庞大团体，似乎它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支配着数以百万计的经费，盲目地和绝对地服从发布罢工命令和准备类似巴黎公社那样的起义的伦敦总委员会。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荒唐的了。国际不曾起过这样的作用，也不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它实际完成的任务虽然不是那样富于浪漫色彩，但还是非常伟大的和重要的。国际的使命是使原来被政治疆界彼此分割开和因民族仇恨和民族偏见而互相隔绝的欧美各国工人彼此接近和建立联系；国际的使命是制定应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信条的社会主义理论；国际的使命是在除德国以外还没有一个国家存在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创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只有象卡尔·马克思那样的革命的和科学的天才才能够表达关于这样的组织的思想，只有这样的天才才能够制止国际走上错误的道路，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当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国际过了几年完全退出了舞台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它的成员面临的任务就是在各自的祖国建立民族的社会主义政党。

当凡尔赛反动势力的第一次狂暴发作稍微平息下来的时候，国际的会员在法国从公社曾经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从国际在它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总宝库中吸取自己新的社会主义信念。公社失败后十年，有法国各地工人阶级代表参加的马赛代表大会，不顾相当大的少数派的反

对，通过了把工人组织成一个阶级政党的决议。这个政党应当通过支持罢工参加经济斗争，而在政治斗争中利用选票夺取政权，从而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变成全民族的财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党找到了自己天然的活动领域并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对它来说，剩下的只是集合和组织自己的部队了。他们已经积极地欢欣鼓舞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 * *

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了解或不重视战后出现的和对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人士产生深刻影响的经济事件，照旧继续自己的议会斗争。资产阶级报刊连续好几天对马赛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决议吹毛求疵和冷嘲热讽，然后就把它完全置之脑后。因为把工人阶级组织成政党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资产阶级政治家用不着对此多费脑筋。在他们看来，这是永远不会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空中楼阁。这些老爷们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议会视野以外的一切东西，以致他们真的以为不再存在阶级了，政治同过去一样永远只是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

有产阶级的政党在战后充满了活力；每一个政党都力图取得政权，彼此斗得精疲力尽。保皇派由于麦克马洪当选总统而认为自己是形势的主宰，试图进行王朝复辟。他们被击溃并不得不让位给机会主义者。在此之前共和国的权力掌握在保皇派的手里，这时共和国开始由共和派来统治。人民在反动统治时期期望共和派掌权后会实现所允诺的改革，但是他们完全失望了。人民对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再信任，但又不知道应当指望谁。社会主义政党刚一形成就发生内部派别斗争，在人民看来，不能保证取得胜利。因此，人民便追随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冒险家。曾经对布朗热将军的异乎寻常的威望感到震惊的保皇派，后来才想到把这位前陆军部长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利用它作为复辟的工具。

布朗热主义给社会主义帮了大忙。它起了所谓的最后一滴的作用；它使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希望破灭了；布朗热主义出现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在舆论中就永远声名狼藉了。在布朗热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一切派别都当过政。他们无一例外地清楚表明自己存心不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改革。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击败将军这位世界末日的可悲的凯撒。只有一个政党能够继承人民以前给予共和派的信任和它糊里糊涂对布朗热表示的信赖，这就是社会主义政党。

在马赛代表大会之后，社会主义者立即向资产阶级共和派宣战。他们知道，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和加强它的有目的的行动，必须使社会主义政党独立，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党明确划清界线。因此，社会主义者不仅应当阐述自己的纲领，而且还应当经常用这个纲领同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相对抗，要求这些政党的领袖出来就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公开辩论。一些律师和资产阶级政客依仗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即在此之前自己对劳动群众所拥有的不可争辩的影响，出来参加这些口头的论战。他们坚信，他们一定会对社会主义者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一露面和高唱雄壮的自由歌，就足以使被甘必大称之为“喝醉酒的奴隶”的人们躲到地底下去。但是，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听众们却对甘必大喝倒彩。这些老爷们大失所望。经过几场对他们不顺利的论战之后，他们停止了同社会主义者的争论，因为后者虽然在声誉，甚至常常在口才上都不能同他们相比，但是却成功地“唆使”工人听众去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当共和派不再参加社会主义者召集的会议时，社会主义者开始在自己的会议上攻击资产阶级政客。在这里，敌对阵营的中心，他们不断地取得胜利，以致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实际上宣布自己战败了，因为不论在巴黎，还是在任何一个

有社会主义组织的城市，他们再也不敢举行公开集会了。工人党剪掉了律师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的舌头。经过这个初步的胜利，社会主义者可以自由地接触以前只听资产阶级政客的声音的工人居民。

这个胜利增强了社会主义者的勇气，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宣传热情。成百上千的富有口才而缺乏金钱的宣传家走遍全国各地，深入城镇和乡村，根据自己的力量和理解讲解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所有地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都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基础。工人群众完全失去了生产资料；他们仅仅靠工资维持生活；他们聚集在工厂里，共同进行劳动，因此，由个体所有制产生的一切本能和观念都丧失了。小资产阶级由于经受不住大工业和大商业的竞争而破产了，并被世界性的金融势力掠夺得一干二净。宣传家只需要把在几十万和几百万人头脑中模糊不清的思想说出来并用明白的、虽然并不总是科学的和学院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够了。马隆和盖得把拉萨尔的口号，诸如“铁的工资规律”和“第四等级”等变成了流行的说法。虽然在科学和历史方面它们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们在法国象在德国一样是有效的。

除口头宣传外，还进行了实际工作。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所追随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始终反对罢工。他们向工人们说明，罢工即使取得胜利也不会给工人带来好处，不要进行罢工，最好用自己的钱来建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但是，他们的说教等于在沙漠叫喊；没有人理睬他们，罢工仍旧举行。不过，他们的高明的劝说很符合这些家伙的利益；这些话使得政治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可以不考虑罢工问题和不反对政府用国家的一切镇压力量来为企业主服务。现代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不去劝说或劝阻举行罢工，而是如果举行了罢工，就

加以支持，因为他们知道，罢工是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必然表现。最初，他只是用自己有限的资金支持罢工者，但是当议院里出现了社会主义者议员后，他们就为罢工者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因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单独地决定赋予议员什么权利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给议员们提供了相当大的特权。法国议员是不可侵犯的；只要他佩带三色绶带，就不受官方的逮捕或侵犯，除非他严重违法时被当场拿获；只要他出示自己的议员证章，警察和宪兵要给他让出一条路来；在缴纳一百二十法郎后，议员在一年内可以在所有铁路线自由地旅行；最后，他每年可以得到九千法郎的津贴。曾经为自己提供了这些优厚的议员特权的资产者先生们没有想到，有一天议员们会利用这些特权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当社会主义者议员用自己议员特权为罢工者服务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惊愕，大为恼火。1885年第一批进入波旁宫的两个社会主义者巴利和卡梅利纳，最先以议员的身分干预了德卡兹维耳罢工。1889年由于博丹、费鲁耳、茹尔德、拉法格等人当选，社会主义者议员的人数增加了，他们都认为学习自己的两位先行者的榜样是自己的职责。现在议会里已经有五十名社会主义者，任何一次比较重要的罢工，都受到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干预。当发生罢工时，他们轮流前往罢工地区，所以罢工者始终可以当场得到一个或几个议员的支持，使他们免遭奸细的罪恶干涉和警察以及武装力量的残酷迫害。从前，工人们在罢工时被形形色色共和派政客可鄙地置于不顾之地，他们听凭工人们遭受企业主的专横恣肆，而不加保护，政府动用国家的一切权力手段来支持企业主。而现在工人一次又一次体验到，在罢工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出现一种新的力量：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威信。德卡兹维耳、卡尔莫、亚眠、加来海峡、特里尼亚克、格赖塞萨克等地的罢工引起了广大的居民阶层的热情关注，并使工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者议员是他们的利益的唯一保

护者。社会主义者在许多地方取得了胜利，这明显地表现在 1892 年市镇选举和 1893 年议会选举上；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各地都当选了，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被击败的地方也得到非常可观的少数。^①

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客已经明白，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它有明确的纲领和明确的政策；他们已经明白，过去和现在使社会主义者发生分歧的纷争并没有妨碍他们取得选举的胜利；社会主义先锋战士的宣传热情丝毫不因受到惩处而减弱，相反，法律判决使他们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最后，从 1848 年起不断重复的诽谤社会主义者的陈词滥调连资产者都已经不相信，更不用说工人了。

（六）教士和社会主义

教士首先理解了由于保皇党的失败、布朗热主义的垮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破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而形成的新的政治形势。现在，凡是有组织人民群众和引导他们参加政治斗争的政党的地方，政权最后必定会转入拥有普选权的人民群众的手里。神父们回想起教会在中世纪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回想起他们当时在城市和乡村对人民群众有过多么大的影响。为了逃避封建贵族和城市权贵的压迫，群众曾寻求教会保护。神父们幻想恢复过去的时代。因此，他们决定与社会主义者争夺工人。根据罗马下过的指令，修道院长、教区牧师和修士们开始参加资产阶级共和派与

^① 1892 年在全法国——巴黎和塞纳省除外——举行市镇选举时，光是支持所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候选人就有十五万七千五百三十一张选票，他们的七百三十六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镇参议员。1893 年议会选举时，工人党（马克思主义者）在三十一个省得到二十四万六千张选票，各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得到七十万张选票，其中有三十人当选为议员。属于议会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其余二十名议员是社会主义激进派，他们这次选举之后加入社会党。——拉法格注

已不露面的公开集会。他们的讲话比律师和资产阶级政客巧妙得多。他们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讲演者，而是决定用机智来战胜这些人。他们情愿无保留地承认，工人的处境是不堪忍受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评是公正的。当然，他们补充说，这种不幸的原因似乎是人们离开了教会所指明的道路，没有听从它的圣诫。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者也象他们所攻击的共和派——共济会会员一样不能消灭人民的贫困，在当今时代只有教会才能改善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命运，就象它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但是教士很快就对公开集会感到不满了，因为他们尽管老奸巨猾，却常常被社会主义演说家驳倒。他们开始在教堂里宣讲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在那里象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他们用不着担心遭到反驳。但是，为了使教堂里的会议能够象公开的人民集会那样具有吸引力，他们采取中世纪惯用的一个办法。让一个反驳者——在中世纪这种人叫做“魔鬼的律师”——出来同宣讲基督教社会主义纲领的布道者唱对台戏，为非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作辩护。当然，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讲了一堆非常荒唐的话，而上帝的律师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些话驳倒了。

但是，神父们很快就明白了，尽管他们非常狡猾，还是走进了死胡同。他们未能诱使工人离开社会主义者，而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工人推向社会主义者一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仍然还是某种荒唐可笑的怪物。正象在1848年一样，人们还是经常把社会主义者看成是“喝人血的”，发狂的、暴戾的人，他们不善于提出论据和进行辩论，总是恶语伤人和动辄大打出手。当教士们参加公开集会时，总要有一群忠实信徒伴随着，给他们捧场和必要时保护他们免遭粗暴的袭击。现在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亲眼看到社会主义者集会上的情景。他们听到社会主义者心平气和地和实事求是地阐述无可辩驳的论据；他们看到社会主义者的同志们在

神父讲话时平心静气。因此他们从这些会议上带回去对社会主义者的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完全不同于他们以前在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的圈子里议论的传统看法。这样一来，教士们就通过他们在公开集会上的讲话给社会主义者帮了大忙。他们为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散布的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诽谤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甚至违反自己的意愿而使得社会主义组织的银库充实起来。只要一宣布某某集会上将有教士同社会主义者辩论，会场就会挤满人。利尔的跑马场可以容纳八千人，但是对所有从邻近各省拥来参加公开集会听修道院长诺代和拉法格演讲的人来说便显得太小了。这次晚会使利尔的同志在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盈余二千八百法郎。

如果一个党是该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产物并与之相适应，那末它就会诸事如意。教士们想要消灭社会主义，对它进行讨伐，反而促进了它的发展。他们对这种徒劳无功的角色感到厌倦了，他们在公开集会上的演讲是短时间的现象，他们很快就仿效资产阶级给他们作出的榜样；他们逃避公开集会，以免再受人讥笑。

(七) 警察和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政党还要战胜一个比教士可怕得多的敌人，这就是警察。

资本家阶级既无力靠劳动获得财富，也无力保护自己的财富，所以它是第一次使警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牢固的支柱的有产者阶级。在这方面，它毫不吝惜地花费重金；资本家阶级用基督教的仁爱的外衣掩盖警察的一切肆无忌惮的和违法的暴行；如果有时本阶级的某个成员被“法律的眼睛”惩治了，它甚至会感到某种欣慰，因为这样它就可以稍微领略一下警察对那些不幸落入他们沉

重的和总是非常肮脏的魔爪的穷人和社会主义者所能采取的手段。

警察被当成娇生惯养的孩子，所以它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它自作主张把无政府主义引进法国，为的是用它来同社会主义相对抗，同时还要吓唬一下善良的公民，以此取乐。前警察局长安德里厄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警察当局出钱在法国创办了第一家无政府主义报纸，向大家介绍制作爆炸物和炸弹的配方。安德里厄接着透露说，众所周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梯也尔先生的雕像的第一次袭击是在警察的同意和帮助下进行的。但是，警察局在资本家心目中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机构，它干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坏事。安德里厄先生不仅没有被触动——虽然他自己供认他策划过无政府主义密谋，而且政府中和抱有良好意愿的报刊上没有任何人因他干了这件事而对他提出轻微的指责。他们感到最大的遗憾是他自己毫无顾忌地把事情透露出来了。不过，资产阶级报纸总是流露出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情，甚至是温情，鼓励它攻击社会主义。去年《费加罗报》得意洋洋地刊登了无政府主义者科亨反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篇谩骂性文章。顺便提一下，这家“抱有良好意愿的”报纸向科亨先生的诽谤性澜言支付了一笔优厚的稿费。

警察满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听从它的任意支配。它打算利用这些先生专门去反对社会主义者，阻止他们的宣传活动，破坏他们的集会，携带凶器闯入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部并用匕首和枪弹对付社会主义者编辑。只要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和为社会反动派服务，他们是不会受到打扰的。警察曾接到命令，如果某个无政府主义匪帮袭击社会主义者，哪怕他是巴黎市参议员，也要袖手旁观。例如，现任议员、前巴黎市参议员鲁瓦奈有一次遭到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为首的是奸细马蒂内，他们把他打倒在

地并用脚踩他。目睹这个事件的警察却不闻不问，以哲学家的超然态度说了一句“让这些先生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便扬长而去。

警察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宽容态度使无政府主义者更加嚣张了。他们首先把自己的关于财产的个人主义理论变为行动，抢劫了一些橱窗内陈列的商品和店铺，开始闯入富有资产者宅院进行抢劫，如果遇到反抗，便诉诸刀枪。资本家感到这种强盗行为过于野蛮，对此表示反对。警察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喽罗们无政府主义者逮捕起来，送交法庭。法官不得不把他们当作一般的骗子和盗贼来审判。“伙友们”对此大为不满，便开始袭击法官，不论他们是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开始向上瞄准：瓦扬向众议院投炸弹，而卡泽里奥打死了卡诺。

大臣们和政客们曾经鼓励警察利用无政府主义者打击社会主义者，当匕首和炸弹的骑士们抢劫私人并用炸药把法官和证人从尘世送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他们无动于衷。但是，当无政府主义者危害政客的生命时，他们才发现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吓得发抖的议员要求制定惩治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律和增加警察预算。这些先生们非常清楚，他们国家的警察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所有这些使勇敢的资产者心惊肉跳的谋杀有牵连。尽管如此，他们非常敬畏这个可尊敬的机构，以致不能对它表示任何一点非难和要求追究它的行为。他们唯恐得罪警察，不仅如此，还急忙赋予它以新的特权和优惠。他们合掌祈求“可敬的人”保护他们免遭无政府主义者的炸药和匕首。

当警察放出无政府主义者破坏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时，政客和资本主义报纸“完全一致地”为警察鼓掌喝彩。资产阶级报纸津津有味地最详尽地报道无政府主义者“伙友们”破坏社会主义者集会的激烈场面。它们报道这些场面时幸灾乐祸地高呼：“请看啊，社会主义者彼此是怎样对待的”。它们非常起劲地在公众当中散布一种

看法，似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说，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逻辑结论；无政府主义者是勇敢真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变为行动；而社会主义者是伪善的、不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怯懦和爱好虚荣，因而不敢从自己的理论中引出全部结论。这种策略曾经得逞一时，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长期把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罪行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尽力消除资本主义报刊恶意编造和支持的这种不良的概念混淆。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理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后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必然产物，无政府主义者放纵个人行动，而社会主义者期望通过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取得胜利；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反对选举权，而社会主义者利用选举权来参加立法和行政机关，使得资产阶级政客惊恐万状；无政府主义者谴责罢工和五月一日的示威，而社会主义者支持罢工并参加五一示威；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和谋杀专制的个人来进行宣传，而社会主义者只承认思想宣传，既不同意鼓吹凶杀的演讲，也不同意使用火药罐，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抢劫行为和他们的盲目的和野蛮的爆炸行径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反，必然会延缓这个问题的解决，激起一切正直的无产者的愤怒。但是政客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愤怒上，以败坏社会主义者在舆论中的声誉，把他们送交法院当作一般罪犯来审判。当1882年盖得、多尔莫瓦和拉法格被交付木兰城的轻罪法庭并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时，共和国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宣读了一家由警察资助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的文章。

这种曾经给社会主义宣传带来极大危害的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混淆持续了相当长的时候。如果不是最近的谋杀事件使社会人士看清了事实真相，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从前一向被人忽略的事实真相大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一切实行或

赞助“行动宣传”的爆炸英雄，表现出对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辱骂这些战士，把这些战士说成是“头目”和“教皇”，就象资本家方面把这些人叫作“煽动者”一样，他们甚至扬言要杀死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从一些书本上吸取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的。这些书是一些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和哲学家，如达尔文、海克尔和赫伯特·斯宾塞所写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社会主义著作家。现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如埃利泽·勒克律和克鲁泡特金，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样，流露出对卡尔·马克思的科学贡献的极大蔑视。在他们的多愁善感、辞藻华丽和矫揉造作的著作中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如果有什么学说应当为无政府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打败的和被践踏的人们的绝望心灵中滋生和发展起来负责的话，那就是关于生存斗争的自然科学学说。这种学说不过是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自由竞争的理论的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无政府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指出，对人和社​​会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关系怎样向前发展并自然必然地导致共产主义。

警察本身也对消除它非常愿意保持的概念上的混淆作出了贡献。1893年1月1日，瓦扬谋杀案发生后若干星期，内务部长雷纳耳下令搜查，逮捕了两千人。所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住处都突然受到彻底的搜查，被发现的所有文件都被没收。内务部长希望用这种办法搜寻可使人相信有社会主义者参与的大密谋案的事实材料。他本来以为，在没收的文件中总可以找到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的信件，从中发现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内部协议和秘密联系。雷纳耳非常失望。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就连社会主义者的一封普普通通的信也没有找到，相反，尽是无政府主义者谩骂和威胁社会主义者的信件。这样一来，警察的搜查最清楚地

表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私生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没有任何联系，相反，他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彼此敌对的。不过，如果说警察要把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牵连在一起的努力遭到了惨败，那末它并不是一无所获，而是发现了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在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件中发现有神父、交易所大王、公爵和其他反动头面人物的信件。这些信件中有表示谢意和通知寄款的内容。看来，巴黎交易所经纪人的联合会里有一笔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专款，用来防止几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卡拉瑟枪击交易所的事件重演。无政府主义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机灵的人就靠狂热者的罪行所引起的恐慌进行敲诈勒索。从前在一个交易所经纪人那里当差的塞巴斯蒂安·福尔是交易所经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中间人。能够说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是他经常兑换显然来自及时防止爆炸事件基金的面值五百法郎的银行券，因为人们几年来一直猜不透福尔以什么为生。警察因面抓获了一些无政府主义银行家。它把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众显然是为了开脱它似乎向瓦扬供给了制造炸弹所需的一百法郎的指控。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曾非常谨慎地和小心翼翼地询问这一百法郎的来源，使得听众对指控的正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报刊和政客们解释说，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导，人们一开始是集体主义者，只要他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勇敢的和真诚的，最后必定会成为炸药的信奉者。这种杜撰并不成功。几乎所有靠思想宣传或行动宣传发迹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教会培养出来的，这可能是惊人的不幸的巧合。能说会道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家塞巴斯蒂安·福尔在法国各地举行集会，激昂慷慨地号召采取暴力行动，这个人就是在圣亚田的神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父亲死时，二十五岁的福尔在他应当献身作教士的时候离开了这所学校，投身于商业生活，把他妻子的财产挥霍殆尽。尽管他作为

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轰动一时的活动，但是他始终同教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他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城市里同当地的教士聚会。现在还在服苦役的西沃克参加过里昂天主教联合会，当他开始充当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时候，他还是圣文桑·德·保罗协会的成员。拉沃肖尔和瓦扬都受过宗教教育；卡泽里奥以狂热的上帝信徒而著称，他在他童年读书的神学校里被叫作“圣徒”；十五岁以前，他在弥撒仪式上当童子合唱团员。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因公开赞扬谋杀卡诺而被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却有一些教士。其中的一个人大肆吹捧卡泽里奥的谋杀行动并对不能寄钱给卡泽里奥表示遗憾。教士仇恨卡诺，是因为他们把他看成是“共济会会员”；早在卡诺遇刺当天，天主教报纸《北方十字架》就刊登了一篇反对共和国总统的文章。这篇文章曾经预言：“他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教会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它有权审判国王和公爵并作出判决。在中世纪，它曾经推翻过君主；耶稣会教徒把匕首交给了杀害法国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凶手；正象巴斯噶在他的著名的《一个外省人的信》中所指出的，他们的最有名望的学者支持这样一个论点：“要让那些准备迫害我们的人活不成”，而且还要让“那些损害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名誉的人，反对我们的伪证人和对我们作了不公正判决的法官”活不成。谁知道这样的学说现在是否还对某些人继续发生作用呢？无论如何，这些以巴斯噶为代表的著作并没有遭到教皇的谴责。话又说回来，难道《旧约》不是赞扬犹滴委身于亚述统帅和罗孚尼，把他灌醉，然后将他杀死的行为吗？谁知道不是卡泽里奥在虔信宗教的少年时代读过的这本悲剧故事给了他杀死卡诺的勇气呢？

* * *

无政府主义者自己竭力扩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他们仰仗人们对他们采取的宽容和姑息

态度在实践自己的理论方面走到了极端。当政府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打击的矛头指向议员和国家政权的代表的时候，它当然认为有必要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并打碎它本来打算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斗争手段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它们一个个都被打碎，或者不得不再被抛弃，因为它们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策划者。

当社会主义者开始使资产阶级政客感到不愉快的时候，这些政客决定利用 1870—1871 年的失败给法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国际主义成了滔天大罪，人们把他们称作普鲁士的同盟者，因为他们高举着资产阶级在 1789 年曾经举过的向暴君宣战和宣布一切民族友好的理想旗帜。1880 年抛出这种诽谤的机会主义者不可能把它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的领袖费里和甘必大自己不得不寻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接近。他们向俾斯麦卑躬屈膝，甚至向他讨教他们的殖民政策口号。布朗热主义之后对沙皇的幼稚而又无意义的崇拜成了一种时髦，爱国者把沙皇看成是保护法国的天使，这时有人认为再一次指责社会主义者是没有祖国、背叛祖国的人的有利时机到了。这是 1893 年选举前的情况。俄国要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揭露了它在亚洲的野蛮行为，它企图让欧洲流血，使沙皇俄国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奉行它的巴尔干政策和向君士坦丁堡挺进。俄国大使馆收买了资产阶级报刊并把早在布朗热主义时代就已经为其效劳的戴鲁累德们和米尔瓦们放出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似乎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无祖国”的人，而且还把自己出卖给了普鲁士，而普鲁士从韦耳夫王室基金中拿钱酬劳他们。他们从柏林得到组织罢工和通过宣传制造政治混乱局面的命令。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建立选举基金而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的二千五百法郎被说成是几十万法郎。人们指望，通过报刊和广告散布这些丑行必定会永远败坏社会主

义者在选民心目中的名誉。因此，当“祖国的敌人”、普鲁士人的帮凶在法国各地得到七十万张选票，即占有所有选票的十分之一，还有三十名社会主义者被选入议会时，资产阶级政客大失所望。这个事实犹如晴天霹雳。一开始，他们就向全世界宣布，他们要求宣布所有在竞选中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资助的人当选为议员都是无效的。但是在选举之后他们却很机智，不敢贸然地把这个威胁付诸实施。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只剩下一个手段了，这就是凭借国家权力采取野蛮的暴力；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决心同它争夺政权并夺到手。

(八)社会主义和农民

尽管无耻的敌人设置了无数的障碍和困难，社会主义政党仍在继续发展和日益壮大。经过它的成员的不倦的和积极的宣传，它逐渐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而以前他们说这个理论是异邦的、德意志的思想成果，既不好理解，又难以捉摸。社会主义成了时髦，而因为时髦在法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人人都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敌人也开始对社会主义表示有保留的赞同，说什么在大量错误的和幻想的思想垃圾下面埋藏有一些应当加以挖掘和实现的实际真理。有人甚至说，应当用实现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改革的办法同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这样可以剥夺他们借以对无产阶级群众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的手段。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了这个计划，但是它带有浓厚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色彩，因而未能实现。不仅工业中心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参加社会主义者的

队伍，而且乡村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接受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政客认为，农民是反动派的后备军。当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取得成就时，他们认为主要的选民群众最终来自农村，土地共有的学说必然会在“反集体主义的农民脑壳”上碰得粉碎，以此自我安慰。他们认为，农民任何时候也不会容忍土地共有的思想，因为农民对自己一小块土地的眷恋之情非常深厚和强烈，以致于这种感情在农民的心灵中排挤了一切其他的激情，迫使农民拚死地劳动，以满足这种感情。但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三十年来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缺乏认识。帝国初年在铁路建设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的农业导致了地产的集中，而地产的集中又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和改进的农业机械，外国谷物的竞争和法国酿酒业地区的葡萄根瘤蚜灾而加快。当然，在法国土地所有者的人数依然很多。如果仔细地分析1884年最近一次人口统计结果，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地产正在非常快地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

当时四千九百五十万公顷可耕的和纳税的土地分属于八百三十四万六千个所有者，其中五百零九万一千个农民占有二百五十七万四千公顷，也就是说，每个所有者平均占地半公顷；而二万九千二百零一个所有者占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公顷，即占法国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占法国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半以上的五百万农民仅占有可耕地的二十三分之一。自从前而提到的那次人口统计以来，美洲和印度谷物的竞争愈加激烈，葡萄根瘤蚜使葡萄园一片荒芜，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事件和大金融资本家的其他世界性的掠夺使成千上万的人破产。结果，地产的集中越来越快，因为上述种种情况使大批中等所有者消失了，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人数量不多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大量小农，他们只占有一小块土地，靠这块土地根本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为了能够活命，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需要“人手”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土地所有者。

大土地所有者因为需要小农，才容忍他们在自己身边存在。这些小农仅仅名义上是自由的所有者，对他们来说，占有一块土地等于一条把他们拴起来为大土地占有者干活的锁链。农民的小块地产类似阿尔萨斯的慈善工厂主建造的“工房”。工厂主把它们廉价租赁给自己的一部分骨干工人，好让他们终身为自己的工厂干活。

铁路和现代金融资本从1852年起对农业关系起了革命作用，但是有产阶级不知道或不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铁路使农村生活发生了变革。铁路把从前必须在产地消费的农产品运到了外地市场。铁路把农村居民运进远离家乡的城市，而从前农民从生到死都没有离开过故乡。因此，农民逐渐摆脱了他们从前的迟钝和笨拙的特点。他们已经不再过祖辈时代那样与社会隔绝的生活了。他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加入了全国的生活。把每个健康的人变为士兵的义务兵役制和渗透到最边远村落的廉价报纸更加强了铁路的上述作用。铁路本身也许是我们的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世纪的最伟大的革命因素。除了铁路的革命作用之外，金融资本也发挥了革命作用。它用自己的魔力把农民世代代积聚下来的所有金钱都集中到它的贪婪的、掠夺者的手里。它用不亚于魔术的巧妙手段把农民的黄金和白银变成了巴拿马投机公司的股票。金融资本通过这个办法完成了铁路的事业并在农村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基础，正象大机械工业在城市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基础一样。

社会主义者在城市开始进行宣传活动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向农村派出一些某种意义上的前哨，深入到那里的一些地方，以便熟悉这个领域。最初向农村传播社会主义信息的尝试是谨慎的。社会主义者面对着新的居民成分，他们不知道如何接近农民，如何同农民交谈。他们不了解农民的习俗，农民的最切身和最迫切的需要，农民的思维方式。他们害怕向农民讲那些在工人那里受到热烈同情的理论而把农民吓跑。

很明显，社会主义者必须经受一段时期的考验，他们必须交一些学费。尽管如此，他们已经着手在乡村进行宣传并为这种宣传在农村能够被接受而感到非常惊异。保守派曾担保说，只要他们一提起社会主义，农民一定会用链枷和叉子对付他们。但是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农民恰恰要求宣传家讲解社会主义；农民津津有味地和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讲解；农民抱怨他们为什么不早点来，他们注重城市而长期忽视农村；他们发现农民嫉妒他们以前把在城市居民中进行宣传放在首位。^①

^① 我上面说的是有切身体验的。我1885年到阿利埃省，1889年到歇尔省进行过宣传旅行。当时我到过法国中部这两个省的许多村庄，那里小农户占优势，但是也有大地产。一些大地产早在1789年革命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我访问过一些森林深处的偏僻村镇，从最近的火车站下车还要坐上四、五个小时的马车才能到达那里。许多村镇还从来没有举行过民众集会。居民只能到教堂里去听神父的布道。因此，人们常常把我叫做“布道者”。在歇尔省有一个小农所有者、该村的村长陪同我到各个地方。集会的地方总是挤得满满的。附近的人们从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赶来听社会主义“布道者”讲话。妇女们特别热心和好奇，但是她们非常胆怯，不敢进会场，宁愿站在会场的敞开的大窗户下面。我从来没在这样聚精会神的听众面前讲过话。农民们静静地听我讲话，不用任何同意或不同意的表示打断讲话。开始时，这种寂静使我感到奇怪和不安，我觉得似乎他们听不明白。但是，当我的报告结束后同会议参加者随便交谈的时候，我才发觉我的想法错了。农民有外交家的本性和素养，从来不露声色。开会时乡村听众的举止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我后来同他们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们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并要求解释我讲话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我对他们对自己处境的认识表示惊讶。他们的认识比许多产业工人更清楚。同我谈过话的农民们都很清楚，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同大地占有者的竞争作斗争越来越困难了。我在许多地方观察到，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眷恋并不象资本家所说的那样严重，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大大削弱了这种对自己小块土地的爱。即使农民对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并不特别热情，但是他们毕竟看到，在现存的条件下，实行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上述两次宣传旅行之后，我还到其他省的农村地区作过宣传。我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的死敌卡桑尼亚克关于社会主义必将征服农村的预言是正确的。他写道：“除了这一切之外，如果再加上日益增长的农民不满情绪、他们的地产的缩减、几乎完全断绝收入、二十年来向他们许下的诺言（农业信贷、农业保险、老人和残废人基金，减轻租税负担等等）不兑现，那就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在这里为自己的传播找到了非常现成的土壤”（1893年9月25日《权威报》）。——拉法格注

社会主义者在1892年5月1日市镇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七百三十六名社会主义者被选入各个市镇参议会，象鲁贝、蒙吕松、纳尔榜等这样的大城市的行政管理权转入社会主义者的手中，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认为着手在农村居民中开展经常的和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的时机已经到来。全国委员会在马赛召开党的年度代表大会，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市镇参议员参加。在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问题中“土地问题”占首位。曾经邀请农民派代表——虽然他们还不是党员——参加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要讨论他们的利益。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全国委员会举行了关于农民的状况和改善这种状况所必要的最迫切的改革的调查。全国委员会希望代表大会在听取农民本身的意见之后再通过决议。^①

两次马赛代表大会在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历史上都是重要的里程碑。1879年第一次马赛代表大会曾经通过决议：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夺取政权，以便把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转交给社会。在1892年第二次马赛代表大会上，党制定了代表农村居民的利益的改革纲领。这是法国一个现存的政党第一次以农村劳动者的保护人的身分出现。从前似乎为了发展农业而提出和实施的一切改革都只是为了帮助大地主老爷。这个“马赛土地纲领”——人们通常这样称呼1892年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要求进行有利于三类农村劳动居民的改革。这三类人是：1. 短工，他们同城市工业工人一样，按天、月或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 佃农或分成制佃农，他们耕种资本家的土地，付给资本家一定的租金，或者一定数量收获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所得只占收获物的规定的份额；3. 小农和细小农，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收入

^① 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安塞尔作为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万-科尔作为荷兰党的代表出席了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他们对工人党党员以及从法国南都和中部各省前来参加会议的农民讨论土地问题的方式表示非常满意。——拉法格注

低微，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为佃农和自己经营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干活。全国委员会以小册子形式发表了马赛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全国委员会还在每项改革要求后面附上一个简短而重要的说明。这个小册子共印刷了十万份并散发到全国各地。法国工人党的农业改革纲领非常符合上面列举的农村居民阶层的切身的需要，所以许多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议会选举时从这些居民阶层那里得到了他们击败和战胜自己对手所需要的选票。社会主义者在农业地区所得的选票主要是要归功于工人党的改革纲领。

自从工人党开始根据这个纲领在农村居民中进行宣传工作以来，有产者已经注意到它将会起什么作用。在议会选举之前很久，为了一开始就抵制社会主义者，村庄和小村落到处都有很多重复 1848 年的陈词滥调的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传单，说什么社会主义者是“均产者”，想要抢夺农民的财产，破坏社会秩序和家庭等等。但是时代不同了。这些无稽之谈不再起作用了。曾经被巴拿马运河公司和其他同样显赫的企业的骗子手和投机者抢夺一空的小农现在认清了真正的“均产者”是谁；他们开始明白，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均产者”的敌人。

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社会主义政党不仅仅在城市居民中吸收自己的支持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参加它的队伍。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所有那些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或思想发展而必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将加入党的队伍。

(九)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

几年以前才参加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党当时没有期望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而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宗旨，现在开始准备进行争夺政权的合法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后必将战胜自己的所有对

手。它经过在市镇、省和议会的选举中对自己力量的检验，不久前试图向参议院进攻，争取在那里得到席位和选票。今年年初在塞纳和阿利埃两省举行参议院选举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龙格和提夫里埃。甚至在许多党内同志看来，社会主义参议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参议员是根据有限制的选举权当选的，参议院是反动化石的收藏室，是残废人收养院，被普选权抛弃的政客的养老院。因此，必须使党的拥护者懂得，社会主义者必须占据一切阵地，如果将来罢工时在罢工者当中出现一个保护他们的参议员，那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这两位社会主义候选人落选了，但选票相差不多，而一位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阿利埃省取胜。无论如何，用不了多少时间，社会主义者就会进入参议院，它的成员是由众议员、省会议员以及各省的市镇参议员选举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这些机构中有了代表，而且代表人数一天比一天多。

正当社会主义者广泛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争取到人们承认的时候，正当来自体力和脑力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资产阶级队伍的拥护者人数增长的时候，正当各个社会主义流派之间从前存在的纷争平息下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政党在继续瓦解，在公众的心目中越来越失去影响。布朗热主义击败了保皇党，促使激进派在工人当中失去了拥护者。那些从前还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抱有某些希望的无产阶级群众，现在准备转向社会主义。曾经使得一切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威信扫地的巴拿马丑闻最彻底地破坏了机会主义政党的声誉。但是由于还有相当多的机会主义者进入新议会，所以他们组成最强大的议会政党。在他们周围集聚了一批反动分子（保皇派和波拿巴派）——其中许多人倾向共和制，以及左翼和极左翼的成员，他们害怕社会主义更甚于最残暴的专制制度。进入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大约有三十人。但是议会开幕不久，就有米勒兰所领导的大约二十名激进派分子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些人并不接受

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理论原则，但是承认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实际改革的必要性并支持这些改革。目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共同组成社会主义联盟这一议会集团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为一方同得到右翼和左翼议员支持的机会主义派为另一方之间，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极左翼拥护者，他们没有固定的立场，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倒向另一边，今天同这些人一起投票，明天又同另一些人一起投票。这个中间集团必然会消失，或者至少越来越缩小并失去作用。实际上，在法国议会只有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和互相对立的党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政党，另一个是机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政党人数不多，但实际上是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对它有利。它的成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形势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它还由于自己的党员的才干、毅力和威望拥有很大的影响。机会主义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票。不过，即使所有参加该党的议员不都是骗子，那末它的最有影响的成员无疑是投靠了金融大王，参加过最肮脏的和最奸猾的投机活动。头目们的无耻和出卖灵魂的行径损害了整个党的形象。这个党被人们痛斥为巴拿马分子的党，并将永远保留着这个烙印。

1893年10月议会一开幕，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就展开了斗争。四万采煤工人在加来海峡省举行了罢工，杜毕伊部长动用宪兵、军队和行政机关支持煤业公司，企图强迫工人下井干活。社会主义者议员的当选虽然还没有得到确认，他们就急忙前往罢工地区支持罢工者。而多数议员对这种行为竭力表示不满，同时，以选举昂赞煤矿的最富有的股东卡季米尔-佩里埃当议长来表达自己的反动情绪。他们用这个办法给内务部长杜毕伊指明了行动方针。他在以内阁的名义宣读的文告中放肆地叫喊：“社会主义就是敌人！它的拥护者想要废除私有财产，用匿名的国家暴政来代替公民的个人主动性和自由合作；他们宣扬阶级斗争，其实从大革命

以来已经不再存在阶级了，财富已经在一切社会成员当中分配得越来越平均，个人财产已经普遍化，从个人财产代替集体占有的程度可以衡量文明的进步，”等等，等等。“……我们坚决镇压任何煽动和无秩序行动；并以祖国的名义无情地严厉打击一切暴乱首领，不论他是谁！”中间派听了这个文告之后欣喜若狂和拍手称快。它终于找到了消灭社会主义多头蛇的海格立斯。

在这种情况下，饶勒斯站出来了。他逐点批驳了政府的纲领，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他指出：“你们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可是你们对你们自己想要实行的改革只字不提。你们的改革纲领不过是一系列否定，不过是你们连试行也不愿意的改革的清单；至于你们提出的改革，你们自己一开始就宣布说是不能实行的。你们给我们端出的一道菜是一个零。你们想在改革问题上用宣布讨伐社会主义来抵销你们的零，这是办不到的。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刚才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荒诞无稽。你们这样做是反对整个现代经济的发展，反对机器，反对铁路，反对工厂，反对生产资料的集中化。你们不明白，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从那些通常被称为煽动者的人的头脑中产生的，而是在经济关系本身的内部发展起来的。你们主张义务教育，普选权，而同时却攻击社会主义！但是，教育会启发人民的头脑，使他们理解社会不可阻挡地向社会主义发展，而普选权正在使无产阶级成为政治关系的主人，而且不久就会使它成为经济关系的主人……你们是些什么人，竟想要阻挡历史的道路？你们和你们的同僚不过是议员大家庭的内阁神甫。你们可以用刺刀对付罢工者，可以把他们的领袖关进监狱，但是，你们将会象欧洲的胜利者俾斯麦一样不得不为无产阶级清扫道路，使它能够朝着夺取政权的目标前进，以便借助于政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剥夺资本家阶级。”

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的讲台上竖起了自己的旗帜。饶勒斯以

道地南方人的奔放热情和扣人心弦的言辞阐述了社会主义宣传家在人民群众中已经传播了十二年的思想。在他的非常精采的讲话之后，中间派席位上发出了不是同意而是愤怒的喊声。但是，当杜毕伊出来答辩的时候，这种愤怒变成了沮丧。在议会里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人象这位不久前还是非常神气的内务部长这样张惶失措和无可奈何。他说：“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空谈”，接着又改口说：“它是一种宗教，是某一种东西，它分解为被煽动者们利用的社会主义和我们力图实行的可能的改革”。这时，所有刚才还兴高采烈的面孔都流露出失望和绝望的神色。杜毕伊这个同大象一样有力的海格立斯只不过是一个空皮囊。两天之后，他便辞职了。

形势急转直下。在上届议会里，只要社会主义者一登上讲坛，就引起一场哄闹，把他的声音压倒。现在可以讲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议会中已经有了足够的代表，使自己的演说者受到尊重。有一天，多数派想故技重演，用大声喧闹来压倒瓦扬的讲话声音。但是社会主义者议员以牙还牙，阻止部长的讲话。人们对此表示愤慨，把他们的行为称为胡闹，这给了多数派有益的教训，现在他们只好听社会主义者讲话了。

不过，杜毕伊内阁的垮台不是社会主义议员的第一次胜利。1893年11月19日的《时报》报道说：“议会里的社会主义集团已经取得了某种成果，这就是，他们使得埃纳省的议员无法提出一项爱国主义提案，如果通过了这个提案，新议会就可以对上月的法俄宣言表示支持。上述议员认识到，如果他提出这个提案，那末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会利用这个机会来阐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果展开这样的辩论，就不能不使非常崇高的感情受到十分轻率的攻击，从而遭到玷污。因此，这位尊敬的议员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可见，由于某些对自己的国际主义朋友负有责任的社会主义议员出席，在法国议会谈论法兰西祖国成为一件难事”。可见，

只有社会主义者反对骇人听闻的法俄同盟和共和制的法国对沙皇的亚细亚式专制主义的卑躬屈膝，社会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来遏止议员先生们的亲俄热情。

小小的社会主义集团使得资产阶级政客战战兢兢，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想成为杜毕伊的继承人，卡诺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卡季米尔-佩里埃出面组阁。曾经欢天喜地选举佩里埃当议长的议会多数派，由于社会主义者的坚决态度而发生分裂；惶恐不安的议员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第一次投票结果，新内阁只得到三十票比二十六票的微弱多数。最微小的事情可以使内阁失去这个多数。当瓦扬的炸弹爆炸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佩里埃内阁将垮台。惊惶失措的议员们集聚在卡季米尔-佩里埃的周围；他曾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给予警察八十万法郎经费和实行报刊管制法。这个法律甚至不容人们仔细地看一看，一提出来就立即通过了。如果内阁总理要求取缔棉布睡帽，因为棉布可以用来制造炸药，那末议员们也会同样盲从地投票赞成这个提案。

卡季米尔-佩里埃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来纠集自己的多数。警察奉命破获一件重大密谋案件。警察在全法国进行住宅搜查。每天早上报纸都报道说，警察逮捕了二、三十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通常在第二天必定把他们放了。而所有这些警察措施都没有妨碍艾米尔·昂利、帕弗尔斯和假拉巴尔迪的炸弹一个跟一个爆炸。警察在散布关于大密谋案的消息时，不得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总是个别人的行动，而且只有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之后，才能查明肇事人。但是，因为最近的一些谋杀已经不是针对议员的了，所以他们的极端恐惧心理逐渐缓和了一些，这使卡季米尔-佩里埃深为遗憾。

预算的赤字已达到一亿四千万。为了消灭赤字，财政部长比

尔多提议在税收制度方面进行某些修改——铸造低价值的银币和把国债的利息由四厘五减为三厘五。这后一项措施可以多收入六千八百万。在议会讨论这个提案的时候，社会主义者阿弗兹对部长说：“因为你们缺钱，所以我愿意向你们提出一个再多收入三千万的办法。不是把四厘五的国债券变为三厘五，而是变为三厘。你们可以实行这个办法，因为三厘利息的国债是平价”。如果阿弗兹提出的办法被通过，那就会危害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所以这个办法被否决，虽然只是以微弱的多数。比尔多一获得这个多数，就危言耸听地指责社会主义者想要通过降低利息来废除国债。饶勒斯针对这次表决回答说：“好罢，就请你们把国债变为三厘五的利息吧，因为你们不愿意破坏交易所投机者的自私打算，那末我要求把节省下来的这六千八百万给农村居民。每次降低利息时你们都许诺给农民减税；请你们这一次履行自己的诺言，利用这六千八百万来废除自耕农的土地税”。不论议会或内阁都没有料到这个切中要害的打击。一向冒充小农的天然代表的右派和中间派议员发现，他们别无出路，只有投票支持饶勒斯的提案，以免引起自己选民的强烈不满。公共工程部长不敢投反对票，而是弃权。这个提案赢得了压倒多数，如果表决有效的話，内阁就要垮台。绝望的比尔多跑去打电话，乞求卡季米尔-佩里埃赶紧来挽救危局。卡季米尔-佩里埃来到议会声称，如果议会不改变自己的决议，他就辞职。狼狈不堪的多数派为了不制造新的内阁危机而不得不屈从，在一小时内终于揭穿了自己的虚伪。这对多数派是多么大的耻辱！对社会主义集团是多么大的胜利！各式各样的庸人，从共和派自由思想者到天主教保皇党，都喋喋不休地对农民说，社会主义者是“均产者”，他们想要抢夺庄稼人的土地和金钱。但忽然间发现，这些“均产者”变成小农的支持者，并且保护他们免于向国库交钱，而资产阶级议员可耻地出卖小农居民，以免得罪卡季米尔-佩里埃先生。

无知、缺乏主动性而只会俯首听命的多数派的涣散状态同小小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的干练和智谋相对照更加引人注目，并使舆论感到惊愕。保皇派报纸《太阳报》发表了如下的具有代表性的议论。我在这里援引它，因为它是出自敌人之口。

《太阳报》写道：“社会主义者取得了他们有充分理由为之自豪的成就。从议会开幕以来，他们几乎在一切重大的辩论中都总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他们以无与伦比的榜样证明，干练的、无畏的和有好的领导的少数派能够做出怎样的事情。

议会制度的这些敌人利用议会制度给他们提供的一切手段来使议会机构瘫痪和受辱。他们在议会程序的最繁琐的和自相矛盾的规定下活动自如，就象在家里一样，他们在一次会议中可以几十次援引议会程序来破坏、阻碍和拒绝辩论，要知道，这个程序是为了正确地进行辩论而制定的。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有很好的纪律。在精明的领袖的领导下，当需要鼓掌、打断、叫嚷、沉默或捣乱的时候，他们行动一致，令人佩服。而一群配角没有想到要笨拙地掌握主动权。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他领袖们放弃在自己内部进行斗争直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者不是相互勾心斗角，而是相互协商、相互分工和真诚地相互帮助。

在共和国的议会里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党。

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充当反对党，因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毫无限制和保留地作出最极端的结论。在波旁宫里，他们不受‘社会’关系或同外界的任何事务性联系的束缚。他们不出入俱乐部，不签署条约或不同他们打算在讲坛上加以攻击的那些部长本身一起投机取巧，因此他们大胆地公开地反对这些人。

的确，如果谁看到这些人的工作情景，一定会嫉妒。如果人们用攻击社会的劲头来保卫社会，那末社会就不会这样虚弱。”

政治局势对卡季米尔-佩里埃的内阁作出了判决，而社会主义者来执行这个判决。1894年6月，公共工程部长若纳尔在议会宣布说，国家雇员（例如铁路工人）不得罢工。当时，茹尔德和米勒兰

质问这位部长，一切法国人在法律面前是否平等，他是否打算为国营企业的工人规定一种不利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不能享受一切公民所固有的罢工权。然后，他们要求议会敦促这位部长不要破坏工会法。但是若纳尔坚持己见，而且还得到整个内阁的支持。这种观点十五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国家收买铁路以后便出现这种观点并已经根深蒂固。因此，这位部长深信，议会这一次也象在以前类似场合一样一定会支持政府的立场。但是，自从在议会里有了社会主义集团，多数派议员们已经变得非常谨慎，不敢十分公开发表违背自己的城市和农村选民的利益的意见。当要投票的时候，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表示反对内阁的立场，支持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第二次被击败的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提出辞职。从本届议会开幕以来，即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内，小小的社会主义集团搞垮了两届内阁并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获得了多数。

议会不得不象圣经里所说的狗一样吞下自己吐出来的东西；杜毕伊又当了内阁总理。当他重新把权柄抓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每个人都怜悯地笑一笑，预言内阁只有几个月的寿命，如果说它现在还存在，那末象当年的佩里埃内阁一样应当归功于无政府主义。卡泽里奥的匕首杀死了到目前为止领导第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当中最可尊敬的总统，同时也巩固了杜毕伊的内阁并把佩里埃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因为议员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又要谋杀政治活动家，所以他们再次惊慌失措起来。

杜毕伊希望从谋杀卡诺的事件上捞到好处并使自己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遭到了惨败，但他自我安慰说，他为了反对自己的政治敌人而制定了一项残暴的法律，废除资产阶级共和派从路易十八登基开始为之奋斗的一切政治权利。尽管如此，那些无耻地向议会提出和兜售这个法案的人们却称自己为共和派，而那些仅仅从共和国成立时起才在政界崭露头角和现在到处跟在内阁后面的

比较年轻的政治家当中有某些人甚至属于资产阶级极左翼。例如，饶勒斯不久前提醒杜毕伊，1888年他曾经同他一起提出过旨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法案。杜毕伊提出的所谓惩治无政府主义者法案在法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为了找出一个相似的法律，果布累不得不提到提比利乌斯皇帝的褻渎帝王法！它同1789年革命产生的一切立法相矛盾，并且在重要问题上修改了这些立法。无政府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不再由陪审法庭，而是由轻罪法庭审理，也就是由那些其任命、提升和薪俸都决定于政府的法官来审理。这个法案规定法官有权全部或部分地举行公开审判，也就是消灭了行使审判职权的公开性。诚然，公众仍旧有权参加审判，但是警察随时可以派它的暗探占满法庭大厅，这样，国家官员不再在舆论的监督下进行审判，可以任意判决任何人一年单独监禁，即一种在法律上招致终身流放的惩罚。甚至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家庭里说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告密，都足以触犯这个法律。在三年的时间内任何流氓都可以无耻地告发别人偶尔说的一句话。这项法律规定可以拆看邮寄的书信，不仅写信人，而且收信人都要为在书信中发现的违法言行负法律责任。

杜毕伊提出的这个法案没有确切地和明确地规定应受惩治的过失的性质。口头上说是要惩治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要制造一种打击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统治者的人的致命武器。杜毕伊在辩论中愚蠢地引用一家幽默讽刺杂志《喧闹报》上的一篇文章来说明，谁可能成为犯法者，这样也就泄露了这个法律的意图。这篇文章是反对死刑的！在巴拿马事件中最声名狼藉的议员之一费里大吵大嚷打断米勒兰的发言，他说，这个法律正是针对象米勒兰所领导的攻击一切政治活动家并给他们脸上抹黑的《小共和国报》那样的下流报纸的。《法兰西报》报道了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主任同保尔·拉法格的谈话。这次谈

话透露，卡季米尔·佩里埃也认为，这个法律不仅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也是针对一切反对当前统治者的人的。

据报道，保尔·拉法格似乎说过这样的话：“行动宣传不可能和不当惊扰名符其实的国家活动家……只有正在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前布朗热分子、狂热的文人和新闻记者以及陆军、海军和教士当中的不良分子才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只要通过无情地打击闹事者的总参谋部和他们当中的最活跃分子的办法来瓦解这些分子的无政府行动——唯一可怕的无政府行动，就可以使法国重新安定并继续繁荣。如果我们坚定地和无情地将四、五千名煽动者一网打尽并使之不能为害，那就一切好办了。六个月之后，再不会有人想要闹事了，国家就将在二十年之内肃清一切制造混乱的分子。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找到手段”。哈瓦斯通讯社^①批驳了这篇报道，但是《法兰西报》的消息提供者，外交部前武官，坚持自己提供的消息，并且补充说：“难道保尔·拉法格先生甚至没有建议一位高级海军军官去访问卡季米尔·佩里埃吗？后者曾打算同他商谈利用海军和军舰进行即将到来的大批运输。”人们不敢追究这个直接把共和国总统牵扯进去的新闻记者。

甚至连多数派议员也对应当如何运用这项法律表示惊慌。诚然，他们准备同意内阁所要求的一切惩治措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措施只能用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煽动者。他们绝对不愿意把政府可以用来打击一切它所不满的人的非常危险的武器交给政府。因此，多数派根据前国民教育部长布尔茹瓦的动议决定，这项法律所惩治的过错“应当是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个补充案破坏了当权的巴拿马分子的无耻计划，引起了内阁和总统的

^① 哈瓦斯在1835年创建的一家法国通讯社，1940年停业，1944年在原哈瓦斯通讯社的基础上改组成法新社。——编者注

勃然大怒。

杜毕伊本来以为，这项法律在一次会上不用辩论就可以通过，就象在瓦扬谋杀案之后通过出版法一样。但是，他忽略了社会主义集团。当然，社会主义集团不可能仿效英国议会里的爱尔兰议员利用程序手段阻挠议事进程，因为法国议会程序规定多数有权通过表决中止任何辩论。但是，社会主义议员利用所掌握的唯一手段，强迫议会认真审理所提出的法案：他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修正案和一个又一个的补充案。在十四次会议上，社会主义者一个跟着一个登上讲坛；充当政府走卒的议员们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尽管如此，他们谁也不敢为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可耻法律进行辩护，只能象机器一样机械地投票赞成法律的个别条款，似乎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部长们不得不亲自不停地为这项法案辩护；他们甚至被迫求助于一个根本没有参加议会的政府委员，让他帮助他们处理社会主义者给他们出的难题。

盖得和罗什激烈地抨击警察。他们证明，警察促进了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并策划了谋杀事件。无论部长们还是多数派议员都反驳不了所举出的事实，他们甚至不敢为他们心爱的警察及其教唆者辩护。盖得援引工人党利尔全国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宣布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是站在现代工人运动之外的。只是在这之后，才有一个亲内阁的议员德夏内尔走上讲坛说，如果谁象社会主义者那样要求无偿地剥夺资本家阶级，他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盖得敏捷而一针见血地回答说，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无偿地剥夺了贵族和教士，但是德夏内尔先生却不认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米勒兰和饶勒斯把辩论引向另一个领域。他们抨击了一伙滥设企业者、投机者和大垄断者。米勒兰用如下的结束语打了这伙人一记耳光：

“我现在要向多数派的诸位议员说：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通过这个法律，那就不单纯是满足政府的愿望的问题了。通过这个法律意味着小小的、人数不多但有影响的、很活跃的和**无耻的**集团的成员所要求和渴望的报复行动。这个集团十五年来一直把共和国当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东西来加以支配。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你们是十分熟悉的。你们知道他们干过什么事情：你们自己在这方面吃过苦头，你们一度曾经想要反对他们的行为。你们对他们是熟悉的，你们知道，这些人一直同大投机家保持联系，经常同一些银行家保持密切的接触，他们的名字尽人皆知，其中有一个是共和国的真正国王，而另一个向**拮据的部长们提供帮助**——要知道共和制的法国不很富裕，无法支付这样的债务——，第三个人虽然受到严密保护和一再地乞求保护，仍然在**马扎斯监狱结束了自己的突然中断的官场生涯**。我所指的那些政治家的名字在最近几年从铁路促进会的破产到巴拿马丑闻的一切交易所垮台中都反复听到过。

但是，报刊揭露政界和金融界之间的合作，**政权和交易所之间的丑恶关系，揭露所有这些丑事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当事人都感到自己灾难临头，现在他们还惊魂未定。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希望，就是要让使他们胆战心寒的那股力量为其所经受的恐惧付出更高代价。这股力量就是出版自由。早在一百年前卡米尔·德穆兰就在他的不朽的檄文《老科尔德利派》中把这种自由称之为使**骗子手恐惧的东西**。”

这样，社会主义者用手指着那些骗子手，使他们可耻地低下了头。米勒兰的猛烈的和直接的攻击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杜毕伊不得不上台声明，刚才受到抨击的人没有一个是内阁成员。鲁瓦奈打断了总理的讲话说：“他们是支持内阁的”。巴拿马分子想利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所造成的恐怖来堵住那些在舆论面前揭露他们的肮脏勾当的人的嘴巴。社会主义者集团粉碎了他们的计划。米勒兰把巴拿马分子从暗处拖了出来，他们躲藏在那里是为了自由地进行欺骗活动。当他们的无耻勾当在舆论面前遭到彻底

揭露之后，他们受到了饶勒斯代表社会主义党团加以论证的补充案的谴责。其中规定：“政治活动家、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凡是拿自己的委任状做交易，接受贿赂和参加投机金融企业，不论是通过参加被法院判罪的股份公司董事会还是通过报刊或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讲话为有关企业作广告，均属挑动无政府主义宣传罪。”

人们情不自禁地要详尽地转述饶勒斯阐述这个提案的精采发言，因为它代表了社会主义政党在辩论中的立场。杜毕伊本来想把社会主义者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替罪羊，而现在他的朋友们，鲁维埃们、比尔多们、赖纳克们——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们——却被当成在道义上应为无政府状态负责的人，因为他们的无耻的和没有受到惩处的欺骗勾当造成了这种状态；现在人们要求他们受到行动宣传者同样的惩处。

饶勒斯说：“你们追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源是正确的。这很好！但是我要对你们说，你们不可半途而废，请你们挖得深一点，追查下去，直到找出罪恶勾当的真正根源……杜毕伊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过，无政府状态首先在于蔑视任何权威。我问他，那些由于自己参加投机企业而损害了全国代表机构的名誉的人民代表是不是比某些言论更加动摇这种权威的基础！”

杜毕伊先生说过，无政府主义同蔑视普选权是一回事。我要问他，有些人仰仗普选权而获得保护公共财产免遭金融投机阴谋的危害的有约束力的委托书，但是成了不法的金融企业的同谋，这样的人是不是青年人蔑视普选权的原因……

那些十五年来支持金融投机家造成上千上万的破产和工人丧生的掠夺勾当的政治活动家却逍遥法外，而且他们还继续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来支持世界性的投机勾当。你们打算恢复法兰西银行的垄断权并把这个权力交给路特希尔德（他在这里是指众议院议长比尔多）；你们不久前还给法国南部的一家铁路公司提供了无耻地欺骗国家和从国库窃取数百万的机会（他在这里是指鲁维埃、雷纳耳之流）。我可以断定，由于目前在国内不会不注意的并使法案具有自己特点的奇特的巧合，你们大家毫无例外地将投票支持上述

法案。

我再补充说一句，你们让全国看到了把司法变为讽刺的一切矛盾中最惊人的矛盾：心毒手黑的巴拿马分子……

……1793年的国民公会不得不对付社会危机。它不仅制定了惩治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狂暴分子的法律，而且还通过立法手段非常严厉地惩治社会主义者，宣布对一切要求颁布土地法的人处以死刑。但是，它在采取这些恐怖措施的同时，还为投机者和进行欺骗的金融家规定了同样的惩罚、同样的死刑、同样的断头台。如果你们想用惩治措施严厉对待暴乱者，那末你们对待营私舞弊的当事人也要严厉。这对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即那些将来有一天要坐到这个席位上的人来说是必要的。

你们必须承认卖身投靠的政客和滋事生非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有一天，当同一条船把行骗的政客和无政府主义者运到辽远的、环境艰苦的罪犯流放地的时候，他们双方会彼此交谈和承认自己是同一个社会制度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

饶勒斯演讲之后，议会顿时乱成一团。德夏内尔和鲁维埃竭力进行反驳，使得会场更加混乱。一位议员问德夏内尔，他是否有一天将会参加鲁维埃也在其中的内阁。德夏内尔避而不答。当中间派鼓掌欢迎鲁维埃讲话时，饶勒斯高声呼喊道：“多数派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议员们看到，人们要求他们报告表决的结果。内阁的拥护者们非常害怕社会主义者的提案得到多数拥护。他们决定采取欺骗手法，伪造投票表决的结果，把反对补充提案的票数增加了二十五票。当议长宣布饶勒斯的补充提案被二十六票的多数否决时，议会里响起了欢呼声。在法国凡是从议会讲坛上宣布的投票结果都是有效的，哪怕第二天发现所宣布的结果是错误的。在我们所关心的表决的第二天发现，不是二十六票的多数，而仅仅是一票的多数。可见，社会主义者的提案只是被一票的多数否决了。这对社会主义党团来说是多么大的胜利！

这项被称为“恐怖法”、“罪恶法”、“惩治嫌疑犯法”的法律的通

过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道义上的破产。社会主义政党拣起了被共和派所破坏的爱好自由的纲领。社会主义政党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它面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而保卫这种自由。同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正在瓦解和崩溃的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社会主义政党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全国面前，这种力量不久将会统治全世界。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12
年卷(1893—1894)第2
册第613—621、641—
647、676—682、705—
721页。

(孙魁译)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回答让·饶勒斯

(1895年1月10日)

公民们!

你们自己明白，把回答饶勒斯^①的任务承担起来我不是没有犹豫，因为这个人的热烈的辩才甚至使最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原理也饱含热情。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当然你们也想：有这个魔法师同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啊！卡尔莫的矿工，当他们把饶勒斯从大学里拉出来并把他投入政治舞台的时候，已慷慨地向那引导他们的罢工获得胜利的社会党付清了自己的债务。

但是你们今天晚上被邀请到这里来不是参加演说竞赛，而是参加思想斗争；饶勒斯把辩论提到哲学的高度，假如你们不能要求我有饶勒斯的辩才，然而你们却有权要求我把辩论保持在这个高度上。我正要这么做。现在就让我们言归正传罢。

—

笛卡儿学派的哲学家劝告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应该先确定争

* 1895年1月10日拉法格对让·饶勒斯于1894年12月间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所组织的集会上就这个问题作的演讲的回答。——编者注

① 饶勒斯的演讲载于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4—38页。——编者注

论的范围。因此我们就在这里提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所有民族，不管他们的文化水平达到如何的高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的起点：所有他们的祖先都是野蛮人。

这些野蛮人栖息于森林之内，靠自然界自生自长的产物糊口，为了比较容易地获得食物，像野马一样由三十到四十人结成一小群。这些野蛮人怎样能够发展成为文明民族，住在聚集几千、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用煤气和电力照明，用铁路交通，在那些城市里居民分为敌对的阶级和从事无数不同的专业？

这个问题又被另一问题弄得复杂化了。当饶勒斯对你们说所有语言虽然彼此之间极端不同，但是可以归结为同样的语法形态时，他已经向你们指出这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我们谈到语言问题，我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现象。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词，开始时在创造它们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则只作牧场、住宅解。法语的“droit”一词在现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语言学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们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吗？

饶勒斯在语言中所证实的那种统一也表现在人的精神创造的一切形态里面，即表现在宗教、哲学、文学里面。例如我们的保姆用以激发我们幼年的想像力的童话在地球上的一切民族中间都会遇到，它多半是产生在野蛮或半开化时期；又例如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说，——这是最新的，但不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无例外地在一切资本主义的民族中繁荣昌盛。

各民族的比较史向我们指出他们全都经历过家庭和政治的同样的形式。公正地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说，存在着“一个所有民族在一定的时期都要经历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即由野

蛮、凶猛和兽行的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状态。”但是既然不是所有民族都已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于是马克思补充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而我国天才的拉马克的伟大的学生若弗卢瓦·圣伊雷尔认为植物和动物构造“图形一致”。

人、动物和植物按照同样的图形进化的原因应当在世界本身里去寻找还是应当在世界之外去寻找呢？

自然神论者同伏尔泰一起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有钟表存在就有钟表匠存在，同样的道理，有世界存在就必然有创造者存在。但是这种过分简单的解答野蛮人就已想出来了，它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推开，因为假如世界的存在就预定着创造者的存在，那末这个创造者的存在反过来又需要另外一个创造者的存在；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的诺斯替派信徒曾断言假如耶稣是耶和華的儿子，那末耶和華本身也是某个不知名的上帝的儿子，尽管野蛮的犹太人禽兽般的卑鄙的情欲玷污了他。自然神论的解释什么也不能说明，不能满足科学工作者。不管你打开一本什么样的科学书籍，你在那里找不到上帝的名字。化学家、生理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不求助于关于上帝的简单的假设来解释他们所研究的现象，而力图完全用物质的特性来解释这些现象。每个学者都从他自己的科学领域中驱逐上帝，而这甚至也发生在他需要用上帝来解释不属他的研究的专门领域内的现象的场合。既然历史还不是科学，那末历史学家就常常求助上帝，以便找到解释那些他不能找出原因的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从上帝的最后的避难所，就是从历史中把上帝驱逐出去。而我们正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创造出科学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饶勒斯曾部分地采用黑格尔的唯心的理论，黑格尔并不认为上帝先于世界存在；相反地，在他看来，上帝存在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在他看来，**观念**的存在先于一切，不过它一开始是采取原子的形式。当自己同自己发生矛盾并同自己的对立物结合时，它创造了第一个合题，这合题反过来又成为正题和反题，然后再成为合题；而这第二个合题又成为新的三段论式的出发点，如此类推。这样自动地发展起来的**观念**获得了外在的表现，产生与自己相似的世界。

饶勒斯没有向后退得这么远：他使用柏拉图的方法，柏拉图在分析观念和划分观念的等级时，溯源到善的绝对和最高观念。饶勒斯在对我们这些文明人所掌握的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分析和分类时，并没有达到正义和博爱的绝对观念，而是达到它的最低程度的表现，他把它放进野蛮人的头脑里去，在那里这观念处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但是当它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它就与外在世界发生矛盾并与之进行斗争，直到矛盾解决为止；因此，历史不过是不间断的冲突的系列，总是以正义的**观念**的胜利告终。

我对饶勒斯的理论的第一个异议是这样的：它不能解释世界，因为并不是什么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在指导着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机体的进化，而现代的哲学应当包括整个宇宙。

其次我向饶勒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停留在野蛮人的头脑上？为什么不再降低一级而到动物的头脑里去找寻**观念**？牧羊狗或看家狗有明显的责任感和很清楚地认识自己过错的能力。你们会对我说，这些责任观念不是狗本身固有的，而是被人灌到它的脑子里去的。但是须知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例如水牛和乌鸦也有它们自己的责任感。公牛宁可自己被杀来保护母牛和牛犊，而充当哨兵的乌鸦细心地观察四周围的动静，给那些在啄食农夫播种的谷粒的伙伴预报危险的到来。

因此在动物中也能找到饶勒斯认为在野蛮人头脑里是无意识的观念的有意识的形态。但是为什么要停留在动物身上，而不在细胞所由形成的无定形的原形质中寻找原子状态（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观念呢？细胞是有机序列的出发点，而人则是有机序列的最高成就。

我还要问饶勒斯：为什么限于寻找道德观念，为什么不从事科学观念的起源的研究？为什么不自问一下，那个只存在于几千化学家头脑里的原子论是否以无意识的状态潜伏在没有头脑的牡蛎身上？为什么不向唯物主义者一样说：一切应当存在在一切中间，因为思想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物理—化学的现象，只不过是运动的特殊形态而已？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为我们说明人脑中的观念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饶勒斯对我们说，视觉和听觉是高级的感觉，因为有视觉和听觉的动物都能享受自然的和谐和太阳的光辉；他把这些感觉的作用放在手（手的姆指可以同其余的指头相对，是猿猴和人的特征）的作用之上！手创造了人。但是可以这样回答他：视觉和听觉归根结底只是触觉的局部化和特殊化，没有眼睛的动物就用自己的整个皮肤的表面来感受光线，甚至连植物的细胞也只因为太阳的作用才产生叶绿素；这一切说法没有向我们说明感觉器官是怎样形成的。

正象你们所见，饶勒斯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归结为关于观念的起源和形成的争论。过去哲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将来还会有哲学家研究这个问题。

笛卡儿认为我们生下来就带着一般、原因、效果等等的先天观念。最初是洛克，后来是孔狄亚克以及感觉论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理智中所有的一切首先存在于感觉中。狄德罗说，理智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自然的现象在它上面留下印记。在各种思想

领域处于发端阶段的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争论过观念的起源问题。柏拉图认为我们的关于正义的观念是对绝对的善的观念的回忆；而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克拉奥斯说，你在其中生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是当时道德观念的泉源。实际上可以看到，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奴隶制被法律承认，那末最不安分的人也都服从它。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阿克拉奥斯和洛克的论点，假如文明人不能准确地确定他究竟在什么时候获得某些观念，那末它们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靠我们祖先的经验获得的，我们从我们的祖先继承了经过许许多多的世代锻炼的脑力，以致我们可以说是自发地获得某些观念，因此它们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先天的。

二

人和动物之所以能思想只因为有脑子；脑子把感觉变成观念，正象发电机把传给它的运动变成电一样；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是**自然环境**（这是为了不使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那种会把自然理想化为形而上学的实体的说法）造出脑子和其它器官。我故意说“和其它器官”，因为唯心主义者把脑同其它器官分开以便使脑的活动，即思维，服从于类似巫术的原因，正如唯灵论者把人从动物界分出来，以便把他描写成神奇的有生之物，上帝为了他下降人间并让自己被钉上十字架。

创造了人的器官和人脑的自然环境使它们发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它们具有最不寻常的和惊人的适应能力。例如，基督教徒和文明人在许多世纪以来从非洲沿岸掠夺黑人，并把他们贩卖到殖民地当奴隶。这些黑人是半开化人和野蛮人，比文明人的文化落后几千年，然而他们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学会文明人的手艺。

耶稣教徒在巴拉圭曾作过一次社会试验，就我所知这是最著

名的一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者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一个民族一移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就能以多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耶稣教徒，这些无比的教育者和精明的劳动剥削者把十五万以上野蛮人训练成为文明人。

他们把瓜拉尼人安置在巴拉圭的居民点里，这些瓜拉尼人赤身露体在森林里游荡，他们用的武器只有弓和木棒；他们只懂得最原始的农业，只种玉蜀黍；他们的智力是这么不发达，以致他们只会数二十个数，并且还得靠手指：一个手指表示一，两个手指表示二，一只手表示五，一只手加上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表示六，两只手表示十，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趾表示十一，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表示十五，两手加两脚一起表示二十；二十以上就太多了。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的野蛮人常常靠手指和脚趾来计算。因此，数，这个存在于文明人的头脑中的最抽象的概念，最初在野蛮人的头脑中是有形物的反映。当我们说或想一、二、五、十时我们并不看任何物件；而野蛮人却要看一个手指、两个手指、一只手、两只手^①。在阿拉伯数字输入之前如此长期地被文明民族使用的罗马数字是模仿手的形状而来：I 是指一个手指，II 是指两个手指，V 是指三个中间的手指屈下而大拇指和小指伸直的一只手，X 是指两个V 或两只交叉的手，由此也可看出以上的说法是多么正确的。

耶稣教徒把巴拉圭的野蛮人变成能担任最复杂的工作的熟练的工人。沙列乌阿在谈到他们时说：

“传教会中的印第安人有最高的模仿才能。例如，只须把十字架、蜡烛台、香炉指给他们看，他们就可以立即复制出来，并且他们的仿制品与原模型很难分得清。他们只要看一看模型就能制造出自己的乐器，最复杂的风琴、地球仪、土耳其式的毡毯和手工业的

^① 文明人的小孩子在计算数目时像野蛮人一样往往也想到有形物，这也是常有的事。——拉法格注

最复杂的产品同样也能制造出来^①”。

博物学家道比尼在 1832 年访问了在驱逐耶稣教徒之后而陷入崩溃和破坏的巴拉圭居民点，在看到这些野蛮人所修筑的并有绘画和雕塑装饰的“中世纪式的”教堂时赞叹不已。

但是，所有这些技艺和美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在野蛮的瓜拉尼人的手和头脑里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们可以说是装进去的，正象维尔第^②的曲调可以装进手摇风琴一样。由于接受了耶稣教徒的教育，他们才能获得了这些技艺和这些不同的思想。在这里就给我们提供了人对人的直接影响的事例。但是，难道对人的器官和脑子就没有其它的改善方法吗？难道社会环境的现象，难道经验不会发展人的器官的技术能力，不会改变他的思想吗？

照饶勒斯所说的那种无意识地沉睡在野蛮人头脑中的那个正义的概念，只是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钻进人脑中去。

野蛮人没有任何正义的概念；他们甚至没有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概念的字眼；他们至多知道同等报复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变形的反射运动，每当有物威胁眼睛时，都迫使我们眨眼，每当受到拍打时，就迫使我们放松肢体。甚至生活在相当发达的、但私有财产还只是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环境里的半开化人，也只有十分模糊的正义的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引用萨姆纳·梅恩的意见，对于他的意见的高度哲学价值大概饶勒斯也不会有异议的。

梅恩说：“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印度的乡村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一个受损害的人，不申诉个人所受的损害，而是申诉整个小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再者，习惯法没有得到承认。在不服从村议会的决议的偶然的场合，唯一的惩罚，或者说唯一的可以肯定

① 沙列乌阿《巴拉圭的历史》巴黎 1757 年版。——拉法格注

② 维尔第——十九世纪意大利大作曲家。——编者注

的惩罚，看来也只是一般的谴责。”^①

洛克像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一样使用几何学的演绎方法达到一个结论：私有财产产生正义观念。他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一书中明确地说了以下的话：“凡是没有财产之处就没有非正义，这个命题正如欧几里德的任何定理一样正确，因为财产的概念意味着对物的权利，而与‘非正义’一词相适应的概念则意味着对这权利的侵犯或破坏”。

假如正义的概念象洛克所说只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能出现，作为它的产物，那末盗窃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你所需要的或你所希望的东西的本能的占有欲，则相反地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前就已很发展了。共产主义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正如我们的学者和作家对待精神财富一样；他们，照莫里哀的说法，看到哪里有财富就向那里去取。但这种自然的习惯一到公有制被私有制代替之后便成为盗窃、犯罪。

公有制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的那些观念和感情，在资产阶级基督教徒（这是私有制的可悲的产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海克威尔德，摩拉维亚的传教士，在十八世纪曾在北美洲那些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和资产阶级的文明所腐化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十五年之后说：

“印第安人相信大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中包含着人的共同的福利的一切；他使人类在大地上生殖繁衍，使森林充满野兽，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而是为了一切人的幸福。任何东西都属于一切人共有。在地上呼吸和在田里生长的一切，在河里和水里生活的一切都归一切人共有，因此每人有权享有自己的一份。

^① 梅恩《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拉法格注

好客在他们中间被认为不是美德，而是不容推却的义务。他们宁愿饿着肚子去睡觉也不愿因忽视自己的义务，未能满足外地人、病人、穷人的需要而受到非难，因为后者与一切人一样有权得到公共基金的援助，因为野兽（假如在森林里被捕获，就用来款待他们）在被猎人捕获之前是大家的财产，因为给他们提供的蔬菜和玉蜀黍是在公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耶稣教徒沙列乌阿也在尚未受过基督教的和有产者的道德的美德教育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在他的《新法兰西历史》里也是这么说的：

“红种人的博爱精神无疑地有一部分可由野蛮人还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些如圣让·克里佐斯托姆所说的冷酷的字眼来解释。他们对孤儿、寡妇和体弱多病的人的关心，他们的如此惊人好客不过是他们相信一切都应当属于一切人公有的结果。”

私有财产在**我的和你的**之间造成差别时，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引起正义的概念，而且也给人的心中灌输种种感情，这些感情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先天的，如果我把它们列举出来，就会使你们吃惊。毫无疑问，当人们还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①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嫉妒，什么是父爱；那时男子和妇女一样，实行多偶制，妇女想要多少丈夫就可以要多少，男子想要多少妻子就可以要多少。旅行家们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些正直的人比可悲的和利己的单偶制家庭的成员生活过得更满意更和睦。但是从私有制确立时开始，丈夫为自己买妻子，把她作为繁殖后代的工具来专供自己享乐。嫉妒是一种变态的所有主的感情。而父亲只有当从他私有财产可遗传的时候才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充满文明人头脑和建立在“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观念之上的

^① 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编者注

正义观念，只有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时候才会象恶梦一样归于消灭。

饶勒斯对我们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但是假如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因为人永远不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正义的观念，而且在这阶段上博爱的感情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表现出来。

正义的观念并不与社会环境的现象相矛盾，反而与它相适应。

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实证主义者，断言说正义和道德的观念是在不断进步中。这种理论是为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把他们在工商业中所作所为都说成德行。但是要赞同被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同样空谈玄理、眼光短浅的深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此喜爱的这种正义和道德的逐渐进化的理论是困难的。

许许多多的事实反驳了这个动人的理论。在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里，在那里人们生产的产品或靠奴隶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家庭的消费，商业受到莫大的鄙视，西塞罗说：“商店里还能出什么好人吗？”只有被鄙视和可鄙的人才做金钱的交易。那时有息借贷等于盗窃，要受到道德和宗教的谴责。耶和華本人就曾禁止犹太人贷钱收息，只有对被认为是敌人的外地人，才能允许使用这种方法。现在已变成为资本家的利益百般效劳的奴仆的天主教教会过去曾经宣布高利贷罪该万死。但是这种道德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时起就变了。贷钱收息变成了神圣而又神圣的事业；1789年革命后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宣布利息的合法性，而在以前利息只是被容忍而已。公债的大帐簿成为金书——资产阶级的圣经。高利贷者、银行家的职业成为可尊敬的和被尊敬的；靠食利，亦即靠金钱利息生活成为资产阶级社

会一切成员最大的奢望。

因此，有息贷款就成为道德的高级形态，如果不是孔德、斯宾塞和其它正义和道德的“可改善的至善境界”的崇拜者所说的最高形态的话。做金钱交易的资本家在这问题上同意自己的惊人肤浅的哲学家的意见，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这些希望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封建领主和古代希腊罗马的贵族对道德的见解略胜一筹，因为那时候他们把高利贷者看作窃贼。

假如正义和道德是不会前进的，那末它们终归要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随着一个历史时代变为另一历史时代而发生变化。马克思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里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

适应统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正义和道德被统治阶级强加于被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终于接受它们，虽然它们与被压迫阶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是相对立的。

我们谁没有听到工人们说过：“总得让老板的钱有利可图”。所有的无产者，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全都这么想。工人——利润的牺牲者——承认它的合法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剥削神圣化，资本主义剥削每天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使雇主得以从自己的资本取得利润。

被压迫阶级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不是用最高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而是用流行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它要求的只是适应压迫阶级利益的正义所承认的权利。举一个历史的例子：

人们说在好战的社会里劳动是被轻视的；这并不完全确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

《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放牧自己的畜群和耕种自己的田地；他们常常以能耕出笔直的犁沟而自豪。罗马的贵族和希腊的世袭贵族放下剑和盾就拿起犁头。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当他们在某一贵族家庭里充当侍卫和仆役时，就开始了骑士的训练。在这些时代受轻视的是出卖劳动。出卖自己的劳动和由此而取得工资的人就这样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象奴隶一样出卖自己，于是就失掉自由人的尊严。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人天天都采取这种使自己地位下降的行动。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只关心一件事：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出卖思想这个神圣的东西。塞克西斯^①赠送自己的画是因为，象他所说，甚至用波斯王的全部黄金也不能偿付它们的价值；而我们的梅松尼埃^②之流则把自己的画廉价卖给芝加哥的养猪商或麦凯之流，他们往往把它们扔到厕所里。

无产者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理想：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公平的劳动日，公平的工资”——这是全世界工人的工会的口号。无产者只有当他们不能按公平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才发出怨言。只有当资本家阶级的有损尊严的和污辱人格的正义不能兑现时，工人阶级才开始想到反抗。

三

自然环境已把人锻炼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们既能在温度达四、五十度的赤道上，又能在水银可以冻结的两极附近生活得很好；不错，老鼠也有这种卓越的能力。自然环境的不同就把人类分为彼此不相似的种族。

① 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时代的著名的古希腊的画家。——编者注

②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编者注

但是人，也象蚂蚁、海狸和它的动物一样，为了自己的生活，创造了人为的环境，即人工的产物。这个人为的环境继续自然的事业；它改变自然的人，使他的品质的一部分得到改善，压抑其它部分和创造出社会的人；此外，它还抵消自然环境的多样化的影响并恢复人类的统一。

在同一纬度上的自然环境有差不多相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经济生产方式相似的人为环境在人们的风俗上、在他们的家庭的和政治的组织上、在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上都表现出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寒冷的加拿大和炎热的意大利，甚至在新开发的澳大利亚地区，——到处都能碰到议会制（先是建立在限制选举上，而后又为普选所代替），到处都能碰到被通奸削弱了的——夫一妻制的家庭、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这种类似不仅在那些许多世纪以来经过同一社会发展道路的民族中间可以观察到，而且在欧洲的运动范围以外进化的、飞越一些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种的民族中间也能观察到。例如日本人一旦输入机械工业就一跃而由先前的封建制度进到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因此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法律、甚至自己的服装；他们已戴上我们这种骇人的高顶大礼帽，请你们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巴拿马丑闻和自己的鲁维埃^①。

因此，人靠着他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帮助而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创造者和主人，但是他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和他的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人常常达到他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而这结果又是同他的意图相反的。例如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阶级的财富而采用和发展大的机械工业，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破坏小生产的同时，也破坏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起缓冲作用的

^① 莫里斯·鲁维埃（1842—1911）——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和总理，1892年作为巴拿马舞弊案的参加者被揭发后被迫辞职。——编者注

中等阶级。在1848年国民自卫军从巴黎附近的城市大批大批赶到巴黎，屠杀参加六月起义的“均产者”，保护贝列拉和富尔德^①之流，而正是这些贝列拉和富尔德后来在财政上绞杀他们。但是在1871年，尽管梯也尔一再号召，没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去参加反对公社的斗争，当时只有我们的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来报到，他从哈佛尔带来了一个水泵，去熄灭凡尔赛分子放的大火。金融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在吞并小资产阶级时也把自己的最好的保卫者吞下去了。人民的智慧已了解这个历史规律，并用自己的一个谚语把它表现出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这场合下，经济生产是天。

是生产的必然性而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观念引导人类前进。奴隶制的历史最明显不过地说明这一点。

据唯心主义者说，奴隶制有这种双层的运气：它是从博爱中导引出来的，又因博爱而消灭。——自从对邻人之爱启迪了他们的心智的时候起，人就停止吃自己同类的肉；然而把邻人吃掉就是爱他的最好的证明；天主教徒认为他们所能给予上帝的爱的最大证明莫过于以圣饼的形式把他吃掉。

实际上，吃人肉的宴会的停止只能归因于经济的原因和妇女的影响。最初的时候，全部落的人——小孩、妇女和男人——都参加这种宴会；他们吃掉某一个年老的亲属，为的是把他从衰老和野蛮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这种生活对于那些失掉了健壮的体魄和灵活的四肢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定居在野兽和鱼类丰富的地区，牲畜的饲养和土地的耕种创造了供养老年人的可能，使他们得以终享天年。可是人们还是继续吃战场上打死的敌人的尸体以及战俘的肉体。参加这种人肉宴的只限于战士，妇女则被排

^① 贝列拉和富尔德均为法国银行家。——编者注

斥。无疑地，正是因为妒嫉的缘故，妇女开始对人肉发生厌恶并且也开始以厌恶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参加人肉宴的男人；男人们因为受到妇女的舆论的影响，终于废除这些宴会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保留下来；天主教徒的圣餐就是人肉宴的一种纪念。

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还有某些剩余可供别人夺取，这时候奴隶制才能产生。

当野蛮的和半开化的部落由于自相残杀的战斗而人口显著减少时，他们就收养战俘来补充自己战士的队伍；如今他们收养他们，为的是迫使他们为自己劳动。这种收养奴隶的办法甚至还保留在文明民族中。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家庭祭坛前举行宗教仪式之后就把奴隶收入家庭之内。奴隶甚至把自己的名字给予家庭：家庭(famille)一词源出古奥斯克语“famel”，意指“奴隶”。父权制家庭实际上是建立在妇女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

奴隶制在开始时带着温和的性质；奴隶被当作同伴，甚至是朋友。阿萨拉，曾充当葡萄牙和西班牙领土的划界委员，他在上个世纪曾在巴西和巴拉圭的野蛮部落中住过十多年，得有机会观察奴隶制度的初生形态。

他写道：“门巴牙人(M'bayas, 巴拉圭的最好战的部落)使用瓜拉尼人充当仆役和让他们耕地。的确，这种奴隶制带有非常温和的性质，而瓜拉尼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使唤。主人很少指定工作，任何时候也不使用强迫命令的口气，与奴隶分享一切，甚至肉体的愉快也是一样。我看见一个门巴牙人冷得发抖，但是仍让他的瓜拉尼人盖他自己预备盖的被子；门巴牙人甚至不让人看出他想要盖自己的被子。”^①

^① 阿萨拉《1781—1801年南美洲旅行记》。——拉法格注

如象《奥德赛》给我们所描写的那种奴隶制虽然还显出主人同奴隶之间的友谊关系，但是已经失掉自己原始的人道的性质。而当文明不断前进时，当哲学启发人们时，当正义对自由公民的权利起调节作用，而道德以清规戒律来防止他们的恶德时，奴隶制就越来越成为非人道的，而在雅典和罗马的鼎盛时期它就变成不能忍受的了。

可是甚至最有理想的哲学家也不反对非人道的不能忍受的奴隶制度。柏拉图把奴隶引入自己的乌托邦的共和国，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预先指定某些人要当奴隶。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凶神则指定含^①的后裔提供奴隶。但是耶和華预感不到的东西，希腊的思想家却预见到了：当机器转动并且象武尔坎^②的三脚供桌一样自己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时，奴隶制就要消灭。

天主教的牧师，他们在研究神学中汲取了扯谎的技巧，不厌其烦地反复宣称基督教已经废除奴隶制。而事实上正是基督教把奴隶制带进美洲和使它在旧大陆保存下来。圣保罗曾把逃亡的基督教奴隶送还他们的主人，并且象圣彼得、圣奥古斯丁以及最初几个世纪那帮圣徒一样向奴隶说教，说他们只有服从地上主人和忠实地为他们服役，才能邀得天主——奴隶主和暴君的天生的庇护者——的惠爱^③。

哲学和基督教从来都没有想到同奴隶制度作斗争，更没有想

① 含是《圣经》中挪亚的二儿子。由于他对父亲不尊敬的言行而被挪亚诅咒他的后代必将成为奴隶。——编者注

② 古罗马人的火神和金神。——编者注

③ 假如天主教的牧师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而公开谴责奴隶制，那末他们在神学院的私人讲授中则保护它。

五十年前故世的耶稣教士古里曾写过一本《道德的神学》，它是经典著作，所有的神学生都人手一册，按照巴黎大主教基贝尔的评语，它“近三十年来成功地改造了法国的宗教界的心灵”。古里在这本书里说：

“问：人是否可以有对别人的所有权？”

到消灭它。但是生产工具一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奴隶制已成为对人的剥削的靠不住的和赔本的形式，它就归于消灭。拿雇佣劳动制同奴隶制比较一下。奴隶主必须买自己的奴隶并在他生病和死亡的场合承担一切损失；他在奴隶生病和在不劳动的日子里必须养他；他还必须操心他的养老问题，因为不能像狗一样把他杀掉。资本家解脱了所有这些操心的事。他不用解囊，要多少工人就可以得到多少工人。他付给工人的工资大体相当于奴隶主为养活他的牲畜所花的钱数。巴黎的公共马车公司维持一匹马的费用比一个马车夫的工资还要多，而他们的四脚的奴隶所做的工作却比他们的自由的雇佣奴隶要少。

为什么无情地剥削自由的男女工人的资本家会成为废除奴隶制的热心的战士，这不是用感伤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能够说明的，这只有用经济理由才能说明。

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压迫阶级也认为正义和道德所赞扬的奴隶制是神圣的和自然的制度。古代社会的不幸的奴隶甚至预见不到消灭奴隶制度的可能性。奴隶制窒息了他们心中一切反抗的感情，正像它阻碍一切正义观念在主人头脑中产生一样。例如在北美南北战争时征集不到足够数目的黑人来组成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军队。

中世纪的情形就不一样。封建主只有用不断斗争的方法才能

答：人按照自然法可以当作有用的财产永远卖给别人。因为假如他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这财产转让给别人，他就可以永远转让它，因为他可以出让他所占有的东西。

奴隶制或永久的从属，同自然法在原则上是并不矛盾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劳动让给别人，是为了换得食物。”

（古里《道德的神学概说》，第二章《财产的原则。——论正义和权利》）

耶稣教士古里作为精明的逻辑学家，他从雇佣劳动和自然法中引出奴隶制。他的论点在一切卫护资本家阶级或承认某种自然法存在的人们看来是无可辩驳的。——拉法格注

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全国：他们必须把暴动一个接一个镇压下去和把生活在集体主义的农村里的农民对平等和独立的渴求淹没在血泊里。请听十世纪的农民的这个反抗的呼声，请告诉我你们是否听过更豪迈的呼声：

“主人对我们无恶不作；他们占有一切，享用一切，一切都干得出来，而使我们生活在贫乏和痛苦之中……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对待我们呢？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也有四肢，也有身体，也有病痛的感觉，——而我们是以前一百个对付一个……让我们起来保卫自己反对骑士，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任何一个人就不能奴役我们，这么一来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砍伐树木和在树林里猎取野兽，在河里捕捉鱼虾，统治树林、沼泽和牧场的只是我们的意志。”^①

农民们为了表达平等的渴望并不需要等待1789年的资产阶级。但是穿着兽皮和毛织的斗篷和用棍棒、镰刀武装起来的贫苦农民如何能对付得了那些穿着铠甲的封建主呢？在法国、英国和德国，他们到处都被打败，惨遭屠杀，备受折磨，——所有这些都是僧侣和资产阶级的援助和参与下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英雄埃蒂耶纳·马塞尔（自由派和急进派的共和主义者，在巴黎市政厅对而竖立了他的塑像），在利用参加扎克雷起义的农民之后又出卖他们，把他们交给坏蛋查理^②之手。

但是火药一走出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并进入工业的领域，它便恢复了战场上的平等并宣布封建制度的死刑；但是当火药把欧洲从封建领主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锁链——常备军。

① 《卢的故事》(Le roman de Rou)。据说这部书产生在九世纪或十世纪（这部书又名《诺尔曼人的英雄事迹》，系十二世纪盎格鲁—诺尔曼诗人罗伯特·韦斯所作。——编者注）。——拉法格注

② 指十四世纪残酷镇压扎克雷农民起义的纳瓦尔国王查理二世。——编者注

资产阶级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耀武扬威的军人，它为不分民族差别地剥削一切人的雄心壮志所鼓舞，宣布一切民族的博爱并声称在它的社会统治之下将出现和平和商业的统治。为了加速这种和平统治的到来，欧洲资产阶级的巨头们建立了“国际和平同盟”，他们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大会还派遣代表到各国国王和专制君主那里去向他们述说战争的恐怖和列举出消耗在维持常备军队的巨额款项来恐吓他们。这些正义与博爱的使徒，当他们看到欧洲常备军的数目日益增长，战争日益成为大规模屠杀的战争的时候，终于不免感到失望。于是他们决定装扮成热烈的爱国者；假如他们现在在宣传了他们的博爱福音之后没有号召各国人民互相残杀，这是由于恐怖；今天资产者也免不了成为炮灰。

人们可以像艾米尔·奥利维耶那样轻松地投票赞成侵略达荷美的亚马孙女人或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的殖民远征，因为派往那里去送命的只是农民和工人；但是在欧洲战争时，资产者自己必须参加战争和付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件事他们是完全不喜欢的，特别从改善的武器和新的炸药使战场变为几平方公里的非常大的屠场之时起，在那里几十万人不光荣地和不英勇地遭到杀害。

屠杀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饥荒。事实上一次欧洲战争势必把一切健壮的男人都征召入伍；工厂都要关闭，谷物在收割前就烂在地里，没有耕过和没有播种的田地不会有收成。在这样的战争——不管哪一方胜利都一样——之后交战国双方的人口减少，面包缺乏；武器落入工人之手。布朗基说：“谁有枪，谁就有面包！”。一次欧洲战争将会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革命。

只有蠢人或罪犯才会希望欧洲战争。破坏工具的发展和改善以及全民军事化使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了；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废除常备军的时刻于是来到了。

但是经济现象比资产阶级的意志更有力，不允许实现它的理

想。目前保留着常备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促进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假如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想废除军队，那末服务于军事的一切工业就要破坏，在劳动市场上一下子就会抛出三十到四十万青壮年；这就会引起普遍的失业，这就会引起社会革命。

假如可怜的资产阶级也偶然有过合理的理想，从它取得社会统治之时起就力图付诸实现，那末就在这里可以看出，由它自己发动起来的经济力量是反对它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它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它必须服从经济领域的力量。

四

理想在人的头脑中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不是正义的理想，而是和平和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理想里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分，在那里一切属于大家，在那里平等和博爱是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纽带。在动乱的历史时期，高尚的思想家——柏拉图、莫尔、康帕内拉——把这个理想的社会描绘为令人心醉的乌托邦，英雄们为了它的实现而起来斗争，不惜牺牲性命。

这个理想不是人脑的自发的产物，而是对于宗教告诉我们的那个**黄金世纪**，那个人间天堂的回忆；这是对于人们在达到私有财产之前所必经的那个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久远的回忆。我曾引用过的海克威尔德和沙列乌阿的报告书也证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假如希腊城市的穷人和平民为恢复财产公有而发动的许多次反对贵族和富人的暴动失败了；假如中世纪的异端的民众的教派恢复世上的平等和博爱的多次尝试失败了，那是因为在希腊和罗马崩溃时期也罢，在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也罢，经济现象都不允许恢复财产公有；它们不但也不想恢复财产公有，反而致力于破坏共产

主义的最后残余和准备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因素。

共产主义的理想以新的光辉在我们的脑子里复生。但是这个理想已经不是一种回忆，它是从现实的深处产生出来的，它是经济世界的反映。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梦想家，象英国的洛拉尔特教派^①和罗马的平民那样；我们是相信科学的人，我们不臆造新的社会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引出它们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

我们被谴责制造阶级，恰恰相反，我们要求消灭阶级，因为我们知道那迫使人们分裂为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生产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亚里士多德这个思想巨人曾预见到当机器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时，自由的公民便不再需要奴隶给他们创造闲暇的可能。而我们则预见到雇佣劳动制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末日，因为我们知道人掌握着铁的奴隶——自动的机器。

在古代，在任何历史时期，自由的公民从来没有拥有这样多数量的奴隶。

这里有从1890年商业部出版的《统计年鉴》中摘下来的几个数字。

1887年法国工业、农业、铁路和水上运输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数目达到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八架而提供九百万匹马力。

按照矿场主管部门的计算，每匹马力相当于二十一个工人的劳动力。因此，这九百万匹马力等于一亿八千九百万个奴隶的劳动力。

据1886年调查，法国有三千九百万人，因而每个法国人可以

^① 十四世纪在荷、英、德等国主张激烈改革教会的下层教士运动。——编者注

摊到四个铁奴隶或者每个家庭以五口人算可以摊到二十四个铁奴隶。

这一亿八千九百万的铁奴隶的工作由一个没有能力指挥和控制它的阶级所独占，它在非常的富饶中间创造出生产者的贫困。

但是当生产资料一旦从资本家阶级的懒惰的和无力的手里夺过来而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时，和平与幸福就会重临大地，因为社会将征服经济力量，正如它征服自然力一样。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人才会是自由的，因为他将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主人。

无意识的统治便要宣告寿终正寝。

选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王子野译) 1965年三联书店版
第1—23页。

财产的起源和进化* (摘录)

(1895年)

献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他的学生和朋友

保尔·拉法格

第一章 现代财产的形式

I. 财产形式的分类

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财产是服从于支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进化规律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些社会不平的御用辩护士承认财产只有一种唯一的和永恒的形式——**资本**^①，他们断言资本是永存的。为了肯定资本的永存，他们千方百计力图证明资本是从世界创造时就存在了，而且洋洋得意地作出一个结论：它既然没

* 这是拉法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讨财产的起源及其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演变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五章。这里摘选了第一、二、五章。——编者注

① 笛卡儿派的哲学家主张一切争论必须从弄清争论中所用的词儿和术语的准确意义开始，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给资本这个词规定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提到资本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带来利息、地租、利润或收入的一切财产。为了利息而出借的货币总额以及不出所有主使用而由雇佣工人使用的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织布机、冶金工厂、船舶等）都可以称为资本。但是农民私有主靠自己家庭之力耕种的土地、盗猎者的猎枪、渔人的小船、木匠的刨子、外科医生的刀、作家的笔等等虽然也是财产，但不能称为资本或资本主义的财产，因为它们的所有者是把它们当作传送自己的而非别人的劳动的工具来使用。资本这个词是指被雇佣劳动者所使用并生产商品并使财产所有者获得收益的财产。不劳动而获得利润这个观念同资本这个词是紧密不可分的，正如著名的传说所讲的海格立斯同他的大鼍长在一起一样。——拉法格注

有起端，那就不能有终结。为了确证这个异想天开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象鸚鵡似地反复讲述着野蛮人的历史，他们以分享猎获品为条件而将自己的弓借给伙伴。由于不满足于资本主义财产起源于史前时期的说法，某些经济学家还到人类社会以外去寻找它。他们在无脊椎动物中间发现了资本，所依据的事实是有远见的蚂蚁也知道积蓄贮备。可惜他们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也只好半途而废，因为毕竟不能进一步发现这种昆虫积蓄贮备只是为了出卖它们并从商品流通中获得利润。

可是，在资本永存这种薄弱的理论中是有漏洞的：它的宣传者就不能证明**资本**这个词本身是永久的。一只船上的绳子，除了系钟的以外，每一条都各有自己的名称。很难设想在经济的领域里人们反而缺乏同样丰富的用语并对资本这样有用的东西忘记了起个名称。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资本这个词具有我们今天的这种特殊意义只是从十八世纪才开始，正如标志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伪善形式之一的**博爱**这个词也同样是从那时开始，因为正是这个时期资本的财产形式才开始在社会上取得优势^①。

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对封建的财产形式的这种占优势的社会意义曾引起了近代历史的主要事件之一——法国革命的发生。这个革命虽然高唱着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爱国主义的口号，而实质上是在主要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口号后

^① 拉·库伦·德·圣-巴莱提到“资本”这个词时或把它当作规定某种赋税的形容词，当作名词则使用于表示建筑或服装上的一部分（《自原始以迄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古语词典》）。李特列在十二世纪的手稿中发现它是当作形容词使用的。把它当作名词的最早记载是十六世纪的事。在里舍莱（1728）的词典里，这个词是属于形容词，只是在两三个场合才当作名词使用。在特勒乌（1771）的词典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只是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它才带上经济的意义：“资本一词指不同利息如何必须偿还的金额。——任何公司的基金亦得称为资本。”——拉法格注

来被金融的和政治的投机家在大纲和纲领中当作广告来利用^①。与资本一词相适应的财产形式只是由于商品生产才开始获得社会的意义。而商品生产又是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它从十二世纪就已开始并由于美洲和回绕好望角而达印度的航路之发现，贵金属从新大陆的输入，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各国王族之间的联姻，欧洲大国的组织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相对的和平等等而加速发展起来。所有这些因素同其它的次要因素一起促进了资本这一私有财产的最完全的，也可说是最后的形式的发展。

资本形式出现较晚这一现象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证明所有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像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現象一样是在发展和经历着各种不同的形式，由一种形式产生另一种形式。

财产很少停留在一种固定的形式里，甚至在现代社会里它也存在着几种形态和不同的变种：

- I. 财产的公有形式
- (A)——古代起源的公有财产：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等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成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垂涎和侵占的对象。
 - (B)——现代起源的公有财产，它是在公用事业的名义之下为国家所管理的：邮政、铁道、博物馆、国立图书馆等。

^① 在革命时代资本家还是社会上的初生之物，塞巴斯蒂安·迈尔西埃在他手编的、1802年出版的新语词典中给“资本家”一词下了如下的有趣定义：“资本家，这是只有巴黎才知道的东西。它是指一种怪物的所有者，一种铁石心肠的人，只醉心于金属。说到地租，他是漠不关心的，因为他无立锥之地。怎么能要他纳税呢？好象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抢劫商队又怕被人抢去而把黄金埋藏在地下，资本家也将我们的金钱埋藏起来了。”——拉法格注

- II. 财产的私有形式 {
- (A)——个人用品的财产。
 - (B)——劳动工具的财产。
 - (C)——资本财产。

II. 个人用品的财产

个人用品或私人用品的财产是财产的最原始的形式；它过去经常存在而将来也还是要经常存在的，因为它构成生活的必须的条件。这个概念是有非常大的伸缩性的：从人们赖以维持其体力的食物一直到人们用作装饰的珠宝都包括在内。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住宅也属于这种财产的范围；人们占有住宅很象乌龟占有龟壳似的。假使文明，由于工业中采用机器，而使以前只有富人才能得到的某些奢侈品现在也能让穷人得到，那末从另一方面它又使多数公民失去自己的住宅，迫使他们住进出租的房子和设备齐全的房间里去，在空前富裕的情况之下，它却迫使生产者满足于个人用品的财产降到最底的限度。

资本主义的文明使无产阶级必定要在比野蛮人更悲惨的生活条件之下过日子。姑且丢开野蛮人不为寄生虫发财致富而劳动这个事实不讲，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吃的是些什么。不容争辩，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居住在欧洲的野蛮人拥有大量的猪和其它家畜，并且有可能在野兽成群的森林中狩猎和从事捕鱼，他们虽然穿着兽皮和粗糙织成的衣服，但是享用的肉食品要比文明的无产阶级丰富得多。文明的无产阶级穿的衣服虽然是用棉毛料子而由精良的机器制成的，但是不能防御恶劣的气候。

更坏的情况是无产阶级的身体不及野蛮人这么强壮和适于应付恶劣的气候。

资产者认为自己是人类理想的体现者。他们的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和宗教家——一致力图证明这种瘦弱的或长满不健康的

脂肪的生物（在他们身上疾病甚至多于恶行），是人类进化的最后产物^①。但是，一切公正的观察者都应当同意文明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缺陷，自然也要看到例外，为了使人类回复到野蛮人的筋肉强健和感觉锐敏，必须要有高明的教育，从婴儿时代开始继续一生，而且要接连几个世代才有希望^②。

现代的工人被迫满足于自身生活迫切需要的个人用品的最低限度，只因为资本家为了实现狂妄的幻想而占有过多之故。即使资本家也象神话中三个巨人那样有五十个脑袋和一百条腿，也不能穿戴完塞满他们衣柜的帽和鞋。富者常常感叹着不能扩大胃的容量，恨不得吞下桌上堆成山样的食品。他们象荒淫的苏丹一样，使后宫有人满之患，为了寻欢作乐，他们好象有十个海格力斯的精力似的。假如无产阶级感受个人用品财产的不足之苦，那末资本家最后却成为财物过度丰裕的牺牲者。苦闷压抑着他们，病患折

① 一个美国的进化论者考察了资产阶级（照达尔文的学说，这个阶级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为成功的）当中相当数量的早期脱发和落齿的事实，预言了无发无齿的人类。假使资本主义的文明继续下去的话，这并非不能发生。——拉法格注

② 凯撒（资本主义文明的最狂热的崇拜者对他的某些观察力也不能不承认）曾极口称赞野蛮的日耳曼人在战斗中所表现的力量和机智。他们光头赤膊与穿戴盔甲的士兵作战，即使战胜了他们，也不敢去追击。在第七次战争当中（这是对罗马唯一光荣的一次战争，正如拿破仑第一所说），凯撒因对粉碎维尔琴盖托里克斯所指挥的高卢人的英勇抵抗已经绝望，于是派人到莱茵河去征募军队，并且命令自己的骑兵下马，以便将马让给日耳曼人，他做对了。在诺维底亚奴和阿勒细亚两次战役中，当罗马的队伍后退时，日耳曼的骑兵就打乱高卢的队伍而取得胜利。后来，隔了百余年，威维利斯为了鼓动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起来暴动，提醒他们说，凯撒之所以能打败高卢人只是由于得到日耳曼军队的帮助。

摩尔根，罕见的人类学者之一，绝不附和那些庸俗之流对非文明民族加以无意义的轻蔑，他认为，“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所达到的进步，或许比文明所带来的还要重要。”

野蛮人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文明，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性质而以可怕的速度感染了文明的缺陷。然而埃及和希腊的历史证明，野蛮民族如处在良好的条件之下并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发展将达到怎样的高度。——拉法格注

磨着和摧残着他们的种族，这是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必然结果。道德家与其拿那可伶的节约论去说服无产阶级，反不如劝说资产阶级实行节欲的善行更好些。

III. 劳动工具的财产

照富兰克林的说法，人是制造动物的动物。的确，工具使人同其祖先——动物区别开来。猿猴满足于木棍和石块。人是能磨光石斧并拿它作武器和工具的唯一动物。因此在洞穴或地层中发现的磨光的石块正如人的骸骨一样确凿无疑地证明人的存在。

劳动工具——不论野蛮人的石斧，或者木匠的刨子，生理学家的显微镜或者农民的土地，都是人的器官的附属品，有了它，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易于得到满足。

在小手工业尚存的时代，自由生产者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在中世纪，手工业者也象我们时代的外科医生一样，随身带着自己的工具。在土地私有制确立之前，农民暂时占有分给他的一片土地。在封建时代农奴紧紧地依附于其所耕种的土地，使他们与土地分开是不可能的。劳动工具的个人所有的痕迹还有很多，但它在迅速消灭：机械化的生产从手工业者手中夺去工具并把它合并于机器。机器不再是个人的工具，而是集体的工具，因而它也就不再能够属于生产者个人所有了。

资本主义的文明从人的手中剥夺了作为其附属品的工具，而这个剥夺的历史发端可追溯到主要的经过改良的工具——武器的没收之时期。野蛮人占有自己的弓和箭，这两者对于他同时用作武器和工具，兵士就成了第一批无产者，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既被剥夺了武器，也被剥夺了工具，并由国家将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里去。

资本主义的文明曾经把个人用品的财产降到最低限度：再要

继续降下去而又不危害生产者的生命是不可能的，而生产者对于他们是下金蛋的母鸡。现在它正致力于彻底地剥夺生产者手中的劳动工具；欧洲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劳动工具。

IV. 资本财产

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的财产形式；不论在其它的任何社会里，它至少没有作为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存在过。

这种财产形式的极重要条件是对自由生产者的剥削，日复一日地剥夺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对这件事卡尔·马克思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资本的存在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商品生产是这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是为了直接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或封建领主和奴隶主的需要，而是投入市场。

在其它的社会里也有买者与卖者，但那里售卖的只是消费以外的剩余品。在这些社会里也对生产者，农奴或奴隶，进行剥削，但是所有主对他们还承担了某种义务：比如奴隶的主人曾给自己的劳动的动物——人饭吃，甚至当他们无工可做的时候也是这样。资本家则摆脱了这些麻烦，把它统统推到自由生产者身上去了。仁慈的普卢塔克^①曾对卡托的道德规范表示愤慨，因为他把一些衰老不能工作的奴隶卖出去。他对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又将如何说法呢？还没有一个资本家、基督教徒、自由思想家、反犹太主义者或慈善家不把那个使他们积累百万财富的无产者赶到街上去饿死。资产阶级在解放奴隶和农奴时曾大叫大喊地宣布自己是人类自由的战士，然而他所关心的不是生产者的解放，而是使资本家摆脱对劳动者所负的一切义务。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存在

^① 普卢塔克(约 46—125)——古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编者注

的情形之下，所有主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和滥用”其权利。

* * *

这就是现代社会里存在的财产形式。甚至表面的观察也能指出不该把它看作不变的，相反地，它们处在不断变革之中。例如，当古代起源的公有财产被私有财产排挤而消灭下去之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又转变为国家管理的公有财产；然而在达到这个形式的极限之前，资本家将从生产者手中剥夺他们个人的工具并且创造集体的劳动工具。

在我们考察了当前财产形式的这个进化之后，若还断言说在过去财产总是停滞不变的并且在取得资本（它注定是要消灭的并为新的形式所代替）形式之前没有经过一系列的形式，那是毫无根据的。

在开始描述财产进化的各种形式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在这个历史概述里所采用的方法。

V. 方 法

所有的人，不论种别，从生到死都经历着同样的发展阶段。在相同的年龄中，只是由于不同气候的影响而稍有差别，他们都经历着相同时期：出牙、发育、成长和衰老。人类社会也同样地经历着家庭发展的同一形式，同样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和哲学观点。

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科^①，第一个发现历史进化的这

^① 卓万尼·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意大利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他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科学原理》（1725年）一书中认为，所有民族都经历三个时期，相当于人类生活的三个时期：童年、青年和壮年。维科说，童年相当于“神权时期”，那时创造了贵族的国家；壮年相当于“人的时期”，亦即民主共和和有限制的君主专制的时代，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时代被他看作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编者注

个伟大规律：在自己的《新科学》一书中他说到“所有民族的历史都要通过的理想的、永久的历史，不论它们在开始自己的文明时带着什么程度的蛮性、兽性和残忍性”。卡尔·马克思把政治界和精神界的现象同经济界的现象联系起来，革新了历史的概念，确证了维科的规律，他在《资本论》的序言里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假使弄清楚了某一民族由蒙昧状态到文明状态的历史，它就可用作为地球上一切民族的历史的原型。然而连续不断地彻底考察任何民族所经过的一切阶段是不可能的。但是，假使不能从某一民族或种族的整个生活中构成这个历史，——那末可以从地球上各民族的历史中选择材料^②，连在一起构成它。人类在这种方法帮助之下，即使逐渐年老，还是有可能认识自己的童年。

文明民族的祖先的风俗习惯在野蛮民族中还会碰到，在那里文明还没有将它们摧毁。蒙昧人和野蛮人的风俗、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和观念使历史家有可能把那永被遗忘的过去唤了转来。探究原始民族，就能找出财产的起源；搜集全地球的材料，就能彻底考察财产发展的阶段。

第二章 原始共产主义

I. 个人财产的起源

经济学家这么慷慨地把资本加到野蛮人身上只是由于他们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② 在以下各章节中读者将读到从旧大陆和新大陆生活中搜集来并加以整理的材料，目的是要证明一切民族不论其起源如何不同和往后的文化阶段如何不同，都重复着相同的现象。——拉法格注

野蛮人的以及一切原始民族的风俗全然无知。

至今还存在着这样的野蛮部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地产（不论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而对个人用品的个人占有也只是刚刚开始。

法森和豪伊特^①根据对澳大利亚部落生活的深入研究指出：在他们那里甚至那些最带有个人性质的东西如武器、装饰品等等，在集团成员之间迅速地由一手传给另一手，因而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个人财产，而只能是属于全体成员的公有财产。

私人财产或个人财产最初以思想的形式出现：在占有任何物质财产以前，野蛮人——这些谁都想不到的唯心主义者——领受自己的名字。名字是在他们达到成年时用宗教仪式授与的，天主教的洗礼便是保留下来的遗风。野蛮人把这个名字看得象最贵重的珍宝似的。他从不向外人公开自己的名字，生怕被人窃去。而当他想用无价的礼物来表达自己的友谊时，就同自己的朋友交换名字。然而就是这种个人财产也不是绝对属于他的：照摩尔根的看法，名字是属于氏族的，当受赠的朋友死去之后，这名字仍旧要归还氏族^②。

个人财产采取物质的形式出现只限于野蛮人的贴身之物，或者说得确切些就是那些与他结合一起的东西，例如穿在鼻子上、耳朵上、嘴唇上的装饰品，围在脖子上的兽皮，防治风湿病的人的脂肪，假想为神的排泄物的水晶石以及其它装在树皮篮里并拴在所

^① 劳里默·法森(1832—1907)——英国的澳大利亚民族志学家，斐济群岛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阿尔弗勒德·威廉·豪伊特(1830—1908)——英国的澳大利亚民族志学家，驻澳大利亚的殖民官，1871年起和法森合著《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和《库尔纳伊部落及其平时和战时的习俗》。——编者注

^② 蒙昧人和野蛮人使一切灵魂化，超感觉的灵魂，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个折磨人的可厌的观念是他们的虚构之一。在他们眼中字是活的，就是说，代表着它所标记的事物的灵魂。基督化身说是野蛮人的观念的再版。死后脱离肉体的和活着时梦中的人

有主身上的珍贵之物。

这些个人使用之物就在死后也不离开它，与死者尸体一起烧毁或者一起埋葬。为了使一件物品成为个人财产，就必须使它同所有主发生真实的或假想的联系。野蛮人想承认某物是属于他的时候，就要作出吃它的姿态：把它送到口边，紧贴舌头，舔一舔。爱斯基摩人购买一件小物品，甚至是一枚针，都要把它贴着嘴唇或者采取某种其它的象征性的宣告动作，借以表示想要保留它作为个人使用之物。这就是达布(Tabou)制度的起源。

使用是个人占有的主要条件。即使是某人所生产的东西也只有在他本人使用和通过使用使之神圣化的情况下才属于他所有。爱斯基摩人只能占有两只船，假如他造了第三只，那就应当归氏族支配。凡是本人所不使用的一切都得归公共所有。野蛮人对借自别人的船只或者一般捕渔和打猎的工具都不负什么责任，假如他丢失了，也不考虑归还的问题。

II. 氏族共产主义

原始人不可能有个人财产的观念，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他还没有意识到与他生活在其中的血族集团分开的个人。

野蛮人碰到这么多的真实的危险又被这么多的想像的危险所困惑，以致一个人单独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连这种思想也

的灵魂能够实行复仇行为和惩罚自己的敌人，它还掌握着左右善恶的非常的力量：因此誓词把原始人投入迷信的恐怖里去。

本文中我也象摩尔根和恩格斯那样使用 gens (氏族)，这个词比它的同义语克尔特人的 clan 要好些，因为 gens 一词就它的起源和派生词的数量之大来看，有更大的历史流传。拉丁文的 gens 一词摩尔根用来表示构成部落的同一血统的集团，它与意义相同的希腊文 genos 都是从雅利安语根 gan(意指生育)而来。gens 和 genos 专门用于同出一祖的集团，由此而有拉丁文的 gentilis (人种)和法文的 gentilhomme(贵族)。——拉法格注

没有过。从他的氏族、他的部落联盟中驱逐出来，对于他等于判处死刑。史前期的希腊人和闪米特人也像一切野蛮民族一样，杀害部落成员之一的凶手只用放逐加以惩罚。奥列斯特^①在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该隐^②杀死了兄弟都被迫离开故乡。在先进的文明社会里，如在进入历史时期的希腊和意大利，放逐仍然是最严厉的惩罚。希腊诗人泰奥尼斯说：“被放逐的人既无朋友，又无忠实的伴侣，放逐的主要的苦难就在于此。”离开了自己的同伴，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对于过惯了群居生活的原始来说是可怕的事情。

虽然，估计到野蛮人所生活的环境，也可以把他们称作完美无缺的人类，甚至比文明人还要完美无缺的人类，因为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他们同自己的部落，同自己的氏族联结得如此紧密，以至在个人财产方面也好，在家庭方面也好，都没有表现过和没有体现出自己的个性，象我们对它所理解的那样。在最原始的野蛮人中间，家庭根本不存在；某一氏族的妇女归另一氏族的男子所共有。儿童属于整个氏族，如象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互相以兄弟姊妹相待，对自己的母亲及其同辈的妇女一概称作母亲。氏族对于他们就是一切，在氏族以外，他们不知道别的东西，结婚是氏族的，所有主也是氏族。

氏族内部的一切都是公共财产。布希曼人^③得到一件礼物时总是要把它分给本氏族的成员。达尔文曾看到过火地岛的一个土人把人家送给他的一床被按照伙伴的人数分割成若干片。假如布希曼人得到一匹牛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他也同样平均分配，而给自

① 奥列斯特——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利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编者注

②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编者注

③ 指生活在南非洲的部落群，直到十九世纪还处于原始公社制社会。——编者注

已往往只留下最小的一份。碰着饥荒的年景，年轻的火地岛人跑到海边去寻找食物，假如他幸而发现一条搁浅的鲸鱼，这是他们最喜爱的食物，纵使饿得快死了也不去触动它一下，而是跑回去报告本氏族的成员，他们立即赶到发现场所；然后由年长者将鲸鱼的尸体平均分配。

比火地岛土人和布希曼人较为进步的野蛮人中间，狩猎的结果也不归杀死野兽者所有，而归他的妻子的家庭或者有时就归他的妻子，并且遵照按亲属的等次制定的详细的规定进行分配。

狩猎和捕鱼这两种原始的生产形式，通常都是共同进行的，因而生产品的消费也是共同的。波多库托斯人，这些巴西的顽强的部落，他们共同地组织围猎，直到把野兽吃完才离开狩猎地点。在有的部落中间，共同狩猎的习惯已经过时了，可是仍然保留着共同享用的古老遗风；幸运的猎人拿出他的猎获物来组织宴会，招待本氏族的所有成员。在高加索的某些村落中，一家杀了一头牛或十头羊，就要给全村人举行庆祝宴；大家一块吃喝，以纪念当年的死者。丧葬宴会就是这种共产主义宴会的遗风。

摩尔根研究了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风俗之后，在他的最后的重要的著作中描写着北美印地安人共同渔猎的情形^①。

住在平原而又以肉类为主食的部落，在打猎中也显示出自己的共产主义。“黑脚种人”在猎取水牛时男男女女一大群人骑着牲口追逐牛群。当追逐牛群的活动开始时，猎人把杀死的牛丢下，让给随后赶到的第一个人所有，这种分配方法一直继续到所有人都有了为止。有些人把水牛肉切成细长条，放在太阳下或在烟里晒干、熏干。另外一些人把猎获品的一部分制成肉干；干燥了的和捣成粉末的肉调以油料并用兽皮卷起来。

^① 摩尔根《美洲土人的家庭和家庭生活》华盛顿 1881 年版。——拉法格注

渔季一到，部落的所有成员都集中到盛产鱼类的哥伦比亚河里来，所有捕获的鱼也一起储存。每晚按妇女人数进行分配，每人都领到相等的一份。人们把鱼剖开，放在篱笆上晒干然后用篮子装运到村子里去。

III. 公共住宅和食堂

野蛮人在停止了沿着河崖海岸流离转徙寻找自然提供的丰富食物之时起，就开始定居下来，构筑房舍，但是他们的房子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全氏族的，而且一直到向母系氏族过渡，家庭开始分立的时候仍然是公有的。这时候，一座房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在加罗林群岛的土人中，常有一家七百多人同住一起。

拉佩鲁兹^①在波利尼西亚所遇到的那种房子可算是这种公共住宅的典型。这种房子长三百一十英尺，宽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十英尺，它们的形式很象倒翻转来的独木船，由两端开门，可容纳百多人居住。据摩尔根说，在前一世纪末就已绝迹的那种易洛魁人的长房子有一百余英尺长，三十英尺宽和二十英尺高。一条狭长的过道贯穿房子中间，过道两边辟了许多七英尺宽的小房间，专供已婚妇女居住。每座房子的两头入口之处有门；门上有描绘的或雕刻的氏族的图腾形象，也就是他们自认为所由发脉的动物。

婆罗洲的达雅克人部落的村落也是由类似的房子构成的，这些房子建筑在离地十五——二十英尺高的木桩上，很象瑞士的水上建筑。据希罗多德说，波奥尼斯人也在布拉西亚湖中构筑水上茅舍居住。野蛮人的已婚妇女有自己的特别房间，通向中央走廊。男人和青年人，未婚的妇女和少女都睡在隔开的公共大厅之内。墨西哥的大屋外观很象一架巨型的梯子，由许多层重叠而成，一层比一层缩小，每一层又分成若干小房间。

^① 让·弗朗斯瓦·拉佩鲁兹(1741—1788)——法国航海家，考察过太平洋许多地区。——编者注

施利曼^①在阿戈利亚德所发现的宫殿以及现在在挪威和瑞典发掘出来的废墟中的巨大住宅的遗迹，乃是荷马时代希腊人的和野蛮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公共住宅。在奥弗涅地方直到本世纪前半叶还可碰到的家庭公社的住宅很象易洛魁人的长屋。

在这些房子里，食物是公有的，烹调和用膳也是共同的，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行事。

为了描述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居民的生活，不得不向摩尔根求教。诚然，他的研究只限于美洲的红色人种的生活而主要地以研究易洛魁人的生活为限。他在易洛魁人中间生活过，作过客人和部落的养子。但是，据他说：“假如在易洛魁人那里发现了某种风俗，很可能在那些处于同样的条件、因而有着同样需要的其他部落也会遇到相同的东西。”

住在一起的易洛魁人栽培园艺，收获果实，把它们堆放在用作公共仓库的房子里。诚然，这里已经出现了某种类似私有的东西，很快地就出现了个别家庭的占有。

例如，玉蜀黍秆用叶子一束一束捆起，吊在各别的小房间里，当某一家的存粮吃完时，别家就以玉蜀黍按需要供给它，直到它能自给为止。鱼和猎获物的储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储存的植物食品和动物食品分给妇女并委托她们担任监督，但仍然是全氏族的公共财产。

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会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个人用品的个人所有，然而它的使用却仍是公共的。海克威尔德讲到特拉华和慕西两种人时指出：“在印第安的村落中或在印第安的家庭中没有一件东西没有自己的单独的主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属于他的，从马、牛直到犬、猫和小鸡。……有时一窝产下的猫或小鸡属

^① 亨利希·施利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1870—1886年曾在希腊和小亚细亚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这里指的是他在迈锡尼的发掘。——编者注

于许多不同的主人，假如想买母鸡，就必须同一窝小鸡相同数目的儿童讲交易。因此，假如在部落中公有制原则占着统治地位的话，那末在家庭成员之间却承认私有权。”^①

事实上，个人财产是在原始公有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不仅不与原始公有制相矛盾，象经济学家所说那样，而且是它的必要的补充。

其他的印第安部落，例如在（新墨西哥的）拉枯纳村里的印第安部落，却不按家庭主妇的数目分配储存的粮食，而是把它保存在公共仓库里。赛米尔·戈尔曼牧师在1869年写信给摩尔根说：“这些仓库通常都由妇女管理。她们比起她们的邻居西班牙人更有远见。她们通常总要备足一年的存粮，而当地的饥馑只在连续两年的歉收才会发生。”

在尤卡坦半岛的马雅族印第安人，在一间小屋里为全村人备办膳食，很象中世纪时期在公用炉灶上为全公社烤面包一样。斯蒂芬在他的《尤卡坦旅行记》里讲到他曾经常常看见妇孺成群，手里拿着木制或陶制的碗钵盛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从公共厨房走出来，然后走向各人的屋子里去。

在易洛魁人那里也在每一个长屋里为它的全体住户共同备办膳食。由妇女们，氏族的主角，从公用锅中取出饭菜，按照各家需要进行分配；每一份饭菜分别盛在木制或陶制的碗钵里面。他们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也没有盘碟，更没有类似厨房或饭厅那样的房间，所有人都随便站着吃或坐着吃。饭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多余下来的存起来，长屋里的住户假使有谁

^① 海克威尔德《宾夕法尼亚及附近各州印第安民族的历史、习惯和风俗》。海克威尔德是兄弟会的传教士，他曾在印第安人中间生活了十五年（1771—1786），并且能说他们的语言。他的记载有个人观察的朴素的著作，澄清了庸人所散播的关于野蛮人的谬论。——拉法格注

饿了一整天就可以去吃。午后妇女煮一种玉米面的粥，让它冷却，放到次日早晨或者用以待客。在他们那里无所谓早餐或晚餐，他们饿了就吃，屋子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一般说来他们不是嘴馋的人。

史前期的希腊也曾有过这样的风俗；有史时期的同餐共食不过是原始公社制时代的遗风。

庞丁的赫拉克利德^①，柏拉图的学生，曾给我们留下关于克里特岛共食的记载，在那里原始时期的风俗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在男人 (andreies) 的共餐桌上每一公民领到同样的一份，只有执政官 (archont)，酋长会议 (gerônia) 的成员有权领取四份；第一份是以公民资格领得，第二份作为餐桌的主席而领得，其余两份作为保管餐厅和家具之酬劳。每一张餐桌都置于年老妇女的特殊监督之下，她分配食物，公然把那最好的部分分给议会中或战场上特出的人们。外宾分给第一份，甚至先于酋长。一大杯掺水的酒从一只手传到另外一只手，喝完就添满，一直到终餐为止。赫拉克利德只记载了男人的共食；荷克补充说，在多利亚的村落中曾存在过妇女和儿童共食的风俗。这位克里特岛的历史学者的假设要比我们对蒙昧人和野蛮人中间存在着的经常的性别隔离的认识远为可信得多。

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所有参加共食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又称后者是贵族会议 (sunedria aristokratika)。坐在一张桌子旁的人显然属于同一氏族。斯巴达人，同一西西迪 (syssitie)^② 的成员，组成相应的军事组织并且一起作战。蒙昧人和野蛮人在一切场合不论在餐桌旁还是在战场上都是采取共同行动，在那里他

① 庞丁的赫拉克利德(约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编者注

② 西西迪是某些古希腊国家中享有全权的公民必须参加的共食制，在斯巴达叫非的迪。——编者注

们都是按家庭、氏族和部落编组起来的。

原始部落每一成员领得自己一份食物的必要性是如此重要，以至 Moira 这个词开始在希腊文中是指共食参加者每人应得的一份，后来就变成命运的名称，最高女神的名称，她同时操纵着神和人并且分配他们每人一份存在，很象克里特共食时的年老妇女给每人分配一份食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神话里命运 (Destinée) 都托化为妇女：Moira^① (摩伊拉)，Aissa (阿伊莎) 和 Keres (凯莱斯)，这些名字都意味着分配食物或战利品时应得的部分。

据亚里士多德说，共食的食品是由土地的收获、畜群和属于公社的农人的代役租供给，因此，他补充说，克里特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由国家供养。他认为实行共食的风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米诺斯施行于克里特居民中间，意大尔^② 施行于意大利西南部的居民中间，正是这个意大尔把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这位斯塔吉里的哲学家^③ 由于发现了当时意大利的大多数民族中还流行着共食的风俗，因此他认为共食是由这个国家起源的。哈利卡纳苏的迪奥尼修斯^④ 提到在罗马每一个库里亚^⑤ 都有自己的公共食堂以供参加库里亚的所有氏族使用，每十个库里亚，构成三大部族之一，也有自己的公共食堂；接着他又说到拉塞德摩尼亚人的共食制并且假定这种风俗是罗慕洛从莱喀古士的立法里借用来的。^⑥

① 摩伊拉——古希腊神话中三个掌管命运的女神（克罗托、拉刻西斯和阿特洛波斯）。——编者注

② 米诺斯——传说中古代克里特的王；意大尔——传说中古代南意大利西南部居民的王。——编者注

③ 指亚里士多德，因为他出身于斯塔吉里。——编者注

④ 哈利卡纳苏的迪奥尼修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罗马考古学》。——编者注

⑤ 库里亚——古罗马居民分组的单位，每一库里亚由十个氏族组成。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族。在罗马一共有三个部族。——编者注

⑥ 罗慕洛——传说中古罗马的奠基人和第一个国王。莱喀古士——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编者注

亚里士多德的假设和迪奥尼修斯的假设都错了：共食的风俗到处都一样，不靠外来的影响或者摹仿，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无论是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也好，或是在希腊人、拉丁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中也好，都没有例外。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基尔特(ghilde)一词来表示共食，它后来变成手工业行会的名称，行会的成员在入会时必须宣誓要象兄弟般互相帮助和彼此维护。

这些共食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即希腊人所称道的“黄金时代”；在希腊人中共食有着“神餐”的名称。奥德赛上记载着这样的一次盛宴，皮洛斯的四千五百个市民围坐了九张桌子，每桌五百人。罗马每逢盛大节日就沿街摆设酒席招待全体人民。据色诺芬^①说，在雅典一年中的某些日子里，由城市负担经费，宰杀大量牲畜，祭肉分予人民。

宗教，这个古代风俗的贮藏库，也把共食当作宗教仪式保存了下来。按照宗教的规定，雅典市民应当以抽签为序赴元老院集会处共食。谁若拒绝履行这个宗教的要求，法律就要严厉惩罚他。坐在圣餐桌旁的市民，一时也成了神圣的了，并取得了巴拉西特(parasites)^②的称号。

为要证明这种宗教共食的起源如何古老，只须举出共食环境遵守的原始的淳朴就够了；在一个城市里送面包是放在铜盘里；在另一城市里却是放在陶碗里。破坏祖宗的风俗，使用新盘，被认为渎神的行为。天主教的圣餐礼(communion)，如这个名称本身所示，就是原始时期的共食的遗风余韵。

IV. 共产主义的风俗

容纳整个民族的公共住宅开始分散为只容一家的私宅；这个分散跟着也引起了共食的消灭，只有民族的或宗教的节日，例如希腊人为纪念过去而举行的神圣的盛宴是例外。食品虽然已被公认

为属于个别家庭所有，事实上仍归全体处理。据卡特林^③说，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每一个人，不论男人、女人或者儿童，假如他饿了，都可以走进任何一家住宅，甚至是部落酋长的住宅，去找寻吃食。即使是部落成员中最贫困的、最无用的人，假如他太懒了，不想去为自己猎获和采掘食物，可以指望他第一个闯进去的家庭的住户会拿出所有的食物来分给他吃。然而，假如这个人确有能能力打猎而出此一举，那他就得为自己的食物付出高昂的代价：人们将用懦夫和乞丐这样可耻的名称去羞辱他。

加罗林群岛的土人出门旅行无需随身携带粮食。要是饿了的时候，他就走进第一家碰到的小屋里去，不必请求允许，便可以伸手到桶里去取饽饽（Popoi——一种用面包果的果实和好的面）吃。吃饱了，他就走，甚至不必向主人道谢；他只是使用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完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到处流行的这些共产主义风俗在拉塞德摩尼亚一直继续到斯巴达人脱离了野蛮状态之后。据普卢塔克说，莱喀古士，这位神话人物（人们把全部法规的制订都归功于他），曾经禁止人们锁门，以便每个人可以进屋并拿取他所需要的食物或家具，甚至当主人不在的时候。每人也可以不经允许骑马，使用猎犬甚至任何别的市民的奴隶。

私有观念对于一切资产者是非常自然的，但当初跑进人们的头脑却不那么容易。当人们开始思考时，恰恰相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切应当归大家。

①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古希腊历史学家，反对雅典的民主制，维护斯巴达的贵族制。——编者注

② “Parasites”，按拉丁语原意为“同桌共食的人”，后转为“吃白食者”、“食客”。——编者注

③ 乔治·卡特林（1796—1872）——美国画家，曾绘有美洲印第安人的风俗组画。——编者注

海克威尔德说，印第安人相信大神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创造了世界及世界里包罗的一切。他使土地上有居民和使森林里充满了野兽，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一切东西都应当遗交人类的后代。在地面上呼吸和在土地里生长的一切，河流水泽中居住的一切，都是全体人类的财产，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自己的一份。好客在他们不是美德而是义务。他们每个人都宁愿自己挨饿老早躺下睡觉，而不愿受到没有执行义务的谴责，说他没有满足客人、病者或贫者的需要；因为所有人都有权取得“公共基金”的帮助；因为供给他们吃的野兽，假如它是在树林里找寻来的话，那它在这之前一直是公共财产，而敬客的蔬菜和玉蜀黍生长在公共土地上是按照大神的意志而不是按照人的意志^①。

凯撒曾经有机会在日耳曼人中间观察到同样的共产主义。但是他拿文明民族的思想去看待它并认为这些共产主义的风俗目的是在于“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既然在他们那里任何人同最强有力的人处于相同的条件之下”。似乎原始共产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前者从自然环境的需要发展起来，后者从经济的和人为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因为它是人创造出来的。然而，确实无疑的事实是生产和消费中的共产主义是以氏族和部落成员之间的完全平等为前提，而且保持了这种平等。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不仅保持了平等，而且发展了友爱和宽恕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如此大吹火擂的基督教的仁慈和名气也很不小的哲学上的

^① 霍布斯(1588—1679)，近代最有才智的思想家之一，也同意这种观点：“自然，——这个无情的逻辑学家说，——给予我们每个人对于万物的同等权利……”

所谓自然状态就是所有的人都可做他所想的一切，取他所想的一切。由此得出一句流行的话，‘自然把一切东西给一切人’和结论：‘在自然状态里权利的条件就是效用’。”(《市民》)——拉法格注

博爱变得滑稽可笑。这些高贵的品质深为那些认识了野蛮部落的人们所赞叹不已，野蛮种族只是由于酒精、基督教、粗暴的重商主义^①和文明民族的有害的疾病的侵蚀才变坏了的。

不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时代都不会碰到这样周到、这样慷慨和这样率真的好客风气。据摩尔根说，假如有一个人在无论什么时候走到易洛魁人家里去，不管这个人是本村居民、本部落成员或外部落成员，主妇的第一个义务是供给他食物。蔑视这个规矩是不礼貌的，几乎是侮辱。假如客人饿了，他就吃，要是不饿，他总要讲点礼貌，应当尝尝食物和道谢一番。

詹姆斯·阿德尔说：“拒绝援助贫困者被认为犯了大罪，谁犯了这种罪，不仅本人蒙受耻辱，而且败坏全部落的名誉。”^②客人被认为是神圣的，即使他是一个敌人。塔西佗^③在刚刚踏出原始共产主义的日耳曼半开化人中间也发现了同样的风俗。他说，无论在其它任何民族中都不会遇到这样丰盛的宴会和这样慷慨的好客风气。拒绝招待客人，无论他是谁，都被认为犯了罪。每个人都尽其所有款待客人。当食物贮藏告罄时，招待宾客的人就可以把客人引到新主人家里去，他们不待邀请一起进入邻家，然而这不会妨碍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既然把好客当作义务来履行，因而对朋友和对外人都是一视同仁。

这种宽厚的、友爱的殷勤在共产主义时期的人们中间得到如此发展，以至一直继续到这个时期的终结还存在，而只是到文明化的资产阶级时代才消灭。在集体主义时代的村落里拨出一部分公有土地来满足客人的需要，这些客人被安置在特别的房子里，这种

① 重商主义——这里指唯利是图的行为。——编者注

② 詹姆斯·阿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伦敦1775年版。——拉法格注

③ 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编者注

房子由客人支配并且常常有“客人之家”的称号。这些事实不仅在印度人的公社制村落中可以观察到，而且在十九世纪初期存在于奥弗涅和莫尔旺^①的乡村公社中也能找到。

塔西佗以及后来四世纪末马赛的主教萨耳维安都曾向文明的罗马人举出他们的邻居半开化人来作榜样。美国的旅行家卡特林自1832年到1839年曾生活于北美洲的最野蛮的部落中间，他写道：“我敢保证，文明人用不着向他们宣传善行和道德。”所有旅行家，只要不象斯坦利和布拉柴^②那样粗野、贪婪和残酷的商业推销员，便不仅要承认和赞扬他们所访问的蒙昧人和野蛮人的非常的品质，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些品质是在他们中间占统治的共产主义的结果。耶稣教徒沙列乌阿^③说：“印第安人中的友爱精神或多或少是由于‘我的’和‘你的’，象金嘴约翰^④所称呼的这种冷酷的字眼对于野蛮人还完全不知道。他们对孤、寡和残废者的同情，他们的著名的好客风气只是由于他们相信一切东西都应当属于一切人的结果。”^⑤

自由思想家拉翁登^⑥，沙列乌阿的同时代人和批评家，用以下的话来肯定他的见解：“野蛮人不知‘我的’和‘你的’这种字眼，因为人们可以说，属于这个人的一切，同样也属于另一个人。只有住在我们城门口的基督教徒手里才有钱。其余的人不想要钱，甚至

① 法国中部山岳地带的两个地名。——编者注

② 亨利·摩尔顿·斯坦利（真名约翰·罗兰兹）（1841—1904）——英国殖民主义者，1887—1889年为英国对赤道非洲殖民远征的领导者。比埃尔·保尔·弗朗斯瓦·卡米尔·布拉柴（1852—1905）——法国殖民主义者，曾为法国侵占一部分刚果并建立布拉柴维尔。——编者注

③ 比埃尔·弗朗斯瓦·克萨维埃·沙列乌阿（1682—1761）——法国耶稣教徒，在加拿大住过好多年。——编者注

④ 金嘴约翰（约344—407）——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辩才著名。——编者注

⑤ 沙列乌阿《新法兰西历史》1741年版。——拉法格注

⑥ 拉翁登（约1666—1715）——法国男爵，在北美作过多次旅行。——编者注

连看也不想看，称呼它是‘法兰西的蛇’……一个人比另一人有更多的钱，钱多的人比钱少的人受到更大的尊敬，这在他们看来是奇怪的。……他们彼此之间任何时候也不争吵，不打架，不偷盗和不诽谤。”^①

* * *

这种不知道商业，从而也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只出现于为数几千人的野蛮部落中间，往后也在一个国家的广大范围内实行过，虽然它的农业和工业比较不发达，却也保证了几百万人的福利和大的国家的繁荣。当秘鲁被征服的时候，其居民已进入家族集产制的阶段。代替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种，他们每年按村落中的家庭进行分配。可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约三分之二要保留给他们的太阳神和占统治地位的印加。这些土地是共同耕种的。收获用于满足祭祀、印加和行政机关的需要；余下的部分则用于公益事业和按需要分配给全体居民。放牧于科迪列拉的大群的美洲骆驼的毛和平原地带所产之棉也分配给每一家庭，尽量使每家的成员都有足够的衣著。

公共土地的耕种和粮食收获的组织非常完善，致使那些从贫困、淫荡和盗窃统治之下的欧洲跑出来的西班牙的“文明传播者”投身于一个不知灾祸为何物的国家。那里的仓廩丰盈，不是玉蜀黍，就是其它谷物。波罗·翁得加多，法学家之一，被派去保护西班牙王国的利益以对付毁灭秘鲁的残暴而野蛮的冒险家，据他说某些仓库“存粮足够十年之用”。普雷斯科特^②曾引用了一个取名西拉·莱日士马的侵略者之一所写的文件，那上面承认了当西班牙的所谓南美洲开拓者（他自己也属于这类货色）破坏印加帝国时，

① 拉翁登《拉翁登旅行记》。——拉法格注

② 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1796—1859)——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编者注

那里的人民管理得非常好，以致在他们那里既没有偷窃者，也没有懒汉，也没有荡子，也没有操不正当生涯的妇女……，山脉、矿山、牧场、森林和猪场都管得井井有条，而且也分配得很好，每个人都知道他所应得的一份，其所领有的财富不必耽心会被别人抢去，因而也从不为此发生争吵的事情……。当西班牙人在自己的住屋上加门置锁的时候，当地土人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害怕被印第安人杀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有谁会去抢夺别人的财物。当他们一旦发现我们中间有偷盗和荒淫浪荡的行为时，便立即改变了对我们的尊敬。

法学家翁得加多看到了印加统治之下“没有一个贫穷的或者困乏的印第安人”，他相信这种有远见的共产主义制度只有魔鬼才能建立，因为只有魔鬼才希望儿童的心肠变硬，不再敬事自己的年老而贫困的双亲，才希望仁慈的情感消灭，既然富人解除了给穷人施舍恩物的必要性^①。

共产主义秘鲁帝国公共建筑的废墟，当它被侵略的时候，其中可以容下二十万人的军队，象古代的共产主义埃及的废墟一样，足使现代的建筑师为之惊叹不已。通过康台苏地区的导水工程之一有六至八公里长，靠蓄水池和自然湖之助把水送到山的中心点去。由吉托到库斯柯^②的大道长二千五百——三千公里，沿路每隔十五公里就有堡垒和军事工程，围以规模巨大的石胸墙。车辆通行的部分宽七英尺，路面铺上大石板，有些地点盖了比花岗石还硬的水泥。这条修建在山区的道路越过急流和悬崖，并架设了许多木桥。洪堡^③在十九世纪初访问秘鲁，亲眼看到这条道路时，不能不

① 威廉·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拉法格注

② 吉托和库斯柯是南美洲印加国的城市。 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德国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编者注

极口赞扬,他说:“这种边缘围以巨石的道路和我曾在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看到过的罗马的最好道路不相上下,……印加的大路是迄今人类所完成的最有用的并且同时也是最巨大的工程之一。”^①这种巨大的工程是由没有驮畜和不知用铁的共产主义的民族所完成的。

V. 土地的公社所有制

当野蛮部落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除了间或有犬之外尚无任何一种驯养的动物,他们沿着河涯海岸流离转徙,哪里发现有丰富的食物,就在那里停下来,直到那一时候,关于建立猎场的公有制——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态,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野蛮人为了获得足够数量的食物,必须利用土地的广大空间,因为在他们那里农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他们大部还得依靠自然提供他们果实、鱼和兽。因此当某地人口密度增加了的时候,就不得不在当地居住的部落之间分配水和土地。

土地第一次分配所取之形式是猎区的划分;以后,当家畜繁殖开始时,牧场也实行分配。这样分配的土地是属于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的联盟或同血统的几个部落的公有财产,这些部落又将分得的土地再在组成本部落的氏族之间进行分配。土地个人占有的观念进入人类的意识很困难,而且很晚。美洲的奥马哈人说:“土地象水火,它不能属于任何人”。土地只能是整个部落的公共占有物,不仅属于现有的成员,而且甚至还属于尚未出生的成员。新西兰的英国当局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这一点。向毛利人购买土地虽然取得了全体部落成员的同意,然而每当一个新的婴儿降生,他们就会继续收到索付新的地价的要求,因为据毛利人说,他们虽然

^① 洪堡《科迪列拉见闻录》。——拉法格注

出卖了自己的所有权，然而不能处理尚未降生的成员的权利。当局只好拨付部落一笔年金，使新生的婴儿能领到自己的份额，这才脱出窘境。上帝是不赞成土地私有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①

教皇利奥十三世在其有名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通告^②里充当了土地私有制的卫士，大概已经把自己的上帝的遗训忘记干净了。不仅如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了财神早就把对耶和华的崇拜丢到九霄云外了。

人类必须经历一个又漫长又艰难的发展时期，这才达到土地私有制。

* * *

火地岛人在他们狩猎和属于全部落的土地四周用大片无主的土地作界。据凯撒说，苏维汇人^③也有这个风俗。这种分隔两个或几个部落的中立地带，日耳曼人称之为“分界林”，斯拉夫人则称之为“防护林”。在北美洲在说着共同语言的部落、同血统的部落和联盟的部落之间通常也有这种地带。

旧大陆和新大陆的蒙昧人、野蛮人之所以要在自己土地的周围设中立地带，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生存资料，就是保护在他们的森林里自由地放牧的野兽和猪群。一切外来人只要在别的部落的土地上被人碰到，就会被追逐；若是被擒就会打成残废，有时甚至被杀。据海克威尔德说，印第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碰到谁都会割去鼻子和耳朵，并且放他回去告诉他那部落的首长说，假如下次再犯，就要削去头皮。

① 《旧约全书》，《利未记》第25章第23节。——编者注

② 利奥十三世(1810—1903)——罗马教皇(1878—1903)，曾在自己的通告里号召建立天主教党和工会同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编者注

③ 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编者注

“谁有土地，谁就要打仗”这句封建时代的谚语还在野蛮时代和村社所有制产生时代就被证实了。狩猎权的破坏是相邻各部落之间发生纠纷和战争的主要原因。

无主地带开初是为防止走入别人领土而设，以后变成为市场，相邻各部落的成员的剩余品就在这里进行交换。英王哈罗德在1063年打败了经常侵入撒克逊领土的威尔士人，和他们签订了条约，若在八世纪时由国王奥发所修筑的工事以东发现任何一个威尔士的带武器的人员就要砍断他的右手。撒克逊人在自己这一面另筑一道平行的工事，两墙之间的空地变成中立地点，作为两民族通商之用。

VI. 劳动分工的起源

旅行家非常惊奇地发现，在野蛮民族中两性间存在着道德的和物质的障碍而且分别居住。这种性的隔离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同原始的杂交和兄弟姐妹间的性交的停止有关系的，性的混乱开始是平常的现象。这种隔离起初是因家庭道德的利益引起的，后来又由两性的职务的差别以及由于财产而被巩固和加强起来。男人担任的职务是觅取食物和保卫安全，而妇女则为氏族保管、分配和烹调食物，制造衣服和家具。一个古尔纳人对法森说，男人只是打猎、打仗、捕鱼和打坐。这就是说，所有其余的都是妇女的事。劳动分工就是这样开始的，依照马克思的意见，分工一开始是建立在性的差别之上^①。每一性别因有自己的特殊的职务，因而就有相应的某种财产。

只有作为使用的结果和神圣化，野蛮人才能理解个人财产的存在：凡是通过使用不能据为己有的东西就不属于他所有。武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390页。——编者注

马匹、渔猎工具都应当属于男人——战士和猎人——所有。食物、家具以及其他与妇女的职务有关的东西都归妇女所有。如同男人随身带着自己的武器和猎获品一样，妇女也把一切属于她的东西统统背在身上，连自己的小孩也不例外，孩子是她的所有物，而不是父亲的所有物，因为父亲通常是难辨认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经营农业是土地分散的主要原因，在此以前土地都是部落共有的。经营农业更加加强了两性的分隔。

男人从事战争和打猎，把一切田间工作完全委托给妇女，只在收获季节才偶尔同意给妇女以帮助。在游牧民族中男人担负管理畜群，管理畜群最后被认为比农业种植更高尚。在卡弗尔人^①中，放牧畜群被看作是贵族的职务。雅利安人的古代法律禁止居首位的两个阶级——婆罗门和刹帝利或武士——从事农业，把农业看作是低卑的职务。马努^②说：“有德行的人之所以谴责从事农业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就因为犁头的铁尖损伤了土地和住在土地上的人们”（《马努法》第十章）。神怪小说中的国王总是娶牧女为妻，人们都认为牧女的出身高贵。

野蛮人中间产生财产之唯一可能的和可以理解的理由就是使用。因此家庭的土地所有在其产生时是被认为属于妇女的。在一切父系家庭形式尚未排除母系家庭形式的社会里，土地财产都由妇女掌管。在埃及人中，在马拉巴尔海岸的纳伊尔人中，在非洲沙漠的都阿列格人和比利牛斯山的巴斯克人都可看到这种现象。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全斯巴达有五分之二的土地都归妇女掌管。

土地财产本来应当使它的占有者得到解放并使之在社会中居

① 卡弗尔人——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部落。——编者注

② 马努法——古代印度的法令汇编，据说是由马努（神话中人的始祖）制订的。它维护奴隶主的利益。——编者注

于统治地位，但是开始时却是处于隶属地位的原因：妇女注定从事繁重的田间工作，象后来的奴隶似的。农业引导人们达到土地私有制，它也引进了奴隶的劳动。

VII. 土地的共同耕种

在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时候，土地属于部落，耕种是共同地进行的。亚历山大·马其顿^①的海军统帅之一奈阿尔科斯，是纪元前四世纪所发生的事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土地是由部落或许多家族共同耕种的，年终大家分配收获物。摩尔根曾引证过的那位斯蒂芬描写尤卡坦的马雅印第安人的帐幕，说他们的土地是共同占有，耕种也是共同的。狄奥多洛斯^②说，在西西里海岸的利帕里群岛的居民中间，土地是共同占有的；一部分居民从事耕种，而另外一部分则专门对付第勒尼安海的海盗。后来当他们所居住的利帕里岛用抽签的方法进行分配的时候，其余的小岛仍然是共同占有并由居民共同耕种。据凯撒说，苏维汇人，“全日耳曼的最强悍好战的民族”，没有私有的、分割的土地 (*privati ac separati agri*)；每年由一百个村落选出一千名士兵出国远征；留在家乡的人就应当耕种公共土地。这种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的习惯甚至一直保留到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在血族集产制占统治的俄国农村里经常会碰到共同耕种的土地，即所谓“共耕地”；收获物也在所有参加米尔的农户之间进行分配。在其余的村子里土地只是在共同耕作之后才分配给各家。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有时共同收割未行分配的草场上的草，只有割下的草

① 亚历山大·马其顿(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 336—323)。——编者注

② 狄奥多洛斯(公元前80左右—29)——古希腊历史学家，《世界史·史学丛书》的作者。——编者注

才进行分配。这种共产主义文化的遗风不仅存在于俄国这个血族集产制的古典国家。1877年，密勒由新墨西哥的印第安村落陶鄂斯写信给摩尔根说，在每一普埃不洛（pueblo）^①中玉蜀黍地都是共同耕种的，玉蜀黍地的收获是在酋长监督之下进行，收获物由贫困者支配。九世纪所制定的威尔士法律规定每一家庭应领得大约两公顷土地归私人使用，但是大部分土地应当使用于公共耕种。

未行分配和共同耕种的土地上的收获物有时不在乡村居民之间分配而用作公共开支。哥姆在他的《共有村落》一书中引证了爱尔兰的墨特郡的一个村落，在那里公有地上的收获是用以支付什一税和其它税赋。在印度的某些公社里，公有地上的收获是用于支付为全公社成员服务的公职人员（铁匠、牧师、学校教员等等）的薪金。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我们看到在希腊也象在秘鲁一样存在着一种单独的神圣土地（temenos），专门用以供奉地方神和军事首长（Basileus）。

在苏格兰魔鬼也有自己的土地，因为魔鬼要求对自己采取有礼貌的态度，他们称呼这土地为“善人之地”（gude man's land）。他们常常听其荒废而不耕种。

雅典国家出租自己的公有地，租地收入的一部分用以供养神圣的妓女，她们为贵族服务却得不到报酬。

秘鲁全部可耕地的大约三分之二是公共财产而属于太阳^②和印加。居民在耕种每年分给他们的土地之前，都得共同耕种太阳的土地，其收获首先满足祭祀之需，然后分给大家。共同的劳动象过节那样兴高采烈。天一拂晓，就登上塔顶或高岗把全体居民召集起来。男人同妇女和儿童穿着节日衣服，带上最好的饰物，纷纷

① 普埃不洛（住宅）——西班牙侵略者对那些生活在北美西南部的定居的农业部落的村落住屋的称呼。——编者注

② 太阳是印加的最高的神。——编者注

赶来集合。人们一面工作，一面唱着颂扬印加的伟大业绩的赞美歌，他们劳动时的这股热情和乐趣只有在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劳动中才经常出现。

VIII. 动产的公有制

现在确实知道，土地及其产物（谷类、鱼和兽）当初在部落和氏族内部都是公有财产，甚至野蛮人手中的最初的、为数极少的动产（武器、船、捕鱼用具和最简单的家庭用具）也被认为是公有财产。

这种共产主义甚至一直维持到野蛮部落中的动产（畜群、奴隶、宝石和贵金属等等）已经增多起来的时候。正是这种动产助长私人财富的积累和商业，在几千年间仍然是人类的灾难，引起未来的巨大变革；这个变革把妇女从先前的崇高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驱使软弱无能的和毫不自觉的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和血族集产制的废墟上建立起不幸的个人所有制。

当农业和工业尚停留于萌芽状态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奴隶制度是没有位置的；战争俘虏都被杀掉或者收容在那些缺乏战士的氏族之内。土地的耕种，工业的成就和驯养动物引起奴隶制的产生；现在在保存奴隶和获得奴隶中发现了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可以把他们使用于各种各样的劳动。以前在各部落之间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达到夺取或保护猎场的目的，随着动产积累的程度，战争变成了获得谷物、畜群、奴隶和贵金属的手段。野蛮人的战士和狩猎者以前是厌恶劳动的。与其在农业劳动的重荷之下弄弯腰背，还不如致力于当海盗、战士或匪徒。抢劫行为与动产的积累同时出现。

史前期的希腊人也是勇敢的海盗，他们出没于地中海沿岸，随身带着获得物藏匿于依山岩而建的象鹰巢似的堡垒之内。希腊人的战歌（Skolion d'Hybrias）的珍贵的片断使我们得以理解野蛮

人的战士的生活和感情。他们的英雄歌唱着：“我的财富是我的梭标、我的利剑和保护我的身体的盾牌；我使用它们来耕种，使用它们来收获，使用它们来采集甜葡萄汁，它们使我成为姆诺雅^①的主人。谁要是不懂得披坚执锐，就让他跪在我的面前，象跪在主人面前一样，而且称呼我为伟大的首领。”

莱宁卡曼，是芬兰叙事诗卡列瓦拉的英雄，也这么唱着：“我的金子与月亮一般古老，而银子与太阳同寿；它们都是勇敢地从战斗中夺取来的，……一枚小小的钱币得之于战场，要比用犁头取得的全部金银还贵重。”^②

陆上和海上的抢劫是野蛮人醉心的职业。甚至已进入农业时期，他们仍未放弃海盗生涯。据凯撒说，苏维汇人同时从事两种行业：每年他们公社的一部分战士耕种土地，另一部分则出去远征；当他们归来时，第一部分又轮派出征。他们带回的战利品大概都要分配给大家，因为留家的必须耕种公社的土地。不论是在农业中还是在抢劫中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以后共产主义虽然消灭了，但是抢劫的热情仍未稍减。私有制全盛时期的雅典人还是保留着抢劫之风。梭伦^③曾在雅典办过海盗学校。据修昔的底斯^④说，“古代人并不认为海盗行为有什么不光荣”。就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对它也还保持极大的敬意，因为一切现代的殖民事业也不过是些海盗战争罢了。

① 公社的奴隶。——编者注

② 中世纪之末，因被十字军征战弄得破产并失掉了土地、过着流浪生活的骑士，专以战争为生。他们象希腊的英雄一样，把从战争中取得的战利品称作“利剑的收获”。照这时期的诗人的说法，利剑是他们的衣食之源。——拉法格注

③ 梭伦(约公元前638—558)——著名的古代雅典立法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曾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编者注

④ 修昔的底斯(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编者注

地中海沿岸的野蛮人的英雄掠夺男子、妇女、家畜、粮食和动产。当土地公有时，被投入奴役的男子就成了公有财产；后来他们被抽签分配了。在克里特的诸城市中间，这是被这些勇敢的海盗所夺取的第一批岛屿，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还存在着成群的奴隶，称为“姆诺丹”(mnote)，他们耕种那供养全体公民的国有土地^①。这种奴隶的公有制也可在印度这个太古风俗的宽广的保存所里碰到。霍奇森曾在1830年描写了马德拉斯西北四、五公里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居民都靠奴隶种地，这些奴隶无疑是公有的，因为当某人出卖或典当公有土地属于自己所有的部分时，他同时也就将附属土地上的奴隶一并出让^②。中世纪的城市以至某些乡村里农奴也是共有的。

在一切国家里，土地、土地产品、家畜和奴隶起初都是部落和民族的公有财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摇篮。文明所到之处，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就被破坏，尽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而这种制度的尚存的遗迹仍然表现着自己的公有财产的特点。可是，文明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破坏；另一方面它又在建设。所以，当它击毁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共产主义制度之时，它又在创造新的共产主义的因素。

我们应当研究文明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运动。

① 在希腊存在两种奴隶阶级：国家的奴隶(koiné douleia)，即属于国家所有的成群的奴隶和用抽签分配而归个人所有的奴隶(klarotes)。雅典拥有大量国家的奴隶，他们不耕种土地，而担任刽子手、警察、行政机关的下层官吏等公职。——拉法格注

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告书》1830年版。——拉法格注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财产

1. 商业的起源

我们在前面研究了土地或不动产开始是属于整个部落共有，而后，在氏族分裂为母系的和父系的家族时，就转变为集体财产，最后，当父系家族又瓦解和共同生活的家族解散时，就转化为个人财产。这时的家庭已经只是由父、母、子女所组成，照新教牧师马尔萨斯的看法，人数愈少愈好。

动产更迅速地通过自己的发展阶段。它也是在共产主义财产的形式中产生的，但是几乎没有过渡的形式就转变为个人的财产。甚至原始共产主义时野蛮人的武器、首饰和个人用品，这些都被视为人的附属品，也同占有者的尸体一起焚毁或埋葬。常常是很合逻辑的野蛮人承认在人的身上有灵魂——确切地说是一个面貌相同的人——，同时就认为动物、植物和无生物也有灵魂，灵魂可以离开它们而独立生活；因此在埋葬一个战士时他们便拆毁他的武器和杀死他的牲畜和奴隶，以便解放它们的灵魂跟到另一世界去为主人服务。

在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的开始阶段动产为数是不多的，谁制造它通常就归谁所有；它随着畜群的繁殖，奴隶的使用，金属的加工和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增加^①。

^① “甚至转移最频繁和最残暴的野蛮人也有自己个人的武器、衣服、珍宝和家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所以这种财产，在他们之间被认为是神圣的，显然是从每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和躯体的所有权产生出来的，就是说，这是自然的财产。”（沃尔浑《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全面观察》，修订本，1821年版）——拉法格注

随着动产的积累野蛮人的习俗也起了变化。在此以前战争只是为了复仇，为了夺回那被抢夺的领地或为了增加由于人口增加而感到不足的自己的领土。如今战争成了一种行当，一种有利于获得畜群、奴隶、金属和其它可以携带的物品的的手段。军事领袖——*rex, basileus thiudans*，——曾经是为了一定的征战而选出来并随着它的结束便失去他的临时的权力，现在却成了必须的和经常的职员，因为战争及其组织从这时开始便成了那些以掠夺为生的野蛮民族的经常的职务，他们把掠夺看作是获取财物的光荣手段。在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peculium castrense*——是个人的财产，正象占有者所制造的一样。但是动产的发展奠定了英雄的掠夺的基础，同样也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掠夺形式——商业。

在农村公社内商业是没有地位的。从实行劳动分工之时起也只产生服务的交换，只有蒲鲁东才有那种天真的愿望，想在资本主义最繁荣的时期还来恢复这种交换。人们为铁匠或织工耕种田地以交换他们的手艺的服务。在相当的时期之内村落之间只是通过村长的中介而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随着动产的增加，动产也开始交换并逐渐形成一种人的阶级，他们把正在兴发中的城市内部的和同其余城市居民之间的商业抓在自己手中。商人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他们遭受到极端的轻蔑和被比作骗子^①，然而他们终究成功地使生产者屈从于自己和一点也不参加生产却取得了生产的总指挥权。这个阶级是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并剥削他们双方。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使生产者摆脱劳动之累和交易的风险，应许扩大生产品推销到远方市场和使自己成为居民的有用的阶级等等借口之下，一个寄生的阶级——社会的真正的蛆虫——于是就形成

^① 坎伯尔上校告诉我们说，康迪士坦的每一个村长都随身带着一名由被人鄙视的等级巴努出身的翻译，专门来对付一切商业事务，因为康迪人认为卖东西和作交易是有辱尊严的事。——拉法格注

了。他们在为了一点非常微薄的服务而取得报酬的形式之下从本地的和外地的生产中挤油水，获得巨大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就因这个原因，在整个文明时期，这个阶级获得日益增多的尊敬和愈来愈大的对生产的统治权，最后终于生下自己的产儿——周期的商业危机。

最初的交换是以物易物：其中之一被选作它们的互相价值的尺度。为此目的许多民族开始曾使用牲畜来充当，但是很快就被金和银所代替。开始时它们的交换是按重量计，后来才使用铸币，就是承认它们是一切生产品的交换单位。金银货币变成一切商品的~~商品~~，——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它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其余一切商品，并握有神奇的魔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各种所需要的东西。随金银货币的出现便找到一种集中和占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产生了破坏私有的个人财产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II. 小工业和小私有商业

集体村落的农民自己生产他们所需要的衣服和食物；他们只是为了加工自己的原料才需要某些手工业者（铁匠、木匠、织工、成衣匠等等），他们按需要的程度把这些手工业者吸收到自己人中间来并把他们安置在村落的周围，在防护墙之外^①。

过了一定时间的生活之后，通常是一年又一日，手工业者才得到承认和被准许在公共牧场收放自己的家畜。在这样的村落开始

^① 柏拉图在自己的《克里蒂亚斯》里描述了古代的雅典，使我们明白了差不多所有城市的原始生活。据他说手工业者和农夫被安置在直对伊利苏士的斜坡上。只有战士等级才占据雅典神庙和黑发土托神庙周围的山顶。他们为自己在北面修筑了公共住宅，住在几面受风的地点，保护着市民的安静。在阿克罗波尔高原上有一股泉水，后因地震而消失。而在当时它却不分冬夏源源不绝提供好水。山顶的战士监视着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和英勇好战的埃莱西士和台伯的居民常常通过的帕尔内斯峡谷。只要一发现敌人，手工艺者、农人及他们的畜群就立即跑到围墙里去躲起来，这些围墙是用枯枝、交叉的橄榄枝编起来的，在阿克罗波尔高原正象在希腊的所有山岗一样生长橄榄枝。——拉法格注

并没有产品交换：手工业者是给公社服务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到的报酬是实物。他们只为加工订货而劳动：原料由订货人供给他们，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就带着工具到订货人的家中去做。即使当他们停止了为社会服务时，他们的全部服务的报酬仍用实物（谷物、酒类、家禽等等）支付；而假如他们有土地，人们便代为耕种借以酬答造车的、织布的或缝衣的劳动。总而言之，人们支付给他们力役或实物，正如支付给战士借以酬谢他们的保护一样。在印度的村落中至今还保留着的这种工业形式，只要还保存着土地财产的集体所有形式，它就会存在下去。

位于商队来往的交叉道路上的或靠近河口或位于海岸上的那些村落首先进行交换；在这里就形成多少受人欢迎的临时市场，当地的手工业者都为这个市场而劳动。他们只要在哪里能推销自己的产品，那里他们的人数就会增加；他们已经不再被驱逐了，不再被人看作包袱了，而是被召来、被请来了。这些变成了市镇和城市的村落的居民是由各种手工业者组成的，他们在各行业中都只营一种，因而是相互需要的。市场由临时的变成经常的，居民之间进行产品交换，而在大集市的日子他们还向外地商人和邻村农民出卖产品。

工业的性质改变了：手工业者开始脱离订货人而独立。他们不再等待人家带给原料才工作，而是自己去设法弄到原料并把它保存在铺子里；他们不是为订货工作，而是预见到出卖。他们已经不只是生产者，而且是商人，他们买进原料，经过加工再卖出去；他们扩大店铺并招收学徒和帮工作助手。为了支付原料的费用和支付手下的徒工的工资，他们必须有货币积蓄，虽然这积蓄的规模小得可怜，实在配不上马克思所使用的资本这个名称；然而这积蓄已经是萌芽形态的资本。

在那些后来转变为城市的中世纪村落中的人口增长阻碍着

给予新来的人使用村社财产的权利和剥夺了他们分配土地的可能。土地始终仅仅是本地居民的财产，他们形成为村社的权贵阶层(patriciat communal)。在村落中为了保卫的需要而形成封建的贵族。在民主的瑞士的某些城市当中至今还保留着城市的权贵阶层。阿尔萨斯的村社贵族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便成了工业的首领。

为了对付这些独占土地和政权的资产阶级权贵的专制主义，手工业者就组织了行会，在行会里开始时平等占主要地位，没有世袭的等级，它对当地一切工人都是开放的。行会不仅保护自己的成员免受城市的权贵阶层欺负，而且还防止他们互相竞争。它们存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推销产品的市场，而既然市场只限于当地居民和大集市日的偶然买主，行会的会长应当采取措施来防止剩余的生产者和生产产品的出现。因此行会纷纷关闭，限制自己成员的数目，就是限制有权在城市开作坊的人以及他们的帮工和学徒的数目，因而也就限制了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数目。原料的加工是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的。设备的一切改变或改良都是被禁止的，以便保证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为便于行会会长监督劳动，行会的工匠必须在敞开门窗的房子里工作，而有时简直就在街上工作。每一行会都有自己的专业，它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例如鞋匠只生产新鞋，而旧鞋的修理则不是他们的事，这是属于其它行会的专业。

售卖也象生产一样受到非常严格的规定的限制。在市集上，象在我们今天还保存着古风的巴黎庙一样，当顾客还没有走近卖主的铺门之前，卖主无权拉他，一当走过了他的门前就属于邻店的管辖。

这些详细的规定指示着市场已经具有巨大的意义；往后市场的扩大完全改变了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连的全部社会关系。

个人生产的原则是建立在矛盾之上，这个矛盾只有它灭亡才能解决。手工业者，同时既是出卖者又是生产者，这是多面发展的工人，把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集于一身，他们只有在生产和工具分散于各地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类似的例子我们在中世纪也可看到，那里不仅各省、各城镇，甚至连每一个封建城堡和农民的住宅都成为食品和其它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心，只出卖多余的和只买进奢侈品。不需要输进消费品，中世纪的城市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彼此隔离成许多往往是互相敌对的小国家而存在。

中世纪的农业经济学家劝告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一切，不要从外面购进任何东西。实际上我们看到封建的领主在自己的城堡中拥有尽可能多的作坊，其中包括武器作坊。

这种生产分散论比产生它的条件寿命更久。

在十六世纪，当从意大利输入养蚕业时，法国政府不是把它集中在适宜于养蚕的地点，而力图把它分散于各省，甚至也包括那些不适于栽种桑树的地方。

在1789年革命时，有人想在法国种植棉花，为了不再从国外输入。而甜菜只因想要免除购进甘蔗糖而向殖民地付钱才发现。

当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由于战败者的消灭而停止时，战败者的土地则被并入战胜者之财产，当道路行旅比较安全的时候，各城市和省之间的商业关系就逐渐频繁起来。市场的扩大引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例如在用英国输入的羊毛来制造呢绒的根特城，在十四世纪人口已达五十万以上。商业的扩大动摇了封建城市的社会组织。

在这时期，工业发达的城市中的手工业师傅的行会变成了贵族的团体，参加这种团体对于非师傅的亲属是一种特权，要取得它就得出钱，看出身好坏或者由于国王的特殊恩典，并且只有在学徒付出了很高代价而取得长期的工龄之后；学手艺他要纳费，升为师

傅又要纳费，最后要取得工作权还是要纳费。行会从自己的成员中把大量非独立地而是在行会师傅的作坊中劳动的手工业工人开除出去。开始时他们还有希望自己成为师傅和开设作坊，但是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希望对于他们越来越难实现。被行会开除出来的，与曾经领导过他们生产的师傅进行着斗争的徒工联合起来并组织成广泛的、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徒工团体，虽然师傅的行会总是地方性的组织。

由于生产发展而致富的行会师傅同城市的新贵缔结同盟来对付联合起来的徒工，在这个敌对的斗争中，徒工常常受到那垂涎行会和市镇贵族的财富的封建贵族的挑拨。所有中世纪的城市都是这些阶级的流血斗争的舞台。

然而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与之相连的商业的发展破坏了师傅的行会和改变了生产方式，因而结束了封建主义最后时期的这种阶级斗争；一方面，分散在全国的小生产集中了起来；另一方面，集中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内的工业部门又分散开来。以前的手工业者变成工场的一部分工作的工人。

III. 工场手工业

十五世纪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之发现和美洲的发现，使欧洲淹没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里并创造了横渡大洋的商业，这就使土地财产贬值，对于那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在荷兰和在汉萨同盟的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给予决定性的推动。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革命的纪元到来了①。

新发现的国家受到掠劫和成为欧洲工业品乃至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人们把谷物、酒、干酪等等输入美洲。殖民地市场的开发和美洲黄金的输入对工业起了影响。那些通常不属于任何团体、靠商业发财致富和希望使用自己资本的新人们投入了生产，他们想

从中获得巨大利润。为此就必须打破行会团体的规章，因为这些规章限制了生产方式、产品的数量和企业工人的数目。因此他们不能在城市中设立手工业工场，这些工场开始时只在规模上有大小之别；他们不得不到农村去，到郊区去和到新的滨海城市去，那里既没有城市的权贵，又没有行会的组织。他们不在巴黎和伦敦而在市区以外，即在圣安托万郊区、威斯特敏斯特和索特瓦尔克开设手工业工场，这些工场必然会使行会师傅破产和引起小手工业的变革^②。

站在这个工业革命前列的不是墨守成规和被行会规章束缚住的行会师傅，而是商人和受商人资助的新人。正如我们时代铁路的修建和管理不是四轮马车行的老板，而是金融资本家一样。

工场手工业对行会组织进行攻击和起来反对行会师傅的特权，这就不能不损害手工业工人，虽然看起来似乎它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它能提供更多的工作，而且是更经常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工场手工业产生劳动分工，这分工提高生产率，但是也使手工业工人的技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手工艺的个别动作都被肢解和彼此分开。例如大头钉的生产分为二十道工序，全部委托给不同工人去完成。手工业工人以前懂得自己的手工艺的全部过程，一

① 通常只把那些伴有人民骚动的政治事件称作革命，而经济现象则比较不被重视，虽然它们对社会发展和对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影响更加无比深刻和有效得多。

欧洲农民的风俗和观念在几世纪之间都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有战争，国界的改变，国籍的变换和政治的革命，一个英国的人类学者最近指出英国农民的迷信与南非黑人的迷信相象得令人吃惊。农村只是从通铁路之时才开始活动起来。这些以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其它经济现象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轻率地毫不觉察的情况下悄悄地完成了自从人类走出共产主义和创造父权制家庭和私有财产以来最巨大的社会变革。——拉法格注

② 1614年当路易十三达到成年时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上提出了工业自由问题，可是被否定了。圣安托万郊区和其余的某些地区大大发展起来，因为那里的工业享有城市中所没有的自由。——拉法格注

件一件挨次实施而造成物品，在这上面反映出他的创作的个性，而现在则贬低为片面发展的工人，命定一生只机械地做同样的动作。他的个性也就消灭了；如今他需要几个同志才能完成他以前独立完成的一件工作。他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除了在主人的工场内和在与其它工人同样的条件之下工作之外，不能有别的出路。他是生产所需的集体的工作器官。于是个体的生产一变而为集体的生产。

工场手工业对个体生产的破坏也反映到农村人口和农业上来。各个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住在农村里或小城市里，通常都有自己的房子或一块不大的土地，他们把自己的时间分配于农业和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使他们同农业脱离，剥夺了他们在自己的田地上或在邻近大地主的土地上劳动的可能。它把他们集中到城市里去，这些城市拆毁了城墙并占领了邻近的田地。从十八世纪开始农村人口外流，地主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工场手工业夺去了农业的劳动力，同时又要求大量的农产品来供养新的城市人口。

在集产制时期的开始城市是不存在的，即使在那享有国王般的权威的军事首领居住之地也是一样。印度的君主们旅行时跟随着一群战士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驻扎之地就变成临时的城市；他们依赖邻近农村的贡赋和贡品为生。

六世纪法兰克诸王都靠自己生活和把自己的宫廷安置在极大的农庄里面；在国王住宅的周围聚集着宫廷官吏和部落酋长的建筑。其余规模较小的房屋则由各种手工业者的家庭占住，从金银器的匠工和武器制造工到纺织工和制革匠，从用丝绸和金线刺绣的专家到编织毛和麻的粗工，样样都有。除了这些建筑以外，在国王的农庄里还有家杂用房：谷仓、畜棚、柴棚和畜圈^①。

^① 奥古斯丹·梯叶里《墨洛温时代的历史》。——拉法格注

缺乏道路和交通的困难阻碍着过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地点：因为不能养活他们。

中世纪的城市只能指靠从邻近村落输入食品，因此城市居民的数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受限制的^①。当道路还很少，而且又不安全，这就使城市之间的一切商业发生困难，甚至不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挤压农产品的输出。但是自道路交通状况改善之时起，自从谷物由一个地方开始调运到另一地方之时起，每一城市，每一省份都采取措施来禁止粮食的输出和预防抢夺粮食。一切欧洲的城市都颁布命令，要求粮食的出卖只在市场上和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同样的命令也规定了谷物的最高价格和可以购买的数量。粮食的所有主不得在谷仓中存储粮食超过两年，违者没收充公；也禁止买青或买谷仓^②。

由于城市的扩大和从外地取得粮食的困难，每一个歉收之年都会引起挨饿或者真正的饥馑。城市当局主要关心的事情是预防挨饿。他们广设粮仓，预见到哪里歉收就往那里的粮仓运送足供六个月或一年之需的粮食；经常关心着保证每年都有足够的土地播种谷物，并且限制其它的农作物。1577年的敕令企图限制在法国逐渐扩大的葡萄种植，指出必须为每一块重新种植葡萄的园地留出加倍的地块种植粮食。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农业必须发展。在十

① 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象伦敦现在如不靠从世界各地输入，便不能生存，但是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农产品是自给自足的。每个居民在城外都有自己的 一块田地，他就靠田地上的收获过活。在八世纪伦敦商业的主要对象是金、银、奴隶、马匹和五金。——拉法格注

② 在中世纪也象在革命时期一样，规定了卖价的最高限。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工业家和农业家都设置关税，想强迫消费者按最高价格购买：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的和资本家对消费者所表现的同情，强迫他们经常降低工人的工资。——拉法格注

六、十七世纪人们开垦了新的土地，森林砍伐了，沼泽弄干了，麦田扩大了。在丰收的年景粮食多得使它的价格不能补偿生产的费用；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于是决定向其它省份甚至向英国和殖民地输出粮食。但是这种权利只是暂时的：一旦谷物在一定的地点达到某种价格，输出就被禁止。从1669年到1683年十四年中间，法国有九次准许出口，而有五次禁止出口。这些经常的命令不能预防地方的饥馑；由于禁止丰收省份的粮食输出，往往反而更加助长了饥馑，因为受饥饿威胁的城市截留运送过境的谷物，或者完全禁止它的过境，假如害怕竞争的话。柯尔培尔^①为了强迫波尔多省议会允许二千五百袋谷物运入巴黎，曾不得不采取暴力。

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城市受着缺粮之困，而离它二十古里^②外却是丰收。其它农产品如酒、毛等等的流通也碰到同样的障碍。为使本地酒销售便利起见，波尔多和马赛不许其它省份的酒运到海边^③。

最后的一批王室的大臣曾力图证明这些禁令的无益和危险，曾经一度取消过，但是又往往被迫恢复。为了消灭垄断，为了取消那与土地财产连在一起，阻碍着现代农业发展的世袭权利，为了取消阻止工场手工业进步的行会特权，这就需要革命。阻碍在城市里开设工场手工业的行会，特别害怕一切的革新；他们禁止一切的改良及施行新的生产方法，以便保证不破坏行会师傅之间的平等，不然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们中的一人得到了便宜，其

①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1619—1683)——法国政治活动家，财政总稽核(1665—1683)，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编者注

② 一法国古里(Lieue)等于四公里。——编者注

③ 马赛的警察用鞭打惩罚偷运私酒的车夫。就是那些不满波尔多和马赛垄断的城市也在自己的近郊照样地做，不许从邻县去运酒。多非内的小城文恩在1756年竟向王室会议要求承认自己的特权，率直地声言，禁止外地的酒对它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的话，居民就会以质量不佳为借口而拒饮本地酒。”——拉法格注

余的就吃亏。阿尔贡，用两根灯心使普通油灯的光增亮三倍的一种油灯的发明者，在十八世纪曾被马口铁业行会控告到巴黎的国会里去，行会要求生产灯的绝对权。印花布由于玛丽-安东尼达和著名的宫廷女官彭帕杜尔夫人以及杜芭丽夫人的说情才准许发卖。罗昂、里昂、图尔和亚眠的商会猛烈地反对这个特许，预言工业的衰落和对于整个法国的大灾难。

1789年的革命把农业、商业和工业从束缚它们进步的封建羁绊下解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就为自己的发展取得了完全的自由。

IV. 资本主义的农业

十八世纪才开始注意农业，它在法国的发展水平是很低的。革命前夕的一个农学家写道：“从罗马时代起农业的进步就非常缓慢，这是不好的，但却是无疑的事实。”^①人们曾不得不研究和注释拉丁文作者的著作，把他们看作是这个问题的最渊博的学者。象我们今天一样，效法英国，输入良种牛和饲草，栽种一百年前在欧洲便已知道的马铃薯^②，进行实验室的研究^③，作大规模的实验，推广

① 吉伯特《对人工牧场的探讨》，巴黎皇家农业学会论文集》第2卷，1788年版。——拉法格注

② 资产阶级的幻想的历史学家毫不吝惜地将马铃薯输入欧洲这笔账记在慈善家帕尔曼蒂耶名下，其实这个人农民权利的死敌，马铃薯在英国在1619年已经按一磅一先令出卖。秘鲁的侵略者从十六世纪之初把它输入西班牙，称为 papas，由西班牙而传入意大利，在意大利推广时称为 taratoufli。还有许多其余的食用植物和观赏植物也在这时输入：荞麦，龙须菜和菜花（后者的种子长期以来都是到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去找），郁金香，在十七世纪中叶国际投机商人利用它来进行投机。

在维尔摩林和霍塞《关于马铃薯的起源》的报告里有着关于它在法国历史的有趣的详细记载：经过加斯帕尔·鲍安宣传之后，马铃薯从1592年迅速进入法兰斯孔太，进入孚日和进入勃艮第。贝桑松的议会禁止栽种，“因为这是有害的食物，吃了就会引起麻疯病”。1761年农学家杜阿梅尔极力劝人栽种马铃薯。杜尔哥得到医学系的证明，认为马铃薯是滋养而卫生的食物，因此人们才在利穆赞和昂儒栽种。

在1765年卡斯特尔的主教把马铃薯分给自己教区的牧师并教给他们如何栽种。帕

城乡的农业教育，建立学会、竞赛、农业奖；发明新的农具和改良旧的④；试验机械播种和铁齿耙等等。

在这个使工业、思想和科学彻底翻身的奇迹般的世纪里，对农业的兴趣是没有止境的；百科全书派的人们肯定地说种植一棵树就等于作了一件好事。

这个朝气蓬勃的热情证明十八世纪已有这么多的人懂得必须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农业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工业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尖锐。他们周期地遭受饥饿，组织了威胁性的暴动，它促使人民走向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的革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思想进行了同样的革命。

然而改良农业的不断的努力因碰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失败了，这个障碍就在于种植和土地的过细分散和农民的地役权。农民的田地由于遗产继承的分割，一分再分以至小得不能再小⑤。贵族和资产者占有的土地虽然面积很大，但是分成许多小的农场，从

芒蒂埃只是在1778年才开始作宣传。——拉法格注

④ 醉心于试验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在皇家农业学会的一卷书里有某侯爵的笔记，其中详述在水银里栽种的无结果的试验；他显然设想：水银对于植物象对病人一样有益。——拉法格注

④ “南部采用的犁，差不多同维吉尔所描述的工具相似。这种犁破土好使，翻土却不行。为了种麦，需要来回翻土九次，因为它入土只不过十二公分。”（巴黎《塔拉斯康区的农业经济》，塞纳省农业学会，1811年版）

“人们耕地显然还是沿用远古时代的办法。现代的犁，由于它的简陋，成为新式犁的主要障碍。最无知识的农人制造它、装备它和驾用它，费用只花在犁头上。”（法尔诺德《上阿尔卑斯省的农业经济》，农业学会，1811年版）——拉法格注

⑤ “土地的分配缺点很大”，——涅夫谢托说——“一块土地或一个地区，假如其中有五百公顷面积，便分为五、六百小片，由五十到六十个人所占有……由于分散和继续不断的分割之故，出现了很不方便的形式：存在着许多地主占有二十单条的地带（四——五公尺宽和无限长）。这种细分之来源，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是兄弟姊妹之间的私产。这个原因由来已久，带来无穷恶果。”（《迪戎的元老院议员年俸区的农业巡视》，1806年版）

子女之间分土地，反动派归罪于革命，其实是农民的普遍习惯。——拉法格注

耕种土地的观点来看，它与小所有差不多相同，象在中世纪一样，在地主的土地上同样实行农民的经营方法，三田轮作制，休闲地和收获后田地上的放牧权。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为了反动目的而讴歌的小所有制是因循守旧的，由于它的主人缺乏知识和货币资金以及田的规模小，因而不能进步。只要有小所有制存在之处，就适用列奥波特·德利尔的论点。他在《中世纪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序言上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农业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即八个世纪以来没有前进一步。现代的农人还是拘守着修道院的文书上所写的方法；假使有一个十三世纪的农民来到我们任何一个小农场里，他将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异的事物。”

实行新的农业方法的主要障碍是老的习惯，它禁止所有主在收获后封禁自己的田地；因为不想拿自己的劳动去喂公共的牲畜，没有谁乐于采用新的播种法和新的种植法。还在革命之前就曾试图消灭这种习惯。1777年奈克尔不管只许所有主封禁五分之一土地和允许一切人利用休闲地和牧场的习惯，颁布国王的命令，准许布洛涅省的地主和佃农封禁自己的牧场。1785年6月23日巴黎议会发布了指令，废除了所辖教区内的这种习惯；在皮卡第、诺曼底以及其它的许多地方也取消了这种习惯。

革命一下子就结束了如此犹豫不决地开始了的事业。

无代价地消灭这种传统的权利和公社土地的瓜分给予小所有者及其耕作方法一个可怕的打击：它剥夺了农民喂养提供衣食和肥料的牲畜的可能。但农业革命马上开始了：森林被砍伐了，以前那么多的沼泽和池塘被吸干了，生荒地被开发了，人造牧场开始播种了，葡萄园和粮食作物的面积增大了，种植了新的农作物；生产品开始迅速流通并且大量地进入工业城市。

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广泛，以致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经常发生的荒年变得稀少了，和缓了，农民所想的已不是如何满足需要，而是

如何为不断增加的产品找寻消费者。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对降低物价的无穷的怨愤，他们力图以关税税率来维持物价。不动产的价值提高了，贵族们由于革命而发财致富，这个革命使他们解脱过时的、对于他们这些土地所有者有害的特权。

近代的农业现在只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以便充分展开自己的惊人的生产的可能性；铁路和资本主义的工业提供这样的市场。大工厂工业满可以吸收农村的人口并使城市里充满成千成万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的农业完全有力量养活他们和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个惊人的发展也有自己的非常重要的消极的一面。森林不受监督地听凭资产阶级所有主的盲目的贪欲摆布，森林的砍伐使群山秃顶，使丰足的河流变成破坏的泉源。不间断的轮种使土地不能休息，因而也就不能恢复它的肥力。沃邦已经在他的《王国什一税》一书中指出农产品向城市输出是土地贫瘠的原因之一，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当生活在自然怀抱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向土地取了多少就给它多少时发生的物质循环，由于输出而遭到破坏。土地，万物的多产之母，变枯竭了。在文明的国家里，若不把从美洲找来的海鸟粪或人造的化肥施用于土地，就没有丰收的希望。英国是大规模采用集约农业的第一个国家，同时也是感到它的可怕后果的第一个国家。从1830年起，英国的农民到法国南部去同普罗旺斯的农民争购马赛和埃克斯的油坊里的油渣和油饼；他们甚至从共和和帝国时代作战场的田野中去占土地，这些地被士兵的尸体养肥了。他们也是第一批大量使用人造肥料和用机器代替薄弱的人的劳动。但是肥料、改良播种、机器、牲畜和一切现代农业上的设施需要资本，而且是大量的资本。

为了把地耕种好，按照计算，英国的农场主在每一公顷平均必须投入一千到一千五百法郎的流动资金。现在农业已变成资本主义的工业了。

但是为了观察资本主义的农业(或如美国佬所说的 financial farming)的真正繁荣,就必须到美洲去。

金融资本家兴办农业企业正如建立五金工厂或机器纺织厂一样;代替机器和棉纺品的生产,他们大量生产谷物、果品和肉类。在1857年拉维涅举出瓦兹省的一个农场作例子,那里播种了五百公顷甜菜,收了三十万公升小麦;在加来海峡省的农场里播种了一千公顷甜菜和喂养了一千头大家畜。他骄傲地说:“在英国没有更大的企业了。”^①但是欧洲的大农场同新大陆的大农场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

从1874年起,一个美国农人,曾一度闻名世界的达尔林普尔在一个金融公司内管理着六个农场,占地三万公顷。他把这些土地分成八百公顷大小的片,每片又按二百六十七公顷分成小区,它们通过电报同中央管理处取得联系。全部三万公顷是由一支有六百个零工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队伍耕种;在农忙季节,管理处又招募五百或六百名补充工人,分配于各区。秋收一结束,除了工头和每区留下十人外,其余一概遣散。在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某些农场里马和骡不在工作地点过冬,因为麦茬都翻耕了,它们以一百到二百对结成一群被送到一千到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去,春天一到又从哪里赶回来。

机械师骑着马跟着工作中的犁、播种机和收获机前进;一遇到小小的故障,他们就在一分钟内走近机器修理,使它恢复工作。麦被送上日夜不停的打麦机;打麦机是用麦秆做燃料的,人们把麦秆通过铁管投入炉内。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种巨型收割机用四匹到八匹马驾御,它的摇动的刀刃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割下十六到二十八平方英尺面积上的作物,只留下离地两吋高的根部,转动的机翼

^① 米昂斯·德·拉维涅《农业和人口》,1857年版。——拉法格注

收拾麦穗并送进板车，经过脱粒，然后装袋。留在地里的麦茬用火烧掉^①。

麦粒自动脱下，簸净，过磅和装袋，由铁路运到达尔林普尔的农场，而后由此再运到德卢思或布法罗去。这农场每年增加播种二千公顷；在1880年麦地面积已达一万八千公顷。

欧洲的资产阶级既经夺取了农民的公社财产和废除其权利，同时向他们征收贡物，把他们委诸高利贷者之手，高利贷者使他们变成仅仅是名义上的占有者，和使他们遭受到大的所有者和美洲及印度的农场的竞争。这些以及其余的原因加速了对小农的剥夺和使他们变成无产者。掌握在金融资本家手中的美洲农业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农业无产阶级。

北美合众国的大批农业工人是由无产者组成的，他们既无立锥之地，又无一间滑稽泥的茅屋；甚至连睡觉的床和吃饭的匙也都不属于他们；他们实现了人类畜牲的理想，失去了任何私有财产；除了直接消费的衣食两项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在田间没有固定的住所，因此在收获一结束，便跑进城去。“金融资本农场”的主人到处招募这些无产者，在乡村和在城市，依靠大小工头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送到工作地点去。他们给工人住房，供给他们吃，给他们洗衣服，治病和按月发工资。他们组成了一支真正的农业连队，服从军事的纪律；在同一时间内起床、吃饭、工作和睡觉。平日

^① 普林尼和帕拉第提到高卢人也有类似的机器。帕拉第在《De re rustica》一书中说，在高卢的宽广平原上施行快速收获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节省人力：只用一头牛就可以收完一整片田地。车子安上两个低矮的车轮，有四角的底和倾斜的侧板（上宽下狭）；前面的板比两侧的略低，上面装了密密的一排小锯齿，齿端微弯，其距离足以容下麦穗；后面安上两个车杠，驾上犍牛，头对着它所拉的、在它前面的车子。随着它在麦田里前进，为前板的齿所夹住的麦穗就被割下来并落入车子里，而麦秆则留下未割。这位拉丁作家补充说，不要几个钟头的功夫，收获就不费力地完结了。——拉法格注

不能喝酒；只有星期日才许进邻村的酒店。秋收一结束，他们便被遣散，只留下几个看管牲畜和家具的人在农场过冬。工人回到城市，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土地财产、耕作方法和农村人口成分的改变是因工业财产和金融财产中所发生的变化而引起的。为给工业提供它的工厂及那些只有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巨大工程才能相比的大型事业（铁路、隧道、工厂）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农村不得不减少人口和掏空农民埋藏储蓄的暗窖。人力落进工业城市，而货币则落进金融家的保险箱。

在以前的时代，除了为数极少的贵族、军人、牧师和手工业者之外，所有的公民都是靠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越来越多的公民脱离农业劳动和主要地从事工业和商业。所有这些都靠农业人口的劳动来养活。这种情况孕育着革命。

不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太多了，致使文明国家的农业必须以革命的速度推向前进；但是，虽然它的加速的和经常的进步，它也象中世纪的小经济一样，变成无力供养工业人口，因为人口增加过快，而且金融家和工业家既夺去土地上的人手，又夺去土地本身，使之适于狩猎和娱乐。

十八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提出过的任务，又由十九世纪的大机器工业重新提出。在十八世纪之初农业是以增加耕地和根本改变耕作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是靠工人阶级每日口粮的减少，这个阶级注定了食料消费的最低量，靠从俄国、美洲、澳洲和印度输入粮食来弥补本地农业的不足，靠创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法国输入它所需粮食的五分之一以上；而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必须从其它国家输入它所需的生活资料半数以上^①。

在十八世纪土地财产因工业革命而得益；在十九世纪则因它

而受苦。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引起新国家的处女地同文明国家的土地枯竭了的土地进行斗争，只有靠投入大量的肥料和加紧的劳动才能恢复土地的肥力。这竞争使欧洲的土地财产陷入经常的危机之中，它的出路只有土地社会化。

V. 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

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经济单位；其中有满足居民需要的全部手工业行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带有偶然的性质，而且只限于少数的物品，普通是奢侈品。资本主义的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会破坏这种经济的独立性；它使手工业分开，使它们隔离，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或者几个一起安置在某些适于它们繁荣的地点。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个省份可以担负居民需要的一切物品的生产；它们只限于生产某些商品；那些停止生产的商品就靠日益扩大的商业来供应。丝厂曾竭力分布到全法国，到十八世纪末几乎全部集中在里昂及其近郊；自从丝同棉花混纺之时起，它们又移到接近棉花生产的中心。在一些地点集中了以前分散在城市和乡村的麻线和毛线的生产；在另外一些地点则集中了铁、粮食的生产，制革业，制鞋业等等。

以前的公社的经济单位为另一种所代替。以前的经济单位是由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一切手工业组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混合的；而现代的经济单位却是简单的，因为这里只有一种工业及其补充；这里是棉花，那里是铁、煤、糖、皮革等等。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法国已经不再按照它们的地理形势和历史传统划分为自治省，

① 马肉、驴肉、骡肉，本来人们对它存有成见，在最近时期已被贫苦阶级充作食物，他们只能偶然吃到牛羊肉。基督教想要消灭多神教，禁止吃以上几种牲畜的肉，因为在多神教的仪式中要杀马和吃马肉。资本主义的文明企图消灭它所依托的基础，和使人类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的风俗和习惯。——拉法格注

而划分为简单的经济单位：产棉区，制酒区，谷物区，生产甜菜区；煤炭、冶金和其它中心。

所有这些城市由于彼此的需要而联结起来，并且没有一个工业中心若不从其它地点输入而能生存一个月甚至一星期，如象中世纪的城市那样。罗昂为全法国制造棉织物，它从里昂取得丝，从蒙吕松取得铁，从博斯取得粮食，从北方取得牲畜，从加来海峡省取得煤，从马赛取得植物油，从埃罗取得酒等等。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工厂：社会生产的每一个部门都集中在某些地点，彼此的位置相距很远，但又由相互的需要而紧密联系着。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上的自治，这是经济独立的结果，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由经济需要和商业关系联系起来的各个中心之间的劳动分工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生产，它曾消灭了手工业生产的地方的和省区的单位，现在准备破坏自己的产儿——民族的单位和代之以更广泛的国际单位。

英国，这个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第一个国家，想要使其它国家变成只是农业国家，以便给它提供粮食和原料，原料加工则是它一国的事。兰开夏应当纺织印度和美国所生产的全部棉花^①。但是国际工业垄断的过早的企图终究是失败了。现在美洲生产的棉织物在数量上已超过自己的需要，而印度的纺纱厂和织布厂虽被英国破坏，仍然采用机器方法纺织。在1870年它的制造厂加工的皮棉达八万七千包，开动的纱锭达三十三万八千枚；到1884年用棉增到五十五万五千包和纱锭增达一百七十万枚^②。

① 迪斯累里在1880年为了安慰那些因美洲的竞争而遭受损失的地主，曾荣幸地提出这个计划。他提议英国和它的殖民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结成广泛的关税联盟，用来抵制其它国家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假如殖民地能给英国提供粮食和原料，那末英国的土地便能变为牧场和行猎之地。——拉法格注

印度——这是棉纺工业的中心：细棉布开始从加尔各答输出；细纱只是取道摩苏尔输入欧洲。在不远的未来，在靠近产棉区制造出来的印度棉织品重新充斥欧洲市场和轮到它来破坏兰开夏和大陆的棉织的中心。向亚洲和非洲输出棉织物已经不是曼彻斯特和罗昂，而是印度、日本、中国和美国。一个美国的工业家预见到英国工业家的命运，好心地劝告他们把自己的机器搬到路易西安那去，在那里可以不花运输费纺棉花。

全世界的工业的重新配置在我们眼前完成了；工厂安置到靠近它所需要的原料的生产中心去。

但是美国和英国还在成为国际工业中心之前便已经使欧洲成为附庸。在1861年到1865年，当南北战争时，在奴隶制的各州棉花生产停止了，法国和英国的棉纺工厂的工人纷纷失业流落街头，而在埃及棉花——“黄金植物”的种植被提到最高的限度；农民（fellahs）变贫困了；而埃及的金融家则落入路特希尔德和国际金融界的豺狼之手。

棉花的生产也企图集中在世界的某些地点。现在美国和印度生产英国所需要的麦子的一部分，而在十八世纪英国生产的麦子

② 在1879年日本政府从欧洲输入新式织布机并分配于帝国的各部分。从1881年到1882年金融公司兴建了新的工厂，纱锭的数目增加很快，在1884年仅三万五千，到1892年便增为三十八万；从事生产的工人有二万之多。输入日本的棉纱每年减少；在1888年输入值为一千三百六十一万一千银元；到1890年减为九百九十二万八千银元，到1891年再减为五百五十八万九千银元。很快地日本人便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中国和朝鲜寻找销售市场。

在写完了以上几行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中日战争，它对欧洲也发生影响。它强使中国走出静止状态和对资本主义的文明门户开放，这便颠覆了它建立在集产制和宗法家族之上的社会组织。汇聚到海边城市以便远离祖国去寻找工作的不幸的人们已经不是以千计，而是以百万计了。

从此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国家的移民，在1880年5月5日举行的“经济学家协会”的会议上渴望地说到这移民将“降低欧洲工人的工资和要求”。但是它引起了经济学家所未料及的后果；它加速了社会革命。——拉法格注

还绰绰有余。文明的国家现时在原料、粮食和销售市场关系上彼此依赖和依赖半文明的国家。这种日益增长着的经济上的彼此依赖在未来将形成全人类政治统一的基础。

商业或前或后地与生产相偕发展。假如在中世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只在集市日期进行，那时出售和购买整整一年的东西，那末从十字军建立起东西方的联系之时起，商业已取得国际的性质。然而运输的困难和危险只许可少数的奢侈品有交易的可能。美洲的发现显著地增加了商人所关心的那些商业物品的数量。

如前面所说，正是这些商人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和给行会工业的变革开了个头。

城市受到某种数量的消费品生产的限制，对其它物品的需要越来越多，国家的贸易跟着便一天天扩大开来。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外国，以便取得原料，推销自己的产品和养活工人阶级，国际贸易立即就以不平常的速度发展起来。商人在行会生产中的影响本来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商业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获得这么大的权力，使他有可能统治工业。

* * *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创造这样的工业机体（它只是通过生产的地方的集中和生产过程的支解才能造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前进，由分散的地方的和省区的单位进到形成全国的政治的单位。例如，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把手工业者和生产工具集中在作坊之内，在这里面实行劳动分工，它使工具和工人分开并规定它们只执行一种特殊的活动。手工业者的工具是简单的和为数不多的，而工场手工业的工具就比较多和比较复杂。随着手工业者变成片面的劳动者，只能执行一种活动，于是它的劳动工具也变成片面的：例如在某些工厂中有着许多大小不同重量不同的锤子，每一个只适用于某一特种的动作。

机械工业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它从片面化的工人的手中把工具夺过来并合并到钢铁的架子上去，这就是所谓机器的骨架，而工具则成为它的肢体。机器，这是机械的综合体。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还形成另外一种综合。

在家庭生产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的统一：家庭对自己生产的原料（麻、大麻、毛等等）进行加工。但是这种统一很快就消灭了，因为在公社的农村里有些劳动已经成为个人的专业，他们把车匠业、铁匠业或纺织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时成为经济单位的已不是一个一个的家庭，而是整个村落。随着商业和生产的发展，这些个体化了的劳动变成专门技能，为那些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所掌握。

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在手工业的这种个体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创建了织布的、纺纱的、梳毛的、造车的、细木工的等等作坊，而在这些作坊之内劳动分工和机器已完成其革命。然而这些作坊终于变成巨大的制造厂，在那里只进行某一种生产过程：在纺纱厂内只纺纱，在织布厂里只织布，在梳毛厂里只梳毛，等等。这些专门化了的制造厂集中在一个地点并成为其中之一的附属部分。梳毛坊、染坊、布匹印花作坊集结在机械织布厂或纺纱厂的周围。例如，在同一资本家的行政机关的监督之下原料通过全部的转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互相补充的过程，如梳毛、织布、纺纱和印花，而且还有全然不同的生产。工业的集中自然不必总在一个地点。有时由同一个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制造厂设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彼此相距很远。

国家银行，例如法兰西银行和英吉利银行正是这些复杂的工业机构的典型，它的分行遍布全国。每一个国家银行都有钞票用紙的造纸厂，印制钞票的雕板和印刷所，用以鉴别真伪的照相放大设备，等等；它在各个商业的和工业的中心设立数以百计的分行，

与城市的和乡村的银行家以及外国的国家银行建立联系。中央银行成为全国金融体系的中心；而这个体系组织得这么巧妙，致使它的脉搏，即贴现率之涨落甚至在农村的深处也有反响，并且影响到其它国家的货币流通。

伦敦金融中心区的《泰晤士报》也是另一种类型的惊人的工业组织：它拥有大批的通讯员，散布于全世界；它用电报与大陆上的所有主要的首都连结起来；它自己造纸，铸字，供养着机师以备修理车间里的机器；它排版，铸字，印刷自己的十六巨幅和分给订户；它所缺的只是非洲的阿耳发草田，以便采集造纸所需要的材料；但是不久总会解决的。

总有一天美国和印度的棉纺厂会把棉花种植场和缝纫厂并入自己的工厂；例如苏格兰的工业家在伦敦开设成衣店，以衣服的形式出卖毛织品，毛织品在他们那里经过了全部生产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图按照家庭生产的样式逐渐恢复经济的统一；以前同一家庭既生产原料，又对它进行加工；现在同一资本家的管理机构既担负原料的生产，又担负原料的全部工业加工，并且把它卖给顾主。

零售商也走着同一的道路。以前只出卖一种商品的小商店，如今让位给备货品类繁多的百货公司。在伦敦有些百货公司出售一切必需品，衣着、食品、医药和家具应有尽有。这是真正的商业的综合。但是这些卢浮和邦马舍^①只是农村小杂货店的扩大再现，在那些小杂货店里同糖、咖啡、蜡烛一起，买主还可找到服饰用品、刀、鞋以及其它有用物品；有时在这些小卢浮还附设了旅店，捎带卖酒、烟和报纸《小报》。别看它们规模小，甚至比巴黎的大百货公司还要完备，因为它们可以满足自己顾客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

^① 巴黎的百货公司。——编者注

需要。

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分工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单位——手工业者；然后它又在工厂里把这种劳动单位恢复起来，那里已不是人，而是铁的工人——机器是新的劳动单位。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图创造硕大无朋的生产机体，由最多样和最相反的工业部门组成。这些个别的部门，作为以上所讲的这个奇怪的生产机体的生理机能，可以彼此相距很远，可以被政治的疆界和地理的障碍分隔开。

这些国际的怪物吞没热力、光力、电力和其它的自然力，正象吞没人的体力和智力一样。

十九世纪的人类被装进这种经济形式里去。

VI. 资本主义的金融

工业的财产开始是在工场手工业中，而后又在工厂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动产的形式也变成金子和银子。这两种金属开始时，甚至已经经过铸造，带有完全私人的性质；所有主藏之于地窖而且只作装饰品使用。在印度以及在其它东方国家，一直到现在这还是它们的主要用途之一。它们在产品交换中开始时起很小的作用，因为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因此封建国王铸造伪币或者改变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对于自己臣民的交易往来不会有很大的危害。但是一经进入商业的时期，金子和银子便变成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标志；这时它们获得了产生微小的合法的收入或利息的权利。

放债取息一直到那时都被认为是不荣誉的事物，只有同犹太人的上帝视作仇敌的外人打交道才可以允许。教皇和宗教会议都谴责高利贷者^①。凡从事高利贷的人都受到轻视和仇恨。他们的四面八方都是危险；他们不仅要冒金钱之险，而且往往还冒生命之

險。中世纪的犹太人，金银的积蓄者，深知他们的宝库将遇到什么危险，因而不信国王的空话，只有用王冠的钻石、宝石、外交文件以及同样可靠的担保品作抵押才肯借钱。资产阶级恢复了放债的名誉并使之成为文明人类的最有利的和最光荣的职业；收利营生乃是资产者的理想。

在整个中世纪犹太人既受人民轻蔑，又受贵族蹂躏，真是苦难重重：某一个缺钱的王公将犹太人洗劫和折磨之后并以宗教为借口驱逐他们；另一王公看到逃亡者带着财宝，为着想抢劫他们才肯收容他们。

但是这些爱金的英雄不怕仇恨和不顾凌辱，他们在这些频繁的攻击之下忍气吞声只是为了更强地站立起来和继续自己的生涯。十字军运动迫使封建领主到处找钱去组织军队。这个运动使城市的解放和贵族权力的集中更容易了，但是也使犹太人和商人成为必要的了。它产生了亚洲的商业，商业创造了地中海沿岸城市的繁荣，且以征收税课和盐税之必要而替各种金融活动奠下巩固的基础。美洲的发现，由美洲输出黄金、名贵的木材、香料等等和越洋的贸易，因此而使海上霸权由地中海城市转到葡萄牙的、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城市，以上一切都扩大和巩固了金融家的权力。1522年大臣杜普拉给国债奠定基础，其长期的利息每年由巴黎牲畜市场的税收支付，这一事实说明国家收入的包税者获得如何的重要性。

受到轻蔑的犹太人，在十世纪在盛大节日时的教堂门口被人

① 宗教的分裂是十六世纪经济运动的特征；在这时期罗马教皇是旧的、崩溃中的经济制度的代表，他唤起了对货币利息的震怒，反教皇的日内瓦人加尔文是新兴的经济制度的宗教代表，相反地借用一切神学上的美德之名来宣传货币利息的合法性。新教及其对圣徒和他们的节日的否定，对救助和施舍之权的谴责，以及神赐的学说等等，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的宗教的表现。——拉法格注

打嘴巴，如今也成了重要的脚色，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并且自从这个职业不再是这么危险时起，许多基督教徒也干这一行了。

萨利^①和柯尔培尔可能认为“由国家税收管理和私人高利贷所挣来的巨量财富对于一切人，尤其对于那些准备用荣誉来换取金钱的贵族都是有害的”（萨利《王国的经济》）。他们可以向法院控告，要求包税者和高利贷者退回抢劫之物。可是他们得小心对付“这些素不见经传的人物，不断进行买卖证券、纸币以及司库、收税吏和国家包税者的付款凭证时榨取了巨利……”（1716年关于设立高等法院的法令）。当1599年萨利允许废除租赁契约时，对这种契约意大利的银行家萨梅特，被人民称为“吸钱鬼”的卢塞莱和齐比奥·萨尔丁尼是非常感到兴趣的，于是他们的同盟者托斯卡纳的大公派了自己的兄弟让·德·梅迪契带着几艘大船航行于普罗旺斯沿岸。路易十四在他的备忘录中可以高傲地宣称：“凡是我们的国家领土上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都同样属于我们……收藏在首饰箱中的钱，在我们司库手上的钱和我们留在人民之间流通的钱，都应当同样为我们效劳。”可是当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也不得不同意包税者的条件。1673年的公债虽经柯尔培尔向外国银行家再三苦求仍未募足，原因是他只付 $\frac{1}{18}$ （5.5%）的利率，而他们则要求 $\frac{1}{14}$ （7.14%）的利率。金融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以前诸侯的宫廷都聚集在大封建主的周围，如今国王又把大封建主吸引到自己宫廷里面去，因而击破了贵族的反抗力量和使他们成为包税者的牺牲品，包税者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富格几乎收买了一切宫廷领主，准备开始一个新的投石党运动^②，由于柯尔

① 马克西米利安·德·比顿·萨利公爵（1559—1641）——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顾问。——编者注

② 十七世纪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编者注

培尔的坚决行动而被阻止。从十六世纪末起领主开始与金融家攀关系，想“让自己的徽章镀点金水”。塞维尼夫人虽以门第自傲，还是主张自己的堂兄弟同一小姐结婚，这小姐“虽然有点犹太人的血统，但有百万豪富”（1675年10月3日的信）。劳^①和他的“密西西比人”拿投机事业把贵族引得发疯，使他们信用扫地和彻底破产。一切等级都混合起来，平等在金融的荫盖之下滋长繁荣。一个暴发户的平民雇佣了四个名门闺女充当女工，四个贵族出身的男仆充当马夫。这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唯一知道的充当奴隶的平等。

十八世纪的银行家和他们的投机事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使百科全书派（其中有些人——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都是银行家）有可能攻击贵族特权，这特权已丧失其存在的意义。紧跟着经济革命之后是哲学的批判，继之又是政治革命，这就把包税者从法庭的恐惧中解放出来^②。

革命把农业、工业和商业从阻碍它们发展的封建的和行会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同时也使金融家从他们在以前国王时代所遇到的不安定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为他们开辟了新的活动地盘。

杜普拉大臣在1552年发行一种利息八厘的无期的国债，这就

① 约翰·劳(1671—1729)——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投机家。——编者注

② 1716年最后一届高等法院的法官受贿，致使赛米尔·贝尔纳只用了六百万就得开释，还有克鲁扎兄弟和其他少数人也获免罪。可是加于保尔·普瓦松的惩罚却很可怕。如鲍瓦赖所说，这个普瓦松是下布利塔尼岛的农民的儿子。开始时他充当仆役，后来成为军队的给养者，因而暴富起来，在外国银行存款达三千四百万。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在旺多姆广场上的私邸被夺走，而他本人则被关进监狱。当第二帝国政府因耽心劫夺金融家会引起人民的愤怒而愿意表示慎重时，以奥斯卡尔·德·瓦莱为首的司法当局甚至不敢提出起诉书；他简单地抄袭旧法兰西最高法院决定的老文章和在交易所的门口安上旋转栅栏就算万事大吉。巴拿马丑闻是本世纪的最大的骗案，也不过让沙尔·德·累塞普斯坐了几个月的牢，被他们收买的资产阶级报纸还为此洒了同情之泪。高悬着荣誉团勋章的爱菲尔也在自己的铁塔里接待法国的和俄国的客人和海军大将阿维朗，他们全都乐于同一个一次捞了三千万的人结交朋友。——拉法格注

为已在小小的工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存在了的那种公债奠下基础。但是法国国王还是以封建观点来对待借息，在感到拮据时便把他们原先同意的利息减去四分之一或一半，有时干脆就停付。

其余的欧洲君主也以同样不客气的态度对待国家的债权人。这种支付利息的贵族方式阻碍着现代金融的全面发展，因为现代金融是把自己全部的投机体系建立在公债的稳固性的基础之上。

1789年资产阶级的最先的和最革命的行动之一就是宣布公债是神圣的并把它置于一切政治革命和未来的变革之上。

公债本身引起赋税自动增加的萌芽……“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①马克思又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②

把公债放到望尘莫及的高度，革命就给金融家进行投资以前人所梦想不到的保证。国家土地的拍卖又使他们更加发财致富。正当那些沈醉于革命热情的人民纷纷上前线保护边疆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如巴拉斯、富歇、乌弗拉尔、奥迪埃、贝莱哥之流却默不作声地累资巨万。并且连保皇党人也没有失去发财的机会。复辟时期的大臣，路易男爵和国民议会的最积极的成员一样参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823页。——编者注

1789年的土地大拍卖。共和和帝国时期的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供应和举债使这伙人的财富增加十倍。

路特希尔德王朝正是在1815年的举债和灾难的情况下产生。

革命和帝国一方面给金融家开辟了新的宽广的活动地盘，同时又从他们夺去了以前的收入来源。税和烟叶的包办，同印度和东方沿海城市的商业垄断等等都被取消。他们于是不得不投资国家工业和加以安排，以便占据交通要道，从商业流通中征收贡品。在1821到1822年为开凿运河——罗纳、布尔古涅、四条运河等而集资一亿二千八百万的一家公司建立起来了。国家，这是金融家的奶牛，给投下的资本保证百分之五点五到百分之六的利息，而当一旦发觉开运河是一件赔钱生意，于是在1853年就由国家以奇高的价格收买了去。被金融家控制着的铁路和越洋的大航线应当给他们一种可能，如象给中世纪贵族们的一样，向通过道路运送的商品收税。而当他们一经控制着交通要道，为了增加在这些要道上运送的商品的数量，他们于是便不得不鼓励机器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但是，为了敷设巨大的铁路交通网，加速大机器工业的成长和使它加速度发展，私人积累的资本已感不足，尤其是在法国。这就不得不求助于积累资本的联合。为金融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圣西门和安凡丹的信徒——现代金融的伟大的代表者创设了动产信用公司，这是一座“发热的洪炉”，并以之与路特希尔德相抗衡，路特希尔德幽居在法兰西银行——“冰冷的地窖”之内，是旧的金融的化身，只以自己所有的资本从事活动。

国家实行小额公债的新制度，波拿巴党人的大臣比诺称为“利息民主化”，这种新制度促进动产信用公司的发展；动产信用公司是那些在二月国家政变之后完成金融变革和空前明显地证明“金融就是他人的钱”的许多公司之一。动产信用公司、土地信用公司

和第二帝国初期产生的类似的公司的创设人都是一些象贝列拉、富尔德、莫尔尼公爵、加利拉公爵、莫希公爵等圣西门派的金融家，他们从这个学派认识了资本联合的力量，还有就是那些把掌权只视为发财手段的政治骗子。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当权时，为了借到债款，曾不得不向犹太人赛米尔·贝尔纳献媚，许多无名的、出身低、门第浅、没有财产、没有保证和没有职位的一些人负了国家的债务，又发行资产阶级所贪婪地认购的公债。几年功夫他们竟能将农民在许多世代积蓄起来和埋藏在地窖中的全部金银都发掘出来重见世面。同这种奇迹相比，拉查尔的复活就算不得什么。单是动产信用公司一家在1852年到1867年这十五年之间进进出出的钱数约达四十亿；在十年间它的经理从过手的总额中仅为开支管理费就扣下八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五法郎，还不算他们留作发明奖金用的已作废了的股票的利息和分红，也不算股票在交易所转卖的收益^①。现代金融界的天才艾米尔·贝列拉醉心于动产信用公司的神话般的成就，想要创设一切金融家所梦想的信托公司（Omnium）（1859年的报告）。所谓信托公司就是一切土地的、工业的和商业的财产的总动员，由它发行股票，然后又将由这种方法而创设的一切公司的股票换成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但是这个庞大的计划还来不及实现动产信用公司便倒闭了。不过贝列拉梦想的第一部分现在的确是正在实现之中，因为商业和工业企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股份公司，而在美国、澳洲和印度，农业企业也建立在股票上面。

金融力图吞下一切，占有一切；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还存在，

^① 银行家埃卡尔说：“所有的经理都是熟知这项事业的秘密的人，在1853年每月都进行投机倒把，便可用动产信用公司的一千股票赢利一百六十二万二千法郎。”（《1852到1867年动产信用公司的历史》）——拉法格注

只要公债的这部书——资产阶级的圣经还没有烧掉，什么也不能阻止它们的这种趋势的发展。

由公债中成长起来的金融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一切有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里，工业和农业企业采取这样的规模，为了它们的建立必要有相当数量的资本的预先积蓄，而这积蓄的完成只是靠经常掠夺人民大众^①。

在许多场合，由个人积累起来的资本是不够的，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借股份公司之力而把它们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为了购买原料和劳动力，对于一切企业都是必要的流动资本的重要性，生产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产品的缓慢的销售，市场的宽广和遥远，成本收回的困难，凡此都迫使工业家为了维持和发展事业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信贷，就是求助于社会资本的预支。因此社会财富，即消费以外的生产的剩余应当积聚和集中起来，以便随时为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服务。现代金融就执行着这种吸进又压出的唧筒的社会职能。

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预测、不合逻辑和无政府状态可以特别明显地从以下事实看出：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重要职务——国民储蓄的集中和分配——被委托给不知名的、不受监督的和不负责任

^① 要认识金融的这种剥夺者的作用，并不需要等待那促使如此之多的小人物破产的巴拿马丑闻。经济学家雷博还在 1874 年就写道：“在储蓄银行里仅存留着人民储蓄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都用于投机了……在里昂、在圣亚田、在热埃河谷地区最成熟的、工资最高的工人乃是牺牲者。在金融破产时，工人破产数目之多远远超乎想象之外……许多人伤心地把那些贬了值的或者完全作废了的证券给我看，为了这些他们的一份小小的财产都耗费光了。当然，他们所挑选的也是最不可靠的企业……这就是那拥有如此之多的辩护者和宣传者的信托的滥用所导致的后果。冒险行为消灭了人民的储蓄和动摇了那建立在它们的稳固性上面的社会保险。又有谁知道？这些可鄙的投机事业的牺牲者会不会因此而产生报复的念头！”（《铁和煤，对工场手工业制度的考察》）

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赞扬的和为政府所鼓励的储蓄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使生产者削减甚至必要的东西，而使金融家有可能弄到多余的东西。——拉法格注

的人物，把整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完全交付给各种各样卑微的人物，照贝利耶的说法，这些人是“什么都能，什么都不能”。“他们用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乡村的收入，国民的储蓄和国家的财产”，把这些资财的一部分用在那些“对人民的贫困是带侮辱性的”闻所未闻的过度消耗上面^①，其余的部分不加选择地用在创立和维持本地的和外国的工业企业上面，常常是最无意义的耗费。

靠着清算商业票据和用提货单和货栈存货单等等形式的工业预支，他们从商业的交易和从工业的生产中抽税并且把统治阶级的其它范畴变成他们的利益而汲取工人阶级的膏血的工具。

由金融家垄断的巨财财富给他们以控制新闻和政府的无限制的权力。他们在路易-菲利浦和帝国时代都有自己的著名的机关报。登载金融的广告对于当时的政治报纸认为是不光荣的。但是资本主义道德的进化战胜了这种成见，现在可以不因创设和维持自己的报纸而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他们收买了一切的报纸，不管它们的政治倾向和宗教倾向如何，靠报纸去影响群众；他们按照发表的文章一条一条付价，就是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日工资^②。

金融家 and 他们的傀儡充斥议会；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象路特希尔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担任议员的职务有辱自己的身份；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奴仆去当大臣。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金融家、众议员和参议员一旦碰到彼此提供租让或其它收入和一般盗窃国库的

^① 1716年关于设立最高法院的命令。——拉法格注

^② 在帝国时代曾出现这样一件事：《卢瓦尔灯塔报》，为数不多的共和派的报纸之一，在第二版上登了一个金融广告，于是引起轩然大波。路特希尔德第一个实行用自己企业的股票来收买新闻记者的新办法，这是使他们感到兴趣的有礼貌的方法。现在的作法就不必这样客气了：把准备发布的编好的新闻连同费用——银行券——一并送去就行了。

巴拿马丑闻，它从道德的和艺术的观点来看乃是一件杰作，给我们提供了金融界的欺诈、勒索、唯利是图和虚伪的集大成，所有法国的报纸都领公司的津贴，他们把我们时代的这个最大的欺诈的组织者累塞普斯吹捧成是法国的伟人。——拉法格注

时候，他们便马上勾结起来。

除了对国家的这种直接影响之外，金融家也对政策起间接的影响，其为害也并不小；他们操纵着交易所的市价，这在目下是政治的晴雨表；他们用收买来的报纸影响社会舆论和用这种粗暴的和犯罪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储蓄的集中，它使一切阶级的生存条件发生变革和引起革命。在“改良主义万岁！”的口号之下发生的二月革命^①是小资产阶级的事业，是为了反抗那些充当大银行家的巨仆的议员而掀起来的。

金融界欢迎帝国，正象犹太人欢迎迦南圣地一样。以艾米尔·德·吉莱丁为首的交易所投机者（艾米尔·奥利维耶就因他的提拔而得以入阁）在对普宣战中只看到操纵交易所的有利机会到了。可耻的和约虽然使普野-克尔蒂约和工业家摆脱了米卢兹的竞争者，也使昂赞的股东（梯也尔就是其中最大的股东之一）摆脱了阿尔萨斯煤业的竞争者，但是它反过来又使欧洲的金融家有可能涌进法国和把法国的灾难变成自己的齷齪收入的无尽的泉源。什么时候也没有过一个国家要人象梯也尔这个戴眼镜的癞蛤蟆更配称“祖国之父”；因为任何时候的国家要人没有象这样喝过无产阶级的血和没有制造国民财富如此大规模的破产；任何时候都还没有一个政治家这么明显地证明过统治阶级眼中的祖国只是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准备了革命并从革命中抢夺直接利益的金融家在斗争时是最可鄙的懦夫，在镇压时又是最残暴的剑子手。在1871年的5月也象1848年的6月一样，他们坚持要求对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血的惩罚，念念不忘要恢复信贷。

金融的强大并不依赖于政权的形式；它们不受监督地统治着德意志的专制帝国，同样也统治着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美国。正统

^① 指1848年2月24日巴黎人民群众推翻路易-菲力浦专制制度和建立共和国的起义。——编者注

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共和派互相交替，金融的统治不仅没有削弱，而且与日俱增地成长起来。任何一个政治革命都不能推翻这个万恶的统治，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公债上面。就人数、就智慧、就勇敢精神来说，金融家是资产阶级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工厂，没收了国家银行和其它的信贷机构和结束了公债之后才会消灭。

金融界同它的抢劫各国的国际强盗，同生活在富裕阶级中的寄生者；同毒化法衣圣器室、沙龙、法庭、编辑部、政界的伤风败俗者；同那些逍遥自在和心安理得地以大宗掠夺为乐事的无耻强盗；同那些刚刚脱出困境而又变得骄奢淫逸胜过封建国王和公爵的大贵族；同那些滥用社会财富投资于设计不佳和管理不善的企业的冒险家……金融界同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色彩，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畸形的花朵。

VII. 资本主义的集产制

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农业经济，商业和金融之所以能形成和发展只是由于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它从个人性质的财产变成非个人性质的财产，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集产制，这种集产制和原始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不是由共产主义中产生出来，而是为共产主义作准备。

从前面所述可知，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作为私有财产而出现的只能是完全地个人性质的东西：为要占有物品，必须亲自动手制造它和因为经常使用而合并到他身上去了，当时**财产**这词的确切意义就是指**劳动的成果**。

作为私有财产的第一批物品是：武器、装饰品、衣服、家庭日常用品；一旦占有者自己造起房屋，这房屋就属于他，而且连屋基和

房屋周围的土地也都属于他。战争增加了这些物品的数日；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占有者所创造，但是经过冒生命危险才获得的；这是罗马家庭的成员的战利品（*peculium castrense*）。私有财产带着如此鲜明的个人性质，以致占有者死后随同尸体一起焚化。

私有财产的这种个人的性质使它有可能侵入共产部落之内并在财产发展的所有时期都支持着它，以致深入人心，竟至于靠社会的幻想，直到现在还把私有财产看作是占有者的劳动成果，而资本的辩护者认为——或许是出于真诚——它的性质是个人的^①。

可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完全丧失了个人的性质：占有者既不亲自创造它，而且也不使用它；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对它都是不相干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是非个人性质的。

金融撕破了那掩盖这非个人性质的最后的帷幕。

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东或证券的持有者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财产；他什么时候也不同它见面；他不需要看见，知道这财产究竟在地球上的哪个地点，甚至连想一想也不需要；他所看见的，接触的、知道的和想象的只是印了各种颜色的纸片。

只有在破坏私有财产的个人性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财产的集体形式的重建。在血族的集产制之下，由血统的纽带联结起来的

^① 罗马教皇看到在我们这个良好的世纪再去向人民宣传天主教的神秘只是白费功夫，于是就担起了为资本主义财产辩护的任务。他作这个也只不过象最庸俗的经济家之所为。他说：“私有财产是与自然完全相适应的，当人们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去获取自然财富时将发生什么呢？这就是说，他把自己连接于他所加工的这一部分有形自然，他就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的烙印，因此这些东西归属于他是完全正义的……这样的论断的力量是很显然的，可是还有一些坚持旧观点的人却反对它，这是奇怪的。既然他们承认个人有权使用土地和土地的出产，可是又拒绝他有权威为他构筑房屋于其上的那块土地和他所开垦的地段的所有主。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这样一来就把人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剥夺去了？”（教皇通告《*De conditione opificum*》）利奥十三世没有看到，当批评这种他所不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时，实际上他恰恰谴责了他所要拥护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拉法格注

同一村落的居民共同占有全部土地，只有按年分配的可耕地的临时使用和它的收获才属于他个人的；森林、牧场和水泽是不能分的，归他们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的集产制之下，股票和证券的持有者没有亲族以至民族的联系，彼此互不相识，共同占有企业（铁路、纺织业、炼铁炉、矿业等等）。尽管企业主分散在各地，企业却是不可避免地不能分的；他们没有直接使用而且也不能使用自己的财产，但是他们每个人可以不投入任何微小的劳动而分别向企业收取利润①。

血族集产制时代的所有主是真正的所有主，他自己使用自己的财产，他取得的收入同“他的精神和肉体”的支出是相适应的。在资本主义的集产制之下占有纯粹是名义的；所有主变成真正的寄生者，因为他可以毫不费力气地从财产上取得他所使用的收入；当他把自己的股票和证券送进交易所，在那里往往一天之内就要转换几次主人，这就等于自己声明自己的寄生性②。大大小小的路特希尔德用交易所的投机和其它买空卖空的把戏来骗取他们的股票和证券并将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息集中在金融家的保险箱内，在实际上证明所有主是无用的。

从前，贵族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在家臣中间，平时负裁判之责，

① 柯林斯用于特别意义的“集产制”这个词被德·巴普、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谢夫莱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变成了通用词。它被输入了法国，但这个词的意义却还未弄清楚。这便给我们的敌人以口实，攻击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想要回到俄国“米尔”的集产制，就是回到已经过时的财产形式。但是从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1880年）时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已普遍流行，“集产制”这词才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且没有取消使用它的必要。——拉法格注

② 在资本主义生产开始时，当占有者担任着组织和管理者的时候，亚当·斯密还可以有理由承认资本有权分享劳动成果，就是征收利息、地租和工业利润，因他确信资本家以节约的美德和组织的才能尽了服务之责。但是各种各样的勒卢阿-博利约，罗雪尔及其门徒，把他的观念引到荒谬的地步，必须找到某种比较不惹人发笑的东西，因为现在财产的流动性已达到这么高的程度，可以在交易所里一手转一手，并不留下自己来源的痕迹，也不因主人的经常变动而引起经济性质的任何改变。——拉法格注

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坚执锐，身先士卒，保卫国土，这时的贵族是非常有用的阶级，消灭它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国内相对的和平一旦建立，领主就变成无用之物，于是就离开自己的土地而移居于国王、主教和公爵们的宫廷的附近；在那里他们终于形成为徒然给国家负担的寄生虫：从这时起就宣判了贵族的死刑。虽然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里贵族都没有象在法国那样被粗暴地消灭掉，但是他们也到处都丧失了自己的封建特权而与资产阶级混为一体，他们在资产阶级中间除了令人可笑的贵族的装腔作势之外什么不同也没有。

贵族作为统治阶级已被消灭了。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资本家。一旦资本家对生产成为无用之物的时候，死刑的宣判就落在所有资本家阶级的身上：准备这个宣判的相同的经济现象将关心着它的判词的执行。对于必将经历自己阶级崩溃的资本家甚至不会留下那留给领主的可笑的特权作为慰藉。

VIII. 共产主义的复归

人类的进步不是按直线走的，象圣西门所设想那样；象天体围绕着引力中心，象树叶围绕着茎干，它的运动描出一个渐次扩大的螺旋形。它必然会复归到相应之点，这时又重新出现那老的、似乎已彻底消灭了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已被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中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对它的相继影响强烈地改变了。

复活了集产制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

从史前期的简单的和粗糙的共产主义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将回到复杂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当资本主义的文明消灭了财产的私人性质之后，就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因素。

从前归个别手工业者所有的生产工具被夺取过来，集中在大工厂和大农场中，成为公有财产。劳动失去了个人的性质。手工

业者独立地在自己家中劳动，无产者在工厂里共同劳动；得到的产品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劳动的成果。

手工业者个人占有工具和自己劳动的成果，因为他独立地进行劳动；无产者既不能个人占有工具，也不能个人占有产品，因为他不能一个人使用机器和创造商品；他应当共同地，象在一个工人“共同体”里那样地进行劳动。

机器和机器产品的占有只能是共同的，因为生产工具和产品既不能由个人创造，也不能由个人使用，因而也就不具备私有财产的唯一合法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依据私有财产的法律占有它们只是暂时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僭夺必然要停止。资本主义的文明自身就担负起这个消灭的任务，既然它经常集中社会的财富，因而使僭夺者的数目越来越减少，同时又创造、集合、准备和组织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应当最终剥夺僭夺者所攫取的财富。

工人阶级随着生产工具的集中而集中起来。在大工业中工作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工具和技能，只占有个人使用之物如食品、衣服、家具等。他们的头脑已摆脱了由许多世纪以来从事手工业劳动而产生的财产的本能，不知不觉地准备去接受社会主义宣传家所带给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思想不是社会主义者凭空想出来的，而不过是从周围世界的现象中抽象地概括出来的。

无产阶级几万几十万地集中在一个地点这件事便于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

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这个阶级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僭夺并将那集中起来的生产工具已采用的共产主义形式推广于全社会，这个阶级是由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取得社会的承认将不是太困难的事——资本主义的文明已经担负了这件事业的大部分。

1848年以前关心劳动组织问题的社会主义者曾试图从头脑里

凭空把它想出来。但是它却被工厂生产、大商业和大金融业按照生产和交换的需要缓慢地和巧妙地实现于银行里、大百货公司里、资本主义的企业里以及在同一资本管理之下原料通过工业加工全部阶段的各种互相补充的生产里。现在，当生产中的一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职能不是由所有主而是由工资劳动者来充当的时候，用全民的管理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管理可以毫不费力地和无需破坏生产程序就能实现。全部变革集中于一点，就是把那被游手好闲者侵吞了的利息拿过来转而用于增进生产者的福利就行了①。

不仅劳动的组织规定好了，而且确定了对生产的监督。事实上，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无政府的，就是每个工业家都只为生产而生产，甚至不顾市场的商品滞销状况，可是在上世纪（十八世纪）末就已创立了统计科学，它用来说明市场需要和现存商品量。统计学本来应当使对生产的监督和按照社会需要调节生产有可能实现，如主妇按照吃饭人数去备办粮食一样，可是现在统计学却只被投机者利用来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②。

① 社会主义的敌人竞相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恶意，他们宣传共产主义者主张夺取农民私有者的土地，并且也夺取小人物的自由和积蓄。他们自己却没有看到他们指责共产主义者有意去犯资本家每天所犯的那些罪恶，如独占土地，诈骗积蓄和迫使无产阶级受工业的苦役折磨，在那里他们吃饭、睡觉和满足最必要之需的时间都被剥夺了，在那里禁止唱歌、说话和把人变成一架自动机，一举手一投足只是为了跟上机器的运转。——拉法格注

② 信仰世界主义的小麦投机商虽然没有想到调整小麦生产，可是非常熟悉全世界麦收的年成，并且准确知道这收成对居民的通常需要是多了还是少了。

现时的造纸家想按照需要来调节生产。在1894年10月，法国、德国、英国、挪威、奥匈、比利时和荷兰的造纸家在安特卫普的市政厅集会；他们讲出了一种想法，为了消灭妨碍他们的利润的生产过剩，必须按照需要的多少来限制生产，必要时甚至可以降得更低些。在布鲁塞尔设一委员会，每个国家派三个代表参加；委托他们研究达到这个结果的道路和方法。但是既然在每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中总得玩弄假仁假义的把戏，因此这次对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个别部门的生产实行国际调整的试图被吹嘘成为改善工人状况的手段，允许让工人每星期有一个假日——星期日。——拉法格注

共产主义只有在人类的进化中达到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正常的肉体和精神需要之时才能出现，因为原来是平等的人类之所以分裂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恰恰是由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简陋的工业和农业不能满足那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他们的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增长起来的需要。但是机械和化学采用于工业，大大加强了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在现时代没有一种正常的需要不能满足，甚至绰绰有余。

共产主义必须以阶级的消灭和所有社会成员不分男女一律平等为前提，当劳动分工还存在的时候，它就不能实现；这分工使男性与女性隔开，剥夺了妇女的社会职务，把她们禁锢在家庭琐事之中并使她们屈服于夫权之下，这分工曾经把人们分成阶级，一部分担任防卫和社会的指挥任务，另一部分则命定成为奴隶、佃农、农奴和无产者，分散在成千种的生产专业部门中间。

机器消灭了劳动的分工和使男女在劳动中平等起来。

机器侵入生产活动的一切部门并将它们转化为机械工厂。总有这么一天会来到，那时候将只有一种普遍的职业——当机械工的职业。男人和女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学会使用机器，便能无分别地由缝纫到纺织，到耕种，一句话，从事机械化了了的劳动的全部工种，这对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的健康将是非常有益的，可以不再象中世纪的手工业工人那样终生都固定在一个专业之内。

机器从家务劳作中把妇女夺取过去，从家庭的炉灶周围把她们抓了出来，机器从童年时期便把她们夺去，把她们禁锢在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中，折磨她们，强迫她们参加工业生产，恢复她们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所充任的社会职务；使她们重新担负充作前驱的伟大任务，而其遗迹已由古代世界的神话和宗教传说给我们保存下来。

机器迫使生产者成为自动机，使他们屈处于过度劳动、经济贫

困和生理苦难的折磨人的重荷之下，机器的使命是要把原始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时间归还给他们，用共产主义部落的蒙昧人和野蛮人所过的那种自由人的生活来代替文明时代的无产阶级的畜牲生活。

妇女也罢，男人也罢，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都被剥夺了权利，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了摧残，被钉在那愈来愈坏、愈来愈单调的劳动上，被紧拴在一种手艺、一种职业里面，象中国女子的脚穿上瓷鞋一般，被阶级的偏见蒙蔽着，被财产的和性的道德的戒律束缚着；他们只有在那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均衡地发展自己的筋肉和脑力，才能抑制自己的情欲和成为象野蛮人那样自由的和完整的人。但是他们将是远为复杂的人。在过度劳动和文明贫困的屈辱平等的位置上出现了自然性质的不平等，它找到了一切的发展手段：关于这个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文明是毫不关心的，然而它却是人种的改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种只有由于个体的千差万别，由于变种的创造和巩固才能进步。

预定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将共产主义的制度和习惯引进政治和社会的领域。

野蛮人在选举酋长和军事首领时所使用的不分男女的普选早已消灭，现在又被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起来，当然只限于男性，资产阶级宣布普选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泉源。这种普选，虽然是虚假的，必须以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确实存在过的那种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

在共产主义的部落内住宅是共同的，饮食是共同的，儿童也是受到共同的教育。公共学校里的儿童也是共同地用公社的钱来教育；哪里有社会主义的市政机关，那里的儿童就共同地靠公社来养育。而那些共同地住在七、八层楼房里的文明人则共同地在饭馆

里被毒害和被盗窃。

假如直到现在的普选制都不过是一种骗局，假如房屋盖得这么狭小，以致住在里面的人变得病弱不堪，假如共产主义的设施徒具形式，而实得其反，就是说恰恰与那些不得不使用它的人们的意志相反，那末这只不过是因为所有这些设施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只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然而不管它们是如何的不完善和不方便，无论如何它们总在消除和消灭文明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感情并且使他们适应于共产主义的风俗习惯。

资本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可图，它就投向那里；它不分人种和民族的差别剥削一切生产者；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中它把他们集结起来，混合起来和联合起来。哪里它扎了根，那里就建立起同样的文化，同样的风俗和同样的习惯。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同样的对暴利的贪欲去刺激自己的占有者，又以同样的贫困和过度的劳动去惩罚工人；它在工人的心中放进了同样的反抗的渴望，这种反抗的渴望越过海洋和国境把他们联合成为统一的国际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到处都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准备占领太阳底下的位置和夺取国家政权。

那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由文明民族的这种革命的压力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国际的并且还会扩大到包括人类家庭的一切成员。它虽然同原始共产主义有点相象，但是也有区别；在以前的集产制的狭小的圈子里只容纳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成员；其余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被视为异类、仇敌。

国际的共产主义，象母腹之内的婴儿，在现代社会里成长和运动。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变（其到来的时机是不可预料的），将打破那隐藏它和束缚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于是它就降生下地并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形式确立起来。

共产主义是人类脱出动物状态时的摇篮；在这摇篮里，也只有

在这摇篮里人类才能成长和走过最初的和最困难的几步。在各民族的记忆中，这个时代是“黄金世纪”，“人间乐园”；这记忆有时变得模糊了，但是什么时候也不会从观念中消失；在历史上困难的时期，它便重新复活；怀有高贵的空想的思想家梦想着它，实行家为了加速它的再现，不惜牺牲性命。但是无论是空想的魔力也好，无论是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也好都不能使共产主义重现；在人类的智力失败的地方，经济现象的粗暴力量终于获得成功。

人类当时之所以征服和驯化那玩弄他的自然力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投入人为的和经济的力量严酷的奴役之下，而这种力量正是由他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转化为经济力的自然力把经济奴役的枷锁加在人们的身上，作为对自己的有增无已的工业奴役的一种报复。

自由放纵的经济力量玩弄人类犹如狂风之于弱草，甚至比风更可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风暴。在私有制时代的许多世纪中间它们蹂躏人类，摧残人类，而人类却不能制服它们。可是这些最无情的、放肆的、盲目的经济力却促进共产主义的再现，无须取得人们的同意，甚至违反他们的意志。共产主义再也不只是存在于那些渴望和平和幸福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和各民族的幻想中，它出现于经济的现实中；它在工业和农业中把我们包围起来，它用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制度把我们紧紧抱住；它陶冶人们的思想和激励无产阶级群众。共产主义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经济生活的深处，只等在劫难逃的革命的时刻一到，便要出现于社会舞台。

在无数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如此渴望地和徒然地期待着时刻已经迫近了。再等一下，人类就要回到共产主义，他们将找到自己的失去的幸福和洗掉私有制时代的低下的利益和欲望，自私的和反社会的习俗。这时人们将战胜尚未受到约束的经济力量，人类的优美的和高贵的品质将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那些注定会看到万象更新的人们将是幸福的，三倍的幸福！

选自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王子野译）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27—59、123—169页。

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

(1896年12月)

一

国际刚刚诞生,《资本论》就在1867年问世了。马克思摆脱了独自写作的状况,又重新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实践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国际力图使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自发产生的工人运动团结起来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论》的使命则应该是使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有可能认识自己。但是,所有这两个产儿在自己出世之前都曾在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强有力的头脑里孕育了很长时间。

马克思在离开学校以后就表现出两个方面: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活动家。一方面,他从事激烈的反普鲁士政府的运动,结果导致了他被驱逐;而另一方面,他把黑格尔的哲学倒了过来。他一生中一直进行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当他在头脑里孕育那个必然会改革历史科学并使得有可能找出人类运动的真正原因(自然神论者以上帝的干预,而哲学家则以唯心主义的思辨来解释这些运动)的伟大的历史理论时,当他写作《哲学的贫困》并在其中概略地叙述自己的价值理论以及阐述阶级斗争理论时,他同时也加入

* 巴黎吉约曼出版社出版了拉法格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摘编本。但是,出版社给这本书加上了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写的一篇“批评性”导言。这里刊登的拉法格的文章就是对帕雷托的“批评”的驳斥,载于1896年12月出版的《社会发展》杂志。括号内的罗马数字是帕雷托写的导言的页码。——编者注

了社会主义鼓动家的行列，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还是一个秘密组织）的主席，并同恩格斯一起写作《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在今天仍然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完整的画面。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回到了德国，而在革命失败以后他又重新流亡国外。他到了伦敦，在他参加过的宪章运动失败以后，他又埋头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有时中断科学研究也是为了出版对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同谋犯帕麦斯顿具有毁灭性的战斗檄文。但一当无产阶级从全欧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活动，马克思就重新投入斗争，成为国际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国际成员欢迎《资本论》的出版。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他们宣布《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是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公认的理论家。他的学说，按照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的说法，是“深奥难懂的、没有用处的和模糊不清的”，但却很奇怪地得到了工人的理解和承认。两半球的社会主义者从他的这部著作中汲取了自己的有益思想，并在自己的期刊上大量地加以转载。领导纽约裁缝总罢工的委员会从《资本论》中选出一部分翻印并散发了几千份。《资本论》被译成俄文、法文和意大利文。起先是莫斯特，后来是考茨基，编出了《资本论》的德文简述本，卡菲埃罗编出了意大利文的简述本，杰维尔编写了法文的简述本，而且杰维尔编写的法文简述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被翻译出版了。《资本论》把马克思的声誉传遍了所有的国家，马克思的名字在工人中间有口皆碑，哪里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在集会，那里就有他的肖像。西西里的工人小组把他的肖像放在国际的上帝耶稣和国际英雄加里波第之间：马克思是国际思想家。

《资本论》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如同上一世纪卢梭的《社会

契约论》一样,《资本论》在我们世纪将成为一部对历史事件发生最强大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结束了幻想的时代,清除了工人头脑中的混乱思想,资产阶级作家和政治家以及作为经济个人主义变态反映的无政府主义精神鼻祖之一的蒲鲁东,都正是用这些混乱的思想使工人走上歧途的。这部著作教导有事业心的人们不要力图匆忙地进行革命,而是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出发促进革命的发展;它教导这些人不要象1848年以前的共产主义者那样脱离周围的环境,不要加入宗派和秘密组织,而是要公开地活动,利用一切由于事件的逼迫而行动起来的人们的支持;它教导人们不要幻想理想社会,不要为无谓地试图实现这些理想社会而消耗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热情地投入日常的斗争,参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运动。它还告诉人们,不应该幻想,似乎魔杖一挥就可以进入天国,而要实现天国,需要长期不倦的准备,即把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党,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己的力量并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党;这个党向立法机构派遣自己的代表,在那里学习管理社会事务,以便在将来能担负起管理全社会的重任。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试图装作对《资本论》的问世不予理睬,但已经不是采取沉默阴谋的时代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国领导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引起了社会对《资本论》的注意。资产阶级本身责成自己的那些玩忽职守的经济学家准备好自己的论据和诡辩,来攻击这部著作。资产阶级的报刊塞满了批判马克思理论的文章,但是,只要这些文章刚一登出来,社会主义者便加以痛骂和嘲笑。就象寓言里的蛇咬镗子一样,德国经济学家在《资本论》上尝试了一下自己的老朽的牙齿的能力之后,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发誓再也不进行斗争了。

法译本《资本论》是在公社失败两年后以分册形式问世的。政

府开始时曾打算禁止它的出版,但经过考虑以后,没有去干涉出版者。政府以为:这是德国的玄学,法国人从中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出版者将会亏本。但是,这部著作悄悄地传播着,而且使所有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终于有一天人们听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宣誓,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令人不解的”理论是如何吸引着工人群众的。经济学家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了。院士和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保尔·勒卢阿-博利约,于1884年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著作《集体主义》,他在这部著作中试图驳倒《资本论》的理论,与此同时也驳倒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莫利纳里先生以他固有的并使他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使保尔·拉法格有可能把这一场争论转移到经济学家自身的范围之内。拉法格在9月5日发表了自己对《集体主义》的反驳意见。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认为这些反驳意见很有说服力,因而不想再作什么回答,尽管莫利纳里先生在自己的杂志上给博利约先生留了篇幅,尽管博利约先生自己也出版一种周刊《法国经济学家》。对拉法格作出回答的不是博利约先生,而是莫里斯·布洛克先生。这位布洛克先生在经过了短暂的政治激战以后也溜之大吉了。

这一场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成功的进攻使法国经济学家的热度降了下来,使他们变得胆怯了。因此,当巴黎吉约曼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的摘编本,并作为“经济学小丛书”之一的时候,在几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要想在法国找到一个同意恢复争论的经济学家,那完全是白费力气。克劳迪奥·让奈先生本来以驳倒马克思为己任,在作了一些尝试以后也退却了。于是人们决定向外国经济学家求援。知道恶魔的力量的德国人拒绝了。最后,人们选中了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侯爵^①,他勇敢地同意充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保卫者。

光荣属于勇敢的骑士！

二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先生的批评

帕雷托先生在开始批评《资本论》时指出，对马克思无须进行更多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在专门性的学术著作中可以见到，而且也可以在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中见到”。因此，他担负起了小学生的任务，而为了表明他是一个好的小学生，他只是采用了那些以打倒社会主义为目的著作和报刊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手法：诡辩、混淆概念、前后矛盾、文不对题、断章取义。在这一方面（而且仅仅是在这一方面），帕雷托的批评是令人感兴趣的。这种批评是官方经济学提出来与科学经济学理论相对抗的那些论据的相当完整的综合。

任何一个小学生，不管他多么小，总是想说出自己的某种思想。帕雷托先生也想作出某种发现。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他讨论集体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中承认，“马克思和拉萨尔具有强大的武器，而且善于灵活地使用它：无懈可击的论证，广博的历史知识，对现代工业的条件的深刻了解，纯朴优美的文体，生动活泼的形象，能言善辩，冷嘲热讽，铿锵有力的语言，——他们拥有所有这一切手段”^②。而著名的比利时经济学家德·拉弗勒则说：“如果让劳动是价值的尺度这一原理成立，那么马克思就会以无可辩驳的逻辑（他在另一个地方写的是‘以钢铁般的逻辑’）证明，‘资本是

①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1848—1923）——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代表人物，洛桑大学教授。——编者注

② 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分析》第206页。——拉法格注

掠夺的产物’，资本是无酬劳动。”^①

相反，帕雷托先生认为，马克思在“他所使用的概念中缺乏精确性”(XXXV)，“他的逻辑是相当脆弱的。在他那里缺乏紧凑有力的论证，能够把事实和他想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他在这方面似乎是单纯依靠那些最经常是由感情产生的联想”(LXIV)。马克思缺乏逻辑，马克思用感情代替论证！但是，所有这些经济学家为了掩饰自己无力驳倒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情剖析者的理论，都一致责备马克思没有感情，因为象一个冷静地切割伤口以便去掉使伤口感染的异物的外科大夫一样，马克思在讲述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受的那些使他感到满腔悲愤的可怕痛苦时，他遏制着自己的冲动，不让这种感情在科学著作中有丝毫的流露。这一出色的发现立刻使我们的批判者加入了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

李嘉图说：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谁知道价值的基本要素，谁就掌握了会引导他穿过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迷宫的诀窍。马克思把李嘉图看作自己的先驱之一，他从研究价值开始。帕雷托先生叫道：这是白费力气！“我们自己认为，在现代的科学水平上，任何旨在确立如何理解**价值、资本**或任何其他术语的讨论，都是徒劳的。”(IV)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所使用的那些词上取得一致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要在我们用这些词得出的推论上取得一致意见。这并不妨碍帕雷托先生指责马克思说，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术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借用不应该看作是很成功的，因为这两个术语的意义不是始终很准确地得到规定，因此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是大量诡辩的源

^① 艾·德·拉弗勒《当代社会主义》第26页。——拉法格注

泉”。(XV) 这也没有妨碍帕雷托先生断言,“经验证明,使用不确定的词,会造成大量的诡辩,从而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V) 毫无疑问,帕雷托先生之所以宣布任何力图确定应如何理解价值、资本以及其他类似术语的讨论都是无效的,其目的是要想使人们知道,他所关心的不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利益,而只是关心保卫资本家的利益。

为了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那种“确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的利益,他吹毛求疵地就马克思的用语进行争论,指责马克思用《资本论》作自己的著作的名称,而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意见,马克思的著作的名称应该是《资本家论》(VI)。

马克思否定资本家的用处,而对帕雷托先生来说,资本家是上帝,没有资本家经济世界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怎么能说资本家没有用处呢!怎么能说没有资本家资本也会再生产出来并增长呢!这是多么可怕的胡言乱语!——帕雷托先生叫道,一边手里拿着五法郎的硬币给自己画十字祝福。说劳动似乎会创造出资本,——这是荒唐的,这同真理、同现实是明显矛盾的。“只有节制消费会创造出资本。”(IX) 不信教的人诋毁苦行僧,说他们没有用处。事实上,正是过着苦行生活的圣安东尼及其同伴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创造出了古代世界的财富。

“但是生产出资本还不够,还必须使用资本”,(XIII) ——象圣安东尼一样过着清贫生活的善良资本家又作出了自我牺牲。帕雷托先生紧随着自己的老师莫利纳里先生说:“因此,资本家完成着重要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形成资本,第二个职能是积蓄资本。”(VII) 为了使我们对他的上帝积累和使用资本的方法有一个很美好的想法,我们这位资本家崇拜者在第IX页上对1892年美国的破产作了统计。登记破产的共有一万零二百七十家,这些资本家遭受

的损失为二亿七千七百万法郎。在一个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里，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破产者对自己的事业的无知、毫无经验、愚蠢和漫不经心，发生了两千八百九十七起破产，而损失总额竟达五千万法郎。

帕雷托先生的统计告诉我们，每十个资本家中间至少有三个显然是无能的，而他们的无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和仅仅在一个国家之内就造成了高于五千万法郎的损失。

资本家能够如此合理地使用资本，他的神通广大的秘密何在呢？在于利息。“在于使用资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哪一个产业部门能够支付最高的利息，胜利就属于那一个产业部门。”(XIV)知道百分之六比百分之五高，这就是资本家的创造奇迹的科学。帕雷托先生，您是绝对正确的，——购买矿山、铁路、制糖厂和冶金厂的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家，不会去采煤，开火车、炼糖、冶炼矿石，但是却会数着手指从一、二、三、四、五计算到十，而有时还会从五十计算到一百。这是多么美妙的科学。在这之后就可以明白，社会应该奖赏这位高明的学者，把自己的全部财富呈献给他。

如果帕雷托先生注意到自己的老师莫利纳里并不总是那么十分尊重资本家，甚至不尊重到了象马克思一样把资本家看作是社会上无益处的甚至有害的人，那么帕雷托先生就会做得很好。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888年出版的《经济进化》一书中说的话，他说：“在以股份公司形式成立的企业中，领导人可以只掌握很小的资本份额。严格地说，他可以完全不掌握任何资本部分，而后面这一点尽管与普遍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从要很好地经营公司事务这一点来看，却是最妥善的办法，因为领导人如果不是入股者，他就没有权利自己监督自己。他只需要有他的职务所要求的才能、知识和道德品质。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在不要有资本的情况下比要求同时有

资本的情况下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而且花费也更少些。”

金融投机家完全信仰这种真理，他们只从事一件事，就是把资本家同他的资本分开，使资本家不能使用资本。为了达到这一值得赞扬的目的，他们用利息引诱资本家。他们答应给予资本家以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的利息，鄙视地把资本家称之为傻瓜，因为他们在或大或小的骗局中让人骗走了自己的资本。同贝列拉、米勒斯、富尔德^①之流一起开办“动产信用公司”及其他当代搜括钱财的机构的德莫尔尼公爵说：**财政——这是别人的钱财。**因此，帕雷托先生所宣告的那个资本家的美妙科学，也就是只是知道百分之六比百分之四多的科学，恰恰是使资本家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原因。

帕雷托先生拒绝说明他所理解的资本是什么，他给予资本以另一个名称，把资本分为**资本本身**，或用于生产其他财富的经济财富，和资本家所支配的**已经掌握的资本**。(VII)把资本的概念扩大到一切经济财富，这就使他可以把野蛮人的弓、鲁滨逊的劳动工具看作是资本，因为野蛮人的弓和鲁滨逊的劳动工具也是经济财富。因此，蚂蚁也是象路特希尔德一样的资本家，因为它在搜集本身是经济财富的储藏物，虽然它对于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起点的商品流通毫无概念。正是为了使自已能够这样把资本的概念扩大到别的事物上，帕雷托先生不想给资本下定义，而他把资本的概念扩大到别的事物上去，是为了跟随在经济学家之后得出一个使资本家感到安慰的观点：资本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甚至无脊椎动物也有在食物贮藏形式上的资本，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资本同上帝一样

^① 伊萨克·贝列拉(1806—1880)——法国银行家，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茹尔·伊萨克·米勒斯(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阿希尔·富尔德(1800—1867)——法国银行家，曾任财政大臣。——编者注

永恒。

马克思对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所作的分析把这种奇妙的混乱消除得干干净净。他确定了资本的性质，揭示了资本的产生过程，从而使得有可能预见到资本的灭亡。

野蛮人的弓和鲁滨逊的劳动工具同木匠的刨子、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外科大夫的手术刀和帕雷托先生用来写出他那些令人瞠目的反对意见的笔一样，不是资本。但它们却是经济财富。它们并不因为被它们的所有者所利用就成为资本。各种工厂、大地产是资本，因为它们的获利机会并不是它们的所有者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雇佣工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的价值同什么也不生产的资本家一起分享。

只要准确地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就立即会暴露出资本的道道地地的寄生性质和工人的保存和创造作用，工人在他所创造的商品中体现了自己的活劳动以及他加工的原料和他利用的机器所包含的死劳动。工人把这种死劳动同自己的活劳动相结合，给予死劳动以新的生命并把它保存在新产品中。帕雷托先生以及经济学家们加在资本家身上的那些品质属于工人。保存和使用资本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工人在利用机器的同时使用资本，工人在把原料变成新的商品的同时保存了资本。资本家的作用仅仅是浪费资本。

但是，为了监视工人完成自己的双重职能，即保存者和创造者的职能，就必须放弃只吃饭睡觉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走进那在创造资本而不幸的人在创造着社会财富的“苦难之城”。经济学家们不屑于看一眼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狱；经济学家们一谈起工人就说他们是懒汉，向他们说教，他们必须估计到寄生虫资本家的无法估量的功绩，劝告工人要节制自己的需要，进行储蓄，从而使金融资本家能够在工人的口袋里找到几个可以偷走的法郎。帕雷托先生抱

怨说，由于篇幅不够，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论述，但他还是谈到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化学上的同分异构现象，克鲁泡特金公爵及其被帕雷托先生宣布为最合逻辑的学说的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员的浪费行为，——这是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触及到的问题，——关于没有资本家生产就失去了刺激等等。此外，他编造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①，儿童代数，黄金寻求者和奥地利织工之间的枯燥乏味的对话，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工作日，谈到商品生产。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就象对于资本家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对商品生产毫无兴趣，好象商品是在月亮上生产出来的一样。资本家对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是利息率。帕雷托先生的天真给我们泄露了这一点。为了提高这种利息率，资本家疯狂地消耗掉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残酷地用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幸福、健康和生命作牺牲。

帕雷托先生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生产世界。他在交换世界里感到很自在，他在那里不是同衰弱不堪、衣衫褴褛的工人打交道，而是同那些穿著很讲究、肥头大耳、得意洋洋地把白赚来的钱塞进自己口袋的资本家打交道。他决定不涉及，甚至在理论上不涉及生产世界，以避免玷污交换世界。他宣布，谁要是在生产中寻找交换价值的构成要素，谁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因为“作为说明不同的**交换率**（翻译成普通语言，就是不同的商品价格）的基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在当代的科学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大概也永远不可能出

^① 他说，我们假定自由贸易在某个时刻确定了一定的利息率，再假定这个利息率等于5%等等。（LVIII）如果犹太教银行家和基督徒银行家听到这个建议，他们就会叫喊说：闭上嘴吧，您这个不幸的人！难道您不知道，只要贸易能自由确定利息率，这个利息率就会等于零？难道您不知道，商人和工业家要求得到无息贷款，由于我们迫使他们支付从我们这里借的那些钱的利息，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要分他们从工人那里偷来的钱，因此我们对他们已经感到厌烦透顶了吗？——拉法格注

现”。(XVIII)但是,因为帕雷托先生是一位勇敢的骑士,他出发去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了。

在上路寻找这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之前,他数落马克思说:“您会犯许多经济学家过去曾经犯过而现在仍在犯的**错误**,也就是,您没有注意到,**使用价值**并不象化学成分、比重等等那样是任何商品所固有的属性。相反,使用价值只不过是商品和人或人们之间的适应关系。”(XVI)

这样,帕雷托先生就告诉我们,面包不具有作为食品可以为人所利用的属性,而毛料不具有使人的肢体保暖的内在属性。如果说它们具有这些宝贵的属性,那么这只是因为,人们根据它们能适应需要的特点认为它们有这些属性。人们同样有权利把这些属性加在海滩上的沙子或菜叶身上。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符合他的需要的孩子,不会以面包作食物,也不会以毛料取暖。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兔子在跑的时候会失去记忆力。帕雷托先生在他写作的时候也失去了记忆力。他在第XX页上写道:“**交换价值**取决于**效用的极限程度**,后者决定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性质”,而这就是说,商品的目的是有效用,而正因为它们有效用,人们才生产它们。

帕雷托先生继续说:“这个错误(把**使用价值**当作商品的内在属性)更清楚地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而这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所包含的诡辩的主要原因之一。”(XVI)因此,物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是因为它符合我的需要。例如,帕雷托先生两天什么也没有吃,饿得要死。他走进一家面包馆,摆在那里的面包很符合他的需要,以致于他不吃一个就会精疲力竭而晕倒,于是他为了不受饥饿之苦,准备付出钱袋里的全部货币。但他拿了面包,只付出两个苏。吃饱之后,帕雷托先生到珠宝商店去,他看到那里有一个戒指符合他的心意,但是,这种符合的程度远远小于面包对他的符合

程度。尽管如此，他付出了金币，而且不是两个苏。根据帕雷托先生的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商品符合人们的需要的程度越小，它的价值就越高。因此，不符合世界上任何人需要的商品，用全世界的全部黄金来支付也不够。这样推论的人当然会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逻辑。

帕雷托先生进一步发挥他对交换价值的天才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商品不是按照一种价格，而是按照各种不同的价格出售。为了不把问题搞乱，使自己的那个会引起人忌妒的发现不致被埋没，帕雷托先生学着庸俗不堪的杰文斯先生的样子，把这些不同的价格称为**交换率**。在第XLVII和XLVIII页上，他列出了1853至1883年期间格拉斯哥每吨生铁的价格表。这些价格确实是极其不同的，在这些价格中没有两个价格是相同的。由此我们的作者得出结论说，不存在真正的交换价值，否则价格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波动幅度。只是他忘记说，或者说他不知道，铁就象第十七世纪的郁金香球果一样成了投机的对象。人们在格拉斯哥的交易所里成吨地买卖铁，不担心铁是否存在，甚至预先不想到铁的存在。卖者不提供他们出卖的铁，而买者也得不到他们所买的铁。所有这些交易都以支付价格的差额而告终。十七世纪的投机家们寻找着能够施展他们杰出的投机技巧的对象。他们找不着别的东西，就开始搞郁金香投机。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投机对象比比皆是：国家年金、铁路股票、金融企业、铁、棉花、谷物、石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投机对象。十七世纪的投机家把郁金香球果的价格抬高不可及的地步，抬高到一万、二万和五万法郎。那时候同现在一样，既不提供所卖的商品，也得不到所买的商品。

我们时代的投机家们抬高和降低价格的作用范围比较窄。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帕雷托先生公布的价格表，那么我们就

可以发现,从1853年至1862年,价格围绕着平均价格六十一先令六便士波动,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63年至1871年,围绕着平均价格五十五先令一便士波动,而在第三个时期,即从1875年至1882年,围绕着平均价格五十三先令二便士波动。1872、1873和1874年不应该考虑在内,因为在这三年时间内对铁的需求特别好,因为必须恢复法德战争所带来的损失,更新武器,扩大在欧洲已经得到不同寻常的发展的工业技术装备。对铁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工业几乎不能满足它的需要。由此就出现了每吨铁的价格的异乎寻常的增长。

既然帕雷托先生和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力推翻这一理论,他们就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始终是轻率的投机活动不是把铁的价格抬到十七世纪郁金香球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而是不得不把价格大致保持在平均价格的水平,而这种平均价格又在逐渐下降。帕雷托先生不去作任何说明。他蔑视这些蠢才,“这些完全不懂数学的人,为了突出某种现象的基本特征,有时候却非常喜欢采用平均数……这种极成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些平均数并不能比侥幸地从我们所研究的一系列数字中取出的任何数字,更好地说明我们希望阐明的那些现象的特点”。(XVIII)

这是具有何等的毁灭性的反驳啊!但是,帕雷托先生在否定平均数对于说明一系列现象以及把这些现象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特征的意义时,他是否恰好是在怀疑他自己所反驳的东西呢?数学上的平均数就象那些把许多同属的个体摄在一起的照片一样,这些照片反映的是典型,是这一群个体的平均面貌,而不与其中的某一个成员完全相象。他甚至不知道,他否认平均数的意义,他也就是在怀疑数学和所谓的准确的科学,因为准确的科学在个别的场合常常是不准确的。帕雷托先生是否会根据不存在两个绝对相同的東西而否定一加一等于二呢?他是否会根据不存在两个

面积完全相等的三角形而否定两个等角等边的三角形面积相等呢？准确的科学在建立自己的原理和理论时并不考虑那些个别的偶然情况，这些偶然情况是围绕着原理和理论旋转的，就象是围绕着数学上的平均数旋转一样。

但是，对帕雷托先生所说的话不应该那么认真看待。他对一切的否定狂达到了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致于他否定了自己作出的否定。他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并不懂得这个方法。他在第 XVIII 页上说，任何平均数都是幻想，用侥幸地从一系列数字中取出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成功地代替平均数，但是，他在第 XXII 页上却又断言说，平均价格是一个现实，“生产者的竞争导致商品的交换价值下降，最后，商品的交换价值开始围绕着某种正常的价值旋转”。接着他补充说：“这种正常的交换水平”，也就是这种平均价格，“是怎样确立的呢？”

马克思证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形成商品的价值，价格围绕着这个价值旋转。

帕雷托先生回答说：“这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证明马克思的错误是多么严重，他开始把他头脑里想出来的那些错误见解强加给马克思。这是经济学家们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们为了推翻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惯用的手法，唯一的武器。

帕雷托先生在第 XX 页上说：“马克思确立生产价值仅仅取决于劳动量时，只是遵循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比较一下这两位作者，我们立即发现，李嘉图用**劳动**这一术语既表示现在的劳动，也表示过去的劳动，即资本形式上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却只看到现在的劳动，他避开了过去的劳动，把它纳进了正常的生产条件”。

因此，马克思没有把被加工的原料所代表的劳动和加工原料时使用的机器所代表的劳动包括进生产价值即商品的价值。但是，因为帕雷托先生具有自相矛盾的天才，所以他在第 XXIX 页上说

出了恰恰与他在第 XX 页上说的相反的话。他在第 XXIX 页上承认,对马克思来说,“在商品所体现的劳动中也包括修理厂房、机器等等,总之,包括保存资本所必需的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经济学家们(帕雷托先生只是他们的喉舌)打算用来取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那些混乱不堪、模模糊糊和完全无法理解的观点。

我们的批判者拒绝讨论**价值**、**资本**以及其他经济术语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样做据说就是“研究语文学,而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会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成词汇的简单堆砌,甚至变成文字游戏。

李嘉图和斯密确定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新的经济学家们否定这些政治经济学之父的理论,简单地把公式颠倒过来。他们说,生产费用取决于交换价值。帕雷托先生十分欣赏词汇的这种换位。莫里哀笔下的医生由于无知,认为心脏在右边,而肝脏在左边,当有些人对脏器的这种换位表示惊奇时,他泰然自若地对他们说:“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因此,新经济学教导我们,商品的生产费用取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投机家象在欧洲和美洲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情况那样,购买铁、谷物、煤油或棉花,并把价格抬高百分之二十、四十和五十,那么它们的生产所引起的费用也立即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十和五十。投机家们永远不可能为自己的诈骗勾当找到更好的理由。

接着是另一个文字游戏。帕雷托先生说,“交换价值,这是为了得到商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XX)你们看见,他避开了“制造”、“生产”这些词,因为这些词会使人想起劳动,他用“得到”这个词来代替它们,因为“得到”这个词只会使我们想起交换。如果不正确地解释他的这个词,可以反驳他说,他的意思是在有各种各样

的商品的百货商店里无须任何劳动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商品。这是从“新派”经济学家的“不确定术语”中逻辑地引出的那些可笑结论的一例。帕雷托先生在同一页即第 XX 页的注中又一次改变了概念，说：“交换价值取决于最大程度的效用。”

因此，效用构成交换价值。新经济学用尽了自己的全部灵感和狡计，却只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复萨伊、麦克库洛赫^①以及其他把李嘉图和斯密弄到荒唐地步的经济学家们的陈词滥调。

帕雷托先生说：“你们想用一桶水来换我的手表。我不傻，我不会干这种买卖。但当我渴得要死的时候，我只好干傻事，拿我的表去换水，因为水对我有不可缺少的效用。”(XXII 及以下各页)在帕雷托先生看来，“效用不是商品固有的属性”，但是效用却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零是价值的创造者！这种论调似乎并不那么傻。

资本家在生产中是零，但是经济学家们发誓说，资本家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应该得到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具有创造作用的零的理论是关于资本家的具有创造作用的无效用性的真正理论。

不幸的是，帕雷托先生为了使我们相信，搬运工人给我们担来了水，我们为此付给他的价格只是对他所耗费的劳动即他实现在水中的劳动的补偿，他抛弃了自己的具有创造作用的零。而他在第 XXXII 页上的注中宣布，“交换价值等于生产费用。”但这实际上是等于说：交换价值是由商品中所包含的现在的和过去的劳动所构成。帕雷托先生在重复马克思。

他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下定决心要同《资本论》针锋相对地证明资本家在生产中的效用，从而证明资本家有权每天以各种名义得到劳动的果实：地租、利息、股息和利润。突然，他在没有受到任

^① 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编者注

何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本，那么国家，当然在扣除了维持费用以外，就会无偿地把资本提供给工人使用。”(XXXIV)这样，帕雷托先生开始了革命的思考并承认，政治革命在剥夺资本家的同时会消除资本家贪婪地每天占有劳动果实的现象。此外，帕雷托先生还对我们说，这样的消除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因为资本家在生产中什么也没有做。他证明说，“产品从经济学上来说过去的劳动以及其他经济财富与活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就如水由氧与氢结合而成一样。”(XXXIV)因此，既不代表过去劳动，不代表经济财富，也不提供活劳动的资本家是寄生虫。多么可怕呵！

我怀疑，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侯爵属于这样一类爱开玩笑的人，这些人为了逗乐以最严肃的表情证明着与他们先前庄严宣布的东西恰恰相反的内容。帕雷托先生想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可是他不实现自己的这一打算，而是用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来代替了这一打算，也就是说，嘲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教条”，证明这些教条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学家们用来搞乱一切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陷入迷途的谬论和矛盾。

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

笃信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先生们谦逊地宣布，他们发现了世世代代永远调节着生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

帕雷托先生所引证的托德教授预言说，谁不遵守这些规律，谁就要倒霉！就象不知道热的规律的孩子把烧红的煤抓在手里要吃苦头一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以自己的发现而自豪，他们把自己的经济规律和天文、物理和化学规律等同起来，以此来说明自己关于

什么是规律的错误想法。

经济学家们认为，规律先于现象，支配着现象，规律同警察局规定现象应如何进行并导致何种结果的强制命令相类似。创造了创世说神话的野蛮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世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出来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接着他命令：“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①

规律没有肯定的存在，它是理性的构成物，这种构成物使我们能够把类似的现象归并、分类和排列，说明它们的共同特点，认识它们的原因和结果，甚至有可能预见到，一当出现某种现象就必然会引出某些结果。如果我们在含有氧和氢的玻璃瓶里点着电火花，那么我们这样做是预先知道会产生出水来的。如果我们让资本家来选择：是愿意得百分之一的利润还是保证工人的健康和生命，那么，他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立即会按照火柴厂主的良好榜样行事。这些火柴厂主（法国的也不例外）不使用非晶形的磷，而主要使用天然磷，这样他们就可以损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而多挣几个铜板。

断言政治经济学规律同天文学规律一样很少变化，这就等于断言，经济现象的发展同宇宙世界的发展一样缓慢和不明显。宣布经济规律如化学规律、物理规律一样不变，这就是说，经济现象同物质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一样不变，换句话说就是，生产方式没有变化，从史前时代以来就没有发展，将来也不会发展。这是在肯定明显的谬误。

经济世界或者人为的世界（因为经济世界是人的创造）与自然世界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经济世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以劳动工具的发展为例：起初劳动工具用木头、石头做成，后来

^① 《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编者注

用青铜、铁、钢；起初把它们用作工具的是手工业者，但后来从这些手工业者的手中摆脱出来并加入到由生铁和钢、由水、蒸气或电推动的巨大的机体中。机器工具开始支配工人，把他们变成自动机，他们移动手脚只是为了跟上机器的运动。

因为经济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把现象分类并使之发生联系的规律也要经常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野蛮人个人所占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生产并使用的那些东西。那个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如此。原始人认为这个规律是永恒的。这个规律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以致人类理性直到现在还在受它的影响，私有财产的辩护者还在试图证明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他们说，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劳动产品。当然，帕雷托先生不会要求恢复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因为帕雷托先生所心爱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会看到自己将失去他个人占有、但不是他生产出来并且也不是他个人利用的劳动工具。

罗马的农学家柯鲁美拉、帕拉迪等等以及在十六世纪也写过农艺学方面的著作的奥利维耶·德·谢尔，是小家庭工业的经济学家。他们把一切都得在家里生产而不到外边去购买规定为好的主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柯尔培尔^①学派的“贸易平衡”理论归根结蒂无非就是这种理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结果。确实，中世纪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织布工场和马车工场，有制作武器的铁工厂等等。那个时代的一切乡村和城市都在自己的范围内生产满足其居民的很低的需求所必需的食物和工业品。我希望，帕雷托先生不致于为了证明自己对经济规律不变的信念而荒唐到要求农民纺自己的羊身上的羊毛，自己织床单并建造收割机和脱粒机。

^①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财政总稽核(1665—1683)，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编者注

在中世纪由于交通困难而出现的家庭工业，转变为位于有利于发展贸易的地区（例如海岸、沿河两岸、商队经过的十字路口等等）的城市手工业。手工业又产生了被人们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法规。因为商品的销售市场有限，所以手工工匠就组织成行会，以便严格监督由于市场的有限性所产生的经济法规的执行。行会理事会的任务是不让手工工匠之间有任何竞争，——规定市场价格，限制每一个师傅所能雇用的学徒和帮工的人数，同时还限制每一个工匠可以生产的商品数量，以免市场上商品充斥。理事会还规定工匠必须使用的原料质量及其加工方法，以免损害城市产品的良好声誉。理事会规定工匠可以使用的工具，禁止他使用任何使他有可能压倒其他工匠的发明。这种过分的规定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可笑的，但在那个时代由于交换条件却是必须得到遵守的、合乎逻辑的、必要的。

当美洲和经由好望角到印度的新通道发现以后，市场无限地扩大了，从地中海推进到了大洋。手工业的法律在这之前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现在却不可思议了，成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障碍。

无论如何必须清除这些障碍，宣布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为帕雷托先生所看不起的重农学派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英雄们在法国造就了一批实现这一经济革命的人物。

自由放任原则和竞争被吹捧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无可争辩的教条。在十八世纪末，一切都无条件地要求自由。农业的要求比工业更加激烈，它要求可以自由地把商品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农业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活动领域。随着限制某些谷物的播种，有时甚至禁止某些谷物的播种的封建法规的取消，人们迅速地开始到处砍伐森林、抽干池塘和沼泽，从而导致谷物的生产过剩，土地所有者则努力用关税来使自己避免谷物生产过剩。这时就出

现了把自己的经济法规宣布为不变的和永恒的保护关税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主在保护关税主义这个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谷物种植者和畜牧业者要求实行进口税，南方的葡萄种植者则坚决地拥护自由贸易。波尔多酒占有垄断的地位。所有南方的酒经过波尔多城出口的都称为波尔多酒。这些酒在所有的国家都有需求。法国，而后是意大利、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希腊、土耳其、克里米亚等等的葡萄种植业都有非常大的规模。各处的葡萄酒都运到波尔多，变成波尔多酒。南方的葡萄种植业者看到外国葡萄酒同他们自己的葡萄酒一样能获得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成了坚决的保护关税主义者。意大利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维护地产利益的经济学家，先前颂扬自由贸易，同样坚信不疑地开始颂扬起保护关税主义的功绩来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经济理论。

帕雷托先生会表示异议说：保护关税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仅仅以他们要保护的那个产业的私人利益为指导。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利益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指导原则，唯一的指导原则？当社会主义者描绘工人群众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时，善良的自由贸易的圣徒们会回答说：我们毫无办法，工业的利益要求他们受这些苦。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保护关税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叫喊道：如果工资不降低到最低限额——工业就会毁灭。因此，宁愿工人受痛苦和憔悴而死，也不能让资本家少拿百分之一的利润；宁愿人类死亡，也不能让棉织厂和制糖厂垮台，宁愿牺牲掉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也不能让每百公升的谷物卖十二法郎，而每百公升的葡萄酒卖十八法郎或者地租下降一生丁。

力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但已经过时的规律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经济现象。自由和竞争，这是自由贸易

的三位一体中的两个伟大的神，而愚蠢则是它的圣灵。竞争是进步的父亲和母亲，完全同丘必特是神和人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竞争是任何工业发展和任何生产的永恒规律，必要条件。但是，在延续数千年的整个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时期内，人们生活和生产着，但并没有向这个上帝膜拜。

毫无疑问，要想借助工场手工业来摧毁手工业，而后再借助机器工业来摧毁工场手工业，那就必须展开竞争。

但是，自由和竞争所引起的机器工业会吞食掉自己的生育者，就象某些昆虫一样，它们从卵中孵化出来后就吞食掉自己的母亲。竞争越是自由地展开，它就越会缩小自己的活动地盘，限制互相竞争的工业家和商人的人数。竞争使商人和工业家破产，把他们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以便消除任何竞争。竞争摆脱了羁绊，以便摧毁小规模的手工业垄断，而在它一个一个地摧毁了这些手工业垄断之后，创造出了无比巨大的垄断，使任何竞争都成为不可能。例如，制糖厂的技术装备如此之昂贵，这些工厂的生产率如此之高，以致于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有数量很有限的制糖厂。这些制糖厂的经理们按照彼此之间预先的协定确定糖的价格，就象当时行会的理事们确定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铁路公司使一切陆上的和水上的运输公司破了产，创造出了巨大的垄断组织，同这种垄断组织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利尔、鲁贝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商业局筹措自己的资金建筑了地方铁路网，同北方铁路公司进行竞争。公司应战了，把自己的运价降低到成本以下，从而挤垮了商业局的铁路，按照废品的价格收买过来，接着又提高自己的运价，以便补偿自己受到的损失。

工业、商业、土地和金融的巨头把自己的股票持有人和亲信塞进议会，让他们按照彼此之间的协议投票通过只对他们所代表的

垄断组织有利的立法，通过一切可能的补助、奖金、补偿、有保证的利息及其他见不得人的赠与掠夺国库。诚实的帕雷托先生对于矿山企业的代表、铁路公司、大土地所有者、大工业家以及金融资本的代表如此自私地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库表示痛心，但是他的哭诉以及他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愤不平都毫无意义，就象一个孩子因为不给他月亮而令人讨厌地哭喊一样。承认资本家有盗窃工人的权利，但不承认资本家有盗窃国家的权利，这简直不合逻辑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是根据强者的权利这样做的。

我们正在走向垄断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象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必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自由贸易宗教的圣灵——愚蠢——使经济学家们失去理性，他们竟看不到那些使们感到刺眼的现象，他们就象但丁的罪人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理性美德，不断地反复着同一个原则：自由放任主义万岁！竞争万岁！

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所引起的经济力量十分巨大，其威力无比，无论是在自己的正常表现中，还是在自己的冲突中，戏弄人们犹如戏弄稻草一样，并且从根基上动摇着社会。这些力量由人创造出来，但却反过来反对人，折磨着人。当饥荒使某个中世纪的城市遭到破坏时，那么这是歉收的结果，谷仓里没有一点粮食。但是当失业象引起饥馑的早风一样迅速传遍各工业城市时，这时商店里却货物充斥，一片丰收景象。

丰收对于家庭手工业时代的农民来说是欢乐幸福的源泉，但在现代农民中间却散布着悲观失望的情绪。请听一听法国葡萄种植业者的叫声吧，他们之所以发出哀怨，并不是因为葡萄在开花时受到了严寒的摧毁，并不是因为冰雹打掉了浆果，而是因为1893年的少有的艳阳天气使收获增加了一倍：他们的酒窖里堆放着一桶桶的葡萄酒，他们找不到这些酒的销路。帕雷托先生，请您试试用

您的关于竞争的慷慨言词去安慰一下他们吧！

整个世界之所以面临着货币危机的威胁，并不是因为银太少了，却是因为银太多了。在新的北美各州里发现了新的银矿，其矿藏的丰富空前未有；银的开采极其容易，结果是银价跌落，所有的银币贬值。这种银币按照帕雷托先生的成功的说法，是虚假的法定银币。请用效用理论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来对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其他谬论来解释一下这种贬值吧！难道自从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开采银以来银的效用就较少或者说较不适合于人了吗？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国政府在国际间达成了各种协议，要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人物给以帮助。这些人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在小册子中、在报刊文章中大谈特谈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但是他们丝毫想不出办法来消除由于银太多而引起的危机。

自从自然科学家研究了牡蛎的特征，弄清了它们繁殖的秘密，就有了可能大量地生产这些十分美味的贝类动物。而牡蛎的饲养者现在正是怕牡蛎太多。在养殖牡蛎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阿尔卡雄的工业家每年都消灭一部分人工养殖的小牡蛎。如果他们养大这些牡蛎，那么他们的牡蛎就会太多，从而不可能以有利的价格出卖它们。消灭财富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智慧。经济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实际上，为了在危机期间使企业运转、活跃工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商店里堆得满满的的商品销售出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像荷兰人那样烧掉大量的糖，以便提高商品的价格，或者把商品运到殖民地，运到亚洲、非洲，在那里廉价拍卖出去，那就只得让商品毁灭，听任企业的闲置技术设备受到破坏。各种工厂关门，损失达到几十亿。不久以前由于从事过度劳动而精疲力尽的工人人口现在找不到工作，陷入饥饿境地，因为工人劳动得太多了，生产得太多了。

假仁假义的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对于盲目的经济力量降到我

们头上的可怕灾难必须逆来顺受。社会主义者回答说，我们不要这种东方宗教和基督教的宿命论。人过去能征服并驯服曾经把人当作玩物的自然界的力最，人现在也能征服并驯服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的力最。

中世纪的行会师傅监督手工业的经济力最，迫使它们保证生产者的福利。当时的任务很简单，因为经济力最很不发达，而且它们的作用也仅限于城市范围之内。相反，今天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经济力最的威力巨大，它们的作用范围同世界一样宽广。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超出人的智力范围之外。当然，不管一个人多么有天才，他一个人不可能设想出社会制度。马克思知道这一点。他没有象经济学家固执地要求他所做的那样，设计出乌托邦，而是逐步地毁掉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研究了这些现象的起源、发展，指出它们必然导致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责任就是要掌握这个过程，迫使它为人类的福利和幸福服务。

译自《拉法格选集》1928年莫斯科—
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12—35
页。

（冯文光译）

交易所的经济职能

(1897年2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0章^①叙述了剩余价值规律之后立即补充说：“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他接着说：“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②。他答应在以后解决这个问题。

有少数政治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资本论》中的这一段论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对他们来说显得无法解决的矛盾上。他们认为，这个矛盾会使理论完全崩溃。许多人则希望，价值理论家在这里将会在他的辩证法和共产主义理论上碰壁，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辩证法和共产主义理论缺乏任何科学根据。天才地发现了某些已经由马克思发现的理论的洛里亚先生甚至断言，马克思为了避免承认自己的无能，会决定放弃后两卷书以圆满地结束他的经济学著作。正如马克思所答应的那样，他在由恩格斯于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可能写完这部书，所以他写下的是概括性的，片断的解决意见，他准备在以后进一步阐述并以事实来补充。在《新时代》(第14年卷第1册第4页及以下各页)发表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中，恩格斯对康拉德·施米特作了回答。在施米特看来，价值规律是说明交换过程所需要的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恩格斯指出，“这

^① 应为《资本论》第1卷第9章。——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0页。——编者注

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①我从恩格斯同我的妻子在伊斯特勃恩的一次谈话中知道,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打算扩充增补的内容。尽管由于疾病而身体虚弱,他仍然在准备把理论表述出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个理论以其简单明了的形式会得到一切有头脑的人的赞同。可惜他没有完成这一工作。这就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一个任务,也就是要研究经济现象,通过这种研究证实价值理论,这种理论是自从人类生产采取商品生产形式以来能说明其发展的唯一理论。要研究这两位思想巨人的这部著作,哪怕是为了证实理论的正确,也是需要勇气的。对于两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两位思想家的经济理论已经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以致于这些社会主义者们只能(也许一直要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变革)对这些理论作一些通俗化的解释,并应用于研究新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揣冒昧地写了这篇关于价值理论的文章,谨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请教。

交易所所有价证券的波动

一切交易所所有价证券的价格都不断地变动,有些每天发生变动,而有许多则在一天之内变动多次。发生变动的不仅有不断经历繁荣和萧条周期的产业公司和信用机构的股票,而且还有如法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大国的国债券,尽管这些国债券的利息始终不变,投在上面的资本也决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些不断的涨落运动乍一看似乎是没有规律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好像是在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3页。——编者注

卷起的灰沙中各个沙粒互相碰撞的情景一样，引起这些变动的资本家是无规则地行事的，他们的行动只受利润欲的支配，出于担心受到损失，或者出于希望获得利润。但是，正如这些沙粒在互相碰撞时发生不规则的运动而在跌落时仍然要服从重力规律一样，同样，这些象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手舞足蹈的交易所经纪人，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和愿意不愿意，都得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办事，提高或者降低在交易所标出的证券价格。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解释的圣经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人们筹算自己的道路，惟经济必然性指引他们的道路（《箴言》第16章第9节）^①。

对表格的说明

我在这个表格中根据1896年《交易所和银行的行情》杂志列出了某些股票的市价，不是逐日列出，而是有五到六个月的间隔。如果逐日研究这些市价，那就会同交易所经纪人一样，只能在这些每日的波动中区分出是赢利还是遭受损失。我在一栏中列出了股票的价格，在旁边的一栏里列出了根据最近支付的股息来计算的股息率。这种股息率根据证券价格的高低而变动。国债券的情况很清楚，它的利率始终不变，不管证券价格是提高还是降低。产业公司或信用机构股票的情况也同样是很清楚的，它们的利率逐年发生变化，因为要支付的股息按照前一个财政年度来计算，在一年或至少在半年内保持不变。股息率是根据股票价格与股息之间的比例决定的。例如，如果股息是十法郎，股票价格是一百法郎，那么股息率就是百分之十。相反，如果股票价格提高到二百法郎，而股息仍为十法郎，那么股息率就只有百分之五。

^① 圣经中的原话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编者注

	发行价格	股票		股票		股票		平均价格和平均股息率	
		价格	股息率	价格	股息率	价格	股息率	价格	股息率
		1月6日	%	7月1日	%	12月1日	%		
国 债 券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3%的法国债券利息	各不相同	101.40	2.95	100.80	2.97	102.80	2.91	101.66	2.94
3½%的法国债券利息	各不相同	106.15	3.29	104.95	3.33	105.40	3.32	105.50	3.31
3%的比利时债券利息	各不相同	100	3.00	103.30	2.90	102.10	2.93	101.75	2.94
3%的挪威债券利息 (1886年)	98	97	3.09	100.20	2.99	99.50	3	98.90	3.02
3½%的瑞士债券利息	99	108.75	3.21	109.50	3.19	107	3.27	108.41	3.22
4%的瑞典债券利息 (1880年)		102	3.43	103.95	3.36	103.20	3.39	103.05	3.39
4%的奥地利金矿债券利息		101.40	3.84	104.75	3.81	105	3.80	103.71	3.81
土耳其国债券利息		18.25	5.47	21.10	4.73	20.25	4.93	19.86	5.01
5%的意大利债券利息		85.10	4.70	89.85	4.44	92.32	4.35	89.90	4.49
3%的葡萄牙债券利息		24.90	4.67	27	4.31	24.80	4.69	25.56	4.55
4%的西班牙债券利息 (对外)		62.70	6.37	65.36	6.12	58.75	6.80	62.27	6.09
古巴债券利息		112	7.28	371.50	8.07	352	8.52	378.50	7.95
巴黎市债券									
1871		423	2.52	427.50	2.49	420	2.74	423.50	2.58
1886		414	2.57	417	2.53	406	2.63	409.30	2.57
法国铁路股票									
北部地区铁路股票	400	1790	3.12	1830	3.05	1830	3.05	1816	3.07

	发行价格	股票	股息	股票	股息	股票	股息	平均价格和	
		价格	率	价格	率	价格	率	平均股息率	
		1月6日		7月1日		12月1日			
西部地区铁路股票	500	1085	3.20	1105	3.14	1110	3.13	1096	3.15
东部地区铁路股票	各不相同	948	3.39	957	3.35	970	3.31	958.50	3.35
奥尔良铁路股票	500	1545	3.43	1600	3.31	1637	3.22	1594	3.32
里昂铁路股票	各不相同	1460	3.41	1553	3.21	1610	3.09	1541	3.23
南部地区铁路股票	各不相同	1250	3.64	1316	3.45	1313	3.46	1293	3.51
外国和法国铁路债券									
北部地区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481	2.97	489	2.71	488	2.75	486	2.75
西部地区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470	2.86	481	2.79	483.75	2.77	478.25	2.80
东部地区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462	2.91	473	2.83	484	2.78	476	2.84
奥尔良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473	2.84	480	2.83	484	2.78	479	2.83
里昂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468	2.87	482	2.79	485	2.77	478	2.81
南方地区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467	2.88	480	2.80	480	2.80	475.60	2.80
奥地利国家铁路抵押债券	各不相同	458	3.27	475	3.16	478	3.13	470.30	3.18
萨拉戈萨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289	4.93	320	4.46	309	4.62	306	4.67
安达卢西亚铁路债券	各不相同	218	6.58	266	5.41	222	6.48	235	6.16
信用机构									
法兰西银行	各不相同	3550	2.90	3675	2.82	3700	2.78	3645	2.83
巴黎银行	500	752	4.29	854	4.32	805	4.58	803	4.39
巴黎国际银行	500	540	5.20	635	5.14	582	5.60	585	5.31
土耳其银行	500	527	7.20	580	4.57	530	5.35	45	5.70
墨西哥银行	500	550	6.60	580	6.03	585	6.20	571	6.27

	发行价格	股票	股息	股票	股息	股票	股息	平均价格和 平均股息率	
		价格	率	价格	率	价格	率		
		1月6日		7月1日		12月1日			
各种证券									
苏伊士运河证 券	500	3220	2.78	3507	2.35	3350	2.76	3359	2.63
巴黎自来水公 司证券	各不相同	1895	3.01	1945	3.05	1940	3.07	1926	3.04
巴黎公共马车 公司证券	500	1080	3.26	1280	3.20	1285	3.18	1215	3.24
海运业证券	500	620	4.06	660	3.81	725	3.80	668	3.89
巴黎煤气公司 证券	500	1090	5.27	1086	5.48	1107	5.38	1094	5.37
塔尔西斯铜矿 证券		113	4.39	150	5.83	153	5.70	139	5.30

在最后两栏内是我们所考察的三个时期的股票平均价格和它们的平均股息率。

第一栏是股票或债券的发行价格,也就是说,资本家在股票或债券发行时为买进它们所支付的总额。

数字是根据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纯收入(扣除税金)得出的。

对表格的分析

交易所证券分两类:1. 固定利率的证券,包括国家债券,城市债券和产业公司的债券①。

2. 利率变动的证券,有工业企业的股票和信用机构的股票,它们的利息根据其发展情况逐年有变动。

交易所证券根据其利息率可以分为下列各类: 1. 股息率略高于百分之二点五的交易所证券,即巴黎市债券、铁路债券和苏伊士运河债券;2. 股息率在百分之三左右的证券,也就是说,百分之三的

法国和比利时的债券，平均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九四；百分之三的挪威债券的平均利率为百分之三点零二；百分之三点五的瑞士债券的平均利率为百分之三点二二。法国铁路股票在百分之三点零七（北部地区）和百分之三点五一（南部地区）之间波动；苏伊士运河股票的平均利率为百分之二点六三，法兰西银行的平均利率为百分之二点八三。（我在下面将说明，为什么苏伊士运河和法兰西银行的股票大大低于百分之三）。

3. 利率在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八点五或更高的证券：工业公司的股票；煤气公司，公共马车公司，海运公司，奥地利铁路公司，锌、铜、金矿公司等等；西班牙铁路债券，金融财政不稳定的国家的债券，如葡萄牙、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等等。

信用可靠的投资证券

能够保证完全稳定可靠的证券称为**信用可靠的投资证券**。这些证券由于它们保证绝对稳定可靠，所以它们的股息率是最低的。这个最低额约为百分之三^②。

① 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对资本不是那么友好，因而对于金融界的用语不是始终那么熟悉，所以我要作下列补充说明：

一个公司的股份资本是该公司建立或扩大时以股票形式发行认购的资本。这种资本的利息直接随着企业的兴衰而发生或高或低的变动。如果企业生意兴隆，利息就高，如果企业营业不好，利息就低。

债券资本是公司或者用于扩大或者用于补偿损失所借的资本。国债券和城市债券属于这一类。债券资本的利息是固定的。只是在支付这种利息以后，才能确定股息，即各股票应分得的红利。由于不幸事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债券资本的利息不能得到全部支付，例如在国家停止支付其债息时就是这样，这时就会发生破产。——拉法格注

② 为了唤起对资本家的可悲命运的同情，国民经济学家们扯着各种调门反复说，资本家由于货币利息不断下降而变穷了。象蒲鲁东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以及在大学里大批生产出来的社会学者们，却都很相信国民经济学家们为资本辩护的话，

法国国债在略低于这个最低额的水平下波动。属于第一类的巴黎市债券、法国铁路债券、农业信贷债券等等的利息大大低于百分之三，尽管它们对于资本投资决没有提供更大的保证。但是它们却提供了获利的机会，而这是国家公债券所没有的。巴黎市债券是有奖的，每一季度抽一次签，中彩者得奖金一百、一千、一万和五十万法郎。铁路债券、农业信贷债券等等也同样用抽彩的办法来偿还，凡抽中彩的债券可得五百马克以赎回，因此人们有希望得到购买价格和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即二十法郎。国家债券很可靠，因此支付的利息是最低的，而有奖证券提供了获利的机会，因此利息比这个最低额还要低。

相反，利息率为百分之三点五的法国无期公债是可兑换的，也就是说，可以降低到百分之三。因此，这种债券的持有者有遭受损失的危险，这种可能性又会通过股息率的提高而得到补偿，股息率平均可达到百分之三点三一，而不是百分之三的不可兑换的无期公债的百分之二点九四。

六个法国铁路公司的股票以及某些提供必需担保的企业，如法兰西银行，苏伊士运河等等的股票，都属于信用可靠的投资证券。如果说苏伊士运河股票只提供 2.63% 的股息，而法兰西银行的股票只有 2.83% 的股息，那么这是因为银行在这几年里恢复了特别优待，而且人们在期待着有更多的优待条件，也是因为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运输在最近几年里大大增加了，这就使得股息有

就象期待救世主的来临一样，期待着利息的逐渐消失，以便由此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只要利息象一百年以来的情况那样继续下降，他们就还可以为此等待几百年。信用可靠的投资证券的股息率（百分之三）一百年来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无论是 1789 年革命以前还是今天，地产提供的利率都是百分之三。亚·斯密说：“在美洲发现以前，百分之十几乎在整个欧洲都是通常的利息率，从那时以来，利息率在不同的国家下降为百分之六点五、四点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2 卷第 8 章）——拉法格注

可能提高。^①

不可靠的投资证券

除了向资本提供可靠安全的投资证券以外，还有另一些证券会使资本遭受到风险，例如信用机构、矿山企业、产业企业等等的股票。这些证券的利息较高，与资本所受到的风险相适应；所遭受的风险越多，利息就越高。这些证券的股息率总是随着营业情况的好坏而变动。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从表中取出下列六类证券，这些证券互相影响，它们的变化是由人人都知道的那些事件引起的。

	1月6日		7月1日		12月1日	
	证券价格 法郎	股息率 %	证券价格 法郎	股息率 %	证券价格 法郎	股息率 %
古巴债券	412	7.28	371.50	8.07	352	8.52
4%的西班牙债券(外债)	62.70	6.37	65.36	6.12	58.75	6.80
萨拉戈萨铁路债券	289	4.93	320	4.46	309	4.62
安达卢西亚铁路债券	218	6.58	266	5.41	222	6.48
巴黎银行	752	4.29	854	4.32	805	4.58
国际银行	540	5.20	635	5.14	582	5.60

古巴暴乱拖的时间越长，古巴债券的下跌趋势就越厉害，因为每月六千万的战争费用在西班牙战胜的情况下就要由古巴财政来负担，而古巴财政在战前就已经很紧张了。如果革命取得胜利，情

① 从苏伊士运河过境运输的收入如下：

从18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73776827 法郎
从189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78103717 法郎
从18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79585213 法郎

——拉法格注

况就会更糟，因为自由的古巴显然不会承认西班牙为了毁灭它而造成的债务。

百分之四的西班牙债券和西班牙铁路债券一样，受到了古巴事件的影响。这些证券在7月份有所回升，由此西班牙无期公债券从62.70提高到了65.36。政府同巴黎银行和国际银行谈判借款十亿，以便由此改善西班牙的财政状况并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些借款要使西班牙摆脱它的一切困境是很成问题的，但毫无疑问会给这两个银行提供极大的利润。这两个银行答应要在法国和比利时投资五亿。当谈判的消息传出后，巴黎银行的股票提高了一百零二法郎，国际银行的股票提高三百九十五法郎。但是，卡诺瓦斯·德尔·卡斯提耳奥先生由于提出的要求过高而中断了谈判，这两个银行的股票于是又跌价，而西班牙的公债券迅速地下跌；尽管西班牙的国内借款取得了成绩，尽管不体面地用马塞奥斯的尸体作广告，这种公债券再也没有达到一月份的市价。

土耳其的有价证券（可兑换的国债券、海关、烟草、土耳其银行等等）又受到了土耳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信用机构、矿山企业、一切产业企业的股票在它们的营业状况稍有变动时就会涨价或跌价。只要有一点点繁荣的苗头，资本就会向它们涌去，而一旦情况稍有不妙，资本又会抛弃这些部门。

金融报刊以及甚至政治性的刊物都使资本家能够了解当前的情况，在交易所开牌价的各公司的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公布伦敦、巴黎、纽约的各类金属（锌、铜等等）的市价，发表关于铜、锌的生产，产业的需求，关于储存的商品以及在运输途中的商品的消息。在报刊、小册子、书籍里有许许多多描写南非金矿的文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种矿业、正在使用的捣碎机的数目，所使用的炸药的数量，用机械方法或化学方法获得的金量，每吨加工材料的费用，粗金产量等等的所谓最真实的详细情况。金融报纸比

政治报纸更富有商业性(尽管有点不可思议),无论是错误的还是真实的消息,都一概刊登;资本家的事情就是要靠这些消息判明情况。信用机构每年、每月、甚至每周公布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法兰西银行、农业信用银行以及其他机构都是这样做的。苏伊士运河每天都公布通过它的船只的数字,铁路、公共马车电车公司每周公布去年和本年度的收入对照表。

交易所使工业和商业的传统习惯发生了革命的变革。银行家、商人和工厂主都尽量对他们的营业状况保密;而在交易所参加交易的信用机构、产业公司都尽可能地公布它们的统计材料;就象一个有道德的人一样,它们希望生活在玻璃房子里。

资本化和股息率

参加交易所的股份公司之所以让公众了解自己的活动情况,并不是因为它们热爱真理,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它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却又在各资本家之间建立了平等,尽管这不是它们的意愿和希望。

一旦某个信用机构或者某个产业公司里的红利提高或者减少,股票价格就会立即提高或下降,以便利息率保持在按照有关企业对投入该企业的资本所提供的安全程度的高低来确定的平均水平上。金融界人士把交易所使股票价格上涨或下跌以便使股息保持在接近于平均水平的活动称之为**资本化**。既然这种资本化决定着现在和未来,所以它与过去当然就没有什么关系。例如,五十年前按价格四百法郎发行的北方铁路的股票已经资本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它的价格在去年12月1日达到了一千八百三十法郎,这样它提供的利息就不会高于百分之三和若干生丁。谁在1850年当这种股票价值四百七十法郎时购买了它,从那时以来并未为

它支付过分文，它的股票对他来说始终只代表四百七十法郎。如果他现在不愿再把这种股票保存在钱袋里，而是要卖掉它，那么它的四百七十法郎就会变成一千八百三十法郎。为了使某个公司的股票资本化，交易所经纪人不等到编制出去年的资产负债表，不等到确定红利，预先考虑到了可能的结果，根据与公司营业情况有关的消息，并根据这种预见提高或降低股票价格。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信用可靠的投资证券来说，还是对信用不可靠的证券来说，资本化的比率总是在不断变化。资本所遭受的风险可以通过压低资本化率，从而提高股息率来补偿。有特许权的银行如法兰西银行同普通银行如国际银行相比，有更高的资本化因素。一个经营管理良好、不怕竞争的工业企业，如北方铁路公司，同煤气公司相比具有更高的资本化因素，因为煤气公司正面临着乙炔和电力照明的挑战，而且由于电力照明，煤气消费量减少了。如果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前的铁路股票的价格同今天的铁路股票的价格，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化因素是同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决定性原因的这个十分重要的产业的进步一起变化的。从表中可以看到，六个法国铁路公司的股票今天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着资本化，就是说，它们的平均股息率在1896年12月在百分之三点零七（北方铁路公司）和百分之三点五一（南方铁路公司）之间波动着。——五十年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时在法国只有几条铁路，都是从巴黎或几个大城市出发；只是在1852年政变以后铁路工业才得到极其迅速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公司，它们毫无计划地到处修建铁路。并不是所有新的铁路线都欣欣向荣；有的铁路勉强维持下去，有的铁路倒闭或者欺诈性地宣布破产。发生了一系列的崩溃。公众害怕了，他们不再乐于把自己的钱交给那些当时正在建立或处于发展中的公司。为了吸引公众，国家必须给予铁路公司以补贴，而各公司则必须保证认购的债券得到百分

之四的利息。这种利息甚至在开辟铁路路线以前，在整个建筑铁路的时期内就要支付。受到百分之四利息的诱饵的引诱的糊涂公众们并没有发现，是他们自己的钱创造出了利息，他们是在吃掉自己的资本，他们这样做使那些靠他们的货币得到支撑的企业很难取得成功。资本化因素当时还是很低的，各公司和各年之间变化很大，我们从下面一个小表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数字取自比里约的《交易所和银行年鉴》(1857年)。股票价格是根据该年最高市价和最低市价的平均数确定的。

这些信用可靠的投资债券是所谓的资本家的储蓄银行。他们不在交易所投机，而是把自己的资金投在这些债券上，交易所经纪人也把他们所获得的一部分利润投在这种债券上。如果市场繁荣，营业兴旺，资本家就会把他们的一部分资本从信用可靠的投资中抽出，投到别的证券上。在危机时期则相反，资本就会小心翼翼起来，抛出那些信用不可靠的证券，购进国债券及其他类似的证券。在德兰士瓦金矿崩溃时出现了惊恐，资本大批地从金矿抽出，信用机构和产业公司由于自己的股票急剧跌价而纷纷抢购英国国债券和利息率为百分之三的法国国债券等等。据说，英国金融家对于他们过去的股东普遍抽出自己的投资一事感到非常恼火，以致于他们考虑要把英国国债券资本化到让它只能提供百分之二的利息的程度，以便使小资本不再有兴趣到那里去寻求避难所。

一切证券，不管属于哪一类，都是互相密切相联，互相影响的。数量极大的国家债券、城市债券、信用机构和产业公司的证券，就象互相汇合的运河一样，大量的资本在这些渠道里流通着，力求达到一个平均利息率。^①

当然，这种股息率不是绝对的，因为人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证券

^① 巴黎交易所和法兰西银行每天公布九百五十七种交易所证券的市价；而这还不是全部证券。——拉法格注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	1202	4.79	815	5.25	780	7.23	787	7.59	927	6.86
北方铁路公司	562	2.62	411	3.00	780	4.30	470	5.10	463	7.77
巴黎-卢昂铁路公司	862	5.96	598	4.19	503	6.71	598	7.02	626	6.55
平均数	-	4.15	-	-	-	6.08	-	6.57	-	7.06
	1852		1853		1854		1855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股票价格	股息率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法郎	%		
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	1030	4.69	1125	5.52	1132	6.09	1166	6.86		
北方铁路公司	745	5.57	872	5.28	797	6.34	857	7.10		
巴黎-卢昂铁路公司	855	3.84	1057	5.68	937	6.68	-	-		
东方铁路公司	681	4.80	871	5.77	761	8.10	872	8.99		
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	742	3.77	768	3.90	752	4.07	1267	6.79		
巴黎-里昂铁路公司	795	2.80	912	4.10	913	8.48	1250	6.31		
巴黎-瑟堡铁路公司	665	3.10	726	2.89	615	4.23	-	-		
西方铁路公司	-	-	-	-	-	-	728	6.84		
平均数	-	4.37	-	4.73	-	6.28	-	7.16		

给资本带来的风险和提供的保证。这种股息率也不可能静止不变，因为不断会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干扰，如国债和股份公司就会受到这种干扰。如果这种利息率在受到某种干扰后能够得到最迅速的恢复并尽可能地接近于平均水平，那么投在这些证券上的资本就象液体一样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而交易所经纪人就必然能支配强大的手段迫使各类资本整个地投入运动并使之互相推动。资本的这种极大的灵活性，以及这种强大的手段，无论在个人的产业、商业还是个人的银行中都不存在，这种灵活性和手段只存在于交易所。^① 推动大量资本以便使证券资本化，从而使之具有一个同利息率相近的股息率，这就是交易所的经济职能。交易所经纪人没有想到这个重要的职能，同样，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职能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富有革命性的后果。

资本的极大的灵活性只是由于交易所证券所采取的形式才产生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国家债券和个人公司的财产、银行等等细分割为二十五、一百或五百法郎或更大的息票和股票。国债的年龄同资产阶级时期一样长，而股份公司则是达到最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形式。

国家公债和股份公司使资本家同得到他的贷款的国家 and 由于他的资本而得到丰硕成果的产业完全脱离了，这时资本家心目中唯一看到的是利息。至于他得到的利息是来自铁路还是来自银行，来自国内产业还是来自国外产业，是来自共和国政府还是来自君主政府，是来自祖国的预算还是来自地球上另一个国家的预算，这一切他都不关心；他希望、要求和追求的只是利息，只要他得到利息，他就感到满足。在角逐利息的过程中，他会毫不犹豫和毫不惋惜地把自己的资本从酿酒业转移到苏伊士运河或冶金工厂，从法

^① 我在这里用“个人的”一词，是为了把个别资本家所有的产业、商业或银行同为资本家集团所有的股份公司区别开来。——拉法格注

国的国债券转移到德国、意大利或俄国的国债券。他在这一切方面漠不关心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于他只要知道他投入货币的公司或国家公债的名字就够了；他不知道公司开办的产业，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向他借钱的那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他甚至都没有兴趣亲自看一看、摸一摸自己的证券或者剪一下自己的息票。他把这些证券的购买和保存以及收取利息委托给银行。他要知道和取得的只是利息。

但是，如果资本家要能做到不放过任何获利的机会（渴求利息胜于渴求上帝的恩惠），他就必须能以电的速度把他的资本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公司，从欧洲转移到美洲、地球的另一端，摆脱一切过去把它束缚在一个产业和一个地方的羁绊。为了使资本家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业绩，交易所向他提供了两个手段：现金交易和延期支付交易。

现金交易

现金交易即用现金进行买卖的过程，基本上同日常买卖商品的情况一样。如果苏伊士运河运输业提供的红利将大于上一个财政年度，那么资本家就会迅速地把他所支配的货币都用来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求过于供，于是按照竞争规律，苏伊士运河股票就会涨价。但是，如果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减少，那么苏伊士运河股票的所有者就会抛出股票，而因为这时会供过于求，所以苏伊士运河股票就会跌价。至于说到交易所买卖业务的特点，它同商人业务的区别，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进行交易的不是商品、劳动产品，而是从银行、铁路或任何另一个企业得到的利润分成，而这些利润分成表现为资本的产品，因为它们同购买它们的资本的量成正比。

交易所的现金交易还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它极其灵活。如果一个资本家要把他的货币投在地产上，投进工厂或者投进一个企业，但不通过交易所，那他就要进行研究，等待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而最终也许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相反，他在交易所却总是可以找到他想购买的东西，因为同一些股票在不断地买进卖出，仅仅价格发生变动。有价证券的价格变动得越经常，它的交易就越活跃，这种运动是完全自动的。但是，现金交易同通常的商品交换相接近了，因为人们必须有资本或信用，才能买进或得到有价证券，而人们又必须拥有有价证券，才能卖出有价证券或者在一定时间内用作支付手段。因为要买进有价证券必须先握有资本，而要能卖出有价证券又必须先握有有价证券，所以现金交易不能推动全部资本量，甚至也不能把已经投入国家债券或大企业如铁路、苏伊士运河等等的资本挪作他用，因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在一定的时刻是相对有限的。

延期支付交易

交易所给资本提供的另一个能推动大量资本并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的手段，是延期支付贸易。这种延期支付贸易最初是在十七世纪随着郁金香球果所引起的狂热投机而出现的。郁金香，这种无香无色但却很茂盛的花，是延期支付贸易的恰当的象征。

延期支付买卖同通常的商品买卖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它同通常的商品买卖正好相反，如果允许我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的话，那么它是交换的否定。延期支付买者根本没有想要收到所买的证券，延期支付卖者也没有打算交出所卖的证券。尽管已经进行了买卖，但是什么也没有进行交换。在通常的商品交换中是等价交换等价。相反，在延期支付买卖中的基本要求是契约双方中

有一方必然得到好处而另一方则遭到损失。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资本家预见到苏伊士运河股票将会涨价，而他想从一百张股票中得到这种涨价带来的好处。因为每一张股票值三千三百五十法郎，所以他必须拥有三十三万五千法郎；这不是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尤其不是在任何时刻都能做到的。于是资本家不是用现金购买这些股票，而是用延期支付譬如说到本月底支付的办法购买这些股票。但是，在本月31日时苏伊士运河股票不是涨价，而是跌价并且只值三千三百四十法郎；因此，每张股票有十法郎的差额或者说一百张股票有一千法郎的差额。买者向卖者支付这笔差额，交易就此结束。相反，如果苏伊士运河股票涨价五法郎，那么卖者就向买者支付五百法郎差额，交易就这样结束。延期支付交易是真正的赌博。

延期支付交易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幻境。一切都建立在虚构上，买者没有货币支付，卖者没有东西可出卖。买者的资本和卖者的出卖物一样，都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但是，这种在纯（思辨）理性领域里发生的形而上学交易支配着整个交易所，甚至支配着铿锵作响的铸币和现实股票之间的现金交易。唯心主义的市场支配着现实的市场。在交易所起支配作用的一般来说是唯心主义；因此交易所经纪人头脑里的迷信比任何地方的迷信都更根深蒂固。一旦有人猜测，某信用机构或某产业公司将提高它们的红利，并接着将提高它们的股息率。延期支付交易投机家就会抢购它们的股票，从而抬高这些股票的价格；而当股票的资本化达到只提供平均股息率的高度时，他们又会重新把这些股票抛出。但是，只要一个政府的政治前景不清，而且其财政可虑，那么延期支付的投机家就会使其债券降价，以便使资本化产生的股息率高于平均股息率，算作是对资本有可能遭受到的任何风险的保险金。延期支付投机家是一些流浪的骑士，他们在资本家的王国内布施着正义和平等。这

些正义和平等的延期交易骑士狂热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不仅签订延期到月底的交易，而且也签订到月中（当月15日）和“到明天”即第二天的交易，为了拯救自己，他们拿出一些最令人吃惊的伪造的消息，如：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占领，其实军队刚刚登陆；拿破仑第三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其实我们在维尔特战役中吃了败仗；黄金大王路特希尔德已经死了等等。

当这些消息传到交易所时，涨价派和压价派有的兴高彩烈，有的惊惶失措。延期交易在一切特种交易所都很兴盛，有谷物交易所、棉花交易所、生丝交易所等等。延期交易买者和卖者利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切脱节，以便改变价格，影响投入这些商品的生产 and 加工的资本所取得的收益，使之接近于平均股息率。

只有在经济领域中无知得象慈善家和道德家那样，才能要求取消延期交易。这些慈善家和道德家为了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可怕的现实，竟想把交易所的作用限制在他们的愚蠢可笑的道德的范围内并剥夺交易所在历史发展中所执行的重要职能。

因此，交易所的职能就在于使一切资本的利润率和利息率趋于平均水平，它是这样完成这些职能的，也就是当利息率偏离这一平均水平时，它就提高或降低股票、有价证券的价格。

马克思说，“这种平均利润率，不外就是这些中等构成（资本构成——拉法格注）部门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利润，在这些部门中利润是同剩余价值一致的。因此，利润率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资本的平均构成占统治地位的中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的。”^①

当某个股份公司的利润高于或低于这一水平时，交易所会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股票的资本化总额使利润回到这一水平。马克思又说，“因此，只要资本的量相等……它们都会从社会总资本所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3页。——编者注

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到相等的份额。”^①但“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②，它只有在资本完全控制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才能达到，而且只有通过这种生产和这种交换毫无共同之处的特殊方法才能达到。实际上，增加股份公司的资本或者使其股票资本化，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增加某股份公司的资本，那就是增加一定量的投入生产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反过来，如果交易所使这个公司的股票资本化，那么它丝毫没有增加投入生产的资本，而只是规定，现在人们必须为股票支付某种价格，以便参与公司的股息分配，也就是公司的利润分配。

1897年1月6日，里昂铁路的股票价值一千六百五十五法郎，而1896年1月6日为一千四百六十法郎，也就是少一百九十五法郎。因为全部股票是八十万，所以全部差额是一亿五千六百万。这并不是说，在一年中有一亿五千六百万的追加额用于装备和工资支出，而是表明，由于一年内剩余价值增加，交易所不得不使八十万股票的价格提高一亿五千六百万，以便使这些股票带来的利息回到平均利息的水平。相反，如果一亿五千六百万用于扩大或改变铁路的装备，交易所就会降低股票的价格，因为它的股票在股票价格不变时提供的利息暂时会低于平均利息。

但是，交易所的资本化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尽管股票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并不会使投入经营的资本有丝毫的增加或减少。为了保持良好的行情，公司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努力使生产费用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通过更好地组织劳动，或者是改善企业设备，或者是节约原料，特别是节约工资。^③因此，交易所的活动最终也会影响资本家在自己之间以股息、利息或利润名义分配的剩余价值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95页。——编者注

^③ 在1882年或1883年宣告结束的营业兴旺时期之后，以及在三年以前刚刚结束的营业萧条时期内，法国铁路公司缩减了数以几千万计的开支。巴黎银行为了弥补

产者。

投入国家公债和在欧美各交易所买卖自己的有价证券的股份公司的资本，总额达到数千亿。除了构成文明国家的最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这些巨额资本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处在农业、商业、工业和银行中的资本，由于它们尚未采取股份资本形式，不能在交易所表现出来。但是这些资本也受到交易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围绕着以交易所证券形式流通的巨额资本所决定的平均利润率波动。例如土地的价格由于工业的进步而大大提高了。^④ 不过，这些农业企业、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不会长时期保持它们的个别的性质。它们不断地转化为股份公司，由此被卷进吞噬着一切的激流，新时代的天才金融家艾米尔·贝列拉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贝列拉在圣西门学派中懂得了资本联合的重要性，他想通过股份公司把地产、工业和银行动员起来，使它们的股票可以彼此相交换，并可以同将成为中央银行或用他的话来说将成为“Omnium”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相交换。

因此，马克思这样说并不是提出假设，也不是编造出虚构的东西，他说，由两大洲的工人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的统治服务的剩余价值应该看作是资本家的掠夺物，就象是从一个被占领的城市掠夺来的东西一样，这些掠夺物被收集在一起，在占领者强盗

它在最近几年内所遭受的利润损失，缩减了它的人员，降低了工资并延长了工作时间。自从德兰士瓦金矿破产之后，金矿经理们只是想到要降低黑人矿工的工资。——法拉格注

④ 永不满足的地主不断地抱怨他们的命运不好。但他们的土地却不断涨价，地租达到了百分之三。法国的情况如下：

	1789	1815	1859	1884
每公顷的平均价格	400法郎	600法郎	1000法郎	1800法郎
每公顷的地租	12法郎	18法郎	30法郎	51法郎

1789年的数字由拉瓦锡提供，1859年的数字由L·德拉维涅提供，而1884年的数字则是根据国库的计算确定的。——拉法格注

们即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分配的份额同他们为了剥削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而投入的资本的量成比例。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15年卷(1896—1897)第1册第612—618、645—652页。

(冯文光译)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 巴黎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99年12月)

公民拉法格：公民们！我尽可能讲得简短一些，所以我要求你们注意听。我们集聚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发出现的。公民米勒兰进入资产阶级内阁本来是可以被看作法国政治运动中的一个插曲的。我们本来可能把它放过去。但是，米勒兰的一些朋友以及议会外的人想把它看作实行新的行动方法的起点，而我们来到这里，公民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一新的行动方法。（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热烈鼓掌）

在我之前的一位发言人兴奋地谈到大批资产者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对此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它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的力量。但是我们有责任探究一下这些人突然改变信仰的动机是什么。这些改变信仰者中间有一些人加入社会党只是因为社会党是一支力量。他们对它的建立未尽过什么力，他们却想利用它。（法国社会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鼓掌）而为了更好地利用这…力量……（很多代表喊：他侮辱我们！）

主席公民：公民们，这里的每个同志都有权让别人听他讲话。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许应该特别受到注意，因为他们代表一种特殊观点。我这样说你们不会责备吧。（欢呼）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公民们，如果某些激烈的措词可能使你们恼火的话，你们要想到，只要你们容许其他人使用这种措词，那么人

们也可以容许你们的人使用这种措词。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鼓掌)

主席台上有人说：但并不是只有盖得派才是社会主义者。(骚动)

主席公民：公民法贝罗发言时，会场是安静的，而在卡尔诺发言时，我曾尽力维持会场秩序，保持安静。现在，我要求你们安静地听拉法格发言。

公民拉法格：我在这里提出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党的问题，工人党的问题，社会党的问题。因此，我不明白，当我只涉及到社会党和党的新老战士都关心的问题时，一些社会主义者为什么想阻止我发言。

公民们，我要说的是，确实，新战士来到了，因为社会党在今天是一支力量。

公民菲洛尔：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懂得……

公民拉法格：可惜！当我们仅仅是百十来个人的时候，你们没有来。(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热烈鼓掌。其他许多代表表示抗议。混乱)

主席公民：拉法格公民，不要进行攻击。

公民拉法格：公民们，我不是攻击，而是确认事实，你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实。这些新战士不是作为同志加入我们的行列，领会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把自己打扮成改革者，主张改变策略，并要求我们接受饶勒斯公民所谓的新的行动方法。他们说，我们所有的老战士是因循守旧、信仰狂热的人，我们对于已经变得更加广泛、更加美好和完整的新社会主义一点也不能了解。(欢呼)

公民奥里：我们从未这么说过。

(独立社会党人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代表喊：“他正是这么讲的。很好！很好！”讽刺性的鼓掌)

公民莫罗：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

主席公民：他没有攻击任何人。（是的！是的！）总之，公民们，我们在讲台上不应该攻击任何人。

公民拉法格：我过去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攻击任何人。如果说我进行批评和好斗的话，那是为了反对人们强加给社会主义的新的行动方法。是的，我是好斗的，并将永远是好斗的。

如果米勒兰入阁只被看作是一次例外的行动，我们本来可以把它放过去，而不去说它。但是有人想把它当作一种新的行动方法的起点，这就不仅是新的加入内阁的行动方法，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的方法。

有人企图把社会主义引向合作社运动，想耗尽社会主义力量和财源以建立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甚至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很少的怀有宗教狂热的人（激进派把我们说成是这样的人）可以派到夏朗东去。二十多年来，我们不得不同坚决的激进派所维护的合作社主义者进行斗争，激进派认为合作社主义者代表真正的工人运动。

我们曾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我们促使它遭到失败。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使新生的工人党脱离了合作社主义道路。而在今天，有人希望使工人党重新回到这条同内阁主义道路一样恶劣的道路上去。有人想以改良主义为借口使工人党走上这条内阁主义的道路。（法国工人党代表鼓掌）

饶勒斯公民今天上午读了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夺取公共权力》里的一些话，听听一个社会主义者说的这些话是很有益的。确实，我们这些老战士非常吃惊地看到大企业主的组织者瓦尔维克-卢梭先生召唤一个社会主义者来保卫共和国。这是很奇怪的，但这却是 1848 年发生的事情的重现。当时赖德律-洛兰和古德肖

之流曾召唤工人阿尔伯和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参加临时政府，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历史做了回答：为了麻痹法国社会主义。（再一次鼓掌）这是为六月的日子做准备。（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热烈鼓掌）共和派屠杀了参加六月起义的工人，他们要为12月2日建立的帝国负责，也正是他们杀害了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真正捍卫者。（再一次鼓掌）

临时政府同瓦尔德克-卢梭一样曾向社会主义作了让步。

一些代表：例如波尔多条约。

公民拉法格：有人以为，由于允许一名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就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当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发表一些关于劳动组织的演说时，政府却在屠杀工人，把卡芬雅克之流和拉摩里西尔之流和镇压六月起义的刽子手从非洲召回。（热烈鼓掌）我不认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完全一样。（啊！啊！一些代表发出嘲讽的喊声）今天的资产阶级是软弱无力的，它再也没有1848年时那样的力量。最好的证明就是保皇派装出要进行政变的样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始实行），而并没有一个共和政府能把他们抓起来送进监狱。（工人党的代表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一些代表鼓掌并发出笑声）

另一方面，社会党不仅在大城市而且在农村也已有大量党员，这样，在今天，就不能对它进行屠杀，而必须重视它并求助于它来拯救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再也不能捍卫这个共和国，以反对没落的保皇派。（重新鼓掌）

好吧，公民们，我向你们承认，尽管对六月的可怕回忆仍然保留着，我还是要把米勒兰进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当作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证明加以欢迎。今天全国都知道，有人把这些社会主义者排斥在共和党之外，对他们进行攻击，把他们关进监狱，而资产阶级共和派正是必须求助于这些贱民来保卫他们的共和国。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公民奥里: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 你现在论证的是我们的观点。

公民拉法格: 他们召唤米勒兰入阁, 同时号召人民走上街头保卫共和国,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这些人在不久之前曾受到什么样的奖赏。你们看到了, 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宣布了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对你们说一说这一入阁行为所带来的危险。刚才有一位工人在这个讲台上曾询问我们这个有两名社会主义者(他们好象把比埃尔·博丹先生也算作社会主义者了)参加的内阁做了些什么。(独立社会党人代表大声喊叫并表示抗议)

一些代表喊: 我们没有把他们混为一谈!

公民拉法格: 那么! 在《灯笼报》……(讲话被打断)

公民安得列·勒费夫尔: 茹尔·盖得曾为《灯笼报》撰稿。

公民拉法格: 在今天上午的《灯笼报》上, 勒费夫尔公民, 您将会看到比埃尔·博丹先生的名字同米勒兰的名字在一起。

公民安得列·勒费夫尔: 我们在报上看到了茹尔·盖得的名字同我们在一起。

公民拉法格: 除了米勒兰之外, 《灯笼报》把博丹先生也算为社会主义者。

公民安得列·勒费夫尔: 不对! 不对!

公民拉法格: 是的, 危险是巨大的。象米勒兰这样的社会党人部长不仅要被迫为资产阶级政府所犯的一切错误和罪行承担责任, 而且他通过加入内阁表明他赞许这些错误和罪行。(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喊道: 很好! 很好!) 米勒兰不正是以他进入内阁而表示赞同继续向罗马教皇派遣大使吗?(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鼓掌并发出笑声)

公民若安迪: 正是你们党内有人同天主教教士勒米尔一起提

出提案。

公民拉法格：我不是指责，而是确认事实。（很多代表打断他讲话）

你们看看，过去有人指责我们工人党某些人不关心宗教问题。诺尔省的一些独立社会党人曾说……

公民古斯达夫·鲁瓦奈：在竞选大会上。（独立社会党人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热烈鼓掌）

公民拉法格：他们曾说：“你们喊‘打倒资本！’喊得太多了，而喊‘打倒上帝！’则喊得不够。”很好，正是这些指责我们的独立社会党人今天支持米勒兰，支持教士。

很多代表喊道：正是这些人当时曾支持盖得。

公民拉法格：而这就是所谓的新方法。（插话，长时间的喧嚷）

一位代表：虽然共和国只能由你们来捍卫，但是，正当共和国可能遭到蹂躏的时候，米勒兰却支持了它。（笑声和掌声）

公民拉法格：请看一看，公民们，这个所谓新的行动方法是激进党的老方法。拥护激进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保尔·贝尔特之流曾嘲笑上帝，如同嘲笑魔鬼一样，他们在自己的选民面前要求取消宗教预算，而在议会中为了保留对他们的政策非常有利的教士却投票支持宗教预算。

公民拉法格：人们要我们参加的这个反对上帝和神父的斗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社会党背离真正的斗争，背离反对资本的斗争。你们的新的行动方法会使社会党离开真正的道路。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险。部长的职位——正如在我之前发言的一位公民所说的——只是资本家阶级政权的职位，它在资本家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的监督下行使职能。右派和左派议员可能会互相争夺席位，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但他们为了欺骗和反对工人阶级，便会勾结在一起。两个社会主义者成为部长以后，这种情况

也丝毫没有改变。

很多代表喊道：只有一个。

公民拉法格：在法国，曾举行过一些罢工，那时军队和勒贝尔步枪不是被运去对付罢工工人吗？（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热烈鼓掌）昨天，左尔格公民刚从这种罢工的地方来，她在那里看到了工人遭到宪兵和士兵的虐待，她在这个讲台上要求你们提出抗议，谴责批准这样做的政府的可耻行径。而这时候你们看到了什么呢？饶勒斯公民站了起来（这是他在这次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发言），阻止对此进行表决。（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某些代表鼓掌，独立社会党人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许多代表愤怒抗议。）

公民奥里：你讲得很不好，这是错误的，绝对错误的。

一些代表喊道：是布律内利埃尔而不是饶勒斯。

公民拉法格：这是为了替米勒兰和瓦尔德克-卢梭内阁进行辩护。（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代表热烈鼓掌，其他代表大声喊叫）

（独立社会党人、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有节奏地喊：“到波尔多去！到波尔多去！”法国工人党的代表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代表齐声回答：“加利费！加利费！”）

主席公民：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每当人们欢呼社会主义者实行联合的时候，你们就鼓掌，而你们的所作所为却会导致分裂。（鼓掌）拉法格公民将结束他的发言。（喊声）

（当大厅内两方面的人造成混乱时，在讲台上，大会领导机构成员饶勒斯公民和拉法格公民之间发生争论。）

公民拉法格：公民们，我要说，我对饶勒斯公民是无限钦佩的，因为我认为，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象他那样来自资产阶级并且处于较高地位的人是……

很多代表喊道：而你呢？

公民拉法格：公民们，饶勒斯公民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都有较高的地位，可以说，他正在通向政权的道路上迈进，只要他愿意，凭他的才干就能当上部长。我要说，这个人已完全站到社会党一边来，把他卓越的演说才能和巨大的热情献给社会党了，正因为如此，我对他非常钦佩。我不明白在这个大厅里为什么会有人表示抗议。（鼓掌和欢呼声）

公民们，我对饶勒斯的这种钦佩心情在今天迫使我更强烈地谴责米勒兰入阁，因为饶勒斯，这个我们所钦佩的革命者，这个给予我们鼓舞的宣传家，现在由于米勒兰入阁所造成的局面而受到指责并使自己的地位下降。（独立社会党人的代表表示抗议，工人党代表鼓掌）

是的，公民们，昨天看到饶勒斯反对左尔格公民的提案，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如果你们让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你们就会同样感到失望，产生同样的痛苦，你们所相信的会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由于对他们朋友的友谊和忠诚甚至会背弃他们的过去。（法国工人党热烈鼓掌，独立社会党人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激烈抗议并喊道：饶勒斯万岁！）

拉法格公民回到座位上，他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祝贺。

译自《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9年12月3—8日）》1900年巴黎法文版第111—119页。

（陈双范译 李兴耕校）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和康德的唯心主义*

(1900年2月25日)

我们的俄国同志拉波波特在《社会主义评论》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题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指责一位德国的知识分子——沃尔克曼博士用康德的唯心主义来感染和修改马克思主义。

拉波波特是坚定的康德派。他说：“康德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需进行修改，而应用“比黑格尔更神圣、更广泛、更科学的哲学”来取代。拉波波特仅仅是哲学家，所以只攻击马克思的哲学。而符尼埃尔既是造诣很深的哲学家又是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因而他在一篇称赞伯恩施坦著作的文章中，不但把马克思当作历史学家、哲学家，而且当作经济学家进行批判。可怜的马克思！

在十九世纪初期，我们的资产阶级结束了革命性的破坏事业之后，便开始否弃了伏尔泰主义的和主张自由思想的哲学。被沙

*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引证了拉法格这篇文章中的好儿段话，以说明“拉法格怎样理解恩格斯，以及他怎样从左边批判康德。他不是批判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不同的那些方面，而是批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那些方面，不是批判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列宁选集》第2卷第205—206页）。——编者注

多勃利昂涂上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天主教又行时了；百科全书派的宣传家们被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为了彻底击溃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塞巴斯蒂安·迈尔西埃输入了康德的唯心主义。

在历史上将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纪的十九世纪末期，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这个反动的运动开始于德国——这样说并不是想冒犯我们那些想把一切荣誉都归于自己学派的创立者马隆的整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马隆本人属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以及杜林的其他门徒那一学派，那个学派是在苏黎世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应当预料到：在饶勒斯、符尼埃尔以及我们的知识分子用熟了康德的术语以后，也会把康德呈献给我们的。拉波波特似乎是了解康德的，他理所当然要向我们讲述使反动派感兴趣的康德哲学中的那个资产阶级部分。

拉波波特说，康德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这是对的；但黑格尔也同样如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充满战斗激情的青年时代曾是黑格尔左派。在这以后，他们批判了和扬弃了黑格尔，正如恩格斯所承认的，他们归附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然后加以借鉴。辩证法一旦掌握在他们手里，便促使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得出了和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认识。

自然的生存繁衍和思维的产生发展都不是自发的，人类智慧的每一个新创造都与过去相联系，都是传统的继续。黑格尔继承了由卡巴拉^①所保存和改造的亚历山大学派思想，这种思想早先也曾为柏拉图提出过。黑格尔认为，观念先于一切而存在，观念通过与自身的对立和通过同对立面的组合并无穷无尽地对立和改组下去，从而创造了世界，而世界则无非是观念的实现。如果抛开黑

^① 卡巴拉(la kabbale)——希伯来神秘哲学。——编者注

格尔的种种变幻莫测的手法,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主义的本质是野蛮人的自然神论:至高无上的精神创造了世界,基督教徒信奉的上帝是精神的替身。如同黑格尔的观念一样,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通过创造世界,宣告了他的智慧、力量、公正……。包括康德在内的自然神论者的二元论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上帝的生命寓于他的创造物即世界之中。

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并不如此。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尽管观念和热力、电力、重力或其他力相比,都同样具有物质性。因此,观念和它所反映的客体不可能有同一性,正如热力和产生热力的化合物没有同一性一样。

如同电池提供电力一样,大脑是产生思想的有机物。但是,大脑只是在通过感官与客观外界发生接触时才能产生思想,因此,二元论始终是存在着。

只有这种唯物主义的二元论才能解决由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先辈——古希腊的诡辩家们所提出的认识问题。

为了使那些需要了解资产阶级哲学的同志们开开心。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引起唯灵论者如此浓厚兴趣的有名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吃着香肠、每天收入一百个苏的工人很明白:老板在掠夺他,他吃的是猪肉;老板是强盗,香肠好吃而且对身体有营养。资产阶级的诡辩家(不管他叫皮浪也好,叫休谟或者康德也好,反正都一样)说道:完全不是这样,工人的看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就是**主观**的看法;他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认为,老板是他的恩人,香肠是由剁碎的肉皮作成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自在之物。自从私有制打乱了人类的生存条件,限制了人类智慧的发展以来,这类愚蠢的

问题伤透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脑筋。

问题提得不对，它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大脑怎样把感觉变为思想，正如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为什么氧和碳化合而放出热量一样。这是我们应该加以证明和记录下来事实，不需要再去想为什么。同样，即使最坚决的康德主义者也不会发问，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我记得曾听克劳德·贝尔纳说：迪亚弗洛斯^①断言鸦片能麻醉人是因为它具有麻醉作用，莫里哀却为此而嘲笑迪亚弗洛斯，那是不对的，因为科学也不能提供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为了认识客体，人首先必须检验一下他的感觉是不是欺骗他。谁都知道，感觉是靠不住的。例如，从远处看，圆塔似乎是方的，大道两旁的树木似乎紧挨在一起。因此，必须运用其他的感觉来检查一项感觉是否正确，以便纠正感觉的错误，然后再筛选印象在头脑中留下的观念。

哲学家们由于对什么是认识的问题困惑不解，便停留在这最初的认识，化学家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深入到物体内部，分析了物体，把物体分解为元素，然后作了相反的工作，即进行综合，用元素再组成物体。从人能够用这些元素制造出东西来供自己使用的那个时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认识了自在之物。如果基督教徒的上帝真的存在而且真的创造了世界，他所作的也不会多于这些。

由于我把正义、自由、国家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其他偶像称作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蠢话，拉波波特这位真正的康德信徒感到十分气愤。可是，一个阶级要挣脱束缚它的枷锁，只能由少数觉悟分子和革命者先从统治阶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① 迪亚弗洛斯是莫里哀的喜剧《心病者》中的角色。——编者注

百科全书派在破除封建的和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造就了一代思想家。社会主义者不应该为特拉里厄、戴鲁累德、加利费、科佩、赖纳克先生及其同伙的娇妻捧场，而应该把这些贵夫人从她们的小客厅里拉出来，脱去她们身上的衣服，叫她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赤身裸体，让大家看到她们的干瘪和丑陋。

译自 1900 年 2 月 25 日《社会主义者报》

（陈双苑译 顾良校）

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 社会和政治意义

(1903年)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卡尔·马克思

前 言

美国的托拉斯正在入侵欧洲，而在它们出现于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之前，其名声早已传播到大西洋彼岸了。首先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所拥有的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资本。资本以前所未见的惊人规模大量集中，单是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

但引起我们注意的还不仅是资本额的巨大。除此以外，托拉斯一面把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可敬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无情地驳倒了经济学家先生们的坚定论断，同时还在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这种科学的工业组织提高雇佣劳动的生产率，同时又加速财富的集中，震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出不断扩大的、因其物质利益受到触犯而心怀不满的资产者阶层，孕育着经济危机和革命事变。

美国的托拉斯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

在这本概略的研究性著作中，我想叙述一下托拉斯的组织，并把它们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最明显的影响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1903年4月

第一章 1903年1月以前的托拉斯

纽约的股份公司年鉴——《穆迪公司有偿证券手册》——的出版者约翰·穆迪，在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意味深长地取名为《工业的摩根化》）里列出了一张工业联合体或托拉斯的名单。它们都是从1890年1月1日到1902年9月1日建立起来的，每家拥有资本均不少于一千万美元，即约五千一百五十万法郎。在这个名单中，列举的托拉斯有：

两家铜业托拉斯——一家拥有资本八亿法郎，另一家拥有资本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郎；一家窗用玻璃托拉斯——八千七百万法郎；一家毛织品托拉斯——二亿五千万法郎；一家书写纸托拉斯——二亿法郎；一家炼乳托拉斯——一亿两千五百万法郎；一家发酵粉托拉斯——一亿法郎；一家烟草托拉斯——十三亿五千万法郎；一家鼻烟托拉斯——一亿零五百万法郎；一家制糖托拉斯——一亿零三百万法郎；一家钢制车辆弹簧托拉斯——一亿法

郎；一家橡胶制品托拉斯——一亿三千五百万法郎；一家果品托拉斯——八千万法郎；一家谷物制品托拉斯——四亿法郎；一家皮革托拉斯——一亿七千万法郎；一家化学制品托拉斯——八千五百万法郎；一家钢铁托拉斯——七十亿法郎，等等。总之，在工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中都建立了托拉斯。

约翰·穆迪在这本小册子里所列举的八十二家托拉斯（名单见本书附录）共拥有资本二百二十二亿五千万法郎。但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其中只包括在最近三年内建立起来的、并且资本都在五千万法郎以上的托拉斯。

如果不考虑托拉斯资本总额的多少和建立时间的早晚，那末，按照约翰·穆迪的说法，托拉斯总数大约有八百家，共拥有资本约四百六十亿法郎。假如把铁路公司也加进去，那末这些托拉斯的资本就会突破七百六十亿法郎。

但约翰·穆迪引用的数字还是低于实际的。美国缅因州的议员利特尔菲尔德利用了最近发表的给国会的报告中的官方统计材料，提出一份1903年1月1日以前的托拉斯名单，这张名单被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完整资料。

截至1903年1月1日为止已有七百九十三家托拉斯，其中包括四百五十三家“工业托拉斯”和三百四十家地方的和自然力的垄断组织，后者包括自来水公司、瓦斯和电灯公司、城市铁路公司、电报电话公司。

工业托拉斯的资本折合.....	4 753 900万法郎
地方垄断组织和自然力的垄断组织的资本.....	2 224 200万法郎
	6 978 100万法郎

假设在这个近七百亿的总额之上再加进全部蒸气铁路公司的资本（为数达三百亿），则总额将超过一千亿以上，这些资本投放在各种公司的股票和证券里并构成了垄断体系的力量。

为了恰当地估计这一总额的意義，必須注意到美国全国的总财富也不过是四千八百五十亿。

在本书附录中，我们转载了利特尔菲尔德编制的拥有五千万美元或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郎以上资本的五十二家托拉斯的名单。

集中起来的资本为数如此巨大，的确令人吃惊。而独立地、不受监督地和不负责任地支配这一千亿的金融资本家人数，竟然很少，这也是特别令人惊讶的。

美国五个非常著名的金融资本家集团——摩根集团、古耳德-洛克菲勒集团、哈里曼-库恩-罗比集团、万德比尔特集团和宾夕法尼亚集团——控制着美国几家大铁路公司的业务。

组成这五个集团的金融资本家们，在各种公司的名义掩盖之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他们从铁路、银行、煤、矿场、铁、铜、银、金，以及钢、粮食、肉类等等的经营中攫取收益。所有美国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都向他们纳贡。

根据约翰·穆迪的统计和论述，皮尔庞特·摩根在铁路公司中的影响最大，这些铁路公司掌握了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公里的铁路网，拥有资本一百五十五亿。摩根还“直接控制着”拥有资本约达九十亿的一些工业托拉斯（详见附录）。

这一小撮资本家不仅剥削美国，而且把手伸到全世界。北美石油托拉斯和掌握在路特希尔德手中的俄国辛迪加分别在东西两半球进行剥削。这两个托拉斯根据共同协议规定煤油的价格，遇有需要还彼此互相代替。例如，有一次，美国托拉斯由于生产不足而不能完成对亚洲市场的供应，它就把这一市场让给俄国石油辛迪加。

铜业托拉斯在几年以前就把这种金属的价格大大提高了，后来铜价虽然有些降低，但仍保持在水平上。这种人为的提价使

托拉斯有可能向所有在生产中使用铜的企业主课以重税。

《时报》发表了本年初在鞋商中进行的调查。鞋商们说，由于美国的皮革托拉斯大量收购英法两国皮革的结果，鞋价很快就得提高。德国皮革商人不得不在1月份一个月内两次提高这种商品的价格。因为美国人大量收购皮革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德国人要么出高价买进皮革，要么关闭自己的工厂。

只是在几个月以前才诞生的海洋托拉斯，已经给法国的海运业务规章造成了混乱。以后它还将对欧美两洲互相交流的各种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产品征收一种道路税。资本家借以掠夺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攫取交通道路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占有了这种所有权，洛克菲勒才有可能组织起他那规模巨大的石油托拉斯。

美国的托拉斯正在入侵欧洲。烟草托拉斯确立了在美国的全能统治之后，又使自己的活动越过大西洋，进入了英国。英国人为了与之抗衡，组织了反托拉斯。但是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两个托拉斯终于达成了协议，在斗争中吃苦头的是消费者。据说，美国的玻璃托拉斯已经把比利时的许多玻璃工厂买到手了，一家有洛克菲勒投资的美国公司正在向巴黎的市政府提出愿意为该市装设煤气。设在芝加哥并同海洋托拉斯有联系的造船公司已经把波尔多的远洋轮造船厂买到手。曾经有一个时期，欧洲为美国修建铁路提供过数目可观的资本，掌握铁路的美国金融资本家靠投机倒把和玩弄交易所的把戏而控制了这些资本，现在又把这些资本输入欧洲用以剥削欧洲的工业。

如果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据这一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还需要什么新的鲜明事实加以证明的话，那么托拉斯正好提供了这种证明。托拉斯不仅统治着经济领域，而且使美国人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都屈从于它们，托拉斯在创造美国的历史。

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也兴建教堂和创办大学。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款项赠给这些教堂和大学，使得法国那些办大学的人羡慕不已。因此牧师和教授都千方百计地设法迎合这些富豪的愿望，而这些富豪必要时也常常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义务。几年前，旧金山某大学的捐款人就曾迫使一位敢于批评资本的过分特权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辞职。在美国，教会是得不到国家资助的，牧师们的生活全靠教徒们的慷慨施舍来维持。股份公司盖教堂，就象兴办工业企业一样。“感谢先生将捐款恩赐给我们”——这就是每个星期日在教堂里反复吟诵的祷文。所有虔诚的牧师都在资本家这个真正的上帝面前顶礼膜拜，因为这个上帝赐给他们生活必需的食物、住宅和其他财物。纽约的天主教主教不久以前把自己教区中一个牧师撤了职，因为他宣传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在波士顿，一个新教的主教公开在讲坛上说，假如耶稣现在降临人世，那么他也会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因为再没有比这更可敬的职业了。虽然如此，洛克菲勒还是认为牧师们的活动不够有效。他准备筹建发行教科书的托拉斯，因为他想把《旧约》和《新约》上有关对富人愤怒抗议的内容从《圣经》上删除干净。牧师和知识分子的无耻谄媚行径，使剥削工人阶级的人真的以为，他们——象旧秩序的君主一样——是根据神的法律占有矿场、工厂和银行的。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贝尔的矿场主在回答人们要他认真对待其矿场罢工工人的要求时就是这样傲慢地宣布的。

那些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制造社会舆论的报刊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电报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假如某家报纸想要摆脱他们

的羁绊，就会失掉电讯稿。这等于被宣判死刑，因为美国的日报，要是没有这些来自电讯稿的最新消息，便不能生存。只有社会主义的报纸不依赖资本家，因为它们不是商业企业，而只是宣传和斗争的机关报。

控制着托拉斯的金融资本家，拨出成百万的巨款用在共和党 and 民主党两党互相竞争的选举上，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事实。银矿的矿主们贿赂布赖恩是为了促使他的竞选运动有利于银币的铸造^①。这对谁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还有那些投票赞成铸造银币的所谓薛尔曼法^②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也都是被银矿主收买的。

托拉斯是不受欢迎的。由于它们损害广大资产者阶层的利益，反对托拉斯的演说家事先就可以指望博得掌声，假如演说家本人又是候选人的话，他还可以指望捞到选票。在选举中，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不惜漫天许愿说要遏制托拉斯并消除它们的危害性。被选举战的热潮弄得昏头昏脑的麦金利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1897年3月4日)中宣称：“今天重新掌权的这个政党，在过去一向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一切资本主义的联合，这些联合或者组织为托拉斯，或者竭力用其它方法随心所欲地左右我国的工业条件。一切立法倡议，只要其宗旨是阻止以征收消费品税或规定过高的消费品运费率为手段来压榨人民的，这个政党都曾给予支持。”尽管麦金利作了这样的声明，他还是尽一切努力

①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43—1901)——1896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时白银铸币问题在总统竞选中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布赖恩在政纲中要求无限制地、按与金币16:1的比例自由铸造银币。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反对。结果布赖恩失败，麦金利当选为总统。——编者注

② 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薛尔曼白银购买法”(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该法命令美国财政部每月按市场价格购买150万盎司的白银铸造银币。法案通过后，美国及全世界的银价迅速猛涨。——编者注

来实行有利于托拉斯的保护关税；同时，他甘愿为制糖托拉斯效劳，加速吞并了夏威夷群岛，从而使该地输出的砂糖不再纳税。当仲裁审查的提案刚刚拟就的时候，他又突然向西班牙宣战，此举纯粹是为了强大的金融资本家集团的利益。罗斯福也想过，一旦控制了古巴，他就能指挥反对托拉斯的运动；当他登上总统宝座时，也曾象麦金利一样，宣布说要把托拉斯消灭、击溃。但是，正如英国人所说，勇敢的人不得不“忍辱含垢”（to eat humble pie），也就是说，要在现实面前俯首贴耳。

贿赂行为在政治界和司法界是根深蒂固的。托拉斯的保护人断言，购买是竞选和普选的后果之一。1899年，在托拉斯丑行调查委员会面前，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证词是这样说的：“铁路公司和工业公司的领导人会告诉你，由于司法和立法机关贪污受贿（这是蛊惑宣传的结果），凡是有益于居民的措施，是不能靠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的；这就迫使托拉斯不得不采用非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①

政客们贪污受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而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托拉斯巨头对政治变得这样漠不关心，以致同一伙金融资本家既可出钱支持民主党，又可出钱支持共和党。摩根财团和万德比尔特财团都不必屈尊争任各种政治角色，而宁愿象耍傀儡戏那样把线牵在自己手里，指挥着参议员和众议员、部长和总统。他们在那个有形的、但却是纸上的政府之上组织起一个无形的、却是真实的政府。宾夕法尼亚矿场的矿主，起初曾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矿工罢工时期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调解建议，但是后来摩根出来一说话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最好不过地证明：的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权存在。

^① 约翰·多斯·帕索斯《商业托拉斯。在华盛顿工业委员会面前所作的一次答辩》。——拉法格注

管理着集中在铁路和托拉斯手里的国家财富的那个资本主义总司令部还操纵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它准备搞泛美联邦，同时提出包含侵略野心的门罗主义，并且强使美国政府出来充当南美各民族的保护人，其目的是占领南美的市场，使欧洲的工业受到损害。它促使政府摒弃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把政府推上帝国主义和掠夺殖民地与市场的道路。

美国民主政治的首脑在号召“流血和大炮轰鸣”的演说中要求夺取市场。波尔特内·比乔洛在**关于当前争夺东方市场的斗争**这篇报告里说：“我们需要世界市场，我们需要整个世界，因为我们比谁都聪明能干。我们消灭了红种印第安人，以此提供了**最适宜者继续生存**的光辉范例。我们还通过西美战争把这一思想深深地印入欧洲各民族的头脑中。我们需要全世界的市场；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切战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市场而进行的斗争。在1776年和1812年，我们曾为所谓**自由贸易**大声疾呼，但在得手之后，我们便筑起**保护关税**的高垒。圣路易的博览会是争夺市场的纪念碑。研究1861年的战争使人确信，这是一场争取统一全国市场的斗争。我们必须迫使南方人拿出百分之二十、三十至四十来，以使北方的工业获得自立。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争夺新市场的斗争。”^①这篇演说表达了工业巨头所关心的是什么，于是各式各样的刊物都纷纷加以转载。资本主义总司令部为了销售其商品以谋取利润，准备象阿梯拉^②那样用火与剑毁灭世界。

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

① 比乔洛以《政治领域的新问题》为题在政治教育联盟宣读的学术论文。——拉法格注

② 阿梯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433—453)。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匈奴帝国拥有从里海至莱茵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东西罗马帝国均被迫纳贡。阿梯拉以残暴凶狠著称，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编者注

时期，欧洲各民族大动干戈互相争夺殖民地，是为了掠取土著居民的珍贵木材、五金、香料和毛皮；而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达到其发展的高峰之后，他们竭力用诡计和暴力夺取殖民地和市场，则是为了倾销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窃取来的商品。

资产阶级竟然宣称，它的统治标志着和平与协调，它的商业与工业把许多民族结成兄弟联盟。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资产阶级对他的学说思想深邃颂扬备至——还在半个世纪以前就预言战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然而事实上，在资本家阶级的社会统治之下，自然力之应用于生产、机器的改进和在科学基础上组织生产，给人们带来的并不是和平与幸福，而是对内和对外的战争。

据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看法，阶级斗争曾经动摇了古老的欧洲的社会制度，却从来没有用纷争困扰过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连阶级斗争这个术语在政治语言中也并不存在；因为每个“愿意辛勤劳动的”（即西部移民的诗歌里所说的Willing to toil）公民都能获得财产，都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但是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也使美国产生阶级斗争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在那里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和如此尖锐的程度，以致出现了内战的前景，也许会同时爆发种族斗争。比乔洛也说：“内战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我相信会打内战，正如相信个别人之间会发生拳斗和决斗一样。”这个托拉斯大亨在其预言中并不反对物色到一个自己的拿破仑。今年^①2月，担任华尔街某托拉斯法律顾问的查理·弗·马西森在华盛顿一次有最高法院五位法官和许多名声显赫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出席的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谈到了罢工，谈到了劳动自由的破坏，谈到了那些借助于左轮手枪

^① 指1903年。——编者注

和甘油炸药用暴力威胁别人接受自己条件的工人。说到这里，他讲了一段历史：当巴黎处于恐怖统治时，一天出现了一个人，名叫波拿巴，他把占领国民议会的一群恐怖分子包围起来并向他们开枪。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代替恐怖而奠定了秩序。在我们这里也应当这样做”。这并不是空话：各州都已颁布反对工人的法律，而那些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法官也象政治家一样，凶残而严厉地执行这些法律了。

1902年国会重新实施了1790年的国民警卫队法。1790年组织国民警卫队是对付印第安人的。国会还投票通过了为此所需的一笔拨款，并责令一切能拿枪的人在发生“内部叛乱”（这个词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时都去当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以前是由各州管理的，现在则直属中央政府。国防部长把那些从地方军械库中领取的带钢壳的子弹收回，另外发给有效射程在二百米以内的小子弹，数目加倍。国防部长命令那些辖有大城市的区的军事首长绘制军事地图，以便在进行巷战时可以实行机动。

国内战争将把人类从国际战争中拯救出来，后者是由于资本和劳动工具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引起的。

社会主义工人在纽约发行的《每日人民报》指出，“象梯尔曼、比乔洛和魏兹这样一些头面人物所发表的这些嗜血的演说具有征兆性意义，预示着未来的国家充满着深刻的动荡。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以及国际战争在资本主义面前提出一项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谋求解决这一任务，就如同想要消灭资本家阶级一样，是办不到的。只有社会革命才能解决这一任务”。

第二章 商品生产的工业组织

(一) 中世纪的行会组织

商品生产(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是为了出卖和获得利润)在发展成为美国佬所说的托拉斯体系(trust-system)之前,在工业组织上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托拉斯本身(除了石油托拉斯以外)虽然只有十五年的历史,但已发生了一定的演变:由几个互相竞争的工厂主为了行动一致和消除竞争而签订秘密或公开协议的初期形式,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生产组织,在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实行垄断,以适应资本主义封建制的利益。

托拉斯体系取消竞争,毁灭资本家的个人自由,把生产集中起来,并把我們重新带回到某种行会性质的生产组织。新近组成的托拉斯称为公司(Corporation)。虽然这种体系使科学家疑惑不解,并使一些聪慧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大伤脑筋,但是它毕竟是商品生产的合法产儿,是商品生产进化发展的结果。为了着重指出工业现代组织形态的显著特点,有必要对中世纪的工业组织形态略加考察。

中世纪的行会是一种工业组织,它旨在对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以消灭竞争。这种体制导致所谓民主的生产垄断组织的建立,而该种组织则是有利于参加行会的手工业匠人的。

为了使某个手工行业能养活自己的全部工匠,行会对有权在城市里从事这门手工业和开设店铺的手工业者的数目加以限制。为了保证真正民主的平等,行会还限制雇用帮工和学徒的数目,规定他们应得的最高工资额,规定接受加工的原料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他们能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同时禁止使用新工具并不准对旧的

劳动工具实行任何改进。一句话，一切规定都经过周详的考虑，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工匠获得压倒自己同行的优势。

有权进入任何作坊的工头有责任监督这许多规章的切实执行，因为这些规章保障每个工匠享有与别人同样的生产和出售产品的条件。

平等和民主精神曾经对中世纪的手艺工人起过鼓舞作用，这种精神在1861年战争以前的美国法令中还能找到其具体表现。这个时期的法令限制工业和商业公司的资本，为的是防止它们过分强大，多斯·帕索斯在自己的证词中指出这一事实，接着补充说：“但是这种带有限制性的法律，在1861年以后就从所有真正‘商业州’的法律中删掉了”。

行会制度在中世纪的一定时期内曾保持完全不受侵犯的状态，如今却丧失了自己那种严格的完整性了，特别是在发现美洲之后，在那些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而业已成为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城市里，就更是这样。行会对生产的种种规定虽已被破坏得残缺不全，却仍被继续保存下来，只是当初中世纪手工业者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宗旨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规定对于工业上的一切进步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在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前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就不断要求取消这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直至爆发这次大革命才被最终废除。

宣布工商业享有完全的自由，那些控制工人人数、劳动工具数量、原料和成品的手工业行会消失了。每个企业主这才有可能不受他人影响，完全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作法去办事，想在哪里开设作坊就在那里开设。制造产品的数量和方法都由自己随意决定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前工业家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团结互助，如今这种和衷共济的精神已为竞争所代替，彼此互相敌视互相拆台。人人**为己**这句格言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原则。这句格言本是基督

教的基本原理，因为每个基督教徒只能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并不关心其父母和亲友的命运。^①

有组织的工业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开始时，行会组织阻止竞争的出现，到后来，行会组织就同竞争进行斗争了，按照经济学家加尔涅的说法，竞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和先知”。

竞争在工商界引起无休止的残酷斗争。竞争被宣布为最高统治者。人们赋予它以神秘的性能，把工商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商品价格的降低和质量提高、改善工商业和金融事业的活动方式以及为人类幸福所从事的一切创造性工作，统统归功于它。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竞争一方面是所有生产事业、商业和资本主义道德的必要条件，同时它又必将在发展中毁灭自己。它在促进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工业组织的托拉斯化，而托拉斯的消灭竞争，有如以前行会组织消灭竞争一样，是同样有效的。

(二) 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组织

对于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来说，工商业的自由和竞争是生产

^① 一个半开化的上流战士，名叫沃尔弗。有一次他问那位想给他施洗礼的神父西里耳说，他能不能在天堂里遇到自己的战友和同部落的人。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回答说：“不，他们将在地狱里受火焚之刑。”——“那么，我宁愿去同他们一起受难，也不愿一个人进天堂。”这句话使得那个无法理解这种共产主义兄弟情谊的基督教神父不知所措。

诚实而思想敏锐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述，虽然受到伏尔泰的怀疑，但是对研究原始风俗习惯的历史学家来说，仍是十分宝贵的文献。希罗多德说：“带着祭品去献给神的波斯人不允许只为自己一个人祈求什么，祈祷必须为全体波斯人的福利。”在所有古代多神教的城市里流行着这样一条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因为个人的幸福只能建立在全公社的幸福的基础上。其实，这个与基督教精神相对立的原则只不过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从公元前七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它的影响便迅速消失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在它被柏拉图哲学灵性化和被基督教神圣化之前便已进入人们的生活。——拉法格注

和交换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托拉斯在建立垄断的时候破坏了这种自由和竞争，美国的资产阶级才谋求用法律来遏制和阻挠托拉斯的产生与发展。

但是资产阶级早就不得不制订法律来保护这两个永恒的神圣原则，使之纯洁无瑕。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这些法律才能维持这些原则的力量。

竞争粗暴地愚弄了这种天真的轻信，因为它一出现就意味着那些对它盲目崇拜的资产者自身的灭亡。竞争的存在本身要求不断减少竞争者的数目、缩小争夺的场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主掌握着优良的机器，他们机敏灵活，比别人更善于剥削雇佣劳动，他们最没有良心，贻制产品和欺骗顾客的本领最高，——市场一旦被他们独占，他们的竞争者只有破产，变成无产者。

在那些一百年前曾有过成千纺织工场、细木工作坊、制鞋工场和其他各种作坊的地方，如今只有十来个工厂和制造厂，这些工厂把原先分散在该地区各处、属于成千上万小生产者所有的劳动工具，集中在其宽敞的厂房里。

因此，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过程中，以及由于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工业的集中。一些大工厂利用其拥有的财产和销售地区使成千的竞争对手破产之后，竞争继续在大工厂之间发挥作用。但是在象冶金、炼糖、采煤等这样一些工业部门里，竞争者的数目已被竞争压缩至最低限度，这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通过调节生产和规定销售价格来节制竞争的作用。

在过去，资本主义生产为了本身发展的需要而摧毁中世纪的行会组织；近五十年来，它又力图恢复这种组织，不过，却是按照另一种方案予以恢复。现在，当资本主义正在演变到它的最后阶段时，两项永恒的原则——即工业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好似资本主义赖以逾越过渡阶段的一对拐杖。在过去，资产

阶级打碎了使农奴依附于土地和领主的封建锁链，其目的只是为了使农奴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迫；它摧毁了束缚生产和交换的行会制度，也只是为了让人数越来越少的少数资本家能随意支配生产和交换。

大企业家为了削弱那损害他们利益的竞争活动，彼此订立秘密合同，规定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条件；这样的契约在美国称为“联营”(Pools)、“联合企业”(Combines)等等，在德国称为“卡特尔”(Kartells)，在法国称为“生产者的辛迪加”(Syndicats de producteurs)等等。破坏契约者被课以罚金，金额往往很高；为了使合同得到保障，常常要求订约各方交出期票，即使破坏合同的某一条款也有被没收期票作为罚款的危险。生产要受监督。按照铁钉工厂主的合同规定，特派视察员有权随时访问工厂，检查帐目和审阅联营组织成员的通信。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也不管罚款多么重，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公开或秘密地破坏合同，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为了预防生产过剩危机，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和织布厂厂主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协商来缩减生产。但是工厂主们在五十年前就放弃这种做法了，因为他们常常发现一些背信弃义的联盟者乘机加强生产，给那些老老实实履行诺言的厂主带来巨大损害。工厂主认为，防止市场商品泛滥的唯一方法是工业企业同盟歇业(Lock-out)或者是人为地引起工人总罢工。

M·H·巴布莱^①断言说，法国是最先走上组织联营道路的国家。1840年，圣亚田的几个煤矿主联合组成采煤工业公司，以图缓和竞争和提高煤价。他们想把不属于卢瓦尔煤田范围的几处煤矿的矿主吸收进自己的辛迪加，这一意图受到了猛烈的攻击。1852

^① M·巴布莱《生产者的辛迪加和商品的持有者》1893年版。——拉法格注

年10月24日的法令禁止联营采矿。法国东部的盐场主为了减缓生产过剩和提高过分跌落的价格，于1854年组成辛迪加。1893年这个辛迪加进行了改组。1881年，各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共同的保险费率；根据共同的协议，各公司所收的保险费都不得低于这个比率。北部地区的玻璃工厂厂主和隆维的冶金工厂厂主也达成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竞争的活动。参加协定的工厂不得直接接受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定货。所有定货单都要送到专设的管理处，由它按照约定的规章分配给各工厂。

但是所有这些联营、卡特尔，企业主之间秘密或公开的合同，都没有给工业组织带来任何变化。每一个签订合同的人仍然是自己企业的主人，照旧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除此之外，他可以废除甚至违反合同，这是他的权利。因此显而易见，所有这些合同发生作用的时间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极其短暂的。一旦达到了既定目的，合同就会失掉一切意义，而一度停止其破坏活动的竞争，就又重新象过去那样起作用了。

相反地，托拉斯却是一种全国或者甚至是国际的经常性的工业组织，它把集中化推进到最大限度。

托拉斯不是一种新的个人企业，也不是某种靠挤垮竞争对手取得飞速发展而逐渐建成的个人企业；托拉斯是相当多的一些彼此不断竞争的公司的联盟，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这些公司的合并(amalgamation)。在这方面堪称行家的查·施瓦伯给托拉斯下的定义是：“由公司组成的公司”。资产阶级的才智之士宣布说：“竞争是工业的生命”。而托拉斯却回答说：“竞争越少，就越繁荣。”

当一个企业主参加托拉斯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工厂连同自己的顾客都交给了它，而把后者完全放弃了。工厂还可以保留本厂厂主的名字作为商行的名称，但管理权已不在厂主的手中，也不

在他的代理人手中(如同英国的联营、德国的卡特尔和法国的辛迪加的情况那样),而是转到了托拉斯的董事们手中。这些董事可以根据需要或者扩大某一工厂(假如它设于有利的地点);或者缩小,有时甚至完全停止其生产(假如它的费用太大或者不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由八十家酒厂合并而成的威士忌酒托拉斯在创办时的头一件事,就是关闭其中的四十八家厂,而只经营十二家厂。但是这十二家厂生产的威士忌酒却比以前八十家厂生产的总和还要多。这家托拉斯的产品占美国威士忌酒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糖业托拉斯也是这样做的:它只利用合并前四分之一的工厂,但这四分之一糖厂的产量却同全部被合并工厂以前产量的总和相等。

石油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和糖业托拉斯的董事是受托管理人(trustees),也就是说这些人享有赋予他们的酌情处理各种事务的决定权,可以不受控制地管理这些联合企业和给所有主分配利润。这种最初的管理形式遭到强烈的攻击,因此受到薛尔曼法即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的取缔。该法令规定托拉斯也必须服从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所必须遵守的接受监督和业务公开的条件。

托拉斯用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来代替参加托拉斯的为数众多的工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总的行政机构规定价格,签订原料、燃料等供应合同,规定储备品的生产,把定货集中起来再分配给那些完成任务最好、时间用得最少、运输费用最低的工厂。参加托拉斯的所有企业不再靠损害其他企业获得本身的发展了,而是彼此紧密联系,互相保障利润,共同承担亏损。

托拉斯不限于把同类企业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它还吞并为其所需的其他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托拉斯同时占有铁矿和煤矿,以便给自己的高炉供应原料;占有苏必利尔湖上的船队,以便运送矿石和燃料;占有铁路,以便运输自己的商品。

完成组建的各托拉斯倾向于结合为一体,力图建立一个囊括

全国一切生产部门的组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拥有过多利润的托拉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用以发展其他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在促成钢铁托拉斯和海洋托拉斯之后，每年还向各种各样的企业投入好几个亿。本年(1903年)初美国制糖公司和统一烟草公司公布的资产负债表表明，这两家公司都收买了其他工业部门的资产，前一家购买了二亿二千七百万法郎，后一家购进了二亿五千八百万法郎。因此，大托拉斯都对较小的托拉斯的行政管理施加影响。由于在托拉斯的理事会里几乎总是碰到同一伙人，这就证明已经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总指挥部了；这个指挥部力图使美国全部有组织的生产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联营和卡特尔的组织者是企业家本人，而托拉斯的组织者则是与工业没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资本家。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单单这一点就已表明，我们正处于商品生产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能完成自己的巨大转变，首先应归功于同本行业无关的人。例如，在十八世纪，兴办工场（这些工场逐渐实行劳动分工，采用蒸汽和工作母机）的不是手工业行东，而是同印度经商致富的商人。铺设铁路的倡议不是出自公共马车公司的经理，而是出自金融资本家。

金融资本家在决定组织托拉斯之后，再邀请那些他们认为值得重视的企业主参加，而向那些拒绝入伙的企业主展开攻势。参加托拉斯的工厂主需对自己的工厂和平均销售额作一估价，据以获得现款，而更普遍的情况则是获得该托拉斯的股票和债券。在后一场合，所获股票和债券的价值一般均比通常所值定得高一倍；无怪乎美国人说，资本“是掺了水的”（Watered）。因此，托拉斯资本的名义价值常常高于实现托拉斯化的企业的真实价值。资本的这种“掺水”使托拉斯的组织者和托拉斯证券的持有者有可能在公开出售其证券时大发其财。摩根及其财团组织钢铁托拉斯只花费了十亿，却用这笔资本获得了一亿二千五百万的利润。那些在财

产上蒙受巨大损失甚至被托拉斯害得倾家荡产的工厂主和证券购买者一旦发现自己受骗，不免对金融资本家的这种“掺水”行为义愤填膺。对资产者来说，“德行”只能是欺诈与诓骗，而欺诈正是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这时资产者如果郑重要求其同行遵守道义，简直是笑话。这种**将资本估高 (sur-capitalisation)** 的方法正是托拉斯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曾见过商人和工厂主为了道德而拒绝把自己的资本增大一倍呢？即使因此而把自己的亲爱的同胞掠夺得精光他也不会拒绝的。

实际上，托拉斯创造的只是比个别大型工业企业更完全和更发达的集中化的工业形式。托拉斯获得完全成功必须以已经相当集中的企业实行联合为前提，这些企业的建立需要大量资本；例如铁钉托拉斯之所以遭到覆灭，是因为建立一个能支持同它竞争的工厂，有五万法郎便足够了。此外，托拉斯还必须拥有充足的资金，以收买自己的敌手或者以较低的价格抛售商品使其破产。最后，托拉斯获胜还必须具备一些特殊条件，例如优惠的铁路运费、保护关税、发明的专利权等。从1890年到1896年期间，美国资本家受到美孚石油公司和其他类似公司获得成功的鼓励，开始着手组织托拉斯，比法国人更为狂热，但对于建立和发展托拉斯所需要的条件却漠不关心。正是由于缺乏这些条件，加上资本“掺水”和难于找到能胜任管理这种庞大复杂企业的人材，使得许多托拉斯遭到失败；经理们在交易所里倒卖其托拉斯的股票，指望借此来提高本托拉斯的价值（这是美国的法律所允许的），招致了其托拉斯的彻底破产。这些屡见不鲜的失败使得许多人，包括法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托拉斯的存在也象联营的存在一样，是短命的，注定要在其自身沉重负担的压力下覆灭。但正如1902年12月31日《纽约论坛报》所指出的：“这些托拉斯的垮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引起组成托拉斯的工厂和商行的破产。”新的托拉斯收拾起

残局继续经营，并从以前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老的托拉斯产生新的托拉斯，因为其中一家获得成功便会迫使它的竞争者联合起来组成反托拉斯和它对抗。假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中任何一家都不能压倒自己的敌手，大家就停止这种代价高昂的竞争而组成新的托拉斯，从而把双方都溶合在一起，规模比旧的更大。

某些托拉斯的失败并不证明工业不可能实行托拉斯化，正如铁路发生事故不能证明不可能在铁轨上安全利用蒸汽机车牵引行驶一样。由于节约和科学的集中化，使得顺利渡过最初危机时期的托拉斯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因此，尽管遭受重大的失败，尽管招致人们的忿恨，以及在法律上受到各种压制性措施的威胁，托拉斯的数目还是有增无已，或者更确切些说，已经有所增加，因为很难指望在1903年一年之内就会增加很多。问题在于托拉斯已经席卷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和吸收了几乎所有的闲散资本。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小公司数目的明显增长。这些小公司中的一部分是某些企业主创办的；因为他们的工厂已被托拉斯买去，而他们又想找一个投放其资本和利用其闲暇时间的场所。但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试验性的公司** (Sociétés d'essai)。某铁路想买一个矿场，但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价值，或者某大托拉斯准备在市场上出售某种新商品而没有把握，它们都宁愿把这些业务直接交给为此目的而创设的小公司去经营。假如矿场是贫矿，或者商品滞销，它们就让小公司停业，不过损失几千美元就可了事，却不致因此而使自己信誉扫地。反之，如果矿场有利可图或者商品畅销，它们就把新的部门纳入自己的托拉斯，并把它们的成就归功于自己。

假如在1903年不能建立许多新的大型托拉斯，地位巩固的老托拉斯将会大大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把一些独立的、处于它们范围之外的企业吞并进来，同它们一起组织某种类似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那样的由托拉斯组成的托拉斯。

下文介绍的几个典型托拉斯，将有助于读者了解它们的组织状况和弄清托拉斯体系的概念。

第三章 某些托拉斯的历史

(一) 石油托拉斯

报纸上不时在叫喊，似乎美国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反托拉斯的立法讨伐，众议员、参议员、法官、总统和新闻记者都已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于是欧洲的公众就以为托拉斯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认识不到：由于托拉斯巨头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间引起的经济损害和破产，产生了人数众多的不满阶层；这些阶层认为，由这些资本巨人所组织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美国的政治家，千方百计想博得人民的信任，就大喊大叫反对起托拉斯来。他们利用这种叫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远比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利用自己的爱国主义或饶勒斯利用自己的为“正义”和“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的口号所获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废话。

看一看美孚石油公司(石油托拉斯)的发家史，就可以使读者对政治家们的所有这些叫嚷作出正确的评价，了解自由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在组织托拉斯时敢于干出何种勾当。

亨利·德·劳埃德在其著作《财富反对联邦》一书中搜集大量资料，论述了这个“托拉斯之父”——美孚石油公司——的产生，它的欺诈和犯罪行为，它对自己的竞争者发动的无情战争，以及它同司法当局和行政当局进行的斗争。他所引用的事实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但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因为作者是从官方的调查材料中摘引来的。^①

石油时代，象美国人所说，大约开始于 1860 年。开采石油成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理想。几万个资产者涌向石油区。宾夕法尼亚人开始动手钻井，取出宝贵的液体并使之净化。金元象雨水一样从天而降。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正当投机热潮高涨的时候，在这个石油王国中却突然爆发了 1872 年的破产。结果表明，许多企业的破产都是由南方改良公司引起的。这家公司在普遍破产中靠牺牲别人得到了繁荣，它是由十二个冒险家在约翰·洛克菲勒的领导下创建的。这些石油工业家毕生都没有开出过一升石油，只是由于点灯才认识了煤油；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新闻记者、有几个服务于银行界的律师、有一个出售棉花的经纪人和一个糖厂老板等。在 1870 年，这家公司的资本估计约为五百万法郎。

这些资产阶级强盗，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曾在石油区住过，不曾拥有过一个油井和任何一小片油田”，但他们却控制着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他们不仅攫取了向消费者出卖石油的专利权，而且还攫取了向生产者规定出售价格的权利。生产者不得不服从于他们的旨意。例如洛克菲勒及其一伙曾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局签订合同，规定铁路管理局必须对那些不愿把煤油卖给南方改良公司的石油企业主加倍收取运费，必须对运费率作出种种必要的调整，使之有利于该公司，同时还要监视它的敌手的一切活动。

既然商业变成了向生产征收贡品的手段，洛克菲勒一伙就显示出相当高明的经商手腕，他们掌握了为运输石油服务的铁路、运河和航运线；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向生产部门课税，最后又通过石油的提炼完成了这一抢劫性体制。由于刚出钻井的石油不

① 亨利·德·劳埃德的著作，1894年在纽约出版，是一部宝贵的文献，对于曾在民主共和国基础上促进过托拉斯发展的经济契约史学家是很有价值的，可惜这部书中由于贯穿了米希勒和卡莱尔精神的那种伤感主义的、印象主义的文体而大为减色。——拉法格注

能使用，所以石油企业主必须自己提炼或者卖给炼油厂；因此，攫取了这些工厂的洛克菲勒及其同谋者就变成了局势的主宰者。不久以前，在德克萨斯发现了一个蕴藏丰富的石油矿。洛克菲勒公司既不去收买产油地段，也不去开采，而是在波蒙兴建了一个产量为二千万公升的炼油厂，专门用来提炼别人开采出来的石油。美孚石油公司每周根据市场情况给新开采出来的石油规定价格，使生产者只获得最低的利润。石油企业主们不得不服从它的旨意，因为他们不知道把原油放在那里好，而保存原油也远非是没有危险的。美孚石油公司不从事油源的勘探，因为勘探油源要冒风险，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公司宁可把这件事慷慨地让给承包人，后来他们看到有利可图，又从承包人手里收买油井，其价格使他们不致失去对进一步勘探的兴趣。

南方改良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的前身）的冒险家们，进行残酷的战争以反对独立生产者。而且他们是不择手段的，武装进攻，用甘油炸弹炸毁作坊和工厂，火烧井架——所有的招数都使出来了。审讯结果表明，宾夕法尼亚铁路曾用自己的特惠运费率帮助了这家公司。独立生产者支付的石油运费要贵一倍；多收的运费的百分之五十落入了石油大盗的腰包。据一个见证人说，把一吨石油送到波士顿每公里要付运费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而美国铁路平均运费每公里只收二生丁。事情还不止于此，铁路还拒绝给独立生产者提供槽车，因此他们不得不把石油装进大铁桶。但这样也不行，因为铁路局拒绝在普通车厢装运大铁桶。

在审讯期间揭露出来的各种丑闻迫使政府实行一种各州都必须遵行的、旨在取缔特惠运费率的商业法。法律虽然颁布了，但一切依然如故。新的法律规定，违反者要受罚和坐牢，但实际上只有过一个判例，受罚的是一个近海航船的船长，因为他竟敢给一条铁路的货载规定高于正常的运费率。

在铺设地下油管把煤油引入运油火车和运油汽船之后，类似上述的情况又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输油管落入了石油托拉斯之手；独立的石油企业主组织辛迪加来铺设新的油管。于是南方改良公司就组织了一批流氓无赖，发给他们左轮手枪和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专门用来对付铺设油管的挖土工人，并且用铁钩把埋入土里的油管拉出来。甚至连大炮也用上了。爱好和平和笃信基督的资产阶级通常总是用暴力来对付工人和没有文化的民众，如今暴力却被石油托拉斯用来反对自己的同伙——资产者了。

把生产夺到手以后，石油托拉斯就赶紧把它的车轭套在零售商身上。为了迫使小商人只能出售美孚油，公司就降低价格把煤油卖给这些小商人的竞争者；假如这样还达不到目的，它就在不肯屈服的那个小商人的店铺旁边开设自己的小商店，并将全部商品按低价出售，直到对手被完全搞垮为止。公司甚至有自己的警察，用来监督小零售商按它规定的价格出售煤油。

石油战争绵延达三十年之久。法院的讼案一个接着一个，由参议院、众议院和由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纽约州以及其他各州立法机构所任命的审讯委员会，也接连不断地进行审讯。托拉斯总是打赢官司。它收买了对方的法官和律师，嘲弄审讯是空洞的形式。没有什么比美孚石油公司经理对审讯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更有代表性了。

“你们的公司叫什么名称？”

“只有上帝知道，”——托拉斯的一位秘书说，“我不知道……它没有固定的名称”。

“铺设油管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经理之一回答说，“我只有一次访问过石油区。我在这方面没有实际经验……八年来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事的详情。”

“我不熟悉公司的会计，”另一个经理回答说，“我只管规定股息的事。这是我的唯一职责。”

“你有没有出钱贿选？”

“我们常常津贴当地最强的政党；在这个州津贴的是共和党；在另一个州则津贴民主党。”

“公司在哪里开会？”

“我不知道。”

“你们有几个经理？”

“不知道。”

一个经理在法官要求他讲出他所领导的托拉斯的周转金（精确度为亿）的数字时，他回答说：“我一点也说不出。我们没有记帐。我们的公司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帐目都写在纸片上，谁也不保留。”

纽约立法机构的审讯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作出结论说：“这个秘密组织的事业及其活动的性质是很特殊的。它的经理拒绝对此作出说明，拒绝讲出它的活动的细节，因为担心这样做会暴露他们的犯罪行为。”

纽约和俄亥俄的立法机构赞成封闭石油托拉斯，“因为它组织起来的宗旨是同我们的立法精神相违背的……它力图在国内建立垄断，这就使它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生产、规定价格和消灭竞争。这样的公司是同我们的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应当解散它们”。

封闭的命令是在1892年颁发的。美孚石油公司实行停业只是为了稍微改一改名义，又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招牌复业。为了消除政府方面的这些滑稽可笑的挑剔，它装模作样地把自己的正式驻地搬到完全置于托拉斯组织者的影响之下的新泽西州去。

禁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速了托拉斯的发展；股息以前规定

为百分之十二，现在则增加了二倍至三倍。在1897年，股息总额达到一亿五千七百万，1901年达到二亿四千万，1902年为二亿二千五百万。据说，经理之一·洛克菲勒一年的收入为一亿二千万。而德雷克上校，宾夕法尼亚油源的开发者，如果不是有几个朋友用募集来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支持他，早就饿死了。^①

在钢铁托拉斯组成以前，石油托拉斯是美国最大的托拉斯，它统治着全世界的石油市场。据说，它同那个由路特希尔德在财政大臣维特协助下组织起来的俄国石油托拉斯汇合为一。无论如何，这两个托拉斯共享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共同规定煤油的价格。^②不久前组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托拉斯，资本为一亿，它是由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十五个石油工业企业拼凑起来的。这个托拉斯并没有故意要同美孚石油公司竞争，也“不想争取在煤油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很可能它现在已同老的托拉斯达成协议，否则后者是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它吞并的。

石油托拉斯控制着设在北美洲主要城市以及设在卢昂、马赛和其他法国城市的石油提炼工厂，控制着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得克萨斯的石油油井和长达一千三百多公里的地下管道，每一百二十公里都安装有强力油泵，供抽送石油之用。全部石油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即约九十亿公升归它所有。它的

① 伊·勒·德雷克上校（1819—1880）——著名的美国石油开发者，后来穷困潦倒，不得不靠朋友们的资助过活。——编者注

② 1901年煤油产量（单位为桶，每桶装42加仑或190公升）：

美国……69 389 194	占世界产量41.95%
俄国……85 168 556	占世界产量51.50%
其他国家…10 827 983	占世界产量6.55%

从1898年起，俄国开始占了美国的上风；在这一年以前优势是属于美国。在1897年，美国的产量是6000万桶，而俄国只有5400万桶，很可能是由于得克萨斯新开发的油源才使美国恢复到第一位。——拉法格注

运油船队把经过提炼的石油运往世界上几乎一切国家。它把制造油桶、洋铁罐、煤油灯和煤油炉的一些小型工厂合并到自己的工厂里。它还修建了化学工厂来加工那些炼油时得到的、在小企业中只会白白丢掉的副产品。托拉斯把一切都利用起来：它利用废料作燃料。生产石蜡和润滑油，是石油托拉斯最有利可图的业务；它同铁路局签订合同承包全部活动机体的润滑工作，为此它还供养着一批自己的润滑工。

石油托拉斯财富的积累过程是累进的，不由自主的，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托拉斯参加者的巨大利润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因而每年都有余额，约达二亿五千万之多；经理们又把这些钱拿去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这就更加促进了他们利润的增长。

石油托拉斯又插手控制为石油工业区服务的铁路，它还拥有其他铁路公司的大量股票，这就使它有可能对铜、铁和银矿石、煤、柴薪、树脂、佛罗里达的水果、西部的粮食和南部的棉花收取高昂的运费。在一切有大利可图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了托拉斯。它的资本投入电报线路、瓦斯工厂、电车、铸钢工厂、造船厂、美国和加拿大的铁矿场、建筑用土地、佛罗里达疗养地的大旅馆等等。据说，这个托拉斯现在花了二千五百万从加斯帕尔·奥肖阿将军手中买得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在墨西哥中部），打算在那里修筑缆索铁路，以便大规模开发该地埋藏的硫磺矿。

石油托拉斯与摩根联合起来组织钢铁托拉斯和海洋托拉斯。

只要哪里能窃夺工人阶级，托拉斯就在哪里出现和起作用，这要比基督教的上帝更灵验得多。

石油托拉斯的垄断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此，托拉斯的任何一个敌人都不想争辩，正如资本主义国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破产了的和弄穷了的石油工业家在1872年曾要求将洛克菲勒以及他的南方改良公司的合伙人流放去做苦工，现在就是这个洛克菲勒

及其同伙人，由于抢劫了数不清的财富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尊贵和最受敬爱的人，成了被一切政党的政客、各种宗教信仰的牧师和各种各样知识分子阿谀谄媚和顶礼膜拜的对象。

（二）烟草托拉斯

今年(1903年)年初，德国吸烟者在烟叶盒里和雪茄烟盒里发现了如下的传单：

“本商标属于一家始终拒绝为美国金钱收买的商号。您的责任是不要允许美国人在德国国土上奴役德国人。德国人，你们要始终忠于我们的旗帜！假如你们不想让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工资被剥夺的话，你们就应当只买德国工厂制造的香烟。”

美国烟草公司——美国烟草托拉斯之一——也侵入德国了。几个月前，它侵占了自尊的阿尔比昂，^①现在又不失时机地想要侵占威廉的帝国。^②这个托拉斯在这里采用了曾在英国和美国获得相当成功的那种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收买该国一家或几家最大的工厂，通过对商人降价和给顾客发各种各样的奖品（从拔塞器到大钢琴和卡车）等办法，向其他的工厂宣战。

美国的烟草托拉斯（美国烟草公司）在英国收买了奥格登商行，以保证自己在侵夺不列颠群岛的事业中有巩固的基地。三十家英国大工厂组成辛迪加来保卫本国的工业。但是靠降低并赠送合乎英吉利海峡彼岸吸烟者口味的奖品来进行竞争，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亏损，以致烟草的爱国者不得不屈服，并加入了托拉斯。这个托拉斯为了永志自己的胜利和突出自己的国际性质，就采用了**英美烟草联盟**的名称。这个联盟拥有国际托拉斯股票的三分之二。

英美托拉斯在德国最大的烟草工厂所在地德累斯顿建立起自

① 英国古代的名称。——编者注

② 指德国。——编者注

己的大本营。它收买了耶斯迈济商行；照它自己的说法，这是它目前所占有的唯一企业。托拉斯用美国最新式的制造雪茄和卷烟的机器来装备这家工厂，现在又在玩弄降价和发奖的把戏。据说，这家托拉斯花了一笔巨款保证自己得到在柏林拥有五十多家烟草商店的沃尔弗和莱塞尔方面的支持。

德国的工厂主们，在原料被托拉斯大批购去的情况下，感到获得原料的困难，就仿效英国人的先例，同一些大商人联合起来，组成“德国烟草工厂联合会”。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普鲁士内务大臣和萨克森的商业大臣请求帮助；前者建议不要把工厂卖掉，后者则答应考虑制订保护这些工厂主的法律。

但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石油托拉斯或烧酒托拉斯使用枪炮和炸药，那末有产者请求政府保护，用以对付它们的暴力行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英美烟草托拉斯所用的斗争方法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降价、发奖、依靠巨额资本、改良机器设备以及使这一工业部门国际集中化而降低生产成本，所有这些方法都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办法，这些方法再好没有地适合于自由竞争的原则，也再好没有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的和永恒的正义了。于是德国的大臣们束手无策地眼看着他们亲爱的同胞的破产，而当一切都已完蛋时，他们就说一声：“阿门！”而威严的达达兰^①则在坟墓前发表浪漫主义的演说。不过，很可能是政府充当了第三个强盗的角色，它想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实现萦怀已久的梦想：对烟草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国家垄断。德国烟草工厂主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他们要么被自己的敌人吃掉，要么被自己的保护者吃掉。前景是不美妙的！

普鲁士的商业大臣缪勒尔想要表示自己如何关心他们的命

^① 达达兰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在《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阿尔卑斯山上的达达兰》、《达达兰》三部曲中创造的一个吹牛大王的形象。——编者注

运，2月份在不来梅所作的演说中呼吁德国商业家组织起来，以便象大地主一样在政治上和在议会中获得影响。他说：“德国要想保持自己在商业和工业上的优势，就应当采用自己最大的敌手——美国——的方法。辛迪加、托拉斯、普遍实行集中，这就是现在商业成功的秘密。德国应当发展自己的完整的辛迪加体系，这个体系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与其靠法律还不如靠文明的社会舆论来加以纠正，后者能对这些巨大的工业组织的经理起解救作用。”

普鲁士的大臣想，“金钢石只有用金钢石来切割”，因此建议组织德国的托拉斯来同美国的托拉斯对抗，而美国托拉斯在进入德国土地之前就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给了德国工商业以沉重的打击。德国的电机工业懂得了这个必要性，现在已在柏林组成托拉斯，把“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同舒凯特商行和其他两个电机公司联合了起来，——后两个公司还在去年12月就已实行合并了。“组织托拉斯！”很快即将成为欧洲生产部门的口号。英国和德国已经采纳它。《华尔街日报》说，1902年在德国已经有三百八十家托拉斯。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经济学家坚持自己关于托拉斯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尽管托拉斯一方面使工业集中化，一方面开拓了由社会规划生产的远景，也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学说使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既然经济学家先生们的科学不能否认托拉斯的存在，于是在承认自己破产这种可怖局面面前，便不得不力图论证托拉斯是短命的。但是就在这个时期，托拉斯却向深广两方面发展了。这件事本身恰恰暴露了经济学家先生们的科学是完全无用的。这算什么科学？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及其力量的相互关系，目的是使它们为人类服务。相反地，经济科学却把绝对不干涉经济力量的运动看作是基本的原理，它甚至在将来也不想对经济力实行监督和管理。因此，人类虽然曾经征服和驯服了自然界的可怕和盲目的力量，对他们自己所引起的经济力量却只能

毫无怨尤地恭顺服从。全部问题就在于：自然力的制服有利于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经济力服从于人类却剥夺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此外，问题还在于经济学家也要拿自己的知识去为资本家阶级服务。

可惜德国的烟草工厂主并没有采纳普鲁士大臣的良言规劝。其中许多人因预感到悲惨的结局，纷纷把自己的工厂以现金或通过托拉斯股票出让给英美烟草托拉斯。但这些外来人却对这种交易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期望着同某些大工厂主达成协议；到那时候就很容易决定，到底是用低价去收买第二流的工厂，还是用竞争把它们压垮较为有利。

占领德国之后，英美烟草托拉斯就着手去占领荷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烟草生产还没有变成国家的垄断事业。1月25日，从伊斯坦布尔发给伦敦一封电报说，该托拉斯已同土耳其政府达成一项获得土耳其几乎全部烟草生产的协议。不久以前，传闻“菲律宾烟草公司”行将并入该托拉斯，这家烟草公司除了栽植和收购烟草、制造和出售烟草制品外，还从事工业、农业、交通和银行业务活动以及不动产的交易和收税。这家公司是1881年创建的，它的资本达七千五百万比塞塔（西班牙本位币名）。

侵占欧洲并没有消耗托拉斯的精力到忽视自己祖国的地步。它在美国也日益扩大和增加自己的财富。报纸经常报道说，它把所有生产鼻烟、咀嚼烟草、纸烟和雪茄的新工厂都纳入了自己的怀抱。

烟草托拉斯把重担加在种植场主的身上。这些种植场主抱怨说，自从托拉斯建立之后，烟叶的价格不断降低，使得种植无利可图。现在他们联合组成公司来对付托拉斯，以便达到提高价格的目的。可是希尔比郊区农场主在这方面所做的可悲试验未必能支持他们的决心。这些农场主约定不按托拉斯规定的价格出卖烟

叶，而在希尔比和路易斯维尔组织集市，把烟草的收购业务都集中在那里进行。据农场主推测，托拉斯的代理人和独立工厂主一定会到那里去购买烟叶，因此出卖者就有可能只售给肯出高价的人。在规定的日子里，工厂主和托拉斯的代表果然到现场收购。但当他们了解到市场的情况以后，决定什么也不收购，这就使得供过于求。由于托拉斯是这样一个大买主，只要它停止收购就会引起落价，独立工厂主想利用这个机会出很低的价钱，以致种植场主拒绝成交。最后他们不得不亲自把货送进托拉斯的商行，还是按照托拉斯规定的价格出售烟叶。

种植场主准备向托拉斯宣战，因为正如康涅狄克州烟叶种植组织的首倡者赫伯特·迈伊里克所说，“在不久的将来，托拉斯就会使种植场主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不管托拉斯出价怎样低，他们都不得不同意将烟叶卖出去。”他们成立了一个资本达二十五万法郎的公司，准备设立几个商店，专门精选和拍卖自己种植场生产的烟叶。他们指望把占地六万公顷和每年收获二千五百万以上的种植场主组织起来。但正当所有烟叶种植区的商行幻想从四面八方寻找出路的时候，托拉斯已占领了世界市场；它现在又把哈瓦那商业烟草公司、亨利·克莱和博克商行以及其它商行搜为己有，这几家公司和商行合起来占古巴岛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

烟草商人对托拉斯有很大的依赖，托拉斯对待他们极端专横，待售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由托拉斯规定，并强迫他们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卖。托拉斯只有在他们同意销售它的其他商品的条件下才接受烟草的订货。一个经营大生意的纽约富商本来打算采取顽强态度；托拉斯当即命令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回他所购买的一批卷烟，从而迫使他屈服。为了比较容易地控制商人，托拉斯还利用杂货商店。纽约的波顿及其分号都经售烟草托拉斯的商品。英美烟草托拉斯征服了商人；它很快就将仿效法国政府的先例，把烟草配

给烟草商店，作为一种恩赐。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商店。有人断言，组成所谓独立公司的商人，其实不过是托拉斯的代理人。

工厂主、种植场主和经销人指望通过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巨大的力量去对抗托拉斯。不久以前，他们在芝加哥建立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这家公司首先要求政府让它保留哈瓦那烟草的旧关税税率。由于从古巴岛进口的全部烟草的百分之八十五已经被烟草托拉斯买走了（这个岛现在已并入北美合众国），在这以后，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关于商业自由能够消灭托拉斯的那种断言，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诚然，托拉斯的出现和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从保护关税中得到好处；可是现在，当它们已经组织起来并得到巩固的时候，关税率的取消对于它们就只会是有利而无弊了，因为关税率的取消能帮助它们压倒那些装备陈旧和资本菲薄的竞争者。

托拉斯创造了奇迹。与其说是基督教用其遗训“爱你的邻人，如同爱自己”，还不如说是托拉斯在被它弄得倾家荡产的资产阶级中间引起怜爱工人的感情。美国农民的某一组织，几年前在人民党^①运动和复本位制运动中遭受失败，怀着同样的敌对情绪，既反对铁路和收购烟草、包运烟草的资本家，也反对外来的农业工人。但是烟草的种植场主、工厂主和经销人的全国联合组织，却集资五百万（这同托拉斯的十亿资本比起来，简直就象是拿儿童的玩具手枪去对付大炮），决定使用自己的资本来建立工厂，在那里只雇佣有组织的工人，并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美国的联合组织也象德国的辛迪加一样，发出绝望的号召，恳求工人为了劳动的利益而拒绝购买托拉斯的卷烟和嚼烟；而且甚至不惜揭露托拉斯对女工所使用的剥削手段。

托拉斯使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革命化，并且从根

^① 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农民政党，主张铁路公有，限制土地所有权。——编者注

本上改变着资产阶级的心理；使它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一个烟草托拉斯就使以下许多工厂主（还不算种植场主）蒙受损害：二万七千个雪茄工厂主，三千个吸烟和嚼烟工厂主，四百个卷烟工厂主，二千个外国烟草进口商和六万个零售商。这些零售商受到在托拉斯保护之下新成立的“联合雪茄商店”的排挤。由此可见，受损害的资产者的数目是多么大，这些资产者的切身利益在托拉斯增长时期就受到侵犯。

3月份公布的烟草托拉斯年度报告显示出这一工业部门托拉斯化的过程，同时也向那些想联合起来同这些托拉斯作斗争的工厂主表明，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美国政府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报告估计所有烟草工业部门（卷烟、雪茄、嚼烟、鼻烟和吸烟）在1901年获得的利润为二亿三千三百万法郎，根据前几年利润增长的材料推算，在1902年就已达到二亿五千万法郎。

统一烟草公司——烟草托拉斯（包括英美烟草托拉斯和其他几家公司）——的报告表明，它在1902年的收入等于一亿六千二百万；因而剩下来留给其他所有工厂主的总数不超过八千八百万。因此，烟草托拉斯自从1901年成立时起，就拿出其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巩固自己在美国和英国的优势，它终于把烟草生产全部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五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三）钢铁托拉斯

托拉斯不仅在经济关系领域内实行革命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也引起革命。它们动摇并推翻资产阶级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迄今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被公认为是永恒的真理，这是因为直到现在资产阶级看到：这些观念同培育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是完全适合的。统治阶级总是乐于相信，在本阶级的环境中成长

起来并拥护它的统治的那些观念是确定不变的和永生的。

某一企业的繁荣总是以它不超出一定规模为前提，这曾是一条公认的、不容争辩的真理。冒进的工厂主，由于破坏了这条规律，就注定要走向灭亡。这条真理过去和现在一直是那些饶舌的经济学家所持有的最有分量的论据，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国性生产组织。当托拉斯的名声传到欧洲的时候，欧洲的经济学家、学者和实践家却耸一耸肩，称这些巨大的工业企业是经济的谬误。他们预言托拉斯寿命不长，会在自己的沉重负担之下破产，还预言托拉斯的建立者最后总会懂得，对正统政治经济学规律的破坏将使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是美国的托拉斯事业家却丝毫不考虑经济学教会的教条和它的大主教的预言，仍然继续干着组织托拉斯的事业并不断加以扩大。美国的资本家在自己的实际事业中虽然一点也不注意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真理，但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这些真理对于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可能多少有点用处。马萨诸塞州商人和政治家在共和党领袖马克·汉纳的领导之下建立了一个团体，编纂文摘和发行小册子，旨在传播合理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并证明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在“文明的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危险。这些资本家认为，经济学家的学说象基督教的教义一样，只适用于愚弄傻子和工人。

十年以前，拥有资本五千万的托拉斯就被认为是最富的了；而在去年，金融学家兼统计学家约翰·穆迪在编制1899年9月起注册的托拉斯名单时，只提到拥有资本五千万以上的托拉斯。近十年中组成的一批托拉斯，每家资本都有几亿。它们为自己的生命力和繁荣提供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证据，致使经济学家会对自己的学说是否具有真理性产生怀疑。托拉斯的资本达到这样大的规模，以致在这些公司的会计中不得不引进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些数字至今只是用来计算五六个大国的预算和国家债务的。^①

美国钢铁公司——钢铁托拉斯——给我们提供几亿和几十亿的惊人数字。这是资产阶级世界所曾见过的劳动和资本的最强大的集中化。根据最近的报告，托拉斯仅在矿场和工厂里就剥削着一支十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七人的雇佣工人大军，托拉斯的全部资本估值达到七十二亿二千万，其中五十六亿六千五百万是股票，而十五亿五千五百万是证券。1903年“皮·摩根”商行以钢铁托拉斯的名义发行十二亿五千万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债券，六十年内偿清，但托拉斯也保有在十年内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行情偿清的权利。

美国钢铁公司是由托拉斯组成的托拉斯；它包括十家大型托拉斯：联邦钢铁公司，资本四亿九千九百万；美国桥梁公司，资本三亿零五百万；美国钢铁和钢丝公司，资本四亿五千万；美国马口铁公司，资本三亿三千一百万；美国钢环公司，资本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国钢板公司，资本二亿四千五百万；国民钢铁公司，资本二亿九千五百万；国民管道公司，资本四亿；苏必利尔湖统一铁矿，资本一亿四千一百万；卡内基公司，资本十五亿八千四百万。

① 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蒂迈欧篇》中曾提到一个天文学家，照他的看法，计算技术是由于观察白昼和黑夜，太阴月和太阴年的相继交递而产生出来的。人们还在认识天体运动和把一年划分为四季或三季之前就已懂得计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非洛劳斯说：“一切存在的物中间都有数，否则便不能思考，不能认识。”事实上，动物和人的智力首先是由于物的某种特性，也就是由于它们在形式上以及在空间所占位置上彼此有别的那种特性而产生出来的，计算的起点就在于此。人脑养成计算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有一种野蛮人，不会计算三以上的数；另一种野蛮人比较发达，懂得用手和脚计算到二十，超过此数他们就用“许多”一词来表示。维科指出，在罗马人中间，六十这个数目，后来是一百的数目，再后来是一千的数目被认为是最大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格瓦塞部落用“黄昏”一词来表示千数，用“夜晚”一词来表示万数，他们用“tapitiisa”一词来称呼百万，这个词的含义是“计算的尽头”。对于我们来说，十亿这个词是同不可计算之数字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当十亿这个词使用于1870至1871年的赔款时，人们为了说明赔款数目的概念，曾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各样的比喻和解释。现在托拉斯已使这个概念家喻户晓了，而我们也逐渐习惯用十亿来计算，如同以前用百万来计算一样。——拉法格注

参加托拉斯的这十家公司更早以前就在自己的管理之下把分散在十一个州(马萨诸塞、伊利诺斯、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密执安、印第安纳、堪萨斯、宾夕法尼亚、纽约、华盛顿、明尼苏达)的工厂和高炉联合起来。其中几家占有分布在各州的铁矿。

这些公司是在1898年钢铁工业危机之后才组成托拉斯的,其中的每一家都把某一部门的主要工厂集中在自己手里,剩下的只是一些在竞争上无足轻重的小厂。这些公司曾指望它们中间不再有互相斗争的事由。可是卡内基工厂开始制造铁管和钢管,象国民管道公司一样;于是后者就准备向敌手的领域发动进攻。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假如不是摩根带着十亿出来调停的话,就会造成无法补偿的损失。在洛克菲勒和施瓦伯的支持下,他得以把两家公司合成一家巨大的钢铁托拉斯(于1901年2月25日在新泽西州注册成立)。所有这十家公司都让出自己的企业,以换取新托拉斯的股票,只有卡内基一家愿意要证券而不要股票;这种情况要在金融范围内去加以研究和评论。在第一次合并时曾经把公司的财产人为地提高估值,这就又一次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二。因此,钢铁托拉斯的资本就大大地“掺了水”。

由这十家公司组成的钢铁托拉斯从开始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以下各项财产的主人:年产九百万吨钢制品、不需再经过加工就可直接投入使用的一百四十九个铸钢工厂;有六百五十万吨铁和生铁生产能力的七十八个铸铁工厂;一万七千个炼焦炉;煤矿床三万六千公顷;其他土地一万二千公顷;苏必利尔湖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铁矿。除此之外,它还拥有苏必利尔湖上由一百二十五只船组成的一支航运队和八百公里的铁路网,可以把煤和矿石运到工厂和其他地点。

钢铁托拉斯刚刚诞生,就立即着手吞并其他托拉斯,如拥有资本六千八百万的肖尔比管道公司、联合钢铁公司(二亿五千万),后

者又吞并了谢朗钢铁公司和拉克·卡瓦纳钢铁公司(二亿)。这样一来,它的高炉、炼焦炉、轧钢机等数目倍增,煤矿和铁矿的矿床也增加了。托拉斯吞并愈多,胃口就愈大;本年内它还准备吞并新的工厂,以便有可能把酸性转炉钢和其他物品,也就是它现在卖给其他公司去最后制成各种日用品的全部原料,制成成品。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托拉斯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两个敌人:拥有几个炼钢工厂的共和钢铁公司和琼斯-劳克林公司,后者是卡内基的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之一。托拉斯用来使它们屈服的办法是非常典型的,而且证明它的力量非常强大。为了阻止竞争者出售商品,托拉斯不允许正在同洛克菲勒控制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线作斗争的一条铁路线修通到匹兹堡。另一方面,托拉斯从供给它们燃料的弗里克公司手里把全部焦炭买去。据说,琼斯-劳克林公司已经准备把自己的企业卖给托拉斯了;人们还预言说,共和钢铁公司也支持不到一年。

冶金公司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还没有被托拉斯吞并,托拉斯就派自己的人员打进它们的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机构,想迫使它们屈从于自己的支配。钢铁托拉斯委员会的两个成员,马克·帕玛和查理·迈·施瓦伯,参加了芝加哥气压工具公司(这家公司在一年前注册时拥有资本为三千七百万)的执行委员会。查理·迈·施瓦伯曾任卡内基公司的经理,他同摩根和洛克菲勒一起,都是钢铁托拉斯的奠基人。伊·加里是艾利斯·查默斯公司(这家公司在1901年5月注册时拥有资本一亿二千一百万)的总经理,同时又是钢铁托拉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约瑟夫·伊·施瓦伯,著名的查理·施瓦伯的兄弟,担任了美国钢铁铸造公司(这家公司在1902年6月注册时拥有资本二亿)的总裁。因此人们很难弄清钢铁托拉斯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全部公司。

钢铁托拉斯的首脑是贪得无厌的,他们不限于希望,象消耗原

料一样,消耗自己大量生产的钢和铁,还想使自己的高炉和炼焦炉所需要的铁矿石、锡矿石和煤实现自给。它已经懂得收购足够的金属矿场,不仅可以从中获得本身所需要的矿物,而且还可以有剩余卖给其他厂家。但既然这家托拉斯的需要随着不断吞并新的冶金工厂而日益增长,它就必须经常补购新的矿场。不久以前,它花五千万收购了湖区唯一的琴皮昂矿场,在矿场附近还没有高炉和冶金工场。现在摩根又在进行谈判,想拿出六千万来收购明尼苏达的铁矿矿床和用同样的款数去收购墨西哥不久前发现的有丰富矿苗的二千四百公顷土地。钢铁托拉斯还打算占有数量更多的金属矿石,使得竞争中的公司不得不乞求它支援矿石。托拉斯所占有的煤矿还没有达到这样大的规模。摩根正在加紧进行侵占煤炭公司的工作。眼下据说他正设法取得肯塔基的沥青煤矿并想把它们并入托拉斯,以便同那家向宾夕法尼亚许多炼钢工厂供应焦炭的弗里克煤炭公司并驾齐驱。这家公司出售煤和焦炭的数量非常可观,以致市场价格要依它为转移。

钢铁托拉斯在生产上所占的比率也象它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一样大。1901年,它的矿场生产的矿石占美国矿石全部开采量的百分之四十四。它生产的生铁,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即六百八十万零三千三百九十八吨,比法国全部产量(约三百万吨)多一倍,差不多同德国近十年来的平均年产量(七百万吨)相等。钢铁托拉斯的生产由于吞并了新的冶金工厂和修建了大量高炉而迅速增长。酸性转炉钢的生产占北美合众国全部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六,制铁钉用的钢丝的生产占百分之六十五,钢轨、钢板和铁梁的生产占百分之五十。

所有这些数量庞大的产品都完全被本国吃下去了。必须指出,最近四年来美国工业的繁荣达到如此惊人的规模,以致它的冶金工业生产(在1902年超过一千七百万吨)还不能满足自己工业的

需要,因此除了不得不减少出口外,还进口一百万吨以上的生铁和钢。由于这些**丰年**,独立的工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的报纸说:“但是一旦**贫年**到来,这些小公司将如何站稳脚跟,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①

钢铁托拉斯在吞并矿场和工厂方面那种无止境的贪欲鼓励了经理们的疯狂活动,他们力图保证托拉斯的无数商店获得销路,并且在业务上作出种种安排,使钢轨、长方铁和轮船钢板都被那些已加入或并入托拉斯的企业消费掉。

当这一广泛的托拉斯化过程也波及到建筑业时,建筑公司便开始迅速增多并扩大自己的规模。一个占有十个这样的公司和拥有资本三亿三千万的托拉斯,专门从事用铁来建筑。可以料到,领导这个托拉斯并担任它的总裁的,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查理·施瓦伯。1902年7月注册的一家建造钢船的托拉斯,拥有资本一亿,把

① 下面所引的数字可以说明托拉斯在其四年发展过程中惊人的工业生产率。

三年以前美国的采煤量低于英国,而现在则比英国多5000万吨。1901年,煤的开采量是2.66亿吨,而在1902年,尽管发生过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罢工,还是达到2.68亿吨。

十年前,美国在生铁的生产方面低于英国,产量不到900万吨。在1902年产量已等于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总和。

生铁的产量1901年为1587.8万吨,1902年为1782.1万吨。

1902年的大量生产并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需要进口131.3万吨生铁和钢。虽然在1900年的出口达到115.4万吨,但到1902年就降到37.2万吨。因而,国内的需要吃下了1876.2万吨。

由于需要超过供给,价格提高了。

每吨价格:

	1902年	1901年	1900年
酸性转炉钢	103 法郎 35 生丁	79 法郎 65 生丁	97 法郎 45 生丁
钢轨	140 法郎	136 法郎 66 生丁	161 法郎 29 生丁
钢锭	152 法郎 57 生丁	120 法郎 65 生丁	125 法郎 30 生丁

1902年的价格是近十年中最高的,除了1900年之外,这一年钢轨的价格扶摇直上。最近六年来修建了40225公里铁路,等于法国铁路网的全长。美国拥有32.1万公里铁路。

那个被施瓦伯(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施瓦伯)收买的贝特莱姆钢铁公司,也并入自己的组织之内。

同后者竞争的是摩根,他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实现芝加哥及其近郊电车的摩根化和在这个城市中修建地下铁路的谈判。摩根准备在南部各州修建铁路一万五千公里。以前,他到哈瓦那作了一次旅行,以便同威廉·万-哥尔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和古巴铁路辛迪加经理一起讨论扩大古巴铁路网和修建纽约至哈瓦那之间的新航运线。它的财团已掌握八万九千公里铁路,也就是几乎占美国全部铁路三十二万一千公里的三分之一。(法国所有的铁路网还不到四万公里)。以前曾同摩根和施瓦伯一起充当钢铁托拉斯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洛克菲勒,现在则同自己的财团一起,控制着很大一部分铁路网的管理机构。摩根还是海上工程托拉斯的头子;这个托拉斯不久前,经过了一年的斗争,迫使握有美

铁路运行量在1902年大到形成铁路交通阻塞;运送商品的车厢和火车头数量不足。从1901年6月到1902年6月这一年,每公里的纯利润增至2042法郎,而支出则增至1254法郎。

私人工商企业和股份公司的数目如下:1893年为1193000家,1901年为1198901家,1902年为1238553家。

在这工业繁荣的十年中,个人的和股份的企业一共增加了3.6%。如果说它们在数量上的增加还不算多,在质量上的增长却是巨大的,这说明在这一期间所完成的资本集中是大大加强了。

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票据交易所的平衡表:

	纽约	美国其他地区
	(单位:十亿法郎)	
1892年	310	—
1900年	430	167
1901年	595	196
1902年	590	209

1892年纽约的数字无论如何也还是赶不上各州。由于投机活动,纽约票据交易所的平衡表膨胀到了极限。美国其他地区——在那里这些投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比较更能说明情况。从1900年到1902年,纽约的清算业务增加了27%,而全国只增加20%。——拉法格注

国最大造船厂的“维·克拉姆普斯父子公司”投降。这一胜利保证了它对造船业的垄断。因此，既然铁路、市政工程和海上工程都处于钢铁托拉斯经理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这就为它推销钢铁提供了宽广的和固定的市场。

海洋托拉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碰到摩根、洛克菲勒、施瓦伯几个人的名字以及钢铁托拉斯的其他头头）还将得到欧洲和美洲造船厂已经开始的“摩根化”的补充，因此就为这个托拉斯的钢铁开辟了日益扩大的新市场，保证它们行销世界各地。当美国工业贫年到来的时候，以前仅在美国国内推销自己产品的钢铁托拉斯，现在却必须把产品送到国际市场上去了。欧洲的冶金工业如何对付这个敌人，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摩根，他是这个如此不怕风险和如此巨大的企业的精明强干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现在成了拥有资本二亿五千万的投机者辛迪加（联营）的首脑。这个辛迪加把留意南部各州棉花的收购看作自己的任务，指望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准备运往欧洲的棉花都引向纽约，这里是海洋托拉斯装船的主要港口。也许，摩根还有其他计划。

钢铁托拉斯不想把自己封闭在美国本土的狭小范围内，因为自己的祖国已不能满足它那贪得无厌的活动了。哪里能获得矿场和工厂，那里就是它的祖国。它的经理之一——菲利浦斯，现在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研究英属印度开采铁矿和修建冶金工厂的方法。没有可能占有俄国的铁路，因为那里的铁路是属于国家的，钢铁托拉斯就决定侵占它的动产。施瓦伯千方百计地想获得莫斯科—旅顺铁路线国际卧车公司的六万张股票；这家公司的经理对这个提议是不放心的，因此只同意让出一部分，但是摩根在他旅行欧洲时却设法买得了其余部分。哪里修建铁路，那里就有摩根；他是巴格达铁路线英国财团的成员；他从自己的竞争者耶尔克斯手

里夺得了伦敦地下电气铁路的修建权。

托拉斯，这些工业的巨人，把许多彼此虽有联系，但各自独立的企业集中在统一的管理机构之下，迫使经理们将许多最多样化、最对立的利益联系并结合起来，强使他们逐步地到处去夺取阵地，甚至包括那些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而这些部门则是由这些经理管理的。摩根、洛克菲勒、施瓦伯以及钢铁托拉斯的其他成员，他们的活动范围包括金属矿、煤矿、煤油厂、铁路、轮船运输、海上工程和市政工程公司，又钻进保险公司来运用他们的资本和推销自己企业的股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财务委员会的总裁比尔金斯，把属于这家公司的一亿零九百万投放到摩根的新办企业的股票上去，因此当了“摩根”商行的股东并且获得年薪一百二十五万法郎，企业分红的份额还不计算在内。

由于必须经常保有大量资本来应付范围很大的企业，这就迫使摩根同纽约七家银行财团中的三家建立密切联系，而洛克菲勒则同两家发生联系。这七家银行财团到2月14日为止已向各种公司付出五十亿以上。

什么树结什么果。利润，这唯一使资本家狂热地感兴趣的事物，在商品生产时期是工商企业的果实。忍受苦役劳动折磨的雇佣工人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乐趣，他们在那条件比监狱更恶劣的工场里积劳成疾，那算不得什么；他们由于未老先衰，生养下多病的和退化的后代，那算不得什么；匆匆忙忙地制造出来的商品第二天就坏了，那算不得什么；零售商人一直处于破产的威胁之下，贪假便宜的消费者大上其当，那算不得什么！……只要有利润就行了，于是资本家的慈善行为、利他主义、正义、道德和基督的美德，完全得到了酬报。钢铁托拉斯在实现资本主义理想的同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不久以前，美国钢铁托拉斯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1902年年度

报告；为了安抚那些为它的命运感到不安的工业家和经济学家，一些欧洲的新闻纸也转载了这份报告。一家巴黎的金融报纸这样说：“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的数字之巨大是令人吃惊的。”

扣除了所有维修费用和磨损了的生产工具的原价以后，钢铁托拉斯的纯利达到六亿八千六百五十四万零一百一十八法郎。这一部分分配如下：

资本折旧和工具改良的资金	143 244 088
债券资本的利润	78 217 427
发放股东的股息	288 672 265
剩余	176 406 338

在这个时期，托拉斯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如下数字：

铁矿石	16 063 179 吨
焦炭	9 521 567 吨
煤	709 367 吨
生铁	7 975 530 吨
钢	9 743 918 吨
钢材和其他小五金	8 197 233 吨
锌板	23 982 吨
硫酸铜	14 224 吨
水泥	486 357 桶

出售上述各种产品获得的总收入同包括交通运输和各种其他企业的总收入加在一起，共达二十八亿八千六百六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六法郎；生产和采掘的支出为二十亿一千八百万；行政管理的主要支出为六千八百万。

股本五十六亿六千五百万的股息为二亿八千八百万，利率超过百分之五。但是不应该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托拉斯资本常常“掺水”，往往掺到 50% 甚至 100%。“掺水”的规模不受任何规定

的限制。钢铁托拉斯的股本还加倍“掺水”，因为这个由托拉斯组成的托拉斯所联合的企业，其资本在一参加托拉斯时就已经“掺水”。第一次“掺水”的规模是谁也不知道，第二次“掺水”达到百分之七十二。假定钢铁托拉斯的资本“掺水”两倍（这个数字大概比实际要低），那末其股本的股息就达到百分之二十。

1903年头四个月的纯利减少了一千零六十万三千八百五十法郎。减少是由于铁路拥挤，妨碍了商品运送引起的；但是这个差额将能得到补足而有余，因为所有最重的商品（钢轨、建筑材料等）的年度生产量都已预售出去了。

这些数字甚至使那些习惯于掌管百万资财的资本家也感到吃惊。

伦敦的《寰球报》对钢铁托拉斯的七十亿感到焦虑和不安；它指出，在1801年，即距今一百年前，美国整个国家的全部财富也不过等于这个总数。《华尔街日报》得意扬扬地说，美国所有铁路公司获得的利润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美国钢铁托拉斯一家的利润数字。这家报纸补充说：“资本、人力和利润这样巨大的集中，已反映到纽约银行的借贷业务上，并干预了国际货币市场。”这是一个愈益增长的中心，靠雇佣劳动剥削来的所有财富都向这里汇聚，而资本主义企业的神经系统又从这里分布开去。

第四章 托拉斯体系的经济影响

（一）工业的整体化

托拉斯把以前彼此独立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合并和集中在统一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产生出一个新的、严整的、各部分有着合理联系的生产机构。这样一个排除了笼罩着经济界的那

种无政府状态的完整机构，美国人称之为托拉斯体系。正象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在自然机体的进化中所发现的“图形的统一性”一样，这个体系不是某个天才人物预先想出来的，而是随着这些经济机体的成长和进化产生出来的。托拉斯体系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它的特点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就是现在，已不难对它形成一个总概念，虽然这一概念还难免有细节不详的缺点。

托拉斯体系把力量放在生产方面，而不放在交换方面，从而证明从蒲鲁东到梅利纳等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的论点——他们把放宽对生产者的信贷并使生产者便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必要的商品看作是免遭一切灾祸的万应灵药——是错误的。托拉斯体系把“金融将军”的努力引向组织和发展生产，引向生产方法的改进和生产工具的改善，以便在费用最少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利润。因此，托拉斯强调自己的务实精神，并夸耀自己在资本进化中的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被它击溃的手工业生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保留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特点——这种专业化曾被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发挥到极限。代替手工业行东的手工作坊主人，也象自己的先驱者一样，把自己的生产限制在只生产一种商品，甚至只从事一种商品的某个阶段的生产：生产呢绒的手工作坊主人把纱线的加工、绒毛的染色都委托给其他作坊。这种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生产活动范围内的状态，并不象中世纪时那样，是由团结精神引起的，由每个手工业者要获得独立自主的能挣钱的职业这样一种愿望引起的；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工业家拥有的资本微不足道。不过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工厂也日益扩大，同时也就把那些制造原料或完成产品最后加工的补充部门统统合并起来了。有一些企业家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制造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例如苏格兰的工厂主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开设成衣商店，所有衣料也

是在他们的工厂里纺纱、染色和织造出来的。“克列索”和其他冶金公司拥有自己的金属矿和煤矿，从那里他们取得原料和燃料。这些公司还直接同政府和铁路局订立合同，承造大炮和机车。

但是生产环节的这种整体化（直到把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尽管有时在某些生产部门中也能看到，却远未成为普遍现象，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集中在个人手中的资本在规模上微不足道，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家的不认真、不坚决或无能力。但是，直到最近几年为止，几个关系密切的工业部门实行这种联合，主要地只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化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股份有限公司手里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它依靠这些资本才得以着手兴建广泛的企业；它清楚地表示出资本主义想把次要的生产部门合并到主要的生产部门的意图。欧洲的工业走这条路并不是没有过动摇的。法国铸钢厂的股份有限公司，掌握着下比利牛斯省的冶金矿场和阿韦龙省的煤矿场，却从英国订购煤，向毕尔巴鄂和瑞典订购矿石。海军部的铸钢厂公司是一个拥有资本二千万而且把开设在圣夏蒙、热埃河、阿肖伊、吉沃尔和布柯等地的工厂并在一个管理机构之下的规模不大的托拉斯，却购买圣夏蒙工厂（法国最大工厂之一）所使用的铸铁，用来生产装甲钢板、车轮、车轴和其他的铁路材料。

德国的光学仪器的生产是很发达的，而且比较集中。由于在这一生产部门中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分散在二十九个工厂里作工，这就证明欧洲工业在跳出传统的行会制度的专业范围时所碰到的那种困难。光学作坊就其本义而言只从事透镜和玻璃的切割工作，另外一些则专管磨光玻璃的工作，最后，第三部分才管安装镜框。镜框的制造又在专业的作坊里进行。柏林附近的弗里德劳的格尔茨工厂约有九百个工人在五百六十架电力发动的机器上工作，它从巴黎和耶拿购买玻璃。耶拿的卡尔·蔡司工厂是把光学

工业的一切环节统一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工厂之一。它拥有一千二百个工人，其中半数是在机械化的作坊里工作，而其余一半在光学作坊里工作。

当欧洲工业缓慢地、胆怯地走向生产整体化的时候，美国人却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已走上这条道路，表现出对实业有出众的嗅觉和对利润的贪得无厌。宾夕法尼亚和湖区的铸钢工厂在合并为一个美国钢铁托拉斯之前就已拥有自己的冶金矿场和煤矿场，等等。在欧洲，铁路工厂只从事修理机车车辆。而在美国，铁路老早就同生产钢轨和生产机车车辆各种附件的冶金工厂合并了。

所有美国生产部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中化倾向并不是托拉斯创造的；托拉斯只是把这一倾向引到强化的极限，合理地引导它并有计划地支持它，为的是利用它的一切有益的方面。

所谓托拉斯就是把原先互相竞争的同一种类型的工业部门统一在一个管理机构之下，在它们的周围又集聚了许多辅助的工业部门和其他有用的企业，用信贷制度支持它们去获取原料、燃料、运输工具、资金等等。托拉斯体系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倾向，只不过是加速已经开始了的进化。同样地，托拉斯只是合乎逻辑地发展了所有美国工业都具有的那种倾向，经营了他们的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或者（像钢铁托拉斯，它可以算得是其同类的最高典型）吞并消耗它们的成品的生产部门，而拿出去销售的只是剩余的产品。

在这个发展阶段，托拉斯——这个名称来源于野蛮时代的 trust 一词——开始运用那个在宗法制和封建制时代就已出现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的指导原则。^①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

^① Trust——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词。格林认为它起源于 tröst 或 traust，有庇护、保护之意。在《尼贝龙根之歌》中，tröst 意为“庇护者”。在酋长的 trustöm 之下，做他的 antrustronöm，意即在他的庇护之下。自由人和处在墨洛温王朝保护之下的农奴因为受到侮辱而有权得到最高的酬金。

纪), 农业占主要地位, 那时的农学家卡通、柯鲁美拉、奥利维耶·德·谢尔以及该时期的其他经济学家, 曾向土地所有者(罗马的贵族和封建领主) 提出建议, 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一切必需品, 这样他们就不必去购买什么东西, 而只把满足自身需要后的剩余物出卖, 拿这些去换得他们自己不能生产或不想生产的奢侈品。这些著作家完全不是创新者: 他们不过是把许多世纪以来实际上已被采用的做法写成训诫的形式而已。实际上, 农村公社不仅生产满足其成员的一切必需品, 不只出卖多余的产品, 而且还由公社出资雇用手工业者(铁匠、织工、裁缝等等) 生产必要的物品。当罗马和法国的农学家提出自己这些聪明的建议时, 全面采用这些建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生产进入了商品经济的阶段, 这时生产不是为了直接的需要, 而是为了出卖和获得利润。

但并非所有的托拉斯, 即使是组织得最好和最稳固的托拉斯, 都达到了发展中的这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许多托拉斯(例如烟草、肉类、皮革、糖、水果各类托拉斯, 制油托拉斯等等)——它们靠农业供给原料——都没有打算达到原料的自给自足, 也没有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生产这些原料。它们宁愿把生产的一切风险让给农业, 获取农业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步石油托拉斯的后尘。石油托拉斯避免进行独立的勘探工作, 宁愿向那些进行过勘探并遭受过失败风险的人们去收买丰富的油源。这些托拉斯既不拥有畜群, 又不拥有

这个词在法语里已不使用了, 但仍然保留在英语里, 而且没有失去它的原意。Trustee 是用来称呼受委托管理财产的人, 委托人由于未成年或由于其他的原因而不能管理自己的财产。在美国, 未成年人的财产都寄存在信托银行(Trust-Banks) 里。在美国的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里, trustees 是用来称呼托付管理其财产的人。石油托拉斯的经理——托拉斯体系之父——被称为 trustees, 即股东所信赖的人。使用“trust”这个词来表示工业公司很可能是由此开端的。——拉法格注

牧场，却向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人发号施令，按照自己的意图任意规定谷物和牲畜的价格。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原料的自给自足，托拉斯不得不加强压制美国农业的银行、铁路、灌溉公司和商人的本来就是残酷的统治。

北部和南部各州的农民曾三番五次地做过努力，想把这个羁绊甩掉。他们建立过强大的组织，取名“格兰其”^①或“保护农业社”。据历史学家马丁说，这个组织在1874年就曾把八十八万个农户联合起来，划分为二万二千个分区或叫“格兰其”。他们收取会费，1873—1874年总额达一百七十九万四千九百法郎，这个团体把其成员所需要的农业商品和工厂商品的采购和分配任务承担起来；其成员的产品的出售也由它来掌管。1876年，它拥有五艘轮船、三十二个有升谷机的粮仓，二十二个保存粮食和烟叶的仓库，还有磨坊和制造农具的工场。^②这个组织曾一度有过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左右某些州的立法机关，特别是在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星州，并且通过立法手续迫使它们修改铁路运费率。这个组织在复本位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格兰其”社员偿还债务所需要的廉价货币）中垮了台。现在在农村里，受到托拉斯的压迫比前更甚，又重新出现骚动。但是，不论农民发动什么样的运动来推翻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它不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是注定要失败的。

农业的这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特点的从属地位，对于托拉斯体系的全面发展是一种障碍。实际上，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组织，只有在它的已达到高度集中的各主要企业已经联合起来，已将辅助部门合并，并能独立解决原料的情况下才可以建成托拉斯。石油托拉斯开始收购油厂之后，就掌握了各处石油油源、油管以及运

^① 格兰其(Crange)是1867年成立的美国全国性保护农民利益的田庄农民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保护农业社”。——编者注

^② E.M.马丁《格兰其运动的历史》——拉法格注

输石油的油船，最后还要建立加工石油副产品的各种化工厂和制造洋铁罐、煤油炉及煤油灯的手工业工场。钢铁托拉斯没有与制钉厂联合（因为预见到同这个厂联合是肯定要失败的），而是与制造钢轨及其他一些大型金属品的工厂和占有煤矿和铁矿的工厂实行联合。

为冶金工业提供原料和燃料的铁矿和煤矿对于冶金工业是辅助部门，因而不管它们本身意义多么大，都属于生产从属部门。

农业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它为一系列生产部门提供原料。生产原料同把原料加工成各种工业品需要花费同样多的精力，甚至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磨粉业、面包业、酿酒业和食品业都依赖谷物种植业提供原料，同这些加工行业相比，谷物种植业是基础生产；同样，对于屠宰或制革、制鞋、毛纺、织造以及服装等行业来说，畜牧业也是基础生产。这么众多的生产部门都是经营原料加工的，因而采购原料就成了这些生产部门的主要业务。

所有这些工业部门组成了各自独立、并不经营原料生产的托拉斯。在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并具有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性质。由于耕作场地面积大、统一管理、大量投资，使用机器和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农业对托拉斯的发展必然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显然，要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道路，还需要一定的动力，这种动力有可能来自灌溉公司。

辽阔的西部平原的农业遭受缺水之害，周期性的干旱毁了收成。因为缺水，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影响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区（即干旱的美洲）那种稳定的、非常好的收成。而在那些由公司建造了人工灌溉田地的地方却获得了相当于平均水平三倍的收成。据华盛顿农业局的年度报告说，到189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那些以资本主义方式耕作和灌溉田地的地区，产量大大提高了，每蒲式耳谷物的成本下降到百分之七十，即每生产一百公升的费用仅两法

郎多一点。

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农场主联合起来修建水利灌溉工程，资金不足也并没有影响这些工程的大规模进行。美国地质局前任局长鲍埃尔少校认为，在一个世代里，利用灌溉就可能把三千六百万公顷土地变成沃土。如果注意到美国佬办企业的速度，这一估计并不夸大。英国政府在印度曾以五十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价值四亿六千万、面积为六百万公顷土地的水利工程，1900—1901年得到了所投资本的百分之十，即约四千四百万的纯利。这些灌溉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一着手这项事业时，就在西部几乎所有各州购买和灌溉土地，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卖给或租给农民。但是也有一些公司自己耕种土地，并开设工厂从事农产品的加工。

1903年2月在路易斯安那州成立了一个叫做联合稻米及灌溉公司的企业。这家公司拥有三千万资本，专门经营灌溉土地和种植稻谷、大麦和其它农作物，并将这些农产品加工成食品。另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资本的犹他甜菜制糖公司，打算同犹他州的其他两家公司一起组成托拉斯，其中一家是犹他制糖公司，另一家是熊河灌溉公司，它占有一万四千公顷土地，有着庞大的渠道网进行灌溉。如果这种新的趋势不停地发展下去，灌溉公司就将把美国农业引向托拉斯化的道路。

这些灌溉公司由于控制了水因而获得好收成，但却使农民难以生存。农民虽然想摆脱这种桎梏，但无济于事。过去，铁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公司以及输油管公司曾对建立工业托拉斯起过决定性作用，现在在建立农业托拉斯中灌溉公司也必将起着这种作用。洛克菲勒和摩根必须求助于这些公司来击败竞争对手，然后才能在这些对手的废墟上建立起诸如石油、制糖、钢铁和其他大托拉斯。

(二) 托拉斯体系与商业

托拉斯体系把主要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组织生产，但也并不忽视产品的销售。它甚至对零售商也实行监督，还设置了专门的警察去监视这些商人不得伪造商品，不得违反标定价格出售商品。商业在过去曾使农业和工业处于从属地位：由于托拉斯体系的出现，现在商业已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者支配之下，失去了支配地位。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最初阶段，商业可以控制生产。那些同行东的作坊进行竞争的手工工场，是由商人创办的。很多商人为了不再为生产操心和不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向拥有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提供原料，收购他们的成品。里昂地区的丝织工业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兴办起来的。就在二十年前，该地区还存在这样的丝织工——他们是手工业者，拥有纺织丝绸的生产工具，向一种称为制造商的商人提供产品。

生产者后来不这样做了，但在购买原料时他们仍然要利用商人的中介作用，而在向消费者出售其产品时，也还需要这些商人协助。中间商（经纪人、收取佣金的代理人、掮客，等等）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即使达到很高的发展阶段，也还要向商业纳贡。商业向生产征收的贡品是很重的，特别是自从原料（小麦、羊毛、棉花、生丝、皮革、生铁，等等）成为投机活动的对象和交易所买卖的对象以来，情况更是如此。托拉斯则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原料，或者是直接向生产这些原料的工厂购买，同时还向零售商直接交售自己的产品，从而摆脱了这些收费昂贵的中间人。它们也不再利用象店员、售货员等这一类人物中的某些人，这些人总是从售价中抽取一定百分比的金钱。

托拉斯体系既缩小了批发商业的活动范围，也改变了零售商

业的性质。从前的小铺老板，一俟商品进了店门，他便成为商品的主人，可以任意确定卖价，随便捣假售给顾客；现在，他在托拉斯的商品面前，就失去了这些权力。但在这里，托拉斯也并无创新，而只是把在它诞生之前即已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加以推广而已。各种药品及专利产品、罐头食品及高级露酒等等，都是装在密封的厚纸盒里、焊封的白铁罐里或是装在密封的特殊形状的瓶子里发给零售商的，上面都贴着标签，标明定价。零售商用不着对他经售的商品负责了；商品的质量由商标担保。他也不能再卖弄他在商品选择上比别人高明了，因为他进的货都是经过包装的商品。他也没法再说他的商品比他的同行的更高级了，因为两个人经售的都是同样包装的同样商品。他同样也不能指望按照曼彻斯特学派推荐的贱买贵卖的道德准则来大发横财；他得按照厂方在标签上标明的定价出售货物，厂方把他的利润率固定下来了，商品销路越广，他的利润率越低。托拉斯成倍地扩大商品数量，把它们包装起来，标明定价发给零售商。当某种商品不能装在盒里或罐里时，托拉斯就动用警察来监督，使零售商按照指定的价格出售商品；零售商出售商品时价格不得高于或低于它们指定让他卖的价格。它们甚至剥夺零售商为了储存商品而决定进货数量和挑选质量的自由。假如钉子业托拉斯经营大钉子更能赚钱，那末它发给零售商的就只会是对它有利的这类定货。烟草业托拉斯的做法也是这样。

剥夺零售商的自由意志及任何专门知识的托拉斯体系，使零售商陷于象在车站里贩卖书报的商贩一样的境地。他们贩卖的商品有定价，他们的收益并不是与销售额成正比，而是由阿歇特出版社决定的；这家出版商把超过一定金额的收益强行收回，用以弥补因被安排在上下车乘客不多的车站上而完不成这个金额的商贩的亏空。其实，这些书报商贩不过是受雇用的职工罢了。但是经售

托拉斯产品的商人，还可以预支租赁店铺和进货的必要资金，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是有产者。其实他们的情况同仅能留下足够糊口的粮食而出卖余粮以偿还利息的小农是一样的。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人开办了手工工场，从而破坏了行会手工艺人的手工业生产，在不知不觉中为资本主义大生产铺平了道路，后者反过来又破坏了手工工场的生产。当资本主义大生产上升到托拉斯体系，即发展到资本主义演变过程的顶峰时，便迫使商业变得仅仅成为生产上的一个配角，即使不是把它取消的话。

(三) 托拉斯体系与利润

利润，这颗商品生产的北极星，仍然是托拉斯体系的最高指南。这种体系把同类工业及其辅助工业组成庞大的、井然有序的生产体系，不过是为了让它们带来比在无政府状态下独自经营时更为可观的利润。

工业托拉斯化可以减少管理及其他行政费用，可以关闭业务重复的车间或工厂而不致于降低产量，扩充保留下来的车间和工厂，以最先进的设备将它们装备起来；利用小型企业所无法利用的副产品；加强劳动强度；把全部生产工序集中到一个工厂可以省去运费，还可以节约原料和辅料，等等。……^①这种集中化组织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足以保证托拉斯化的工业对它的那些单干的对手拥有明显的优越性；此外，托拉斯体系还能获得另一种更大的好处。

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构成资本利润的剩余价值，既然是无偿的、因而是被窃取的那部分劳动，那么，它便是在生产活动中，而不象当今的经济学家们所断言的那样，是在交换活动中创造出

^① 卡内基工厂本身是大托拉斯，它炼一吨钢只需要八百公斤焦炭，而在英国却要用一千公斤。——拉法格注

来的。一吨煤或任何其他商品，不会因经过几个批发商或零售商之手，转运了几十或几百公里路程到达消费地点而使自己的价值有所增加。价值即生产时所花费的劳动，始终不变；变化的只是价格。

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工业资本家所占有。但他不能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他得以捐税的形式交一部分给国家，以地租的形式交一部分给地主，以贷款利息的形式交一部分给银行和金融资本家，并以一部分给那些认为收购他的产品有利可图的批发商，后者则又将自己所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让给运输公司、推销员和零售商。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国家，都对剥削雇佣劳动感兴趣，因为他们和睦地、多少也算是公平地瓜分着由工业资本家每天从雇佣劳动上窃取的赃物。托拉斯体系使那些瓜分由生产者阶级身上掳掠来的赃物的盗贼人数减少了。实际上，自己生产原料及其加工所需辅助材料、自己运输产品、自己把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企业主，为自己保留了几乎全部剩余价值；而没有按照托拉斯体系组织企业的资本家，则不得不把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同另外的资本家瓜分。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托拉斯的资本总是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的“掺水”，有时甚至更多，但仍能使企业主得以保留更多的剩余价值，分配相当可观的红利。

体现托拉斯体系成就的大笔红利，并不是比独立的企业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的结果；在独立企业里，这种剥削已残酷到了极点。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企业一概没有能力提供这样高的红利。托拉斯的创立者摩根和洛克菲勒在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极度剥削方面，同经营独立企业的克虏伯、施奈德以及其他“慈善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愿意，他们可能提高工资，并且同时支付比他们的竞争者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红利。然而托拉斯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敬畏神明的基督教徒和“诚实”的“慈善家”，他们对劳动力丝

一点也不关心，完全不考虑如何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如何让工人摆脱过度疲劳或设法使工人的生活有一些保障。托拉斯剥削劳动是和他们那些独立企业的同行一样精明的，他们利用完善的生产方式，使劳动更加紧张。为了控制劳动人民，他们向政治和司法当局施加腐蚀性影响，当局就颁布反对工人的法律，对罢工工人实行镇压，甚至枪杀。

(四)托拉斯体系与银行

资本主义初期的企业，由于所需资本有限，是由一些仅能支配自己所积累的财富的人草创起来的。后来，由于企业的规模增大，所需资本超过当时个人所能积累的程度，人们便想到要把资本集聚在一起。当时圣西门起来鼓吹合并资本。股份公司与债券公司使圣西门的想法付诸实施。这些公司通过发行五百、一百以及象目前发行的二十五法郎一张的小额股票，把小股资本汇集起来，让他们在创办大型企业上发挥作用。国家公债，以及只有靠新型金融组织才能建设起来的铁路，都曾在发起和推广那个把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加以使用的制度方面作出过贡献。今天，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中去。不断把资本集中起来的银行，只有把这些资本贷给工商业才能有利可图；有时银行也直接参与工商业的活动。

托拉斯体系使迄今一直由个人资本经营的工业变成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化。近几年来，这种改造的速度非常快，致使游资被吸尽，一些大公司尽管急需资金，但在市场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也只好放弃发行债券的企图。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三年中吸收了大约三百亿资金，这些资金远非按其最初宗旨全部用于生产。

	1902年	1901年	1900年
	(单位: 亿法郎)		
对铁路的投资	45.09	45.77	32.70
对其他各个公司的投资	71.79	81.92	20.67
	116.88	127.69	53.37
	总计: 29794000000 法郎		

大量有价证券涌入金融市场吸收资本，破坏着金融市场的稳定。不久以前，《纽约时报》发表了皮·摩根同记者会见时的谈话。他在谈话中力图让人们不必因大量有价证券涌到金融市场而担心。他解释说，如果这几十亿的有价证券不是按其原来预定的目的适当地得到利用，那么这些有价证券无论如何可以用于为改进铁路列车和各种生产工具服务。

与此同时，托拉斯体系还在信贷机关的帮助下促进了资本集中，并使之日益完善。托拉斯企业要求迅速而大量地动用资本，以致拥有集中资本的银行也难以满足这种要求，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要，必须增加集中在每个银行的资本数额，并把一些银行联合起来。比较一下现在和十年前的银行活动，就可以看到银行已经走上这样的双行道。

托拉斯出现后的十年来，通过银行达成的交易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十年以前，纽约票据交换所登记的贷款总数是二十三亿二千四百万，其中八亿四千三百万（即约百分之三十六）是由八家大银行支付的。到了1903年2月14日前夕，该票据交换所的贷款总数已增加到四十六亿四千二百万，其中二十一亿九千八百万（即百分之四十七）是由六家银行支付的。换句话说，现在六家银行支配的贷款几乎等于十年前组成纽约票据交换所的六十四家银行所支付的贷款。这些资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银行对资本集中过程的巨大影响。

集中也涉及到银行本身。十年前，组成纽约票据交换所的六十四家银行拥有资本二亿零二百万。现在，组成票据交换所的五十八家银行却拥有资本五亿四千八百万。这就是说，现在银行减少了六家，但资本却增加了二亿四千六百万。

纽约最主要的银行结成了同盟，划分为七个集团或者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七个“银行联号”。属于这个或那个“联号”的银行有着共同的利益，又因为所有这些银行集团的利益都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这七个信贷集团都奉行一种共同的政策。到今年1月底，它们所支付的预付款总额几乎已达到五十亿。^①

不出人们所料，托拉斯的组织者在筹建银行托拉斯的金融集中化过程中起了强有力的作用。比如：皮·摩根的公司加入三个银行集团，而石油托拉斯则加入两个银行集团。托拉斯的利益同银行的利益溶合在一起。有人曾断言，银行联合起来只是为了相互支持，以共同的力量防止出现恐慌；这种恐慌从大量游资被吸收到各种企业时起就时常发生，以致变得更加危险。1902年的十月事件证明，金融市场的敏锐反应已达到了顶点。西部各州的银行为了在收获季节能够贷款给农民，通常是在这个季节即将到来之前就往回集结自己的资本。这种业务，虽然事先就预见到了，但仍使纽约的银行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并使它们的流动资金大大缩减，以致贷款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因此铁路股票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都骤然猛跌，而且这种下跌带有恐慌的性质。如果这种每年都在同一时间重复出现、而且远非意外的现象

^① 英国也在出现银行集中化的类似倾向。同佩恩—斯密斯银行合并的伦敦联合银行，现在准备吞并那家于1872年建立的、拥有3,000万资本和47个分行的约克郡银行；它在1902年支付了11%的红利。

正如最近十六年来银行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整个信贷业急速地联合起来，集中由有限的几个信贷机构来经营。根据《银行附刊》提供的资料，1888年英国和威尔士曾有115家银行，而现在只有69家。——拉法格注

能够使货币和证券市场发生动荡的话，那么当爆发某种意外事件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托拉斯之所以能够组织和扩展自己的大企业，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说，托拉斯必须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因为这种集中是托拉斯化企业存在的必备条件。显然，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成整体；而这种组织会以超过人们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联合银行的总董事会将把少数有威望的人物（现在这些人物已经聚集在为避免生产和交换方面互相竞争而成立的最主要的托拉斯的董事会里）集中起来。银行同盟使资本主义总参谋部易于组织其中央生产管理机构，这里面就包含着托拉斯体系的趋向。

工业和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联合起来。一方面，由于个人积累的资金已不能满足建立工矿企业的需要，因而工矿企业要依靠银行提供必要的资金。另一方面，银行集中了国家公债所吸收不了的、在小型工业中找不到市场的资金，为了养利生息，它们也得把资金贷给大型的工业公司。银行和工业的利益，从来也没有象现在美国这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生产领域中的任何麻烦都会给所有信贷机构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人们预料中的这次危机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爆发的一次最可怕的危机。

人们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麻烦归咎于托拉斯，责备它制造经济危机，好象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震荡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不能使生产资料和产品与需求相适应，因此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某种商品因求过于供，其价格高于正常价格时，大量资本便向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业部门涌来。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便会出现商品过多、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资料过剩的现象。托拉斯关闭一些工厂而并不因此停止满足市场需要，这就向最闭目塞听的经济学家表明，这种生产资料

过剩的现象确实存在。

但是，尽管托拉斯力图调节生产，使生产资料和产品与需求相适应，他们还是消除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只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造成生产过剩的原因就会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托拉斯同独立的企业的最终命运会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设备占去了本应带来利润的巨额资本，倘若生产一停顿，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它们不管市场上的商品是否积压也得照样生产。此外，兴旺的托拉斯每年都有几千万的剩余利润，除非像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守财奴那样把钱积攒起来，它就必定把钱投到扩充它自己的设备或其他工业的设备上去，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生产资料过剩就是这样形成的。托拉斯所实现的、保证它对于独立企业拥有优势的这些进步，由于提高了生产反而成了经济危机的原因。

近十年来，由于托拉斯空前地发展生产的结果，已经迫使美国放弃它的传统政策，走向帝国主义，用武力征服的方法为托拉斯化的美国工业争夺国外销路。托拉斯本身也感到国内市场太窄，而侵入国际市场。然而不论是殖民地的销路还是对国际市场领域的入侵，都不能挽救美国工业免于俄国工业所曾遭到的那种命运：沙皇政府在欧洲资本的帮助下，那样竭力鼓励俄国的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的生产，结果使之供过于求。

如果说托拉斯体系不应对即将来临的危机负责的话，那么它也将由于自己按科学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业组织和银行机构而大大促使危机的扩展和尖锐化。

(五)托拉斯体系与财产非个人化

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动产作为个人财产出现，产权得到巩固，以及后来推而广之，不动产也成个人财产，都仅仅是由于这类个人财

产具有两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属性。即：它是**所有者的劳动果实；它由所有者使用**。这两种属性给人们的印象很深，以致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至今仍断言：财产是劳动的果实。然而，个人财产一旦丧失使之成为合法的这两种属性，资本主义生产便不能存在。

动产当然还是劳动果实，但它们已不再是创造它们的雇佣劳动者的财产。生产资料（土地、机器、矿山等）也不是使用它们的雇佣劳动者的财产，而是既没有生产这些生产资料，又没有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资本家的财产。

因此，资本家的财产已不具有个人财产的那两种属性。经济学家、道德学家、哲学家和政界人物都在绞尽脑汁去发现那些能使资本家的财产披上合法外表的属性。当他们没有办法把资本家说成是生产者时，就说他是积蓄者。他们说，资本家的财富是积蓄的结果。可是，资本家是不劳动的，他所积蓄的无非是别人的劳动。换句话说，他是从雇佣劳动者身上窃取部分劳动果实以构成他的财富。当积蓄财富论被公认是一派胡言以后，那些具有“发明家”头脑的政界人物和经济学家便慷慨地赋予资本家经营管理的才能，说他们的百万巨资是他们的这些才能同雇佣劳动卓有成效地合作之产物。但是，社会主义者驳斥说，资本家并没有这种才能，有才能的是他的经理、行政人员和工头。因此不能以此来证明资本家拥有占有财产的权利。当经济学家们在绞尽脑汁以后，又把资本家的这种卓越才能改换成为某种形而上学的实体——运气，盲目的命运使资本家成为动产和不动产所有者，而不是什么个人才能。

股份有限公司推翻了这些煞费苦心地捏造出来的、不符事实的论调。拥有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家同生产不再有丝毫接触，他可以不过问进行生产的地点和生产的性质。对他来说，只要能捞到

股息，一切都无所谓，他所关心的只此一点。股份有限公司割断了连接所有者及其财产的最后纽带，使财产非个人化。于是人们也绝口不谈那个著名的“主人的照料”了。股票既可以是比埃尔的财产，也可以是保尔或任何一个二流子的财产，它们可以每天在交易所里易手，一天就能易手多少次，而属于股份公司的大小工厂却一直在生产，好象没有换过主人一样。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归拥有若干股票证券的集团所有的集体财产，这一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所有主完全没有用处。

然而每天都在向新的生产领域渗透的股份有限公司，也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外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工商企业不予干涉。这些企业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来领导，如果不是实际上，也是名义上进行领导。对于这些资本家，人们仍然习惯于将企业的领导有方和管理得法归功于他们。

托拉斯体系扩大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活动范围；它给本来在名义上还保留着个人性质的企业打上了无具名的印记。从而明显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所有主是毫无用处的，把资本家阶级的寄生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们又提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力量的论据。他们郑重其事地声明：股份公司使财产普及化、民主化了，它们通过发行一百法郎和二十五法郎的小额股票，让最小的钱袋参与了最大的企业，它们把最小的积蓄者都变成了资本家。不过，这种潘格洛斯博士^①式的乐观描述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半个世纪以来，股份公司把小老百姓的少量的钱从钱罐中、羊毛袜里挤了出来。把这些迄今为止还是自由的、分散的民间储蓄集中起来，不加监督，不承担责任地交给金融资本家管理，使他

^① 潘格洛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
——编者注

们有可能利用交易所的投机手段及其他高级金融魔术，把这些积蓄囊括过来。所谓依靠股份公司的财产民主化，不过是大资本家对小积蓄者的掠夺而已。^①

由于国家通过银行发行公债，直接向公众伸手，才使股份公司和信贷机构能把全国人民腰包里的货币财富集中起来，正如第二帝国的一位大臣所说的那样，股份公司和信贷机构通过这种所谓**利息民主化**，使老百姓习惯于把他们宝贵的钱财拿出来，可是一拿出来他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六) 托拉斯体系与股息率

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根据查·施瓦伯的定义，托拉斯归根结蒂也是股份公司，或是由公司组成的公司)给资本主义剥削披上了新的外衣。它们把工业利润非个人化了，犹如它们把财产非个人化一样。

工业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是剩余价值的榨取者。他把作为自己利润的部分保留下来，其余的让给国家、地主和批发商等。他为了确切地知道他的总利润有多少，每年都要进行盘存结算。

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使资本家免去了为榨取剩余价值所从事的工作，它们替资本家剥削生产者，把工业资本家先前为自己保留的

^① 引自1903年4月11日《法兰西经济学家》杂志所载巴黎政治经济协会关于“什么是资本家”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报告。协会中那些深思的成员，竟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重复早已陈旧的论断，郑重其事地把它当作是永恒真理。尼马克先生断言：“资本家是生产者”，而帕西先生及其他人则加以补充说：“资本家是货币积蓄者。”埃沙尔先生在其文章中阐述了为什么在法国小存户不愿意把自己的积蓄存入股份公司。他说：“金融辛迪加以其广泛的宣传和狡猾的交易所手法去扩充股份公司，他们把股票的价值抬高到超出股票实际价值的20%、30%、50%，然后把它们抛售出去。通过这种手段，使小存户遭受到巨大损失。自然，小存户也就不会再上当了。小存户成了小心翼翼的人，认为还是把自己的大数目存款存放在信贷公司较好一些。”——拉法格注

利润以股息的形式交给他们。在一个托拉斯或一个股份公司里，资本家的利润是按他们持有股票的多少进行分配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们投入企业的资本比例分配的。资本家不再盘存结算以知道企业有多少利润，而是计算他的资本得到的股息率是多少。

赖以表现工业利润的这种金融伪装，虽说不会改变其剥削劳动的性质，却影响到资本家从雇佣劳动那里所窃取的赃物的分配。

经营某种工业的资本家，可能将该种工业扩充规模，并入一些从属性的工业；但通常他并不想再搞其他性质的工业。例如，一个拥有纺织厂的资本家，通常不想再去建设高炉或开凿运河。可能因为他不懂这一行，也可能因为他墨守成规或者其他的理由。他是给他带来利润的那种工业的俘虏。

利息把资本家从这些桎梏中解脱出来。国家公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使资本得以任意转移，它们完全割断了资本家同收取他们贡税的国家的联系。从此资本家只认得一个东西，即利息。不管利息来自何处：是铁路，还是矿场；是本国工业，还是外国工业；是共和国政府，还是君主制政府；是本国的预算，还是外国的预算，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一切计谋，所有抱负都围绕在利息的周围旋转，资本家挖空心思谋取利息，只要得到利息，他就心满意足。为了追求高额利息，资本家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资本从酿酒厂转移到苏伊士运河或冶金公司，从法国的国家公债转移到购买德国或俄国的公债。资本家只要知道他自己的钱投入的公司或国家公债的名字是什么就够了，其余概不关心。他通常对公司经营的生产部门一无所知，只是模糊地了解一点发行公债国家的地理位置，他自己什么事也不管，甚至不需要看见自己的证券和股票，不需要剪利息票，他委托银行购买证券、股票，贮存和提取收入，只有利息使他感兴趣。

资本家谋取利息的欲望要比任何一个农民祈求上帝恩典的欲

望强烈，为了利用任何微小机会去获取他所渴望得到的利息，他必须把从前依附在一家生产企业上的资本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以电流般的速度从这一家公司转向另一家公司，由西半球到东半球飞速地周转。

为了使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能变这种魔术，交易所提供两种交易方式：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①

追求股息率的越野赛跑没有因为建立一个百分之三的股息率的标准值而告结束。交易所里一切有价证券的利息都围绕着这个标准值上下摆动。那些使股本较有保障的证券，其股息率略低于百分之三；而那些可能招致损失的证券，其股息率则较高。风险愈大，股息率愈高。

国家公债，股份有限公司，一句话，其股票和证券在新旧大陆的交易所里买卖的所有企业，形成一个连通器^②，里面来回流动着大量不知是谁的、不分国籍的资本。

这连通器中各个容器的水平不一般高，也不稳定；它们接连不断地受到各种复杂事件的干扰，而这些事件则影响国家公债以及股本在其中周转的那些公司的繁荣。当一家公司正在分配或有迹象打算分配较高的红利时，资本就会脱离那些不那么慷慨的公司而去购买这家公司的有价证券。这样尽管红利提高了，但由于本金增加，就使股息率回到了标准率的水平。一家公司的红利减少时，资本就会产生相反的运动。

托拉斯体系把大量原来保留个人企业特点的企业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把它们有价证券引进交易所，从而增加了利息在百分

^① 参阅拙著《交易所的经济职能》一文。在这篇探讨交易所经营手法的论文中，我试图分析一下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拉法格注

^② 连通器是由底部互相连通的几个不同直径的容器所组成的容器。连通器里如果只有一种液体，在液体不流动的时候，各个容器中的液面是一样高的。——编者注

之三上下摆动的非个人化的世界性资本的数量。

资本尚没有分割成小额股票、还没有民主化的农业、商业、工业和金融企业，只是暂时保留其个体性。它们也注定要采取集体形式，变为股份公司；交易所的投机旋风把它们卷进去了。正如艾米尔·贝列拉在半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的那样，这股旋风迟早要把全部资本主义财产吞没。

贝列拉由于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学会了如何从理论上珍视一切联合资本力量；所以他打算通过股份公司把农业、工业和金融的财产动员起来。按照他的计划，这些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应该在它们之间并同动产信用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交换。动产信用公司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Omnum (信托公司)。这样一来，贝列拉就能把资本家联合在一个庞大的辛迪加之中；辛迪加的成员要互相保证资本的平均利息和按比例属于每一股的收入。艾米尔·贝列拉的这一计划，在五十年前当金融学这门学科刚刚建立时未能实行，现在却由于托拉斯体系而近乎实现了。

股息率统一了对劳动的剥削，托拉斯和股份公司都是为股票及债券持有者负责榨取剩余价值的组织。它们窃取的剩余价值就象洗劫一座城市后掠得的战利品那样归大伙公有，并按其投入剥削新旧大陆的劳动者的资本比例在资本家当中进行分配。

从交易所里买来一张有价证券的资本家，保证会得到从雇佣劳动榨取来的一份利益。证券的价格越低，股息率越高，这部分的利益就越大。因此，随着某种证券股息率的涨落，资本家们就竞相将这种证券买进或抛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消除了生产和交换领域里的竞争，把竞争转移到交易所里。但这种仅仅间接影响生产的竞争，却对普及、加深甚至触发生产危机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第五章 托拉斯体系的社会作用 和政治作用

经济学家们害怕托拉斯，因为托拉斯把他们的伪科学降低为某些有利害关系的人们的枯燥无味的空谈。相反，社会主义者却密切注视着托拉斯体系的发展，因为托拉斯体系正好给他们所宣传的学说，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集中、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逐渐消失以及广大群众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学说提供了一个明显和无可争辩的证据。^① 尽管他们已唠叨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他们至今还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我们的社会观点是幻想家的空想，

^① 社会党宾夕法尼亚州委员会书记弗·隆曾以社会党的名义给皮·摩根写过一封信，以讽刺的笔触表达了我们的美国同志对托拉斯的看法。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刊登过这封信。该信内容如下：

纽约市

约·皮尔庞特·摩根阁下：

“冒昧给您写信，请原谅。首先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您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同时我们不得不补充一句，您不过是一种不自觉地为社会各种经济力量服务的工具，是某些经济趋势和社会趋势的主要活动家之一，尽管您对这些经济趋势和社会趋势的意义还没有意识到，而且对其终极目的也没有预计到。您正扮演着一个当代规模宏大的托拉斯运动的领袖人物的角色，这一托拉斯运动正在使文明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它所取得的成就比工人的薄弱力量可能获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通常在学校里讲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过时的错误学说，因为它断言竞争是发展社会财富的最佳手段。其实托拉斯所取得的成就已表明，社会生产的合作化组织是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正是社会主义者五十年来一贯坚持的论点，您如果读一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会对此确信不疑了。

多年以来，资产阶级学者竭力使人们相信，实行全国规模和国际规模的生产是不可能的事，一个人或一些人根本无法领导规模如此庞大的企业。他们说，这样一种生产必定在其自身的重压下崩溃，它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然而，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托拉斯甚至能使最愚蠢的人对此确信不疑。”

朗格接着阐述了经济发展如何使社会分化成两个对抗性的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如何使得资本家阶级能够控制政府、教会、学校和一些领取津贴的报刊。经济上的统

毫不考虑人的欲望和世界事变的进程。然而托拉斯体系却把幻想家这一称号回赠给那些荒诞的说教者——那些经济学家和政界领袖。

这些工业上的庞然大物已经越过大西洋而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它们把不同类别的生产部门联合起来，以便确保自己的企业能够得到原料和销售其产品。它们取消竞争，科学地组织生产，以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们把亿万财产的支配权交给几个金融资本家来掌握。它们使钢铁大王和石油大王成为地下矿藏和海洋资源的主宰者，使垄断全部肉类贸易的四大巨头成为铁路大王。大家可以看到，难道这些托拉斯不正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试图组织全国性生产和交换的一种尝试吗？

治地位使得资本家成了那些经济上受剥削受压榨、肉体上受折磨和精神上受摧残的工人阶级命运的主宰者。政治平等的空谈成了辛辣的讽刺。政府不过是财阀们借以秘密勾结起来、躲在其背后以便从幕后操纵政治机器的一个组织而已。

“两个阶级的斗争越来越残酷了。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小企业和靠小企业为生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消失。无产者和失业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

社会主义者希望制止这种斗争。但是，只有在产生这种斗争的根源被消灭以后，斗争才会停息。为此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托拉斯，将它们收归全民所有。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使一切财富的生产者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社会党人所从事的正是这项工作，而托拉斯的发展使得运动更加易于开展……

美国赞成社会党人的票数超过了33.3万张。工业区宾夕法尼亚州2.8万票，知识分子密集的城市马萨诸塞4万票，等等。摩根先生，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应该感谢您和您的阶级，因为正是您和您的阶级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但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党宾夕法尼亚州委员会代表 弗雷德·隆敬启 1903年2月14日于费城”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同样也研究过托拉斯的问题。下面我们引述两项决议为例，这两项决议都表明社会主义者对托拉斯的认识是一致的。

一项是1900年9月法国工人党在伊夫里（巴黎附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决议指出：

“托拉斯，即一种或数种同类生产事业的垄断组织，不久前产生于美国，现已日

金融资本家所以把同类生产部门联合起来，把辅助企业并入这些部门，只不过是為了谋取利润。但却带来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后果：把大量属于不同类别的企业联合成为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体系，使这些企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股份公司已使资本家们有可能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不同的企业中去，为的是如同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托拉斯体系则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已经不只是把矿场、铁路、织布厂、造船厂等企业的股票积聚起来放在一个皮包里就算完事，而是把这些矿场、铁路、织布厂、造船厂等企业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或国际性的组织。

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的国有化（这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终目

益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托拉斯是资本集中的最高形式，它正在加速资本的集中。

托拉斯正在消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竞争，并调节生产，将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减少到一定程度，从而使生产摆脱非生产性开支。

但是，在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组织的情况下，托拉斯也和任何一种进步（例如机器的使用，劳动的分工，等等）一样，带来了直接恶果：它加强了对呻吟于统一管理重压下的各劳动阶级的奴役，同时还剥削消费者。

受托拉斯排挤而陷于破产的那一部分资本家阶级要求消灭托拉斯，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个政府能够遏制托拉斯，托拉斯是一种迟早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鉴于以上所述，大会声明，只有将一切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才能解决托拉斯问题，同时又保留托拉斯的一些优点。”

另一项是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指出：

“托拉斯是企业主和商人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同盟。

这些同盟是竞争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产品所有者可能获得超过他们所能销售的产品。这就使他们把竞争看作是危害自己获取利润的敌人，因而要在现存制度下就把它消灭，而以生产领导者的联合和合作来代替竞争。托拉斯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摆脱这些困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国有化，尔后在国际托拉斯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那些部门之间，实行国际性的生产调节。

……这样一来，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私人生产，便逐步转变为以获取产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

——拉法格注

的),绝不是什么空想。堪称为空想家的倒是那些学究和谨小慎微的人,他们要求消灭托拉斯体系和恢复小生产,仅仅是因为摩根集团、洛克菲勒集团和哈夫迈耶集团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为了一伙资本家寄生虫的利益而在设法实现这种国有化。然而,如果把积累了亿万财富而丝毫不愿也不可能利用这些财富的托拉斯体系的创始人,同那些过着腐化生活的资本家等量齐观,也是不公平的。施瓦伯这个精力充沛、工作到了狂热地步的劳动组织者,只是最近才听从了医生的劝导而同意休息。洛克菲勒的消化系统坏得只能吃一种特殊的奶制品。他已许下诺言,谁要是能把他的病治好,就酬谢五百万元。^①资本家一旦发了财,往往就离开工作贪图安逸,享用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反之,托拉斯的活动家们却永远是一些献身于自己事业的人,并且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而活着。这些人就是卡莱尔所说的“工业统帅”的化身。他们的心目中,既

^① 《时报》转载了某记者访问施瓦伯时的一次谈话,一问一答十分简要。施瓦伯原是一个小店员,白手起家,经过一番奋斗,得到了卡内基工厂董事的职位,年薪达五百万。后来,在他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操纵美国整个国家财富的几个金融寡头之一。

“您多大岁数?”记者问。

“三十八岁。”

“您在什么地方出生?”

“宾夕法尼亚州布莱尔郡。”

“您在哪儿上的学?”

“在布莱尔郡。”

“您离开学校时多大岁数?”

“十八岁。”

“您当时的爱好是什么?”

“技术。我当时想成为一个工程师。”

“您的第一个职业是什么?”

“在食品杂货店当售货员。”

(哄堂大笑)

“当时很苦吧?”

“干了六个星期,确实很苦。”

没有人类的同情心，也没有社会理想。他们在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和剥削工人时丝毫不感到内疚。他们就象轧钢机中的轧辊一样，无动于衷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不管他们是否自觉，是否违背他们原来的意愿。他们终归是干着革命的事业。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经济形式，人类的未来将会从这种经济形式中被铸造出来。

通过对托拉斯体系的研究，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理想得到了新的信心。他们可以更加坚定地确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不论是牧师的祷告，还是经济学家的虚构，或者政府当局的欺骗和镇压，一分钟也延迟不了社会危机的到来。这种社会危机将使被剥削者通过猛烈的进攻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

托拉斯体系正在从人员和事件上为这一巨变准备条件。

商业原来是对农业和工业发号施令的，而现在，托拉斯体系却

“您是自学的吗？”

“是的，我跑遍了周围的工厂，我没有虚度时光。”

“您是怎样进入铸钢工业部门的？”

“很偶然。我认得一位工程师，他收留了我，鼓励我并给我安排了工作。”

“后来呢？”

“后来遇上了卡内基先生，我在霍姆斯特德创办了几个工厂。碰到困难，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现在成了卡内基公司的总经理。”

“这么说来，钢铁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都更适合于您的卓越才能了？”

“才能？我没有什么才能。我只知道不辞劳苦地辛勤工作。”

“您获得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劳动，劳动，再劳动！”

“您喜欢大自然吗？”

“我没有工夫去欣赏。”

“剧院呢？”

“我没有工夫去，没有工夫！”

“骑马？”

“哎呀，真见鬼！没有工夫，干什么我都没有工夫！”

施瓦伯先生说到这里匆匆走开了，希望赶快把谈话浪费掉的时间补回来。

——拉法格注

使商业也得遵守它的法纪。商人由于经营托拉斯的商品而丧失了一切独立性。他们丧失了选择商品的权利，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包装好的、贴有价格标签的商品。他们必须抛弃发大财的幻想，变成托拉斯的职员，如同他们从前在经济上独立时那样，为赚钱操劳。

托拉斯在其已扎了根的那些生产部门所引起的恐慌，也使销售这些生产部门产品的人们栗栗不安。因此，在竞争中遭到破产而变穷了的工业家便和陷入托拉斯体系罗网的商人们一起形成一个人数日益扩大的不满阶层。他们叫嚷说，必须制定取缔托拉斯的法令，幻想回复到昔日那种他们靠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发财致富的幸福时代。

资本主义的集中一方面为托拉斯体系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使农业受到极大震动，从而引起了两股强大的运动：一股是西部各州的农民运动，农民们为了与铁路上的粮食投机活动作斗争而联合组成一个广泛的“格兰其”，但这一运动随同布赖恩为实行复本位制的竞选运动与民主党一起遭到失败。另一股是雇农运动，这股运动在人民党领导人科克西指挥下向华盛顿举行了著名进军之后就停息下来了。而托拉斯体系则用同样强大的力量打击地主、工业家和商人，又在农村引起骚动不安。

空想主义者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就选择北美作为进行自己社会实验的试验场所。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一些小型的村社，这些小型村社本应通过实践显示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并成为整个社会改革的样板。康拉德·贝西埃尔于1732年成立了幼发拉底村社，杰米纳·威金逊于1780年成立了耶路撒冷村社；修女安娜于1786年成立了黎巴嫩山村社，这是三十五个震教徒^①村社当中的第一个会社；乔治·拉普于1805年组成了和谐公社；罗伯特·欧文于

^① 震教徒是基督教的一派，因祭神时跳震动舞而得名。——编者注

1825年组成了新和谐公社；埃蒂耶纳·卡贝于1848年成立了伊加利亚公社，等等。然而，在美国这个以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基督教个人主义而著称的国家里，却不大适合于从事这类试验，因为正是在这个拥有辽阔的处女地的国家里，以极端的利己主义推行着“人人为自己”的这一无政府主义原则。正如遥远的西部地区的移民在民歌中所唱的那样，每个“愿意辛勤劳动”的人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工作，购置财产，并且过相当富裕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希望获得最高的政治地位。众所周知，林肯原是一个伐木工人，格兰特曾是一位制革工人，约翰逊原是一个裁缝，如此等等。各行各业的大门都是敞开着，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行业大显身手，挑选工作，借以找到一条捷径去获得自身的幸福。曾经更换过十几种职业的美国人是举不胜举的。

经济生活中盛行的自由，也反映到政治上，国家具有真正民主的性质。这个国家赋予公民们一切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欧洲人要想争取这些自由却是枉费心机，他们甚至以革命为代价也争取不到这种自由。美国政府不象旧大陆国家那样，豢养各种雇佣军来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以防工人们侵犯。因为所有美国的工人都希望自己会变成财主，而且往往不用多久他们就确实变成了财主。市政当局、政府和联邦同盟都不大关心如何保护公民，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有相同的经济条件，或者希望争得相同的条件，他们拥有武装，能够保卫自己。国家政权机关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这种虚假的经济平等；这种平等在工商业无政府状态的竞争所引起的斗争中，使人人能得到几乎平等的机会。为了使小企业主也能参加竞争，各州于1861年战争之前就颁布过一些法令，限制工商业公司的资本额，但各州却不保护居民免受那些为社会需要服务的工业公司的剥削。邮政、电讯、铁路、照明、供水等等都交给各私人公司经营，不受任何监督，同时也交给公民使用，使公民有充

分的自由去办好自己各种大的和小的、正当和不正当的业务和去剥削自由公民。这是对自由的玷污。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学家和政治家们面对着美利坚合众国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感到无比兴奋，甚至欣喜若狂。

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理想乐土的堡垒却被 1861—1865 年的战争摧毁了。这场战争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欧洲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从伪君子格莱斯顿到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他们都因为资本家拥有奴隶的自由被剥夺而不满。战争加速了金融资本的集中。在这以前，金融资本的集中进行得非常缓慢。当时掌权的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人，他们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以最卑鄙的手段在供应军队枪炮、弹药、粮食和服装等物资时，把钱财装满自己的腰包。讲和之后，在美国积累起来的资本迅速集中到农业，而从欧洲转来的资本则主要投放到铁路的修筑上。几年之内，美国的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致从 1879 年起，竟以大量出口粮食使欧洲农业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的农业状况。到当时为止，每年都有大批欧洲移民到达大西洋沿岸，他们在美国东部城市逗留一段时间，积攒了一些钱财之后，便迁往西部地区。那里的土地售价低廉，或者由政府按一定条件无偿分配。拓荒者用粗耕方法将土地耗用得贫瘠不堪以后，便廉价卖给新来的人，自己又继续向西部更远的地方迁移，寻找新的遭致同样命运的土地。这样，源源不断的移民将他们推向前去，一直到他们将全部新的未经开垦的土地开发完为止。但是，这时金融资本家的农业公司和铁路公司却把土地都买了下来，对于没有资本的移民来说，西部地区就被封闭了。

工业曾一度被人轻视，可是如今美国资本家的全部进取精神都集中到了工业上来。以前屈居第二位的工业，如今迅速赶了上来，甚至超过了农业的发展。现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工

业都已跃居于农业之上，占有统治地位了。

经济上的这些变革，不能不使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条件发生强烈的动荡。农场主通往幸福的所有道路都被堵死。除了债务以外，他们再也得不到什么了。向消费者出售农产品的业务，以前是由他们亲自经营的，如今却落到商人和投机分子的手中。这些人与铁路和银行家相互勾结，使农场主破产，使之变为有名无实的所有者。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赶出土地，仅仅是因为债主们通过放债所得到的利息，比直接用这些钱亲自经营田庄所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货币经济在农村中的广泛活动，使得一个新的阶级——雇农阶级——在农村中形成了。他们在农忙季节和收获季节从城市来到农村，秋收结束后，冬季到来时又回到城市。这些不幸的、一般说来都是相当散漫的雇农，由于在工厂找不到工作，于是变成了一群流浪汉；他们时常拦截火车或向沿途村镇的居民勒索食物。人民党的一位鼓动家科克西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和他们一起进军华盛顿。在农村里发生这种演变的同时，资本主义工业却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大工厂里，而且在此期间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工人们原来曾指望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挣得财产，这种愿望后来也完全落空了。

但是，这种愿望在文明人的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竟使工人不顾生活中的种种教训，怎么也不肯加以抛弃。的确，对于这种已被资本主义生产消灭了的经济时代的残余，人们可以举出某些事例，使不论老少都可以常常回想到确有一些人摆脱了贫困，挣得了亿万财富。这些巨大财富竟使美国工人陶醉，使他们不甘心放弃那种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希望。尽管这些工人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一个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已不可能获得个人解放的阶段，然而他们仍然没有表现出追求集体的阶级解放的愿望。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给美国带来了当代社会主义的种

子。然而接受新思想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上层工人，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这种新思想还是停留在字而上的东西。他们说：“给我们讲阶级有什么用呢？难道美国存在着阶级吗？难道我们大家不是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吗？难道我们每个人不是都能成为企业家、资本家或合众国的总统吗？我们需要革命干什么？难道我们没有投票权吗？难道我们不是由自己选举法官、市议员、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总统吗？难道我们没有信仰、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吗？我们究竟还缺少什么权利，缺少什么自由呢？”这些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蒙蔽的可怜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只是理论上的空谈，资本家已剥夺了他们享有权利和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象在美国那样，自由主义及其同伙——基督教——竟使工人阶级的思想糊涂并歪曲事实到如此地步。托拉斯体系正在毫不留情地拆穿这种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无稽之谈，使工人的思想豁然开朗。

如果说，托拉斯体系损害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那么它也并没有给雇佣劳动带来什么特殊的好处。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什么东西会给工人带来好处，甚至连起初似曾使他们的命运好转的那些改革，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奴隶和牛马的主人必定怜惜奴隶和牛马，因为它们值钱。但工厂主却无须去关心那些随时可以雇到的雇佣工人。一旦不再需要工人的劳动时，就把他们一脚踢开，听任他们到处流落饿死。托拉斯已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逐出门外。不久前，石油托拉斯和糖业托拉斯为了进行投机活动，就暂时关闭了自己的某些工厂。

托拉斯体系所引起的集中，使资本主义统治套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枷锁变得更沉重了。工人们不可能更换雇主。不管他们进入哪个工厂，他们遇到的都是同一个主人；工厂主把所有的“顽固分子”都列入黑名单，就象古代给逃亡的奴隶在额上打上烙印一样。

进行罢工这样一种劳工骚动，已变得困难多了。托拉斯并不害怕局部罢工。因为如果它的某个工厂由于罢工而停产，生产任务可由其他工厂来完成。但托拉斯并不满足于此；它还要使一切劳工骚动，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都成为不可能。虽然人们在报纸上、公共集会上和国会里都诅咒托拉斯，然而受“独立工厂主协会”支持的摩根集团一伙却要求颁布法令，强令工会承担责任从物质上赔偿企业主由于罢工所遭受的损失。正象英国资本家已经做到的那样，他们也会做到这一点的。^①

直到最近，美国工会还完全停留在经济斗争阶段。它允许自己的会员投票赞成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属一伙的资本家，允许他们去充当国民警卫队员——在罢工期间维护资产阶级秩序和“劳动自由”。然而托拉斯体系却激发了工会的一种新精神：许多工会已下令自己的会员退出国民警卫队；而且所有工会都开始认识到，仅仅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特别是从1901年技术人员举行罢工抗议当时组成的钢铁托拉斯以后，就更加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工会中已提出了参加政治斗争的问题。

托拉斯体系不仅给工人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而且使这种不

^① 拉特兰法庭(佛蒙特)不久前作出的判决表明，资本家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不需要新的法令。1903年4月，这个法庭曾作出这样的判决：罢工工人要用工会的现金赔偿雇主损失，现金不足时，由工会会员的个人财产中扣除。拉特兰法庭的这一判决是不会没有人仿效的。

尽管美国的法官是选举产生的，却受资本家所控制。由于美国的司法权高于立法权，因而这种从属关系会带来更为有害的后果。任何一个法庭都可以把由国会或州立法会议通过的法律宣布为违反宪法而予以废除。不久前，在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共和党人和三名民主党人组成的纽约上诉法院，作为一个终审法院，在审理工人和雇主之间关于工作日长短的争议时，竟作出这样的判决：那项规定在公共工程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因此是无效的，不一定必须遵守。人们认为，由于这一判决，承包人收入腰包的钱就有3,000多万，因为他们同纽约市订立的合同中规定可以索取最高价格的权利，作为他们必须遵守八小时工作日的交换条件。——拉法格注

满情绪有了明确的性质和方向；它明确地给工人们指出了他们应该努力追求的革命目标。美国政界领袖们也知道工人阶级在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共和党的主要首领马克·汉纳（该党有一部分人想提名他为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与罗斯福对抗），4月8日在克利夫兰召开的一次有政界和金融界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充满不安和绝望情绪的演说。

他对金融界人士说：“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早作防范，是会有好处的。因为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爆发一场最大的风暴，一场世界上未曾有过的风暴……工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我认为局势远不是美好的，相反，政局正被一片不祥的乌云笼罩着。工人们很快就要为一种革命精神所浸透，这是社会党人在工人当中煽动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泛滥全国，很快就要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后果。我们资本家对这些会引起风暴的事实不应掉以轻心。相反，我们应力图驾御这场风暴，如果可能，就把这场雷电交加的风暴引向我国各个政党。

我吁请你们注意这些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同时请你们竭尽全力制止这场运动（我对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如果我们继续采取我们近十年来的那种策略，这场运动将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在许多地方犯了错误。华尔街（纽约的金融中心）所做的一切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的所作所为很不谨慎。向市场上抛售了价值数百万的物品。我们榨尽了中产阶级的全部资财……工人的购买力大大降低，我们的错误使工人们有一切理由进行暴动。所以，当暴动的日子一旦来到（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认为皮尔庞特·摩很的脑袋将一文不值；因为工人们认定，正是他，应该对工人们所遭受的灾难负责。”

马克·汉纳的坦率，在华尔街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人们

纷纷指责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事实夸大了，把事情渲染得太过分了。究竟他的演说有没有夸张；且不去管它，但一个共和党领袖竟认为需要用这种语言来说话，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时代的特征。

法官格罗斯克佩2月15日在密执安大学的廉洁政府俱乐部发表的演说，虽然从形式上看还不那么尖锐，但实质上至少带有惊恐不安的性质。他说，“劳资之间的对抗是一个带有反共和国、反美性质的事实。将人们分成两股互相敌对的势力，就有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危险。托拉斯体系观念助长了这种危险。托拉斯体系使有产者人数减少，不过，比这更可怕的是，它迫使广大自由阶层的人民不再是财产的朋友……这个阶层必将加入敌视财产的行列，这将给社会主义增添力量，使它成为不可战胜。”

美国的政治生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的政治土壤上第一次发生了阶级斗争。

托拉斯体系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议会机器摇摇欲坠。和英国一样，美国的议会机器也是操纵在两个轮流执政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手中的傀儡。在野党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心怀不满的人，这些人盼望在野党实行改革，把这种改革看成是可以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错，他们总是大失所望。然而这并不妨碍反对派的政客们重新诱骗他们上当。因此，只有既公开帮助共和党人又公开帮助民主党人的托拉斯，才使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揭下了蒙在眼睛上的障碍物。他们开始看到，有一个新的政党既同民主党人也同共和党人（这两个政党同托拉斯是酒肉朋友）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宣布进行社会革命，主张剥夺资本家阶级并对生产资料和交换实行国有化，把这当作医治社会痼疾的良药。所以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政党了。社会主义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表明，它在社会舆论中已获得何等重大的成果。这超出了战士们的期望，给战士们增添了新的力量。

流亡的巴黎公社战士和被俾斯麦赶出来的德国侨民把当代的社会主义带进了美国，但由于种种独特的原因，它仍然是舶来品，没有得到美国人的信任。托拉斯体系把社会主义变成了本国货。我们的美国同志已经掌握了它，给它贴上了自己的标签。当欧洲社会主义者读到美国同志们为数众多的报纸和小册子时，都感到非常高兴，钦佩他们那种明显的实践才智和热情奋发的精神。他们用这种才智和精神去阐述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将这种理论运用于美国的现实生活。当他们认识到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出人意料的异常发展而落到自己肩上的历史任务以后，便热情地宣布自己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的倡导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阐述过发生在1848年革命以前、并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那些经济大变动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生产和交换所遇到的周期性危机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有朝一日这样的危机将引起社会革命。这一预言很可能在美国应验。

现在，美国资本家正在期待着贫年的到来，以接替从1899年以来一直使工业得到繁荣的丰年。他们也预感到，正如马克·汉纳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恐慌行将到来，那时大批企业将要破产。他们认为，拥有大量资本和牢固地建立在国内外基础上的托拉斯，能经受得住经济风暴的袭击，并将在它周围的废墟中以更宏大的规模发展壮大。

但能否设想，社会各阶层中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都会象基督教徒那样深信将在天堂里上帝的右首占一个席位，都会甘心忍受目前的一切灾难呢？难道他们不会实行现时就在争取实行的所有工业垄断组织的国有化吗？

美国资本主义的崩溃必将引起欧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选自《世界经济译丛》1980年第8、9、10、11、12期

（王子野 易廷镇译）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1904年3月16日)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卡尔·马克思

—

社会主义的批评家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便奠定了他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的基础。显然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由于担心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会败坏他们的清白和使他们失掉资产阶级的仁慈，因而对这方法不加以理睬。但是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使用这种方法也犹豫不前；或许他们是害怕得出可能把资产阶级的概念弄混乱的结论吧，其实他们一直是这种资产阶级概念的俘虏，不过他们自己不觉察而已。他们不在实验中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不是在试验之后再行判断，而是热中于宁愿去争论这个方法本身的价值，并且从它里面挑剔无数的缺

* 本文首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22年卷(1903—1904)第1册第780—788、824—833页，题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后来收入《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编者注

点：他们说，这方法没有充分估计思想和它的影响，它粗暴地凌辱了永久的真理和原则，它没有考虑到个人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它引到经济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使人们放弃任何努力，等等……然而假使有一个木匠，他不去用他的锤、锯和刨进行工作，而是对这些工具吹毛求疵，那末这些同志对这木匠将有如何的想法？这木匠只有唠叨不休，因为尽善尽美的工具是没有的。只有经过实践之后提出的批评才不是空洞的而是有效的，因为实践经验比一切经过深思的论断更能指出工具的不完善和如何加以改进。人类最初使用的是粗笨的石锤，只有实践才教会他们制造出一百种以上的质料、重量、形式都不相同的各种类型的锤子。

还在公元前五世纪，留基伯^①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②便使用了原子的概念来解释精神和物质的构造；而两千年来的哲学家不是在实验中去验证原子的理论，而是去争论原子本身，**争论无限连续的物质实体，争论空虚与中断**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道尔顿才利用德谟克利特的观念来解释化学的化合。原子，哲学家不知拿它来做什么，一到化学家手里便成了“人类的智慧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就在用于实践的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工具终究还不是完美无缺的。物质的放射性使物理学家有可能把原子——物质的极限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渗透的粒子——分解为超极限的粒子，这些粒子在一切原子中都是同样的并且都是带电的。这些粒子比一切原子中最小的氢原子还小一千倍；它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围绕着自己的原子核，如同行星和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因此，原子就象是一个小型的太阳系。我们所知的物

① 留基伯（公元前5世纪）——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编者注

②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体的元素的差别只是由于它们的粒子的数量和旋转运动不同而引起。最近发现的原子的放射性既动摇了数学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又破坏了化学结构的原子基础。不必再举出更多明显的例子就可证明空论的无益和实验的有效。无论在物质界或在精神界只有行动是有益的：“行动在先”^①。

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以便靠它的帮助在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确立某种秩序。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和解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和智力的局限性使得社会主义者独占这个工具；但是社会主义者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就希望确信它是绝对完美无缺的，可以成为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钥匙。他们可能终生为此争论不休，可能写一篇又一篇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甚至许多卷的书，然而他们在思想的问题上却一步也没有前进。从事科学的人们就不是这么胆小；他们认为“理论和假设是否正确在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只要它们能引导我们达到与事实相符的结果就行”^②。真理，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是最有效的假设而已，**错误往往是达到发现的捷径**。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从托勒密所得出的地球圆周的错误计算出发认为到达了东印度，其实他发现了美洲。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淘汰说的最初观念是由于他盲目地采纳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的错误规律而得出的。物理学家现在可能认识到德谟克利特的假设对于理解最近研究的现象是不够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有助于创造现代化学。

对于一个事实人们还很少注意，这就是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只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幕。——编者注

② 维·鲁凯尔在1901年格拉斯哥科学家大会上的开幕词。——拉法格注

实践中加以检验。因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方法所达到的结果提出异议，只有驳倒例如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批评这种方法。然而人们却没有这样作。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魔鬼的邪恶产物，正因为它引导马克思去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强大动力的理论。

二

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 唯心主义哲学

历史，这是一堆混乱不堪的事实，不受人们的控制，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互相冲突，出现也罢，消灭也罢，都看不出明显的理由，这就不能不诱使人们设想把历史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类，从中发现进化和革命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整理历史使之系统化的试图的失败引起某些杰出的思想家，例如赫尔姆霍茨^①的怀疑，他们认为“未必有可能制定在实际上得到证明的历史规律”^②。这种怀疑现在已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以致现代的思想家已经没有胆量象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哲学家那样去创立世界通史的体系；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不相信有可能控制经济力量的反应。但是能否由历史问题的困难和解决它的试图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结论，说解决这个问题是人类的智力所办不到的呢？若是如此，社会现象就可能成为一个例外，成为人们不能使它与制约

① 赫尔姆霍茨(1821—1894年)——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编者注

② 英国的历史家弗路德认为历史事实不能构成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而我们不能期待某种事实的再现来修改我们的假设的意义”。——拉法格注

它的原因发生逻辑联系的唯一现象。

普通人的常识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这种不可能性；相反地，人们总是认为落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祸福都包括在最高主宰所预定的计划之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人民的智慧的历史公理，它同几何学上的公理一样包含很多真理；——问题只在于对上帝这个词的意义如何理解。

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每一个古代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的城市之神，希腊人称之为守护神，它保护城市的命运并住在专门用来供奉它的神殿里。旧约中的耶和華就是这一类的神；他住在一个被称为“圣柜”的木箱里；以色列诸部落在向新的地方迁徙时总是带着这“圣柜”一起走，并且总是把它放在军队之前，好让耶和華為自己的民族打仗。——《圣经》说他是这么关心他们的纷争，以致到他们的敌人那里去消灭了男人、女人、儿童和牲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人认为，为了抵抗汉尼拔而把佩辛努之神，即赛比利——诸神之母，增加到他们的城市之神上去将是有益的；他们从小亚细亚运来她的雕像——一块巨大的未成形的石头——并将她的狂饮的祭仪也输入罗马。罗马人不仅是讲迷信的，而且是狡猾的政治家，他们吞并了被战败的城市的守护神，把它们雕像运到卡皮托里^①去。他们以为神不会再保护被战败的民族，因为它已不住在这个民族里。

基督教徒关于神也保留着同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为了驱逐多神教的神，曾经捣毁他们的神像和烧毁他们的神殿；或者让耶稣及其天父来对付异教奠基者的恶魔和对付那用新月形来抵制十字架的阿拉^②。中世纪的城市都把自己放在守护神的庇护之下；圣热纳维埃夫是巴黎的神。威尼斯共和国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庇

① 卡皮托里是罗马的一个小丘，丘上有丘必特的神庙。——编者注

② 最初的基督教徒也这样牢固地相信异教及其奇迹，正如相信耶稣及其奇迹一

护神，曾从亚历山大运来圣马可的遗骸，又从蒙彼利埃运来圣罗凯的遗骸。各文明民族尚未抛弃异教的信仰。每一个民族都独占一个唯一的和普遍的基督教的上帝并且把它变成守护神，这么一来，有多少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就有多少个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这些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互相撕打；只要各民族之间一宣战，每一个民族便都祈求自己的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去消灭自己的敌人并唱着《神赞美你》的歌，假如获胜了，它就完全确信自己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万能的上帝的参战。对于上帝干预人的战争的这种信仰不是国家要人为了迎合愚昧的群众的粗俗的迷信的简单的弄虚作假；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抱有这样的迷信。最近公布了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时致其妻子的私信；这些信说明他相信上帝只作关心他、他的儿子和普鲁士军队的事情。

那些承认上帝是历史的最高主宰的哲学家也沾染了这种迷信；他们以为上帝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上帝除了关心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之外不再关心其它的任何事情。博胥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是这类最出色的典型之一：多神教民族互相火并是为基督教——博胥埃的宗教的到来做准备，而基督教民族的彼此厮杀又是为了赞扬法兰西（博胥埃的祖国）的辉煌和路易十四（博胥埃的主人）的光荣；上帝所领导的历史的运动是由“太阳王”来完成。当太阳隐没时，黑暗便笼罩着宇宙，革命便爆发，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把革命叫做“撒但的产物”。

撒但战胜了上帝——贵族和波旁王朝的守护神。资产阶级——这个当时还没有被上帝看上眼的阶级——夺取了政权并把

样。德尔图良在他的《辩护》一书中和圣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中都说，根据不可争辩的事实，埃斯库拉普曾使死者复活，他们引用了死者的名字；又说有一女神曾用筛子从台伯河取水，而另一个则用腰带拖拉小船，等等。——拉法格注

承受天命的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受上帝诅咒的自然科学庆获胜利并给有产阶级创造了比上帝给予自己的宠儿贵族和合法的国王还要多得多的财富。被上帝束缚着手脚的理性摧毁了自己的锁链并对它进行谴责。撒但的统治到来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浪漫派的诗人写了赞美诗歌颂他；他是不屈的战败者，伟大的殉难者，被压迫者的安慰者和希望。他象征着不断起来反抗贵族、僧侣和暴君的资产阶级。可是获胜了的资产阶级没有勇气拿他作为自己的守护神；他们把受到理性损害的上帝修补起来，并且恢复它先前的荣耀。但是，由于失掉了对上帝的万能的信念，他们就在它的周围增添了一批半神：进步、正义、自由、文明、人道、祖国等等，——指望靠它们来担负领导摆脱了贵族羁绊的民族的命运。这些新的上帝是思想，“思想—力量”，“无法估计的力量”。

黑格尔试图把思想的多神教引到思想的一神教；思想自己产生出来，通过自身的进化创造出世界和历史。

唯灵论哲学的上帝是一个机械师，他为了自己娱乐而构造了宇宙，他调节宇宙的运动；他制造人，他按照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计划来支配人的命运。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永恒的上帝并不是创造者，而是人的创造物；人随着自己的发展而修改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不仅不是指挥者，并且还是历史事件的玩偶。

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外观上比自然神论较少幼稚，它想把抽象的科学的演绎法应用于历史也没有成功，这种方法的逻辑上互相联系的命题是从某些公理中引出来的；这些公理是不能证明的，因为它们被认为太明显了，不需要证明。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样进入人的头脑的。而唯心主义者又不屑去研究自己的思想的起源，谁也不知道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只限于肯定说思想是自身存在的，它是能完善的；随着思想的日

臻完善，它改变人类和社会现象，把这些现象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由此可见唯心主义者只满足于从对思想进化的认识上去获得历史的规律。例如毕达哥拉斯老早就认为：认识了数的性质便可认识物体的性质。

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不具有象形状、颜色、重量或热量这样一些物体的性质。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有关物体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其实推论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物体为什么有四方形，有色，有重量或热量，也不能说明部分何以小于全体，二加二何以等于四等等。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①。

进步、正义、自由、祖国等等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之外；它们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才有的；它们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成为积极的力量。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

^① 莱布尼茨白费力气地想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他的证明，照数学家的说法，只是验证而已。康德不承认几何的公理是经验证明了的事实，如弗雷西纳在他的名著《论几何学中的经验》中所作的证明那样，他认为公理是由直觉和反省（灵感和沉思）的结合所发现的；而彭加勒——他在这场合也只是表达多数学者的意见——在他的《科学与假设》一书中声称公理是“假定，……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假定中进行自己的选择时遵循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但这种选择是自由的而只是受到一点限制，就是避免一切矛盾（即在作为出发点的假定中所导出的命题中的矛盾）的必要性”。他象康德一样认为这些命题不需要经验的验证。因此，相信天主三位一体的奥义的基督教徒的数学家得以自由地假定一加一还是等于一，由此推演出一种算术，同洛巴切夫斯基或莱曼的非欧几何学一样合乎逻辑。这两个非欧几何学派的一派认为从同一点上可以引出无数之多的平行直线，而另一派则认为不可能引出任何一条平行直线。

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经过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它的定理是同两千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理完全对立

要揭示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可是哲学家对这个任务是不感兴趣的。

* * *

博胥埃和自然神论的哲学家把上帝提高到历史运动的自觉领导者的地位，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使自己对神的历史作用的想法适应于社会的俗见而已。唯心主义者用思想力来代替上帝，也不过是把流行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应用于历史。一切资产者都宣布他们的活动，不论私的或公的，都只是受到进步、正义、祖国、人道等等的激励。为了确证这一点，只要看看工业家和商人的广告，金融家的大纲和政治家的选举纲领便够了。

进步和进化的思想起源于现代，它们只不过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人的可完善性这个思想移用于历史。资产阶级必然地要把自己的夺取政权看作是无可估量的社会的进步，然而贵族却把它看作是灾难性的后退。既然法国革命是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之后，因此是在更成熟的条件之下发生的，所以这个革命能够如此剧烈地和完全地以资产阶级代替贵族，从这时开始，进步的思想便在欧洲的舆论中扎下了根子。欧洲的资产者自认为进步的全权代表。他

的，——是人脑的逻辑的令人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被看作是这个逻辑的强有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说成是理所当然的；普选制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少数；总之，在文明的物质构造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系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逻辑性是我们头脑这物体的固有属性之一；人们不论是从正确的或错误的推理出发，也不论是从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事实出发，都是在构造思想的或物质的建筑，这建筑的各部分彼此相通。人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历史为这铁的逻辑提供无数的例证，可惜这逻辑又往往回转来反对它自己。——拉法格注

们好心好意地肯定他们的习惯、风俗、德行、私德和公德，他们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工业和商业，比起以前所存在的一切都要进步。在过去只是愚昧、野蛮、非正义和无理性。黑格尔大声说：“理性终于第一次开始统治世界！”1793年的资产者把理性神化了。还在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在古代世界中柏拉图就已宣布理性高于必然性（《蒂迈欧篇》）^①；苏格拉底非难阿那克萨哥拉就因为他的宇宙论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一切，而可以解释一切的理性在他的著作中却不起任何作用（《斐多篇》）^②。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是理性的统治。

但是只是一件历史事实，即使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重要的事实，要在这上面建立进步的理论也是不够的。自然神论者使上帝成为历史的唯一的创造者；唯心主义者不愿意让人说进步在过去只是空洞的思想；他们发现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内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的胜利；它组织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以精神文化；使资产阶级富裕起来，同时又削弱贵族阶级的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逐渐地破坏教会的堡垒。随着进步的思想，进化的思想就自然地得到传播。

但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当进步的进化为它的胜利作准备时，才有进步的进化；而既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只在最后的一千年中才能判明它的有机发展的萌芽，那末当他们冒险进入史前期的迷宫时，就会失掉阿莉阿德尼的线^③；在那里他们满足于简单复述这段历史的事实，并不想把这些事实整理分类归并到进步发展的

① 柏拉图对话的自然哲学部分。——编者注

② 柏拉图的对话篇名。——编者注

③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他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米诺托之后走出迷宫。后来，人们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编者注

序列里去。既然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的专政是进步的进化的目的，那末这个目的一经达到，进步就告停止。既然资产阶级认为夺取政权是历史上唯一的社会进步，资产阶级声称，假如无产阶级再从自己手里夺去政权，那就是复归于野蛮——“奴隶状态”，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那样。战败了的贵族也是这样想的。资产阶级的群众对停止进步的本能的和不自觉的信念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自觉的和有根据的反映：黑格尔和孔德，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每一个都明确宣称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发展的序列；这体系是思想的进步的进化的大功告成和终结。这样一来，哲学、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只有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时才能进步，而这以后进步便告停止。

资产阶级及其最聪明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企图给进步的进展规定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使一些最重要的社会机体摆脱它的影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道德学家力图无可辩驳地证明父权制家庭形式和私有财产是不能改变的，断言这些形式存在于一切时期。当他们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半世纪以来人们所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家庭和财产的原始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故意装聋作哑。

进步和进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获得了非常的成功，那时的资产阶级还沉醉在自己的政治胜利和自己的经济财富的惊人的增长中。哲学家、历史学家、道德学家、政治家、小说家和诗人把进步的发展的调料撒进自己的作品和演说，只有一个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傅立叶对它嘲笑挖苦。但一到十九世纪中期他们便不得不抑制自己的疯狂的热情。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上引起不安，担心自己的社会统治能不能长久，而进步在他们眼中也就失掉了魔力。假如不是由于科学家，进步和进化的思想早就在资产阶级的用语中消失了。从十八

世纪末开始进化的思想就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开来，并被利用来解释宇宙的起源，植物界和动物界的起源；他们使它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并广为传播，以致不可能消灭它。

但是单单考察某几个世纪中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发展还不能说明这个历史的运动，正如描述一块石头被抛到空中在它落下时所划的弧形线不能说明这个降落的原因一样。历史的哲学家把这进化归功于思想力，特别是其中最有力的正义的不断的活动。据一位从头到脚都沉没在唯心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里的哲学家说：“正义是永久的，虽然它只是逐渐地潜入人的思想和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一来，便成为内在正义的最后的和最高的表现；而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美妙的结果，正义这位小姐长期以来就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做着工作。

让我们来查看一下以上所讲到的这位行为可疑的小姐的犯罪纪录簿，以便弄清她的特性和她的德行。

统治阶级往往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东西都宣称为正义，而把一切违反其利益的东西都看作非正义。正义，照他们的理解，只有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得到满足时才能实现。由此可知，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受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配的，正如封建的正义是受贵族的阶级利益支配一样。因此，人们以不自觉的讽刺拿眼睛蒙着头巾来形容正义，为的是使它看不到它所保卫的是如何卑污和肮脏的利益。

封建的和行会的组织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是非正义的，并且必定被内在的正义所摧毁。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说正义同封建男爵的武装掠夺是不能调和的，封建男爵只知道用一种手段来增大自己的土地和充实自己的荷包。其实，这并不妨碍可尊敬的内在正义也赞同武装掠夺，即和平的资产者无须冒生命的危险，强迫无产者改装成士兵在新旧两大陆的“半开化的”国

家里进行武装掠夺。这不是说，这种形式的掠夺特别投合这位有道德的小姐的口味。在法律的名义之下她郑重其事地赞同和允许只是经济的掠夺，即资产阶级不用大事喧嚣的暴力日复一日地施之于雇佣工人身上的那种掠夺。经济的掠夺与这种正义的气质和特性是非常符合的，因此她心甘情愿地给资产阶级财富当看家狗，须知资产阶级财富不是别的，不过是合法的和正义的掠夺物的积累。

正义，照哲学家的说法，在过去创造了奇迹，现在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它引导人们去追求和平的和幸福的未来。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切社会的非正义的多产的母亲。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象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牲畜还要坏。正义容许奴隶主鞭笞奴隶，并使奴隶主在痛打奴隶时冷酷无情；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心安理得。当奴隶主鞭打自己的奴隶的时候，他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当资本家在公开窃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时，他也会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资产阶级善于使一切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利益，他们用“文明”和“人道”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待人的方式。只是为了“用文明的精神启迪半开化的民族”，为了“把他们从粗卑的无道德的状态里拯救出来”，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可怜的生存条件，他们才从事殖民地的远征。而他们的文明和人道却是以基督教的愚弄、酒精的毒害以及掠夺和残杀土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资产阶级只是专门优待半开化人，那就错了。不，他们也在本国拿这些文明和人道的美德大量施用于工人阶级。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人道的尺度是大批的男子、妇女和儿

童失去财产，被迫日夜做苦工，遭受周期性的失业，死于酒精中毒、肺癆和佝偻病。以及犯罪的增加、疯人收容所数目的增多、监狱制度的发展和日益完备。

从来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样大叫大喊地讲到理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么需要用唯心主义的废话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种思想上的招摇撞骗在资产阶级手里是政治欺骗和经济欺骗的最可靠的和最有效的手段。然而，言语与行动之间的这种非常明显的矛盾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永久的观念和原理看作是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的历史的唯一的动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谬见，已经越出了学者所许可的范围，可以作为思想的作用以及资产阶级的狡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资产阶级能够培植和利用这种力量，以便让它给自己带来利润。金融家在自己的营业说明书上写满了爱国主义的原理，文明的思想，人道的感情，给存款的家长的百分之六的利息的许诺。这是诱骗傻子出钱的有效性的饵。累赛普斯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十九世纪的巴拿马运河的大骗局和征集到八十万个小人物的储金，只因为这个“伟大的法国人”许诺给祖国增光，扩大人类文明的范围和使认购股票者发财。

永恒思想和原理是这样不可抗拒的诱饵，任何一个金融的、工业的或商业的广告，任何一个酒类或药房的药剂的说明书都离不开它。政治的背叛和经济的欺骗都打着思想和原理的旗帜。^①

^① 王德威尔得及其他同志对我用这种不敬的和过于“极端的”态度来揭露永恒思想和原理，很不以为然。把那些在科学院和议会的演说里、选举纲领里和商业广告里卖笑的正义、自由、祖国看作某种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娼妓，这是何等的亵渎！假如这些同志生在百科全书派的时期，他们将大发雷霆地起来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因为他们抓住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把它送上自己的理性的法庭；他们嘲笑基督教的神圣的原理、奥尔良的少女、贵族的血统和荣誉、政权、神权和其它不朽之物。这些人一定会把《唐·吉珂德》付之一炬，因为这部无与伦比的浪漫文学的杰作无情地嘲弄了那些为贵族捧场的诗歌和小说所吹嘘的骑士的美德。

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只能成为乏味的和难懂的一堆空话，因为他们不能认识到，资产者用永恒原理来作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动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本身不能认识清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的性质。然而唯心主义哲学的可怜的流产并不能证明人们不能象发现了分子组成化合物的规律的化学家一样发现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进化的原因。

历史哲学之父维科说：“社会界无疑是人的产物；由此得出结论，人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人的智慧的变化本身中去寻找原则……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②

贝尔福特·巴克斯责难我对正义、自由和私有者的形而上学的其它本质所采取的轻蔑态度；他说，“这些思想是这样普遍和必不可少，以致为了要批评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可笑的模仿，我也得使用某种正义和自由理想。对，当然罗！象那些最极端的唯灵论哲学家一样，我也不能逃避自己的社会环境；它的流行观念的影响是逃不脱的；每个人都照自己的尺码去剪裁并且把自己的个人的思想作为衡量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但是假如说某些思想在它们由以培养起来的那个社会环境中是必要的，那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思想，象数学公理一样，在一切其余的社会环境中都是必要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么想的，他在《普罗塔哥拉》里似乎是要证明正义的永恒的必要性，他说甚至连强盗在彼此交往之间也遵循着正义。的确，建立在私有财产——不论是家庭的或个人的——之上的社会实际上是强盗的社会，这社会的统治阶级掠夺其它的民族和窃取被统治阶级——奴隶、农奴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正因为如此，正义和自由才成为他们的永恒原理。哲学家宣称这些原理是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因为他们只知道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而不能设想建立在其它基础之上的社会。

但是社会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要把我们引到建立在公有财产之上的社会，不怀疑所有这些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将随着你和我，随着产生这些思想的私有制社会中人剥削人现象的消灭而从人们的头脑中消灭。这信念不是由温情的梦想，而是由基于观察得来的不可争辩的事实所引起。史前期的野蛮人和半开化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于这个永恒原理的概念，这就足以证明。萨姆纳·梅恩虽是一个法律学者，他在现代印度的农村公社中也没有找出这些原理，那里的居民在自己的品行中都遵循着传说和习惯。

私有制社会里的人们根据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来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将来实行公有财产的社会里就成为多余之物，无需再用这些思想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历史将把它们收集起来并且送进死的思想的博物馆里去陈列。——拉法格注

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方法的多次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试用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

三

维科的历史规律

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一书中规定了历史的基本规律。虽然，历史哲学家几乎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他们喜欢一本书又一本书地转述他的 *Corsi et Recorsi*（顺流与逆流）和二三句其它的格言。这些格言在他们复述时常常都走了样。

维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切民族不论他们的种族起源和他们的地理环境如何不同，都通过同一的历史道路，就是说某一民族的历史是另一个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民族的历史的重复。

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的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达到定居状态（照维科的说法是 *ad addimesticarsi*，见《新科学》第二卷第五章）^②。

摩尔根大概不知道维科，但是他也达到相同的规律，他以更肯定、更完全的形式表述了这一规律。那不勒斯的哲学家^④认为，各不同民族的历史的一致性是由于它们都是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发展的，——而美国的人类学者则把这归之于两个原因：归之于人的精神的相似和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发展中所要克服的障碍的相同。维科也相信人的精神是相似的。他说：“在人的本质里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上普遍的、对一切民族共同的语言，它同样地表示着在人

② 卓万尼·巴蒂斯塔·维科《新科学的原理》。——拉法格注

的社会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事物的本质，并且表达着与这些事物不同的存在形态相适应的事物的不同名称的本质。我们可以在谚语里，在这些人民智慧的准则里看到这种语言的存在，虽然谚语表达形式非常不同，但就内容说则在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同上书，*Degli Elem*，XXII）^⑤

摩尔根说：“人类的心灵在一切个人、一切部落、一切民族中都

^⑤ “文明”一词在维科时代的意大利语言中大概还不存在。只在十八世纪才在法国开始用来表示人民在进步道路上的运动。它的这种意义的来源是非常近的，法兰西学院只是在1835年出版的字典中才把“文明”这词放进去。傅立叶使用它只是为了表示现代资产阶级的时期。

自然科学也有自己的“理想的永久的历史”；指出自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上的平行论是很奇特的和有趣的。亚里士多德和自然神论者都设想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存在，上帝依照它创造动物；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去发现这个计划，——“他于是反复思考神的思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用自然来代替上帝，把它解释为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计划或者更确切些说是非物质的和不现实的模型，样式；现实生活的形式就依照这样式的计划发展起来。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原型，最初的形式，地面上的生物是它的逐渐的改善；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原始型，地面上的生物是它的变异了的、不完善的改造品。——拉法格注

^④ 指维科，因为这是他的故乡，——编者注

^⑤ 亚里士多德也赋予谚语以重大的意义。许多作家都讲到他所编辑的民间谚语的汇集，可是都遗失了。西内西在他的《秃顶赞》里提到这件事：“亚里士多德在谚语中看到过去时期的哲学观点的残余；这些观点在人们所经历的革命时期被消灭了，但是这些残余却因自己的简洁而精确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因此谚语和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与古代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古代哲学把谚语留给我们，而谚语又带着古代哲学的可贵的痕迹，因为在古时候人们理解真理远比我们时代要深刻得多。”这位基督教的主教，他是靠异教著作教养出来的，一再重复着古代流行着的见解，人是在退化，而不是越来越改善。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观点；它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它也为埃及的祭司所赞同，据希罗多德说，埃及的祭司把过去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神的世纪、英雄的世纪和人的世纪。

人自从进入氏族共产主义时代起，便认为他是在退化中，幸福、人间天堂、黄金时代都属于过去。关于人能改善和能达到社会进步的思想只是在十八世纪才产生，那时的资产阶级正开始接近政权。但是同基督教一样，它把幸福放到天上去实现。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使幸福复归于地上。圣西门说：“天堂不是在我们后面，而是在我们的前面。”——拉法格注

是同样的,它的能力是同样地受到限制的,因此它是在同样的形式中进行工作,而且必然只能这样进行工作,只有极小的偏差。它在时间和空间相距都很大的一些国家内达到的成果会把各个环节组成一条共同经验的不断的和逻辑的锁链……正象渐次的地质的构成一样,人类的部落在它们的发展中可以看作一系列的沉积层。经过这样的分类排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人类进化的全过程——由野蛮到文明的可信的情景”,因为“人类经验的行程差不多走着同一的道路”^①。马克思研究了经济的“经验”的行程之后,证实了摩尔根的思想。他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上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②

因此,“理想的永久的历史”,照维科的说法一切民族无例外地都必须通过它,决不是由某一个神的理性所预先制定的历史计划,而是历史进步的人的计划。这计划是可以为历史家所理解的,只要他研究过不同民族所经历的一切阶段,对它们加以相互比较和按照它们所达到的发展的相对的高度对它们作出分类。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野蛮部落、关于古代和现代民族的研究光辉地证明了维科规律的正确性。它们证明所有的人们,不论他们的种族来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都必须通过同样的家庭、财产和生产的形态,以及同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丹麦的人类学者最先确定这个事实和把史前期分为相继的三个时期,依照制造第一批工具所使用的材料,从而按照生产方式称呼相继出现的石器世纪、铜器世纪和铁器世纪。不同的民族,不论他们属于白种、黑种、黄种或红种,也不论他们生活在温带、热带或两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第9章,第4编第1章,第3编第5章。——拉法格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极，他们的历史是没有不同的，只在一点上彼此有所区别，这一点维科称之为“理想历史的阶段”，或摩尔根称之为“历史上的沉积层”，或者如马克思所称的他们达到的经济阶梯的级别。因此，较发展的民族只是给较不发展的民族指出他们未来的远景。

人们的精神产品也不能逃脱维科的规律。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发现了在创造词和语言时一切种族的人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民俗学家在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中发现了同样的民间故事，而维科已经确认了他们中的同样的谚语。许多民俗学家都认为这些相同的民间故事不是由每一个民族各别地创作出来，只是靠口头相传保留到现在，而是由一个共同的中心创造出来，由这中心向全球传播。这个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同对社会制度和对其它的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观察相矛盾的。

灵魂的思想以及其它由此所产生的思想的发展历史是思想发展同一的最有趣的例证之一。灵魂的思想甚至在最低阶段的野蛮人中间也能遇到，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批精神产品之一。灵魂一经发明就必须为它在地上或天上构造住宅，以便在人死之后可以得到归宿，目的是阻止它因无处安身而游荡和扰乱活人。灵魂的思想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中是很活跃的，曾经对大神和上帝的思想的创造起了促进作用，但在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中却消灭了；只是当这些民族进入另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它才以新的力量重新复活起来。历史学家证明说，灵魂思想在那些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民族的历史上是缺乏的，虽然它在他们先前的野蛮状态时期中是存在过的。直到公元前几世纪才重新复活，一直存在到现在。他们只限于简单叙述这样重要的思想的消灭和重新出现的这种明显的事实；他们没有重视这样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想到给它找出解释。其实，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这个解释。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只有研究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

才有希望找到这样的解释。

那些从事研究家庭、财产和政治制度的原始形式的学者太过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们的变化原因。他们只给我们描写了历史，而社会科学应当不仅是描写，并且还作解释。

* * *

维科认为人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动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恶习才是历史的活力。不是无私、宽厚和博爱，而是“残酷、吝啬和野心”创造和发展人类的社会。“这三种恶习控制着人类，它们产生出军队、商业和政治制度——*la corte*（伴随品）——，而作为继续发展的后果，又创造出勇敢、财富和共和的智慧。因此，这三种恶习本来会消灭地上的人类，却创造出公民的幸福。”

这种非预期的结果给维科提供证据，“证明神的预见、神的理智的存在：这理智依靠人的欲念组织社会的秩序，这才使人们得以生活在人类的社会中，而只关心私利的人们却象野兽般过着独居的生活。”（同上书，*Degli Elem*, VII）

使人产生恶念的神意不过是民间的公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翻版而已。那不勒斯哲学家的这个神意和民间智慧的上帝依靠人的恶习和动乱来引导人们，它究竟是什么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维科和民间智慧在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人的需要和欲念，恶的和善的，都不是不变的量，而唯心主义者正是这样想的，在他们眼中人永远是同样的。例如，母爱，这是动物的遗传，没有它人在野蛮状态中便不能生活，也不能传种。母爱在文明时代却大为削弱，以致在富有阶级的母亲身上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因为这些富有的母亲自婴儿出生之日便对他不再关心而把他委托给雇佣者去照料。其他的文明的妇女也很少感

到当母亲的需要，甚至发誓当一辈子处女^①。相反地，父爱和性的嫉妒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文明人中却很发展。平等感，在那些生活于财产共有制度之下的野蛮人中是很活跃的和有权威的，这制度禁止任何人占有其他人所不能占有的物品，自从人们生活在私有财产制之下时起这平等感就大为削弱了，致使穷人和雇佣工人俯首帖耳地接受自己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和鬼使神差的命运。

因此，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基本的欲念在发生变化、在削弱和消失，而另外一些欲念在产生和加强。只有在人的本身上才能找出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终极原因，这似乎意味着可以这样假定：人虽然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然而可以不受他周围的现实的影响。这种假定甚至在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的脑子里也不能产生，因为他不敢断定说，在所谓礼义之家出身的妇女身上和不幸的、靠卖身糊口的妇女身上有同样的羞怯感；或者银行职员和书斋学者有同样的快速计算的技能；钢琴家和挖土工人有同样的灵巧指法。因此，毋庸置疑，人所生活的环境，不管他意识到与否，总会对人的肉体、智力或道德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

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环境不仅直接地影响着起作用的器官，例如钢琴家和挖土工人的手，官吏和书斋学者的脑的一部分，或者良家妇女和妓女的道德感；它还对所有其余的器官给予间接的影响。若弗卢瓦·圣伊

^① 蜜蜂是知道为自己创造社会环境的，在蜜蜂中间可以观察到这种母爱完全消失的现象：蜂王，一窝中的母蜂，不关心自己的后代；假如无性的工蜂不把那些长有性器官的雌蜂从它们母亲的盛怒之下抢救出来的话，它们就要被母蜂杀死。有几种家禽失掉了母性的本能：它们产卵很多，但是任何时候也不伏卵孵化。——拉法格注

雷尔给环境对整个身体的这种一般的影响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器官的从属**，现代的自然科学家称它为“交互关系的规律”。居维叶对这规律作了如下的说明：“一切有机生物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和封闭的系统，其中的各部分是互相适应的并通过相互作用达到同样的最后结果。如果不是其余部分也发生变化的话，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变化。”^①例如，某种动物的牙齿形态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变化，就会引起颞骨、使牙齿运动的肌肉、牙齿依托的头盖骨、头盖骨之下的脑髓^②、支持头部的骨头和肌肉以及肠子的形态和长度，一句话，使身体的一切部分都发生变化。前肢从不再用来走路之时起而发生形态变化，这变化就引起各个器官的变化，最终使人同类人猿分开。

某种器官的变化引起的变化，往往不能预见，甚至不能理解。例如，很难说明为什么折断鹿的腿或者割去鹿的睾丸会使头上相对的角变萎缩，为什么白猫是聋子，为什么脚上有蹄的哺乳动物是吃草的，而脚上有五个爪子的哺乳动物为什么又成为食肉的了？

习惯的简单变换，使一种或几种器官受到不平常的训练，有时会引起整个机体发生深刻变化。达尔文断定说，有几种苏格兰母牛的骨骼之所以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在陡峭的斜坡上吃草的习惯。自然科学家一致承认鲸科——鲸、抹香鲸和海豚——开始时都是陆生哺乳动物，但是当在海里找到更丰富和更容易获得的食物时，才向水里移居，慢慢学会浮水和泅水。这种新的生活形态改变了它们的器官，使那些不再使用的器官逐渐萎缩，只留下残迹，而其

① 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变革》。——拉法格注

② 解剖学家认为食肉兽和许多猿猴的鬃角肌肉连接在颅盖上并且象皮带一样紧裹着它，使之受到挤压，从而妨碍脑髓的发展；因此它们的脑髓比起那些象人类一样有着不发达的咀嚼器官和较弱的鬃角肌肉的动物的脑髓要小一些。安东尼把两只新生的狗割去鬃角肌肉的一面，几个月后他发现那与被割去的肌肉相应的半个头盖骨更加隆起，而脑半球的体积也增大了。（《科学院的报告》1903年11月23日）——拉法格注

它的器官则得到发展，以适应水生环境的需要。撒哈拉的植物为要适应干燥的环境，就得限制自己的生长和把叶子的数目减少为两片或四片，并在上面盖着一层蜡，为的是防止水气蒸发，为了找水分把根子伸得特别长；它们的生长过程和正常条件之下不同：夏天是热季，它们停止生长，而在冬季生长，因为这是一年中比较凉快和潮湿的季节。沙漠地带的所有植物都有类似的特性。一定的环境制约着机体的生存，每一个机体是特定的特征的综合。

动物和植物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适应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这个环境象居维叶的“有机生物”一样形成复杂的、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地质的构造和土壤的成分、该地点距离赤道的远近、海拔高度、灌溉它的河流系统、降雨量和日光的热量等等，最后，生于其中的植物和动物。所有这些部分都是这样紧密地彼此联结起来，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都要引起其余部分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不象在有机生物中那样显著，可是仍然很容易感觉得到。例如森林就会影响气候，影响降雨量，因而也影响土壤的湿润和黑土化。达尔文指出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动物，如蠕虫，在黑土的形成上就起着重大的作用。拜特洛和农学家赫尔里格尔和威尔法特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的细菌是土壤肥沃的因子。人们繁殖家畜和耕种土地，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罗马人开始的砍伐森林，把亚洲和非洲的肥沃地区变成荒无人烟的沙漠。

植物、动物和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除了自己器官的适应能力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手段，它们虽然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假如一连几百和几千代都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最后就必定获得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种类的自然环境因而给人类、植物界和动物界带进差异。的确如此，不同的人种正是在野蛮状态的时期中形成起来的。

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仅改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并且还创造出一个人造的或社会的环境，这就可以使他们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低限度也可以大为减弱这种影响。而这种人为环境同样也加给人类以自然环境所曾给予的那种影响。因此，人也和驯化了的植物和家畜一样受着两种环境的作用。

由人们逐渐创造出来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构造和复杂程度彼此有所区别；然而有着同样构造和同样复杂程度的社会环境彼此是很相象的，不管创造它们的人种如何，也不管它们的地理条件如何。因此，虽然人类继续遭受到各种自然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同时也受到同样的人为环境的无差别的影响，这种人为环境缩小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使同样的需要、同样的利益、同样的情欲和同样的智力得到发展。此外，相似的自然环境——例如位于同样高度和纬度的某些地区——对于那里的植物和动物界有着同样的统一化的影响。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找到相似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因此，相似的人为环境有助于消灭人类之间的差别，这差别是由于自然环境把人分为种和亚种而发生的。

自然环境的进化是极端缓慢的。因此那些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的外貌似乎是不变的。相反地，人为环境的进化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历史同动物和植物的历史相比有着异常活跃的性质。

人为的环境，完全同有机生物和自然环境一样，构成一个综合体，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的一切部分是彼此适应和紧密联系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不引起其它部分的震荡和变化，是不能改变的。

在野蛮部落中间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是极端单纯的，它是由为数不多的成分组成的。它随着人类的进步，由于不断增加新的成分或者由于发展已有的旧成分而逐渐复杂起来。从历史时期的

开端起,人为的环境便由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设施,由传统、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由常识和社会舆论,由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组成。社会环境的这些成分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间产生出许多更复杂的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这些社会环境随着自己的发展改变着人类本身,因为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制约着在肉体 and 道德关系上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的存在。假如所有这些彼此相联系的部分是稳定的,或者象自然环境的各部分那么缓慢地变化,那末人为环境就会经常保持平衡状态而根本就没有历史。但是实际上它的平衡状态是以极端的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为特征,它经常由于某一部分发生的变化而遭受到破坏,因为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将对它的其余部分产生相应的影响。

有机生物的各部分象自然环境的各部分一样,彼此发生直接的,就是说,机械的影响。当在动物发展过程中人终于确立了直立的状态,它就成了人的一切器官变化的出发点;当头不再象其他的哺乳动物那样靠强有力的筋肉附于颈下,而靠脊梁竖立起来的时候,于是筋肉本身和被筋肉围裹着的骨骼也起了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头盖骨、脑髓等等也发生了变化。当某一地区的黑土层因某种原因而增加时,在它上面便开始生长森林而不再生长矮小的植物,森林改变着河流的方向,增加水流量等等。但是人为环境的各部分只有靠人的中介才能彼此发生影响。已经起了变化的部分应当首先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改变人们,促使他们发挥作用并改变其它部分,以使它们达到同它一样的发展水平,因为只有这样这些部分才不致阻碍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同它重新处于完全协调的状态。尚未改变的部分正是由于构成社会环境的“好的方面”的那些有用品质,使人感到它们的缺陷;现在这“好的方面”已经过时了,而且成为有害的和转化为“坏的方面”。尚未改变的部分应当受到的改变

愈重要，这些坏的方面就愈加不能忍受。人为环境各部分之间被破坏了平衡往往只能经过那些对正在变化的部分特别感到兴趣的人们和社会的所有其余成员之间的斗争才能恢复。

为了说明人在人为环境的成分的改变过程中的这种作用只要举出不久以前的、记忆犹新的某些历史事实就够了。

当工业开始使用蒸气作动力时，它同时也就需要新的运输方法来载运燃料、原料和成品。于是就启发了有关的工业家采用蒸气机在轨道上牵引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在法国实行是1830年在加尔产煤区和1832年在卢瓦尔地区；而在英国斯蒂芬逊在1825年开动第一辆用火车头来拖拉的列车。但是这种运输方法的进一步推广却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的抵制，这就使它的发展延迟了许多年。梯也尔——纳税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健全理性和社会舆论的代表——拚命反对新的运输方法的采用，他声称“铁路是行不通的”。然而铁路实际上推翻了一切反对它的最流行的理性论据。除了许多其它的不可能的事物外，它要求激烈地改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建筑的基础——财产关系。事实上，在此以前一个有产者只靠自己的钱经营工业和商业，至多也只向一、二个相信他的忠诚和才能的朋友或熟人求援。他有权支配基金，他不仅是工厂或商号的名义主人，而且是实际的主人。但是铁路的修建需要数目惊人的资本，这是不能从几个人的手里征集到的。因此，这就必须使大量的有产者肯下决心把自己从来不舍得放手的钱拿出来托付给一些人，对于这些人他们几乎连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其能力如何。他们一旦把钱拿出来之后便失掉了对它的支配权，连对那些用这些钱制造出来的车站、车厢、火车头等等也没有所有权。他们只是有分红利之权，假如有红利的话。代替有体积、重量和其它的坚实的性质的金币和银币，他们得到的是薄面轻的纸片，上面用黑体字印着他们的集体财产的名字，虚构地

代表了他们的集体财产的无限小的和不可捉摸的部分。在资产阶级的记忆中财产从来没有采取这种形而上学的形式。这种新的财产形式使财产本身失去个性，同以前造成有产者享乐的财产形式，同他们所熟悉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那种财产形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只有被控为罪犯和被宣称为社会秩序的最坏的捣乱分子的人们才肯承担它的保卫和宣传之责，——只有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圣西门才最早重视以纸面的股票运用财产的过程^①。在他们的学生中有工业家、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们准备了1848年的革命，成为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参加者。他们利用1848年的政治革命来使经济环境革命化，办法就是把九个省的银行集中为一个“法兰西银行”，使新的财产形式为社会舆论所公认和创造法兰西的铁路网。

大的机械工业从远地运来自己的燃料和原料并向远方推销自己的产品，因此它不能容许把一个国家分成许多小小的独立国，每个独立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货币和纸币等等的制度；相反地，大生产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和集中的国家。意大

^① 傅立叶在《关于普遍统一的论文》中详细地列举了这种财产形式对于资本家的好处：“它不会遭到偷盗、火烧以至于地震的危险……被监护者任何时候也没有丢失的危险或者遭受到由于他的财产管理不善而招来的损失，因为管理处对于他象对所有股东一样……资本家，尽管他拥资累亿，任何时候都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变卖成现钱”，如此等等。它保证社会的和平，因为“一旦人们都变成主人，叛乱的意图就会变成对现存制度的爱”，而另一方面，“穷人，虽然他只有一个埃居，也可以参加那种划分得极小的、大众化的股票……这么一来，他也就在无限小的范围内成了全国的主人而且完全有权说，我们的宫殿，我们的商店，我们的宝藏”。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工人解放运动的代表，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代表。他们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金钱的时代而已。

路易·拿破仑和他在政变中的同谋者非常赞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思想，他们使最小的财主容易获得国债利息，在此以前这些国债利息都只是大财主的独占品；当他们给了用五个法郎甚至一个法郎购买公债券时，就使国家的公债利息民主化了——如他们中的一个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来使群众同国债的稳定发生利害关系就能预防政治革命。——拉法格注

利和德国只是用流血战争的代价才完成了大工业的这些要求。梯也尔先生和蒲鲁东先生，——他们有许多点是共同的，因为他们俩都代表小工业的利益，——也属于那些独立于教皇和意大利君主的国家的热烈辩护者。

既然人创造着和继续不断地改变着人为环境的各个部分，那末显而易见地，历史的动力象维科和群众的智慧所认为的那样是人，而不是象那些哲学气味极浓的历史学家所坚持的那样是正义、进步、自由和其它形而上学的实质。这些自相矛盾的和模糊的观点因不同历史时代以及同一时代以内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个人而发生变化，因为它们是为人为环境的不同部分所发生的现象的思想反映。例如说，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法官就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正义是把从雇佣劳动的生产者那里窃取来的财富归还给他们，而资本家所理解的正义却是保存这些窃取来的财富；既然资本家掌握着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那末他的关于正义的概念就是统治的和具有法律的力量，而对于法官，法律就是正义本身。正因为同一个词掩盖着正义的矛盾的概念，所以资产阶级就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统治和欺骗的工具。

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部分给予在其中活动的人以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事物的这种教育使人产生思想和触动他的情欲，它带有不自觉的性质。人以为自己自由地受到自己的情欲和思想的支配，然而其实他只服从人为环境这一或那一部分所给予他的影响，而人为环境的某一部分也只有通过他的思想和情欲才能对其它的部分发生影响。不自觉地屈从于环境的间接的压力，人把自己的行动和运动归因于上帝，神的理性或者归因于正义、进步、人道等等的引导……如果说历史的进程是不自觉的，因为——如黑格尔所说——人常常达到不是他原来所追求的、另外的结果，那么，这是由于人至今还不能意识到迫使他行动和指导他的行为

的原因。

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部分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不是人生产什么，而是他如何生产。举例而言，人还在史前时期就开始织布，但只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才知道用机器来织布。机器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我们眼前就有着它的毁灭性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设施的无与伦比的例子。机器生产的采用在一个世代之间就使日本由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它跻入世界强国之列。

由于不同的原因生产方式获得这样强大的影响。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把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精力吸引过去；而在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即政治、宗教、文学等领域里工作的有限的少数人为了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的资料，也不得不关心生产。其结果是一切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只有极少数人服从于环境的其它部分的影响。然而既然社会环境的各个不同成分只有通过人才能彼此互相影响，所以影响着一群人的大多数的那部分必然是最有力的，能够震撼社会环境的整体。

生产方式在野蛮人的社会环境中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越来越多地把自然力引进生产的范围，随着人逐渐认识了它们，生产方式才获得决定性的和不断增长的意义。这个降服自然力的过程还在史前期，即当人使用石头来作武器和工具的时候，便已开始。

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比较迅速地获得进步不仅由于在生产中吸引进火群的人，并且还由于它在激励“私利的恶妇”时带动了维科

所视作历史动力的三种恶德：残酷、贪财和野心。

在这两个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进步是这么快，以致参加生产的人们不得不经常改变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以便把它们维持在相应的水平上。这时它们所遇到的抵抗不断地引起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这样，当人们想发现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时，就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剥夺了维科的历史发展的统一规律的宿命性。这种性质会使人们设想，似乎某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很象动物机体的胚胎阶段，如若弗卢瓦·圣伊雷尔所想那样——不可分割地同它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并且是由某种不可抗拒的内部的“进化力量”所决定了的，这种力量似乎会引导它按着预先规定好的道路走到它的预定的归宿。假如事情是这样的话，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所有民族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应当以同样的发展速度和唯一的、相同的道路前进。这样设想的发展的统一规律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中都得不到证实。

相反地，历史的实际情况向我们表明，一些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停滞不前，而另外一些民族以急速的步伐走向前了，还有一些民族却从它已达到的发展阶段向后倒退了。这些停滞、进步和倒退的原因，只有当我们用这些民族所赖以发展的人为环境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各个不同民族的社会、政治的和精神的发展历史时才能说明。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些环境的变化又决定历史的事变。

人为的环境不仅通过一个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且还通过国际的斗争而获得改造。因此，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的历史事件取决于应受改造的人为环境和这个民族被自然环境以及遗传的和获得的习惯所创造的那种形态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何。自然环境和过去的历史赋予各民族以原来的、它所特有的特征。由此可见，同样的

生产方式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产生出同样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因此，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在各个历史时期不会引起绝对相似的历史事件。因为随着达到高度文明的民族的数目的增长，国际间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扩大和加剧。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不是注定的，象动物机体的胚胎发展那样。假如历史发展经过相似的家庭的、财产的、法律和的政治的组织，经过相似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文学的思想形式，那是因为各个民族不管它们的种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总得为满足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而采取同一的生产方式。①

选自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

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5—38页，
并根据《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28年巴黎法文版第1—51页作了校订。

① 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在自然的历史中引进构造图形的统一的规律，正如维科在人类的历史中引进发展的统一规律一样。若弗卢瓦·圣伊雷尔认为卵子的胚胎发展——从受精到降生——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的，因而形态学阶段必然地一个接一个发生，而怪胎是发育不完全的、部分地停滞在胚胎发展某一阶段上的生物。

现代的胚胎学家抛弃了预定计划的思想而认为胚胎的发展——在有成胎的生命力之下——只依赖于它在其中发展的那环境的状况。例如假使破坏了蚂蚁、海胆、棘皮动物等等的卵的一个或几个节(blastomère)，那末就可产生怪胎，就是说，不健全的机体，——虽然不经常如此，有时未被损坏的环境的那些部分本身会人工地再生出被除掉的那部分。还有，在胚胎的生命的初期人工地把它剖成两半，只要这两半仍能继续发展，那末就不是得到一个，而是两个形体，假使胚胎没有被弄破的话；由此可以推想母体中的人胎的类似的分裂便是怀双胞胎的原因。还有，在胚胎发展所依托的液体环境中撒上一些矿盐而使它发生变化，那末就可得到变态的胎形或者赋予它以新的形态。

要在自然界中保存着同样的形态只有在它们形成的相互条件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起码也是非常相似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在这些条件中甚至极微小的改变也会逐渐地使同一群、同一科的形体发生变化；并且当这些改变更显著时，它们就可能产生变种，可能成为新种的起点。

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同胚胎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理解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拉法格注

上帝的信仰*

(1906年1月)

一

资产阶级的信宗教与 无产阶级的不信宗教

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在两位著名的学者——拜特洛和海克尔的支持下在罗马，在梵蒂冈的面前筑起了讲坛，以使用霹雳式的演讲去攻击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想以其教阶制的神职人员和所谓永久不变的教条成为资产阶级的宗教。

自由思想家是否认为只要他们攻击天主教就能摆脱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一切宗教的根本基础呢？他们是否认为资产阶级，他们所属的这个阶级没有基督教也能行？天主教只是基督教的一种表现而已。

基督教虽然也能适应于其他的社会形式，但它主要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剥削雇佣劳动上面的社会的宗教；所以不论人们怎么说和怎么做作，它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都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十多世纪以来一切资产阶级的运动——无论是为了组织、解放或由它的一个新的阶层夺取政权——都伴随着宗教危机并因此而复杂化了；资产阶级常常用基督教来掩盖自己所追求的物质利益，他

* 本文首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24年卷(1905—1906)第1册第476—480、508—518、548—556页。后来收入《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编者注

们声言要改革宗教和使它恢复圣主的纯洁的教义。

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为可以在法国根绝基督教，就以无比的严厉来迫害僧侣；其中最彻底的人认为只要对上帝的信仰还存在，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用命令来取消上帝，把它当作旧制度下的官员来处理，而代之以理性的女神。但是当革命的狂热一过，罗伯斯比尔又用一纸命令恢复了“最高存在者”，因为“上帝”之名还不能被接受；再过几个月牧师就从自己的隐秘的角落里爬了出来，打开了教堂之门，信徒又涌向教堂去，而波拿巴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平民，签署了协议^①。于是产生了一种浪漫的、伤感的、华丽的、滑稽可笑的、由沙多勃利昂^② 弄得更适合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口味的基督教。

自由思想家中的聪明人，不顾明显的事实，在过去和现在始终肯定说，科学能够使人的头脑摆脱上帝的观念，使这种观念对于理解宇宙的机制成为无用之物。然而从事科学的人，除了少数的例外，都还在上帝信仰的魔力之下。如果说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照拉普拉斯说，为了说明他所研究的现象不需要上帝的假设，那末在需要弄清楚不是他研究范围内的现象的地方，他就不敢说上帝的假设是无用的；而且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为了使社会的机构正确发挥职能和对人民群众发生道德影响，上帝多少还是必要的^③。可是，上帝的观念不仅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消除，并且最粗俗的迷信不是在穷乡僻壤和在愚昧者中而是在文明的通都大邑和

① 拿破仑一世和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在1801年7月15日签定了和解协议。——编者注

② 弗朗斯瓦·勒奈·沙多勃利昂（1768—1848年）——法国作家，反动的浪漫派的首脑，著有《基督教真谛》等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编者注

③ 1904年11月19日的《科学评论》证实了他（拉普拉斯）的论断，皮埃隆在他的一篇关于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论文中承认“上帝是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最后的方便的原因……信仰常常构成科学的补充……而科学同信仰和信念是毫不相干的……但

在有教养的资产者中间盛行：一部分人同鬼魂对话，为的是想探听阴间的消息；另一部分人则跪在帕多瓦的圣安东之前，为的是想找回失物或测出可以得奖的彩票的号码，想通过综合技术学校的考试等等；他们向手相术士、向梦游者、向女算命者请教，为的是想知道未来，解释梦境等等。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不能保护他们免除愚昧的迷信。

但是，正当宗教的感情在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中继续活跃和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却表现出对宗教的不合理性的，但又是不可动摇的冷淡。

蒲斯根据对伦敦的宗教状况“通过一区一区地、一条街一条街地、常常是挨门挨户地”访问得来的广泛调查，确定“人民群众不信仰任何宗教，对宗教仪式也没有任何兴趣……那些号称工人阶级和那些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最下层的穷苦人之间的居民的大部分，整个说来，都站在一切宗教教派的活动范围之外……他们干脆把教堂看作是那些有钱的人和那些想要得到处境比他们强的人们庇护的人的集会地点……我们时代大多数的工人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权利和他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不是去想他们常常不能完成的义务。谦逊和认识到罪孽也许不是工人的天性”^④。伦敦工

是宗教也不是同科学绝对不相容的——只要把它关在完全封闭的笼子里就行了”。他既反对“在科学中只寻找上帝存在和宗教的真实性的证据的某些现代学者……同时也反对在科学中只寻找上帝不存在的证据的另一些现代学者的诡辩”。

在我们的现时代以前，不承认上帝为维持宇宙秩序的不断的活动就等于否认他的存在，苏格拉底责备阿那克萨哥拉，说他在解释天体运动中想取消上帝的干涉；而柏拉图说雅典人认为那些主张行星的运动和自然现象受某种法则的控制的哲学家是无神论者（《法律篇》，VII，§21）；在另外的地方他用世界创造的事实，用统治世界的秩序，用一切民族、希腊人和半开化人的和睦共处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同前书，X，§1）。埃及的祭司说：“上帝是维持世界平衡的人。”——拉法格注

④ 《宗教的影响》——调查表的第三部分，载于蒲斯的《论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上。——拉法格注

人通常都被认为是很信宗教的，然而他们本能上是不信宗教的，最肤浅的观察家在法国的工业城市也可以无可辩驳地确认这一点。假如在那里也碰到一些工人装作相信宗教或是真正相信宗教，——这种情况是很少的，——那是因为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慈善救济的形式；假如另外一些是自由思想的狂热拥护者，那末这是因为他们曾受过牧师对他们的家庭或对他们同雇主关系的干涉。

对宗教问题的冷淡，照拉梅耐的说法，这是不信宗教的最重要的标志，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天赋。假如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在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形式掩盖之下，那末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中却找不出任何发明新宗教来代替基督教的企图，也找不出任何改革基督教的愿望。两大洲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对宗教教条和唯灵论观念的任何教理上的争论毫无兴趣；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同一切宗教的牧师们进行战争，因为这些牧师是资产阶级的奴仆。

多少受过广博的科学教育的资产者还是作着宗教观念的俘虏，而被剥夺了这种教育的工人却摆脱了宗教观念，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

野蛮人中神的观念的自然根源

象自由思想家那样夸夸其谈反对天主教或者象实证论者那样不理睬上帝，尽管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普及，对上帝的信仰却仍然继续存在；尽管有伏尔泰的嘲笑，革命者方面的冲击和圣经注释家的批评而基督教仍然兀立不动。夸夸其谈和不理睬是很容易的，但

是说明却十分困难，因为要这样就得着手研究如何和为什么上帝的信仰和唯灵论的观念跑进人的脑子里来，在那里生根和发展；而只有追溯到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里已经清楚地可以看出那些充塞文明人头脑的唯灵论思想的概略。

灵魂及灵魂不朽的观念是野蛮人发明的；他们为了说明做梦的现象而赋予自己一个非物质的和不朽的灵魂。野蛮人并不怀疑自己做梦的真实性。假如他在做梦时出去打猎、战斗、复仇，而在醒来时又发现自己还是在原来睡觉的地点，他以为这是另外的“他”——他把这称作**双重人**，这个双重人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和轻如空气的，离开他的熟睡的肉体到远处去打猎或作战；既然他在梦中能看见自己的祖先或死了的同伴，他就得出结论说，他们的灵魂来拜访他，他们的尸体毁灭后灵魂依然存在。

野蛮人，维科称他为“人类的儿童”，也象儿童一样对自然有幼稚的观念；他以为他能象指挥自己的手足一样去指挥自然现象，他能用咒语和巫术呼风唤雨等等；例如当他害怕赶路时碰上黑夜，他就用规定的方法把某种草结起来，以阻止太阳的落下，正象圣经上的约书亚用祈祷来做这件事一模一样。既然死者的灵魂对自然现象比对人有更大的权力，他就把它们召来，使它们引起他所不能引起的现象。既然勇敢的战士和能干的魔法师对自然比平凡的人有更大的影响，那末他们的灵魂显然也应当比普通人的灵魂对自然有更大的权力；因此野蛮人把它们从灵魂群中选拔出来，用供物和牺牲来敬奉它们，当干旱威胁着他的庄稼地的时候，就求它们降雨；当他出征时，就求它们保佑胜利；当他病时，就求它们医治。原始人从对梦的错误解释出发，发明了促成往后创造出唯一的上帝的原素，所谓上帝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比其他的灵魂更强大有力的灵魂而已。

上帝的观念既不是天赋的观念，也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后天的观念；一切观念都是如此，因为人只有同他所能解释的真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接触时才能思想。

三

资产者信仰上帝的经济根源

本来完全有权可以希望：科学知识的异常的发达和普及以及对自然现象的必然联系的证明将引出一种观念，即被必然的规律支配着的宇宙不依赖于人的或超人的意志的变幻莫测，因而上帝将成为无用之物，因为他的许许多多的职务将被解除，而原始人的愚昧无知曾把这些职务的执行加在他身上；然而却必须承认对那个可以任意改变事物的必然秩序的上帝的信仰仍存在于科学工作者中间，而有教养的资产者也象野蛮人一样祈求上帝降雨、保佑胜利、治病等等。

假如学者们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信念，即认为自然界的现象严格地服从于必然性的规律，以致先行的现象决定继之而来的现象，然而他们终究还要证明社会领域的规律也同样从属于必然性的规律。可是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他们虽然研究了人类社会和甚至希望管理社会，但是没有达到而且也不能达到创造一种信念，即认为社会现象也同自然现象一样依赖于必然性的规律；因为他们不能确立这种信念，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对于资产者，甚至最有教养的资产者都是必要的。

哲学的决定论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是由于资产阶级允许自己的学者自由地去研究自然力的作用，它对认识这些自然

力是感兴趣的，因为要利用它们来生产自己的财富。但是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把这种自由给予自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因此他们不敢把哲学的决定论带进社会科学的领域。天主教会曾出于同样的原因一度禁止对自然的自由研究，为了创立自然科学曾必须推翻教会的社会统治。

资产阶级中信仰上帝问题的研究只有在正确理解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作用不是在于生产财富，而在于迫使雇佣工人生产这些财富；在于侵占这些财富并在自己阶级的成员中瓜分之，而留给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只是仅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

从工人那里夺取来的财富构成资产阶级的战利品。半开化人的战士在占领和劫掠了城市之后就把夺得之物堆在一起，尽可能均等地分成若干份，用抽签的方法分配给那些为了掠夺而冒过生命危险的人们。

社会的组织允许资产阶级占有财富，同时又不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去冒生命的危险；夺获这样大的战利品而不冒险，这是文明的巨大成就之一。从生产者那里掠夺来的财富不是分成平均的份额用抽签来分配；它们按照动产和不动产的价值的大小，即每个资产者占有的资本的数量，采取租金、地租、股息、工商业的利息和利润的形式来加以分配。

财产、资本的占有而不是体力的、智力的或道德的品质的占有是参加财富分配的必要的条件。襁褓中的儿童和成人有同样分得财富的权利；当活人尚未成为死者的财产的继承人之前，死者仍是财产的占有者。分配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进行。人等于一个零；只有财产才有意义。

有人把达尔文的竞争说，即动物为了取得生存和繁殖的资料而作的竞争，同分财富时资产者中间发生的斗争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那些保证动物胜利的力量、勇敢、敏捷、忍耐、灵巧等等的品质是动物的机体的不可分开的部分，然而使资产者得到他所不生产的财富的财产，是不同资产者发生人身联系的。这财产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因而带给他一份或大或小的财产，可是它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是资产者的体力的或智力的活动所引起的。充其量只能说，欺诈、阴谋诡计、招摇撞骗，一句话，最卑鄙的精神品质使有产者取得比他的资本的价值所能允许他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份额更大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他偷盗了自己同行的资产者。由此可见，假如生存竞争在许多情况下是动物进化的原因，那末为财富的竞争却是有产者退化变质的原因。

攫取雇佣工人所生产的财富的社会使命使得资产阶级成为寄生的阶级：它的成员，除少数的例外（其数目在不断减少），都不参加财富的创造，他们的工作也同他们所分得的那份财富不相适应。

假如基督教在最初几个世纪曾经是那些靠国家和富人每日分发一点口粮维持生活的贫苦群众的宗教，如今成了资产阶级这个主要是寄生性的阶级的宗教，那末这是因为寄生性是基督教的本质。耶稣在山顶传道中很好地说出了它的这个性质。正是在这里他规定“我们的圣父”这个祈祷的公式，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用这个祈祷的公式称呼上帝，为的是向他请求赐给“每日的面包”，而不是工作；并且还为了使任何一个名符其实的基督教徒不必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受到寻找劳动的诱惑。基督补充说：“你们看天空的鸟：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而你们的天父喂养它们……你们不用担心，也不要说我们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资产阶级的天父就是从事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的雇佣者阶级；它是那个关心他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但是资产阶级如果承认自己的寄生性质，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给予科学家完全的自由，使他们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不停留在任何偏见之上，对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自然力作最自由的和最深刻的研究，同时又禁止自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公正无私地去研究社会界，迫使他们去寻找为自己的惊人财富作辩护的理由^①。醉心于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酬金，他们兴致勃勃地着手探求在侥幸的场合，社会财富的创造除了雇佣劳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创造者，于是他们发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金融家、股东和食利者的劳作、节约、秩序、诚实、知识、智慧和许多其他的美德都有助于财富的生产，用不同于雇佣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方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他们有权取得狮子的份额，^②而给雇佣劳动者只留下驮畜的份额。

资产者听到这些话自然眉开眼笑，因为这是对他们的赞扬；他们甚至重复这些厚颜无耻的说法并宣称它们是永久的真理；但是不论他们的智慧如何低下，他们的内心是不能同意这个的，因为他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看到那些劳碌终生而假如不占有资本的人们将比约伯还要穷，那些只占有知识、智慧、节约、诚实和把它们用在事业上的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抱负限制在每天的食粮上而很少限

①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自己发展的初期还没有把整个资产阶级群众改变成寄生者时，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还能公正无私地研究经济现象和探求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自机器和蒸汽协助雇佣劳动创造财富之时起，经济学家就只限于搜集对商业投机和证券投机有利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而不再去作综合或分类，以便从中得出理论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对于有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再作科学的研究，而向社会主义挥拳攻击；他们甚至想推翻李嘉图的价值论，因为社会主义的批判占有了这种理论。——拉法格注

② 意即最大最好的份额。——编者注

制在超过这个的其他东西上。于是资产者就说：“如果智慧丰富和文学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虽然作了认真的研究还不能找出更有益的原因来说明资产阶级的财富，那末这只是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一些尚未知道的原因，人们不能探究它的秘密”。这就在资产者面前摆着一个**不可知的社会秩序**。

为了安定自己的社会秩序，资产者所关心的是使雇佣劳动者相信他的财富是他的无数的美德的成果；但是资产者自己实际上却对于说这些财富是他的品质之报酬，正如说他象贪婪地吃猪肉那样吃进口里的地菰是培植出来的，都一概加以嘲笑。对他有意义的唯一的**东西**，这就是占有财富，而使他不安的只有一个思想，就是他即使没有过失也可能失掉财富。他不能排除这个不愉快的前景，因为就在自己熟人的小圈子里他看到某些人失掉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另一些人原先是景况窘迫的，如今变富了。这些失败和成功的原因是他所不能理解的，正象那些亲身经受者不能理解一样。一句话，资产者虽看到财富的不断的流进和流出，但其原因在他看来却是属于**不可知的领域**，于是他只有把命运的盛衰变化归之于运气或偶然^①。

不能希望资产者有朝一日会达到正确认识分配的规律，因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财产**将失去个人的特点**而采取集体的、股份公司的非个人的形式，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最后将被引进交易所的漩涡中去。在交易所里股票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而且无论是买者、无论是卖者都没有看到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财产，也不确切知道财产所在的地理位置。它们进行交换，一部分人失掉而另一部分人获得，其所用的方法近似赌博，所以交易所的活动获得“赌博”之名。一切现代的经济发**展都力图逐渐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广大的国际赌场**，在这里资产者赢得和失掉资本，是由

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出乎一切的预料和一切的预计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们看来似乎依赖于运气、机缘。不可知的在资产阶级社会象在赌场里一样占着统治地位。

交易所里公开进行的赌博往往是商业和工业的条件之一：冒险是这样大和这样不可预测，往往有些事虽然想得很周到，经过盘算和筹划，但是不获成功，而另外一些事虽然草率从事和听其自流，反倒成功了。这些成功和失败，其原因是不能预料的，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和似乎只依赖于机缘，这就使资产者预先有赌博的心情；而交易所的赌博更使这种心情巩固起来和活跃起来。资本家既然把财产投资在交易所的有价证券上而又不知道其价格和利息涨落的原因，所以他们成了职业的赌徒。而赌徒只能把自己的赢输归因于顺利或不顺利，所以是最迷信的人；一切赌场的常客都有祈求运气的法术；有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或某个另外的天上的

① 资产阶级的头脑时时都为自身命运的经常不稳定而烦扰，希腊神话曾把命运表现为一个妇女，眼睛蒙着布，站在有翼的车轮上。公元前五世纪梅加尔的诗人泰奥尼斯（他的诗据伊索克拉特斯说曾用作学校的教本）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赚钱和亏损的原因，神才是财富的分配者……我们人类是靠虚幻的思想养大的，但是我们一无所知。神按照自己的意志使一切事都可发生……丘必特按照自己的意志使天平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又倾向那边；使某人富起来，然后在顷刻之间丧失一切……没有一个人的富贵贫贱不是由于神的干预所使然”。《传道书》、《诗篇》、《箴言》和《约伯记》的作者使耶和華起同样的作用。希腊的诗人和犹太的作家一模一样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

梅加尔象它的竞争者科林特一样是最初的海边城市之一，在那里发展了商业和工业。在这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为夺取政权而挑起内战。大约在泰奥尼斯降生以前六十年，民主派在一次胜利的暴动之后废除了欠贵族的一切债务，并且要求退回已支付的利息。泰奥尼斯虽然也是贵族阶级的成员，虽然也对民主派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他们掠夺和放逐了他，他甚至想喝他们的“黑血”，可是他仍不能逃脱资产阶级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甚至语言。例如他曾多次对流通的金子进行研究；这是商人为了辨识流通中的货币和钱锭的成色经常要求这样做的。因此泰奥尼斯的格言诗象《旧约》一样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极大智慧的基本原则，成了民主的雅典的学校里的教科书。色诺芬说：“这是一篇有关人的专论，正如灵巧的骑士写的骑马术的专论一样。”——拉法格注

神灵喃喃祈祷，另外一个除非赢得某种颜色，否则不下赌注，第三个左手里拿着家兔的脚等等。

不可知的社会秩序包围着资产者，正象不可知的自然秩序包围过野蛮人一样。文明生活的一切行为或几乎一切行为都力图在资产者之间发展赌徒中存在的迷信的和神秘的习惯，即相信一切都是偶然的习惯。例如信贷（没有它任何商业、任何工业都是不可能的）就是贷出者相信偶然，相信不可知之事的一种行为，因为信贷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即不能保证借贷期满之日借方必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借方的支付能力完全依赖于无数的偶然性，而这些偶然性又是这样难以逆料，象未知数一样。

其他的经济现象日复一日地促使资产者相信没有物质基础的、丢开一切物质的神秘的力量。只须举一个例子：银行的纸币所具有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的微小数量是很不适应的，这件事使得资产阶级的头脑对那离物质而存在的力量深信不疑。这些可怜的小纸片，假如它的魔力不能使它的握有者获得世界上更多物质的和赏心悦目的东西：面包、肉、酒、房屋、土地、马、女人、健康、尊敬、荣誉等等感官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快乐，那末谁也不屑把它从地上拾起来；上帝所能做的也不比它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①。

商业和工业的危机在受惊的资产者面前产生不可抗拒的威力的无穷的力量，它们散播同基督教的上帝发怒一样可怕的灾难。当危机冲进文明世界时，它们使成千的资产者破产，使亿万的产品和生产工具受到破坏。经济学家在百年来就注意到它们的周期的出

① 勒南，他的多疑而有教养的头脑为神秘主义弄昏了，对财产的非个人的形式非常同情。他在他的《童年回忆》中说，与其用收入购买不动产、土地或房屋，还不如购买“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这是些比较轻的、易碎的、轻飘飘的东西”。银行纸币也同股票和公债券一样是一种轻飘飘的价值。——拉法格注

现，但是不能对它们的来源作出合理的解释。既然在地上不可能找出危机的原因，于是就促使英国的经济学家到太阳上去找；太阳的斑点用于旱来毁坏印度的收获，同时也就减少了他们对欧洲商品的购买力，因而引起经济危机。这些大学问家从科学把我们引到中世纪的占星术里去，占星术曾把一切人类社会的事件都归之于星球的影响，并且使我们同野蛮人一样相信流星、彗星和月蚀对命运的影响。

经济界对于资产者到处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经济学家束手无策，不去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资本家由于自己的学者而成功地降服自然力，然而为经济力的不可理解的作用所惊倒，以致宣称它们象上帝一样是不能约束的，因此就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顺从地承受它们所带来的灾难，而以感恩的心情去接受它们所赏赐的幸福。他同约伯一起说：“主既赐我，主也要取去，应当感谢主的圣名。”经济力量在他看来是虚幻的东西，既象善人，又象恶人^①。

包围着资产者和使他吃惊的社会秩序的神秘莫测的恐怖，他不明白为什么和怎么样出现在他的工业、商业、财富、福利和生活中，这件事对他的苦恼正如神秘莫测的自然秩序对野蛮人一样，这种自然秩序曾使野蛮人的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发生动摇和激动起来。人类学家把原始人的巫术、相信灵魂、鬼和上帝归因于他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文明人；他们的唯灵主义的观念和信仰上帝应当归因于对社会界的无知。资产者的荣枯无常和他们的幸与不幸的原因不可知，这就促使他们也象野蛮人一样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他们想象，这些最高主宰从顺利的方面或从不

^① 危机对有产者产生这样强烈的印象，以致他们说到危机时总是把它比作有形的生物。著名的美国幽默作家阿尔特姆·华德说他听说纽约的金融资本家和工业家确实实地相信“危机已经来到了，它已经在这里”，他以为危机就在客厅里，于是就在桌子椅子下面去寻找，为的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拉法格注

顺利的方面影响着社会的现象，象泰奥尼斯和《旧约》所说的那样。为了感动最高主宰，他们醉心于最粗俗的迷信的事情：与阴间的鬼魂打交道，在圣像之前点上蜡烛和向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的上帝或哲学家的唯一上帝祈祷。

自然秩序的未知之物曾对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蛮人产生特别强烈的印象，相反地却并没有使资产者感到什么了不起的惊慌：他只知打扮过的、装饰过的、修剪过的、铺上沙子的、弄平了的、被驯服了的自然。科学为了使他致富所作的许多贡献和他所期待于科学的新成就都使他的头脑中产生出一种对科学的威力的盲目信仰；他不怀疑科学总有一天能解决未知的自然界的问题，甚至能使他的生命无限延长，如象微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所应许的那样。但是讲到社会界的未知的事物，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使资产者焦虑的唯一的事情；他不认为这是有可能解释的。不是自然界的，而是社会界的未知之物不知不觉地在他那想象并不丰富的头脑中引起了上帝的观念，其实上帝观念的发明他用不着费什么气力，他可以找到现成的东西来加以利用。不可理解的和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使上帝成为非常必要的，假如有需要的话，他就会发明出来。

资产者既被幸运与不幸的忽来忽去的动荡和经济力量的不能理解的赌博所困惑，又进一步被他和他的伙伴的行为同流行的正义、道德和诚实的观念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弄得昏乱不堪；他也虚情假意地重复这些观念，但是并不打算用它们作为行为的规范，虽然他与别人打交道时也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举例来说，假如商人把损坏的和冒牌的商品卖给顾客，他却想他们付给他好的、成色十足的货币；假如工业家在计算劳动时欺骗工人，他却要求工人在支付了工钱的时间内不失掉一分钟；假如爱国的资产者——一切资产者都自称是爱国的——侵占了较弱的民族的祖国，那末他们就把自己祖国的完整作为商业的信条。——用塞西尔·罗得斯^①的话

来说,祖国的完整就是社会的理由。正义、道德和其他比较有永久性的原则只是当它们服务于资产者的利益时才是对他有意义的;它们有两付面孔:望着资产者的一付是宽大为怀的和笑容可掬的;向着别人的一付则是阴沉的和威严的。

行为与正义和道德观念之间的永久的和普遍的矛盾,看来似乎可以动摇资产者的正义的上帝的观念,然而相反地却巩固了它和为灵魂不朽的观念准备了基础,而这灵魂不朽的观念早已在进入父权制时代的民族中间消灭了。这个观念由于资产者希望他所做和未做的一切都有报酬的习惯而在他们中间得到支持、巩固和经常复活^②。资产者雇用工人,制造商品,卖出买进,借钱,作任何一种服务,只希望有报酬,能赚钱。经常期望着利润的结果使得他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为了寻快乐而去做它,而只是为了获利;假如他是宽大的、仁慈的、正直的,或者他能做到不使自己成为无耻之徒,可是他对自己良心得到安慰并不满足;为了得到满足和不致被自己的善良的和纯洁的感情所欺骗,他需要报酬;假如他不能在地上得到好处,这是常有的事情,他就指望在天上得到它。他不仅希

① 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英国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的辩护人,英布战争的发起者。——编者注

② 泰奥尼斯也象约伯和《旧约》的作者一样,因为难于使命运的不公正和上帝的正义相调和而发窘。这个希腊的诗人说:“啊,撒但的儿子,你怎么能把同一命运赐给正义与非正义……啊,永生的王,让那个既非不名誉,又没破坏法律,又没有发过假誓,而且经常保持正直的人受苦受难是公正的吗?……不义的人只想自己,他既不怕人怒,也不怕神怒,他尽干不义之事,可是财富用不完,而正义的人却失掉一切和受到严重贫困的折磨。凡是看到这些东西的人,谁还害怕神呢?”《诗篇》的作者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享受安逸,财富便加增。……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我见恶人和狂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诗篇》第七十三篇,3,12,15)。

泰奥尼斯和《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不信死后灵魂的存在,也不信非正义将在人世间被处罚。希腊的道德家说:“因为神的智慧高于一切。但这是使人困惑的,因为神不是在某人犯罪的时刻就给予惩罚。某人亲自偿还自己的债,另一个则罚其儿女倒运。”据基督教教义的说法,人为亚当的过失而受罚。——拉法格注

望自己的善行和禁止坏事有赏报，并且还期待为自己的不幸、失败、挫折和甚至自己的悲伤也得到报酬。他的“我”是欲壑难填的，以致为满足它，他就把天也归并于地。文明世界的非正义行为是这么多和这么令人愤怒，而他本人成为其牺牲品的那些非正义在他眼睛里看来，其范围是无限宽广的，以致他的健全的理性不能设想它们在某一天会得到纠正，而这个日子只有在另一世界里才能出现：他相信只有在天上他才能为自己的不幸取得报酬。阴间生活对他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他的善良的、正义的和用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德装扮起来的上帝不能做别的事情，只是为他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一切赏给报酬和补偿他的一切苦难，在天上的商业法庭上将结清地上所没有付还的一切账目。

资产者不把占有工人所创造的财富称作非正义；这样的偷盗行为在他看来就是正义；他不能设想上帝（或者不论什么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其他的意见。虽然他不以为因允许工人有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愿望而会使永久的正义受凌辱；但是因为他确实地知道这些改善的实现一定会使他受到损失，于是他想到政策上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许诺他们以未来的生活，到那时候他们将同资产者一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许诺阴间的幸福是满足工人要求的一种最经济的方法。死后生活，对它的期望原先使他得到快乐来满足他的那个“我”，现在变成为剥削的工具。

自从地上的账目的最后清偿移到天上之时起，上帝必然变成法官，他掌握着用来安置一部分人的乐土和用来禁闭另一部分人的监狱，基督教也跟着柏拉图这么说^①。天上的法官判案是依据文明的诉讼法典，不过补充了一些道德的条例，这些条例由于确定和证明罪案之不可能而不能列入法典。

现代的资产者把报酬和赔偿主要寄希望于阴间世界；他不很关心对恶人，即对给他带来伤害的人的惩罚。地狱并不使基督教

徒担心，第一因为他相信他没有做、也不能做什么坏事，值得受地狱之罚，第二因为他并不对那欺负过他的伙伴怀恨在心。他随时准备同他们重新缔结业务上的或友谊的关系，假如他发现他们有利可图的话；他甚至还对那些欺骗过他的人怀有某些敬意，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对他所作的也只是他曾对他们作过的或想对他们作的而已。每天都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干欺骗勾当而丢了脸，他们可能被认为永久破产了，但是他们又重新出头露面并获得光荣的地位；为了重操旧业和取得正当的利润，只要他们有钱就行了②。

地狱只能是由那些为仇恨和报复欲所苦恼的人们发明出来，而且也只为这些人才发明出来。早期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刽子手；罚他的敌人——非信徒受到永久的折磨使他感到快乐。圣保罗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加后书》，1，7—9）。当时的基督教徒以同样热烈的信念期待着因自己的笃信宗教面受奖赏，如象对那些成为上帝敌人的自己的敌人给以惩罚一样。资产者已不再去培养这样残忍的仇恨，因为

① 苏格拉底在《共和国》一书的第十卷和最后一卷中引用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当作值得相信的事实：一个丢弃在战场上的尸体，它经过十天之后象耶稣一样复活了，说他在另一世界看到：“灵魂为生前所行的每一件不义之事而受到十倍的惩罚。”折磨他们的那些“形容丑恶的人都象火般的暴烈……他们剥了犯人的皮，拖着他们经过荆棘丛生的土地等等”。基督教徒从柏拉图的诡辩派抄袭自己的道德观念的一部分，余下的只是对苏格拉底加以补充和改善，为了建立自己那个装饰得如此阴森可怖的地狱。——拉法格注

② 埃米尔·贝列拉是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者和经理，他在这银行可耻的破产之翌日在林荫道上遇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他却迎面走上去，大声对他说：“你应该向我鞠躬，我还留下几百万哩”。这呼声非常适当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所以引起注意和受到重视。贝列拉死时拥有几亿家产，因此受到尊敬和哀悼。——拉法格注

仇恨不产生利润，所以既不再需要地狱来满足自己的报复，也不再需要刽子手的上帝来惩罚那些欺骗过他的伙伴。

资产阶级的信仰上帝和灵魂不朽是他的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现象之一；只有当他被剥夺了他从雇佣劳动者窃取来的财富和从寄生阶级变成生产阶级之时，才能使他摆脱那种信仰。

为着在法国夺取社会专政而战斗的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曾经猛烈地攻击过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因为他们支持贵族；假如在战斗的烈火中他们的一部分领导者——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曾把反宗教的思想发展到无神论，那末他们的另外一部分并非次要的精神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杜尔哥从来也没有达到否认上帝。唯物主义的和感觉主义的哲学家如卡巴尼斯、梅恩·德·比朗、热朗多等，他们都经历过革命，但都公然否认自己的学说是信神的。不必空费时间去责难这些著名人物背叛了当初曾使他们获得名望和饭碗的哲学观点；犯罪的只是资产阶级；它成为胜利者之后就失掉了自己的反宗教的战斗，于是象《圣经》的狗一样回到自己曾经讨厌过的东西——基督教那里去，基督教象梅毒一样是一种器官病并停在资产者的血液里。这些哲学家受到了社会气氛的影响；他们是资产者，他们随同自己的阶级而进化。

这种社会的气氛的影响就是最有教养的和思想最自由的资产者也不能避免，它是居维叶、若弗卢瓦·圣伊雷尔、法拉第、达尔文这样的天才人物的自然神论以及现代学者的不可知论和实证论形成的原因，这些学者不敢否认上帝，力图回避这个问题的研究。但是这种回避等于默认上帝的存在，他们需要上帝来解释社会界；这社会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偶然的，这同自然界之受必然规律的支配是不一样的。

布吕纳蒂埃尔反复引用德国耶稣会会员格鲁伯说的“共济会

习惯讲的上帝的观念是不可知的”这句话，认为这是嘲弄自己阶级的自由思想的警句。不可知并非对于任何人都能成为上帝的观念；但它是同样地在蒙昧人和野蛮人当中，在信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当中和在共济会员当中引起这观念产生的原因。假如自然环境的未知之物给蒙昧人和野蛮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指挥者的观念的必要性，那末社会环境的“未知之物”也给资产者创造了上帝观念的必要性，让这个上帝来分配那从体力的和脑力的雇佣劳动者身上窃取来的财富，分配善和恶，奖励行善，纠正不义和改正错误。野蛮人和资产者对上帝的信仰是不知不觉形成的，正如他们自己绕着地轴旋转对于他们是不知不觉一样。

四

上帝观念的发展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未知之物使在人脑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帝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它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改变；它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进化。

希腊人、罗马人和古代民族的神是被安置在一定的地点并只对自己的崇拜者有利和对他们的敌人有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别的神，这些神都是神化了的祖先的灵魂，每一城市也有自己的神，或象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城市的神或女神住在专门供奉他们的庙宇里和赋形于木雕或石雕的偶像上面；他或她只关心城市居民的命运。祖先的神只管家庭的事。《圣经》上的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神；他住在称为神龕的木箱里，这木箱在部落迁移时一起带走；人们还把它放在军队的前头，为的是让耶和华为自己的民族打仗；虽然耶和华因为自己的法律被破坏而残酷地惩办它，但是他也

给它作了许多服务，象《旧约》上所讲的。当城市的守护之神不适应自己环境时，就增添其他的神；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从佩辛努弄来了赛比利的神像，让这小亚细亚的女神来帮助他们自卫，反对汉尼拔的侵略。当基督教徒捣毁神庙和破坏神像以使它们迁居和阻止异教徒保护它们时，他们也有同样的关于神的概念。野蛮人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副本，所以他们的神化了的灵魂，虽然依附在石头、木块和动物身上，仍保留了人形。同样，对于圣保罗和使徒来说上帝是具有人形的；因此他们把他做成肉体上和精神上都象他们的人神。而现代资本家设想这个神是没有头没有臂的，不是住在某个一定的地点，而是在地球的一切角落和偏僻之处。

希腊人和罗马人，同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教徒一样，都不认为他们的神是世界上唯一的神，犹太人相信摩洛克(Moloch)和巴尔(Baal)以及他们曾与之作过战的其他民族的神，正如相信耶和华一样的坚定；而公元初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假如称丘必特和阿拉为伪神，那末总还是承认他们是能完成奇迹的神，完全与耶稣或天父一样^①。正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数目很多，因而每个城市都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神，专为自己服务，供奉在庙宇里和附在塑像或某种东西上而；耶和华是用石头塑造的。现代资本家认为他的上帝是遍于全球，因此必然得到唯一的上帝的概念；他赋予自己的上帝的这种无往不在阻止他去把上帝设想为有脸有髯、有手有脚的人形，象荷马的丘必特和圣保罗的耶稣那样。

守护神对于那些经常与周围民族作战的好战的古代城市是适用的，但是不能满足商品生产在工商业城市的资产阶级民主中所创造的宗教的需要，因为这些城市相反地被迫不得不同邻近民族

^① 德尔图良在自己的《辩护》里和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都说到确凿无疑的事实：埃斯库拉普使许多死人复活，他们还举出死人的名字；一个贞节的少女用筛子从台伯河取水，另一个贞节的少女用腰带来拖船等等。——拉法格注

维持和睦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需要迫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取消守护神而创造世界性的神。在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在伊奥尼、大希腊和希腊的沿海城市可以看出有组织宗教的试图，这种宗教的神不是为某一城市所特别专有，而应为各种不同的民族，甚至为敌对的民族所承认和敬奉。这些新的神，如伊西士、得墨忒耳、迪奥尼修斯、米特拉、耶稣等，其中有许多是属于母权制时代的，都还具有人形，虽然已开始感到需要有一个不具人形的；但是只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提出非人形的上帝的观念，这是由于股份公司的财产是采取非个体的形式的结果。

股份公司的非个体的财产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占有形式，它同前者所存在的形式截然相反，因此必然会改变资产者的习惯和风俗，并且进而改变他的精神状态。在它出现以前只能有波尔多的某一葡萄园的占有者，卢昂的某一纺织厂的占有者，马赛的每一铁工厂的占有者，巴黎的某一食品店的占有者。这些财产的每一种都因工业部门和地理位置而各异，总是由唯一的一个人或者两个，最多三个所占有；同一人占有许多企业是少见的。说到非个体的财产情况就不同了；一条铁路、一个煤矿、一家银行等等可以由成百上千的资本家所占有；同一个资本家也可以在自己的皮包里同时装有法国、普鲁士、土耳其、日本的公债证券，德兰士瓦金矿、中国的电车、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巴西的咖啡种植业、法国的煤矿等等的股票。资本家对他所握有证券的非个体的财产没有象资产者对归他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所怀有的那种爱；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为购股票而支出的价格和股票带来的红利大小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至于票息是由管理卫生清洁的企业、制糖厂或纺织厂所提供和它来自巴黎或来自北京，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从那只有利息对于资本家才有意义的时候起，他所得到的财产的特性的差别便消失了；这种因工业部门和地理位置而不

同的财产对于资本家就同一化为带来红利的统一的财产，其证券被投入交易所里流通，继续保留着工业部门和国家的不同的名称。

非个体的财产席卷一切工业部门和扩大到全球各地，它用装有橡皮奶头的触须到处去吸取进款，不论是对信基督教的民族，也不论是对信伊斯兰教的、信佛教的还是信拜物教的国家都是一样。既然财富的积累是资产者的贪婪的和占统治的欲望，那末这种因性质和民族而不同的财产之同一化为统一的世界性的财产就不能不反映到他的智力上来和影响他的神的概念^①。非个体的财产不知不觉地引起他们去把地上的许多神同一化为统一的和世界性的神，这些神因不同的国家而称为耶稣、阿拉或佛陀，并且受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的敬奉。

统一的和普遍的神的观念，阿那克萨哥拉是最初说到它的人之一，它从许多世纪以来都只停留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中，只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之下才成为普遍的观念，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由于与这种非个体的、统一的和世界性的财产一起还存在着无数的个体的和地方的财产，所以地方性的和具人形的神在资本家的脑子里就同统一的和世界性的神碰在一起。人民之划分为民族，在工业和商业中互相竞争，这就迫使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统一的神按民族的数目而分为许多的神；因此，每个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切基督教徒共同的神，然而同时又是民族的上帝，象犹太人的耶和華和雅典人的帕拉斯-雅典娜就是如此。当两个基督教的民族宣战时，其中每一个都祈求自己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为自己去打仗，获得胜利的民族则唱《感恩赞美诗》来感谢上帝帮助打败了敌对的民族和他们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多神教徒迫使各种不同的神彼此交战，而基督教徒则迫使自己的统一的上帝自己同自己交

^① 泰奥尼斯说：“财富是永无满足的，有了很多财产的人还是要努力求其倍增。”——拉法格注

战。只有当所有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联合为一个唯一的民族时，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头脑中的民族的上帝。

非个体的财产还具有其他的一些特性，它把这些特性转嫁于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

麦田、细木工作坊或服饰用品商店的所有主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到，估得出自己的财产，因为它们的精确的和特定的形态深深地印在他的感觉里。但是公债证券和铁路、煤矿、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股票的持有者就不能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到，估得出他的证券和股票所代表的那部分财产：他能不能设想它的位置是在哪座森林或哪所国家的建筑里，哪个车厢里，哪一吨煤里，哪张保险单上和哪只银行的钱柜里？他的那部分财产失掉了，溶化在广大的整体当中，以致他甚至不能想象出它的样子；因为虽然他看到了火车头和车站，同样也看到隧道，但他任何时候也不能看到铁路或煤矿的整体；而某一国家的公债，银行或保险公司也不能用某种现实的形象表现出来。非个体的财产在他的想象中只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和不确定的形态；它对于他与其说是感性的真实之物，不如说是抽象之物。然而这种非个体的、不确定的财产象形而上学的概念一样，却能关心一切他的需要，象基督教的天父一样，不要求他作任何其它的工作和多费心思就可坐收红利；他在身心的悠闲中取得红利，这是资本的恩惠，资本的恩惠就是上帝的恩惠，也就是勒南所说的“基督教教义中最可靠的东西”的反映。他不再绞尽脑汁去弄清那给他利息和红利的非个体的财产的性质，也不再去弄清：他的那个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者还是动物，是聪明还是愚蠢，这上帝是否也具有人形的诸神所具有的那些力量、残暴、正义、善良等等品质；他不必再费时间去给上帝作祈祷，因为他相信任何祈祷也不会改变非个体的财产的利

息和红利的大小，而他的那个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就是这种财产的精神上的反映。

当非个体的财产把基督教的具有人形的上帝变成为非人形的上帝，变成为抽象之物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时，它也就使资产阶级的宗教情感丧失了曾经引起殉道者、十字军骑士和宗教裁判者的狂热病的那种感染力；它把宗教变成个人口味的事情，象饕餮一样，有用牛油制的，也有用植物油制的，有加蒜的，也有不加蒜的，各人都可拣自己喜欢的吃。但是假如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宗教的需要，并且假如他发现自由的基督教是对自己适合的，那末他也不能不加严重的修改就接受天主教的教会，因为它的那种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一直管到生活细节；这教会有自己的主教、牧师、僧侣和耶稣会会员的组织，这些人都是严守纪律的，甚至一举手一投眼都听从指挥，所以对他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威胁。只有封建社会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会，因为这个社会的一切成员，从奴隶到国王，构成了一套等级的制度，并且用相互的权利和义务把一个跟另一个联结起来；但是它不能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所容纳，因为这种制度的成员在运气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又为利益所拆开，彼此处于不间断的工业和商业的竞争当中，他们都希望常常有权批评宪法的权力和使它对自己的经济失败负责。

资产者为了追求致富，不愿受到任何的束缚，也就不能忍受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因为这种组织要监督生产的方法和产品的质量。因此他就摧毁了它。解除了一切的监督之后，他唯一关心的是建立自己的幸福，每人都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行事。只在自己的有弹性的良心面前他才对出厂待卖的商品的质量负责。顾客所关心的事是在他所买的商品的质量、重量和价格方面不使自己受欺骗。每人都为自己，而上帝，即金钱，为大家。商业和工业的自由必然反映到他对宗教的理解方法上，即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

思去理解宗教。每个人都要同上帝相处好，正如在商业事务上要同自己的良心相处好一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认识去解释教会的训示和《圣经》的话，《圣经》在新教徒手中正如法典之在一切资产者的手中一样。

有产的资本家既不能是殉道者，也不能是宗教裁判者，因为他失掉了那种曾经鼓舞过早期基督教徒的笃信新教的热情，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增加信徒的数目，目的是为了增加不满现状者的军队来同多神教的社会作战；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种既不鼓励、也不劝说的宗教信仰的热情，表现在他对妇女和雇佣劳动的剥削上面。

妇人应当顺从他的意志。他想随心所欲地叫她忠实或不忠实；假如她是他的同行的妻子，假如他想追求她，他就要求她不必忠实，算是对待他的那个“我”的义务，并且使用一切的花言巧语来劝她摆脱宗教的顾虑；假如她是他的合法妻子，她就成为他的财产而不许别人染指；他要求她坚定不移的忠实并利用宗教来在她脑中灌输夫妻的义务。

雇佣劳动者应当顺从自己的命运。劳动剥削者的社会职能要求资产者宣传基督教的宗教，宣扬向那个选拔主人和规定奴仆的上帝谦恭和顺从，并且要求他用民主制度的永久原理来补充基督教的教义。对他非常有利的事是使雇佣劳动者在宗教真理的辩论中和在正义、自由、道德、祖国和其他类似的笨拙的骗局的讨论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使他们无暇去想自己的贫困的处境和改善之法。著名的激进派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杰科布·布莱特非常重视这种愚弄的方法，以致牺牲了自己的礼拜日去向自己的工人讲读《圣经》。但是用《圣经》来愚弄的事，英国的男女资产者只是出于闲散和由于好奇才去干它，——这是很不经常的，象那些凭兴趣的劳动一样。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有一批职业的愚弄家来担任这个任务。各教派的僧侣给他们提供了这类人物。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让雇佣劳动者读《圣经》是有危险的，洛克菲勒就懂得这点。托拉斯的创造者为谋补救起见，就组织了托拉斯来出版通俗的《圣经》，删掉对富人的伤风败俗的怨言和反对他们的卑鄙无耻的幸福之嫉妒的愤怒的呼号。天主教的教会早已预见到这个危险并采取对策：禁止信徒读《圣经》和把维克莱夫——把《圣经》译为通俗语言的第一个翻译者，活活烧死。天主教的僧侣因为有自己的九日祈祷、朝拜圣节和其余的虚伪的仪式，所以在一切僧侣中是最懂得实行愚弄技巧的人；他们也最懂得分派僧团的兄弟姊妹去服务于初级小学和分派宗教的女监视人去服务于雇用女工的工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虽然对僧侣的等级制度、贪婪和干涉家庭事务感到厌恶，但因为他们服了许多务，所以还是从政治上和金钱上来支持他们。

五

无产阶级不信宗教的原因

在欧洲和美洲曾采用过许多办法想使工业无产阶级基督教化，但是全部都失败了；他们想改变无产阶级对宗教的冷漠态度，没有获得成功；这种冷淡随着机器生产把新募集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编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的数目的增加而越来越普遍。

机器的生产方法使资产阶级相信宗教，相反地却在无产阶级中造成不信宗教的气氛。

如果说资本家相信有一个关心他的需要的神明，相信有一个上帝把他从成千上万的人中选拔出来并使他过游手好闲的生活和作社会的无用之物却有无数的财富是合逻辑的话，那末无产阶级不理睬神明的存在就更合逻辑，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从早祈祷到晚，

任何一个天父也不会赐给他每天的面包，他也知道给他以生活必需品的工资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他很清楚假如他不工作，不管天上有多少善良的神和地上有多少慈善家，他还是要饿死。雇佣劳动者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他的生活条件使另外的神明概念成为不可能：在他的生活中没有象在资产者生活中的这些命运的突变，似乎能够靠魔法一下子就把他从悲惨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他作为雇佣劳动者而生，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活，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死。他的欲望至多不过是工资的增加和在一年中的每天中以及一生的每年中能有继续不断的工资。促使资产者相信迷信观念的偶然机会和不能预见的运气对于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面上帝的观念，假如它的出现不是由迷信的观念（不管来源如何）准备好的话，就不能在人脑中出现。

假如工人也使自己去迷信上帝，因为他在不留意时经常听到周围的人们谈到上帝，他便开始怀疑到底上帝有没有正义，为什么只把劳动和贫困的命运赐给他；他感到上帝是可怕的和可恨的，并且把他想象为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模样和姿态，很象殖民地的黑奴说上帝也象他们的主人一样，是白种人。

自然，雇佣劳动者不比资本家更明白经济现象的过程和更了解为什么紧跟着工业的繁荣和高度紧张的劳动时期之后就是危机和失业，象黑夜代替白天一样的准确。这个理解的缺乏正是促使资产阶级的头脑倾向信仰上帝的原因，但是对于雇佣劳动者却不发生同样的作用，因为他们在现代的生产中占着不同的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资产者可以无限制地支配生产和产品的销售，因而使他不得不去研究那些对生产和产品销售发生影响的原因；雇佣劳动者相反地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件事。他既不参加生产的管理，也不参加原料的选择和供应，也只不过问生产的方法和商品的售卖；他只是象牲畜一样提供劳动。引起自由思想家愤怒不已的耶

耶稣教的消极的顺从是军队和工场的法律。资本家把雇佣劳动者放在正在运转和装进了原料的机器面前，命令他工作，于是他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在生产中对于他只有一个目的——工资，资本家不得不给他的唯一的利益；他一旦工资到手，就不再有更多的要求。既然资产阶级答应给他们在生产中保留的唯一利益是工资，所以他只关心为取得工资而要求工作；既然雇主或其代表人给他工作，因此当他有工作时或者当没有工作时，他总是责怪他们，责怪这些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去责怪那他所不知道的经济现象；他因减少工资和停止工作而迁怒于他们，而不怪生产的普遍混乱。他把他所遭遇的一切祸福都要他们负责。雇佣劳动者把他所遭遇的一切生产的偶然事故都归咎于资产者个人，然而生产资料的占有却随生产转到机器的方法而日益失去个体性质。

大工业的工人所过的生活使他比资产者离开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远，这自然环境的影响曾促使农民信仰鬼魂、巫婆、中邪和其他的迷信观念。工人只有通过工场的窗户才能看见太阳，他所了解的自然只是他工作的城市周围的乡村，而且也只在难得的机会才看到；他不懂得黑麦田和燕麦田，马铃薯的茎叶和大麻茎有什么区别；他所知道的土地的产品只是他所消费时那个样子。他完全不了解田间作业和影响收获的原因；旱、涝、冰雹、飓风从未使他想到它们对自然及其收获的影响。他的城市生活使他解除那些困扰农夫的心灵的担心和忧愁烦恼。自然没有在他的想象中留下任何的印象。

在机器工场中的劳动使雇佣劳动者和农民所不知道的可怕的自然力建立了一种联系，如今不是他屈服于自然力，而是他控制它们。庞大的钢铁机器充满了工厂，使它运转，象一架自动机，时而抓住他，时而碰伤他，时而压扁他，可是机器并没有使他产生迷信的恐怖，象打雷之于农民那样，而是使他又冷淡，又无畏，因为他

知道金属怪物的肢体是由他的同伴制造和装配起来的，他只要拉动皮带就可以使它运转或停止。机器，不管它有如何的威力和惊人的生产能力，在他看来并没有任何秘密。发电站的工人只要把配电盘上的机柄扳动一下就可以把动力送到若干公里之外去供电车使用或使城市的电灯发光，他只要象《创世记》上的上帝那样说一句：“让那里有光”，那里就有光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什么更神奇的魔术；而且在他看来，魔术也不过是简单的和自然的东西。当他接电时，假如有某一个人走去告诉他，假如他相信的话，有个上帝可以停止机器和熄灭电灯，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将回答说这个无政府主义的上帝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齿轮系统出了毛病或者是断了电线，而他将很容易地找出这个捣乱的上帝并使之就范。现代工场中的工作教会雇佣工人相信科学的决定论，以致他不需要经过科学理论的学习。

既然资产者和无产者不再生活在田野中间，所以自然现象就不再有力量在他们中引起迷信的观念，它曾被野蛮人利用来制造上帝的观念；但是假如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属于统治的和寄生的阶级，感受着由于社会现象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迷信观念，另一个因为他属于被剥削的和生产者的阶级，则不会受到他们的迷信的影响。资产阶级在它的阶级专政和它每天从雇佣工人身上掠夺来的财富被剥夺之前，是不会放弃基督教和丢掉上帝的信仰的。

对自然的自由的和公正无私的研究在某些科学的领域中产生了并且牢固地建立起一种信念，即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服从于必然的规律，而决定它们的原因应当在自然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去探求。此外，这研究还可以使自然力驯化，以服务于人类。

但是在工业上利用自然力使生产资料改变为这么庞大的经济机体，以致它们逃脱独占它们的资本家的控制。周期性的工商业的危机正证明这点。这些生产的机体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但在

危机时期却以这样一种盲目的力量，即汹涌澎湃的自然力所借以震动自然界的那种盲目的力量，去破坏社会环境。现代的生产资料只能由社会来控制；为了使这种控制能建立起来，它们应当预先成为社会的财产；只有这时它们才不再产生社会的不平等，才不再把财富交给寄生者和使雇佣的生产者受穷和造成世界的混乱，资本家和他的经济学家都只知道把这种混乱的原因归于偶然和不可知的原因。当生产资料处于社会的占有和社会的控制之下，不再有不可知的社会秩序的时候，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才能从人的头脑中消灭上帝的信仰。

* * *

现代工人对宗教问题的冷漠，——其决定的原因我已研究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的现象；人民群众以前常常制造唯灵论的观念，对哲学家来说，只消从其中抽取精华和使它变得模糊就够了，正象宗教传说和观念一样；而牧师和统治阶级只是使这些传说和观念成为官方的宗教和麻痹群众的精神工具。

选自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

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190-220页。并根据《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28年巴黎法文版第289—337页作了校订。

在法国社会党图卢兹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908年10月)

我们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反议会制问题，另一个是改良问题。在我们的争论中只是刚刚触及反议会制问题。我赞成如下的观点：议会制只是资产阶级的适宜的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能够掌握国家的预算手段以及军事、司法和政治方面的权力。社会主义者不是议会派，而是反议会派，他们要推翻议会制政府——这个骗人的、乱七八糟的制度。(一些人鼓掌)那个自称是选民的代表的议员是在骗人，因为他的选民团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他不能既代表这一部分人又代表另一部分人。当他自称是他们的代表时，他是在说谎，况且他也没有这种能力……(一些人再次鼓掌)……啊！你们向我鼓掌，你们这些人！因为我向你们反议会的磨盘里注了水。(大多数人的欢呼声和笑声)而我们的思想，我们党的思想不是今天刚有的，你们的思想是最近才有的，但你们对你们的思想不能给以解释，甚至不了解它！……(抗议声)

有人喊道：你们的思想是最近才有的。

拉法格：也是以前就有的。我们进行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宣传，并且可以说：我没有改变我的思想，这是了不起的。(热烈鼓掌)而当你们可以这么说的时侯，且不说四十年，而是四年，那就了不起，它会使你们所讲的话有某种价值。

当我在常务委员会里说议会制是骗人的制度时，我的一位朋友反驳说，议会制难道不就是我们在工人团体中实行的那种代表制吗？我答道，你不要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当在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组织中选举一个代表时，这个代表同选举他的人思想是一致的，他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如果你是泥瓦匠，那么这是一个你们所接受的泥瓦匠。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是一个你们所接受的社会主义者。而在立法选举中就不是这样，选民团是无定形的组织，它选举随便哪一个人，而不关心他是否有保护它的利益所必需的能力。议会制的无能在选择资产阶级机器的操纵者即部长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有比我们现在的部长更加不够格的吗？（笑声）从来都是这样：人们为海军部选定的部长们从未出过海，对于造船如同神父或随便哪一个汤姆生一样一窍不通。（笑声）过去曾有过这样的农业部长，竟连土豆和洋姜都分不清。（笑声）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认为部长和议员不应有坚定不移的观点，不应想实现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和实践他们的思想。资产阶级所要的是驯服的、随时准备听从它的调遣的代理人。

我们对于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或更确切地说党在议会中的活动的想法，不同于提出若贝尔提案的那些反议会同志。我不想详细谈论我们的观点，而要求保留今后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我要说明一点，我们在常务委员会中，经常是刚开始，只要偶然接触到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分歧。有一些人认为，派代表进入议会就是夺取政权和削弱资本主义政府的抵抗力量。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派代表进入议会并不是想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力量，而是为了同它进行斗争，给我党增加一个新的斗争场所，最宏伟的斗争场所。有些同志以为派十个、十五个或五十个代表进入议会就能削弱资产阶级政权的力量，那么试问，今天克列孟梭先生

和资本主义反动派难道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比在议会中只有三、四名社会主义代表时更加有力了吗？（鼓掌）

在三次晚间召开的会议上，我们所关心并进行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改良问题。我们一致谴责无政府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改良看作是为了延长现社会的存在而作的修补。我和我的朋友们声明，改良不是可医治社会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并认为即使对工人阶级最有用、最有利的改良也不能使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公民饶勒斯在《人道报》上回答我们在常务委员会里的争论和我在《人道报》上发表的文章时表示愤慨，因为我在文章中写道，对工人阶级来说每周一次的休息是重要的，八小时工作日更重要，但这些只是改良，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

饶勒斯，请你看一看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几个世纪以来就已规定每周休息一次；在法国，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实行了每周休息一次，工人们在这场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之前已有他们的星期日，除了星期日，还有四十二天假日，他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工作，纪念圣徒，举行宴会，消遣娱乐，因而也不为他们的主人——资本家创造利润。所以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打倒天上的圣徒，以废止尘世纪念这些圣徒的节日。

革命的资产阶级废止得如此彻底，以致连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不敢要求五十六个星期日之外，再增添四十二个纪念圣徒的节日。

你们回答我说：英国实行的星期六（半日或全日）和星期日休息制难道不是减轻痛苦吗？谁又说不是呢！

唐热刚才似乎指责我们想拒绝改良。恰恰相反，我们希望实现一切改良，甚至纯属资产阶级的改良，例如征收所得税、购买西

方公司所经营的铁路。在我们看来，谁提出改良是无关紧要的，顺便说一句，有关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改良不是社会主义者议员而是资产阶级议员提出的，免费的和义务的教育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

有人喊道：不是这么回事。

拉法格：我来证实一下这一事实。禁止工厂雇佣一定年龄之下的儿童，也就是说禁止摧残尚不能全力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处于童年的工人，提出这一要求的，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工人，而是资产者。路易-菲利浦时代阿尔萨斯和米卢兹最大的资产阶级开发者曾在1842年要求政府禁止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资本主义这个怪物那时曾吞食八岁以下的儿童！……

正因为我们接受各种改良，不管它们来自何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对激进党说：你们总是许诺改良，但从未实行过；现在你们掌了权，为我们实行改良吧，否则，你们就将破产。这样我们就打了激进党一个耳光。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再打它一个耳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全部希望和信念寄托在我们所说的改良上，如同饶勒斯在塔尔纳决议中所说的那样，经过不断的改良就会使集体所有制渗透到个体所有制中去；或者象塞纳决议中所说的那样，只要取得改良就可限制厂主的权力、确立工人的权利……

我们认为，只要不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就不能限制资本的统治权，关于这一点，我向你们提及盖尔尼埃同志最近在《人道报》上援引的一个事实：如果说有一个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并且重要的法令，那就是关于劳动事故的法令，即在工厂内保护工人的法令。无需工会的干预，在法国的某些地区似乎已有一些非常有勇气、责任心很强的督察员在合法地、忠实地履行他们的使命。他们把一个无视他们的监督和法律的规定的厂主送上了法庭。这个厂主

多次被判处五十法郎罚款……这个厂主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他说：“这些人找我的麻烦，甚至到我家里来，要我保护工人避免事故，好吧，我把我的工厂关门。”他确实这样做了，这个地区的厂主们拍手叫好，高喊道：“如果我们是人，就要效法这个榜样”。而工人们为了得到工作和面包进行了请愿，要求不要给他们的厂主找麻烦，并要求取消保护他们但使他们为难的法令。只要资本支配着劳动，那么即使对工人最有利、最可行的法令，如果侵犯了厂主的利益，就要被搁置一边。

我认为有理由对饶勒斯说，英国的工作制如在法国实行可能会大大减轻法国工人的痛苦，但它并未改变英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他们同法国工人一样受资本的控制，他们的生活同拉芒什海峡彼岸的工人生活一样难以忍受。目前，纺织工业出现危机，厂主们想借机削减工资、改变工作条件。由于工人们不甘屈服，兰开夏的厂主们便按照他们的方式举行总罢工，即关闭所有的工厂。这使二十万工人流落街头，加上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也就是说至少有八十万工人失去了谋生手段，不得不依赖公众的救济，而国家的财富正是这些人创造的。

公民饶勒斯，你是否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是否相信我们会说，改良能长久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并能削弱厂主们专断的权力？这就如同你对我说的，由于制定了禁止车夫过分虐待牲畜的格拉蒙法令，就会减少马的主人在对待牲畜上的权利。（某些代表表示赞同，不少人插话）马的主人让这些牲畜干到只剩最后一口气，再把它们送进屠宰场，以便供给工人不听话的马肉而不是不听话的牛肉……（笑声）

在值得注意的塞纳决议中有个明显的谬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反议会派没有揭露和强调这个谬误。这个谬误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正在确立工人的权利，这个权利一经编成法典，就

可以用它来同资产阶级权利相对抗……工人权利一词是一个错误，社会主义者的嘴里永远也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难道说曾有过农奴和奴隶的权利吗？然而在农奴制和奴隶制社会中不是曾有过对奴隶和农奴有利的改良吗？但是这些改良从未损害过封建主和奴隶主的权利。这些改革只是封建主和奴隶主在认为必要时所作的一些让步，一旦认为不必要了就会把它们取消。今天为工人所作的改良也是这样。（有一些代表鼓掌）

译自瓦尔莱编《保尔·拉法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171—177页。

（陈双苑译）

认识问题

(1910年)

一些哲学家曾怀疑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可靠性。贝克莱^①声称,这是因为人的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信的,而且思想是非物质的存在,不能感知物质的客体。因此,我们的认识是主观的;我们只能认识我们对一些事物形成的概念。而事物的质和量,对它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原因、它的形态、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空间的移位和在时间上的延续是构成我们理性的概念,即我们的知性的表现形式。休谟和康德^②说,因果关系、空间和时间同样是我们理性所必需的和普遍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外部世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是我们精神的创造物。我们不能认识物质实体(休谟的用语)、自在之物(康德的用语),因为物体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和不可知的。

学识渊博的阿弗朗什主教于埃嘲笑笛卡儿^③是“所谓的真理发明者”,因为后者以值得赞扬的谨慎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在第二步以后就误入歧途。他要证实一切,但是人类却不能证实什么,因为世界上除了上帝启示、教会传播的真理之外,没有什么确定

① 乔治·贝克莱(1685—1753)——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主教。——编者注

②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变种,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编者注

③ 勒奈·笛卡儿(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编者注

的。而皮浪^①派的怀疑论就是神学的论据！它在联盟^②的热情传教者夏龙那里也发挥这样的作用。夏龙认为，怀疑论为信仰宗教做了“重要准备”：为了“在信异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们中间传播和培植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时进行这样的说教是非常好的：世界由于人们头脑中臆造出来的荒诞思想而受到侵蚀，发生分裂和变得丑恶。上帝成功地创造了人去认识真理，但人既不能靠自身，也不能通过人类的任何手段认识真理，而必须由掌握着真理并使人类产生对真理的追求的上帝去启示真理，正如它过去所做的那样。”^③

但是巴斯噶^④把可靠性从它的最后庇护所——真理是由上帝启示的——中赶了出来。

他认为，“皮浪派的主要力量在于，脱离了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启示，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可靠的真理。……既然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那么，如果人是由仁慈的上帝、恶魔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被任意地制造出来的，这些赋予我们的（可靠性）原则依据我们的不同起源而是真实的、虚假的或不可靠的，这点就值得怀疑。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怎样呢？他会怀疑一切吗？会怀疑人们是否要抓住他、把他烧死吗？会怀疑他是否在怀疑吗？会怀疑他的存在吗？不会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

① 皮浪（约公元前 365—275）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论的奠基人。——编者注

② 指十六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编者注

③ 夏龙《基督教徒谈话录》（1600年）。这一方法非常好。康德和其他人为了重新回到基督教那里去，遵循了这一方法。苏格拉底和皮浪为了迎合异教徒的多神论，也实行了这一方法。这位十六世纪狂热的天主教徒说道，这是因为“由于发生怀疑，便决不会再产生异端和经过选择的、特殊的、荒诞的思想。因此，皮浪的信徒和柏拉图的弟子永远不会成为异端分子，这是互相对立的事物。”——拉法格注

④ 布累兹·巴斯噶（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编者注

彻头彻尾的皮浪的信徒永远不会有。”（《思想》第8章第1节）

一些哲学家证实了我们认识的实在性。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如果人们认识了某一事物的全部特性，就是认识了自在之物；此外，这一事物是在他的自身之外存在的，如果人的感官感受到这一事实，也就完全抓住了自在之物即康德的不可知的Ding an sich。社会主义者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批判了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①

一般人不会为是否知道感官经常欺骗自己这类的疑虑而烦恼。对于我们的认识的可靠性持慎重态度的哲学家，当他们走出纯理性和抽象思辨的领域回到现实世界时，也会这样。学者们在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时，并不理解它们。但是，自从康德主义复活以后，有一些科学家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他们由于被那些疑虑弄得不耐烦，或者不如说被它们搞得心烦意乱，便把它们抛开，并同古斯塔夫·勒博恩一样，宣布“科学不研究自在之物即哲学家的本体，不把它们同表象即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现象对立起来……。我们感官造成的折射差不多在同类型的每个人身上都是相同的。科学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现实的，并用它们建立自己的学科……。弄清楚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这对科学来说不太重要。科学按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接受它，并努力去适应它……。我们的认识是同我们相适应的，正因如此它才使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7—388页。——编者注

感兴趣。”^① 勒博恩虽然把康德的怀疑论撇在一边，但是并不反对它，相反却表示赞同。而费利克斯·勒当泰克作为博物学家，对康德的怀疑论进行了批判，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他说：“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的人种没有绝迹，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骗人的，而且它涉及与维持我们生存有关的周围的一切偶然的事物。”^②

两千多年以来，怀疑我们的认识是否可靠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它在哲学上获得了很重要的意义，并在康德主义复活以后，重新引起争论。它是科学的哲学应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探索怀疑论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原因，并试图对它作一分析批判。

* * *

认识问题是古希腊的诡辩论者以一种合乎逻辑的勇敢精神提出来的。现代哲学家尽管也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在他们身上却从未有过那种勇敢精神。诡辩论者不仅对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认识提出问题并表示怀疑，并且不尊重纯粹理性观念。

他们认为，感官不能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情况，如：浸入水里的桨好象折断了；月亮离地平线越高似乎变得越小；从远处看，圆形的塔成为平面；人们离得越远，看到的林阴道两旁的树木离得越近；闻起来很舒服的香味会损害味觉；看上去富有立体感的画面用手却摸不出来；从航行的船上，两岸的山丘都在移动；在交叉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个滚动的圆球看上去好象是两个圆球，等等。

在他们看来，感官所提供的材料，不仅有一些是错误的，而且

^① 古·勒博恩《科学认识的创立》，载于1908年2月1日《科学评论》。——拉法格注

^② 费·勒当泰克《感觉与科学的一元论》，载于1904年2月20日《科学评论》。——拉法格注

也是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他所处的状况不同，感觉也就不同。如：某人认为香的，别人却认为是难闻的；有些人认为蜂蜜是甜的，有些人认为是苦的；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是既不甜也不苦；而赫拉克利特却认为是二者兼而有之；在冬天，人们去赴宴时感到很冷，出来时却感到很热，等等。

由于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感觉认识各种物体的，因而我们能够说出它们是什么样子，但却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的。埃奈西德姆认为，可以设想，我们的感觉比动物的感觉更符合事物的特性，理由是，动物的眼球是长的，因而想必与我们的感觉不同。有甲壳、鳞片或羽毛的动物的触觉也不一样。人与动物在感觉上的差异可通过事实来加以证明，例如：油对人是有益的，却能致胡蜂和蜜蜂于死命；嚏根草对人来说是致命的毒药，却能喂肥鹌鹑和山羊；海水是鱼生存的条件，但人长时间泡在海水里却是有害的，等等。

既然我们只是通过感觉认识事物的，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便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无法知道事物是否具有使我们产生感觉的那些特性。尽管我们感觉到甜味、白色和热度，但我们不知道使我们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是不是甜的、白的和热的。

普罗塔哥拉^①是一位天才的诡辩论家，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的观点的认识只限于某些经过删节的引文。他认为，如果说当不存在使眼睛产生印象的有颜色的物体的时候，眼睛是瞎的，那么可以说，当没有眼睛看的时候，物体是没有颜色的。因此，任何物体就其自身而言，既不是它现在的样子，也不是它将来要变成的样子。它只是某一个人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所看到的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人来说，每个物体都

^① 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约公元前480—411)——古希腊诡辩学派哲学家，鼓吹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编者注

是他所看到的那样，而每个人所看到的物体的样子，只是从他自己所处的地位看到的那个样子。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真理的主观表象。

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概括了主观主义哲学即资产阶级哲学的全部内容。而资产阶级多半是个人主义的阶级，它的成员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情感来衡量一切^②。

诡辩论者不会怀疑他们自己的感觉，笛卡儿也不会怀疑他的思想。他肯定他曾生活过，看到过光线，闻到过玫瑰的香味。他不会怀疑玫瑰是香的、雪是白的。但是他不知道玫瑰本身是否有香味，雪本身是否是白的。他同样也不知道玫瑰和雪是否会使其他人产生同样的感觉。由于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玫瑰和雪多半不会使其他人产生同样的感觉。由此怎么能肯定同样的东西会使所有人产生同样的感觉呢？可以用同样的词来表达不同的感觉。他观察到，当两个人说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确信另一个人的感觉与他自己是相同的，因为他是从自己而不是另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得到这个感觉的。因此，人们既不能认识事物，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138页。

② 康德也提出了希腊诡辩论者关于感官不能提供对事物的认识的论点。他说：“现象是某种不应从客体的本身、而应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的物，而主体是与我们对物体的想象分不开的……当我们把红颜色看作是玫瑰自身的属性、把任何客体自身大小看作是它们的属性，而不去注意这些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定关系，也并不因此而限制我们的判断，这样就产生了错觉。”（《纯粹理性批判》巴尔尼的法译本第2部第8节）（参见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蓝公武的中译本第68页。——编者注）

另外，他在这本书第一次印刷时已删去的一段中曾认为“酒的味道并不是由酒的客观属性即客体的属性所决定的，而是由饮酒者即主体的感官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而颜色也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是由物体的特性决定的，它只是由于光线通过某种方式的影响而使人的视觉发生一些变化所造成的后果。”（同上书，第1部第4节）（参见蓝公武的中译本第54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也不能把事物使我们的感官产生的感觉传给其他人。人们可以交流词句，但不能交流感觉。因而，不存在对每个人都有效的认识，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普罗塔哥拉认为，只存在个人的看法，而不存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正确的、有效的看法。

诡辩论者一贯主张个人不应不经过任何检验就接受流行的、甚至是先辈遗留下的观点。任何人都应有自己的看法，只应承认自己觉得是正确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且只应重视那些能使他获得信念并能提供某种个人利益的观点。这样，这些诡辩家们就为一种新的哲学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观原则，例如黑格尔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为了创立这一新哲学，对公众进行教育，他们传授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内容。他们主张放弃早期哲学家所进行的对于事物的本质的探索，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

教会也一样，对物理科学——这一撒但的发明——怒不可遏。在这个意义上说，诡辩论者和教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仅仅是利润，只有当对自然力的认识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成为财富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时，才鼓励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

格罗特认为，诡辩论者中的最杰出者——苏格拉底为建立主观主义哲学并使之同整个科学彻底分离所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格罗特认为，苏格拉底不是把对事物的认识，而是把对自身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当作他进行教育的出发点。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对话录中指出，苏格拉底是想通过人来解释世界，因而同早期的哲学相反，因为从方向和内容看，早期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它想要通过世界来解释人。

苏格拉底要求科学直接有益于实际生活，从几何学获得丈量土地所必需的方法，从正确的天文学获得“认识夜晚的时间、每月

的天数以及每年的四季”所必需的手段。色诺芬^①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苏格拉底“不是要探讨天体现象的起因，而是要证明热衷于这种思辨的人是荒唐的。他说过，学习某种职业的人希望以后为自己和其他人而从事这个职业。而那些试图了解上帝的秘密（即自然的奥秘）的人是不是会认为，当他们认识到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时，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制造出风、雨、季节和其他类似的自然现象？还是并不自我吹嘘有这样的力量，而只满足于了解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就够了。”（《回忆苏格拉底》第1卷）

苏格拉底认为，他曾白白浪费时间去研究各种自然现象。他建议放弃对事物的研究而研究观念，放弃对实在的研究而研究实在的真理。而人们对事物形成的观念就是这样的真理：对于事物的观念的认识不需要对自然界进行研究。柏拉图说过，对于马的概念的认识指明了马的属性。他认为，概念支配着实在。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实在，并不是由于物质，而是由于它赖以取得其形式的观念。因此，观念代表了事物的真正实在。

但是，所有的诡辩论者并不赞同这种为纯粹理性思想辩护的高超观点。他们反驳说，人们只能表达他们所处的状态下的感觉，而不能证明他们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也不能说明任何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因为感觉介于外部世界和理性之间，理性受到束缚，不能从自身解脱出来。这样，他们便对运动和空间的概念、几何的定义和算术运算进行荒谬的和吹毛求疵的批判^②。

^①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编者注

^② 下面是他们进行诡辩式批判的一些例子。

当某物处于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它是静止的。如一支飞箭，它在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这样，它在飞行中的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因而，它在整个飞行期间都是静止的，箭的运动只是表面现象

既然任何存在之物都存在于空间之中，那么空间本身同样也应存在于空间之中，如此连续，以至无穷。没有任何存在之物存在于空间之中，这是多么难以想象！

苏格拉底为唯一值得自由人研究的伦理学建立了物理学。而道德、风俗、习惯、法制、正义等观念实际上是诡辩论者始终普遍关心的，他们对它们进行无情批判的检验。

高尔吉亚^③自诩发现表象比真理更重要。皮浪声称，表象在它显现的任何地方都占主导地位。表象的理论就是诡辩论者想要应用于伦理学的理论：既然对每个人来说任何事物都是他感觉到的那个样子，那么真理就只是个人的看法。每个人都应把他觉得是正确的看作是是正确的，把他认为是好的、公正的看作是好的、公正的。因为人不但是衡量精神世界的东西的尺度，而且也是衡量物质世界的东西的尺度。因此，以自然反对社会、以天赋权利反对法定权利的最大胆者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情感和利益行事。倘若法律和习俗与之发生冲突，损害了他的天赋权利，并强加给他一种他没有义务服从的限制，那么，他就应该在不会受到制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反对这些法律和习俗。

古波斯王之所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他能满足他自我的一切反复无常的欲望；阿克拉奥斯因为以背叛和谋杀手段夺取了马其顿的王位，所以成为了一名英雄；施蒂纳^④的“唯一者”

数学家在谈到把一条直线分成相等的两部分时嘲笑我们。他们认为，既然线是由点组成的，那么我们如何把一条由奇数（例如九个点）组成的线分成相等的两部分呢？人们不能把没有长度的第五个点分开。如果分不开，那么由五个点组成的线就不能分成相等的两部分。

人们不能从一个数中减去另一个数，例如从数字六中减去五。因为要在一物中减去另一物，前者必须要包含后者。如果五包含在六中，四包含在五中，三包含在四中，二包含在三中，一包含在二中，那么把所有这些数加起来，就是十五，而十五并不包含在六中。——拉法格注

③ 列昂庭的高尔吉亚(公元前483左右—375)——古希腊诡辩哲学家，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编者注

④ 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编者注

“我”以及尼采^①的自命不凡的“超人”是希腊诡辩论者思想的讽刺性的模仿，即个人的行为不应依据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带有普遍性的道德，而应依据对他“自我”是否合适。“自我”存在于一切的开始、中间和结尾。它应成为新道德的出发点。这一新道德的基本信条就是海西奇乌斯引证的那句话：为别人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事。关于这句话，诡辩论者伊索克拉特斯是这样解释的：“不要对别人做你不能容忍别人所做的事……你要为别人做你希望我为你做的”。基督教也重复了这句话，它是这样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犹爱己。”

斯多葛派声称要回到自然状态去。他们反对早期的自然哲学，赞成诡辩派的主观哲学，认为，为了摆脱各种关系的束缚，智者对其他人既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应承担任何义务。他不应为抚养孩子而操心。因为有许多手段可以满足性的需要，他应自己满足自己，而不应受婚姻的束缚。这样，为了完全回到自然状态，犬儒主义者便主张公开泄欲。芝诺^②和柏拉图鼓吹公妻制。

诡辩论者反对各种社会设施。利科芬声称贵族的优越是虚构出来的。阿尔西达马斯认为，自由人与奴隶之所以对立是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另一些人认为奴隶制是违背自然的。他们说，城市、民族、国家对于那些把世界当作祖国的人来说太狭窄了。智者是世界的公民，他们既不应属于某个城市，也不应属于某个国家。因为他不应以任何价格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且通往阴曹地府的道路到处都是一样长的。他们认为，为祖国捐躯是可笑的，把世界当作

①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反动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编者注

② 基齐昂的芝诺(公元前336左右—26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的创始人。——编者注

祖国的智者不会为一些傻子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和智慧^①。

苏格拉底不敢使怀疑一直发展到它的合乎逻辑的最后结果。但他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②一样，把功利看作是善的条件。他主张要有道德，因为它会带来好处；他主张避免通奸，因为它会招致危险；他主张参加公众事务，因为公共福利对个人有益，他主张保持一种通过相互鸡奸而理想化的友谊，因为人们能够相互得到帮助，等等。与其他诡辩论者不同的是，他把合法性与正义的观念看成是一致的，以致为了不违反法律，他拒绝逃避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判决。和皮浪一样，他的准则就是顺应一般常识，象大家那样去做。也正是为了不与公众的舆论发生冲突，他才祭神。而对于诡辩论者来说，神的存在同对事物的认识一样都是值得怀疑的。

诡辩论者对于认识的实在性的怀疑以及对于自然科学的轻视，导致他们把一般常识看作是智者的向导，是使人类认识具有可靠性的基本保证。但是，他们继赫拉克利特之后曾起来反对流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没落的社会制度的残余。

早期的诡辩论者起源于爱奥尼亚和大希腊的一些商业城市。公元前七世纪以来，这些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向氏族和父权制家庭的共产主义组织展开进攻，以财产私有制代替财产公有制，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父权制家庭对于在父亲的专权下生活的一些人来说符合神意的，因为父亲代表了祖先。这样的家庭满足每个成员在物质和

^① 早期的基督教徒象古希腊的诡辩论者一样，很少关心他们的祖国。例如，四世纪的普律唐塞主教对于罗马征服了各国，把世界变成一个城市感到高兴。而到了十一世纪，信仰基督教的诗人相反却在他们的晦涩难懂的作品中，对富人以及“给世界带来无数痛苦的可恶城市”——罗马，表示了极端的仇恨。他们诅咒罗马帝国崩溃，并希望亲眼看到这一天。基督教最初只把它的注意力放在社会上的穷苦人身上，随着逐步赢得有钱人的支持，便慢慢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拉法格注

^② 耶利米·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编者注

精神方面的各种需要。它的全体成员靠田里的收获和奴隶的劳动过活。他们对祖先的祭祀、历史、传说、传统以及行为准则没有引起争议并且束缚着他们，但却是他们的精神和道德食粮。

随着商人阶级和手工工场主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人数越来越多，父权制的贵族阶级则越来越穷、人数越来越少。对于贵族来说，战争是夺取财富的唯一手段。他们最痛恨和蔑视那些商业和工业中的暴发户，贵族诗人泰奥尼斯希望“喝他们的黑血”。而这些受到如此蔑视的人却同贵族争夺对城邦的统治权，通过高利盘剥攫取他们的财产，同失去爵位封号的贵族、手工业者和奴隶结成联盟，以夺取他们的政权，把他们放逐并对他们实行剥夺。因此，在许多世纪内，古代的城邦经常被淹没在内战的血泊中。

在温情脉脉的和父权制的公有财产的废墟上，新的阶级建立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并不符合神意。于是人们便臆造出上帝的意志，以弥补这个缺陷。这就是：每个人只能从他个人事业的成功中、而不能期望从家庭集体中获得福利；由于摆脱了父权制的专权，而只依靠自己单独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满足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诡辩论者担负起对个人进行过去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他们开办了最早的一批公共的、收费的学校，教授每个人为在社会的混战中走自己的路所需懂得的一切知识，而不受过时的父权制时代的道德和习俗的束缚。

人不应使自己的个性在温情脉脉的和父权制的财产公有制中丧失殆尽，而应对社会树立起自我；不应把一切都归于集体，而应归于自我。用普罗塔哥拉一句寓意很深的话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新的社会条件确定了主观的原则，而诡辩论者正是从这一原则得出资产阶级的主观哲学。

阿里斯托芬和安尼杜斯指责苏格拉底轻视神和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败坏道德，腐蚀青年。其他诡辩论者也受到同样的责难。

但是诡辩论者所进行的教育是符合他们的社会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要求的，他们只不过赋予这些要求以哲学的形式。柏拉图认为，“人民是不愿使自己的观点和志向遭到反对的伟大的诡辩论者”。他们在道德上处于完全堕落的状态。修昔的底斯^①说，人们允许一切过分的行为。不诚实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们不相信最激烈的誓言，却欢迎演说家所宣扬的最厚颜无耻的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准则：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段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无需因为要尊重法律而受到约束；自然规律是最强有力的胜利者；每个人归根结底是要以他的利益和意愿来衡量法律和荣誉的。

怀疑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不顾羞耻地抛弃私人的和公共的道德观念，这些都是社会形势的混乱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反映。而社会形势是由曾改变了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事件所决定的。

怀疑是同资产阶级一起产生的，并且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固定下来。笛卡儿认为，他的公式——**我思故我知**，将把怀疑逐出资产阶级哲学。笛卡儿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我感故我知**。但他并未击中要害。诡辩论者从未怀疑过他们的思想和感觉，而是怀疑根据感官提供的材料而形成的认识的可靠性。不可战胜的怀疑继续在哲学思想领域里盛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怀疑是资产阶级分子的精神特点之一，后者生活在商业和工业的成就很难预料、繁荣的继续得不到保证的状况下。

在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多次看到，在过渡时期重新出现希腊诡辩论者的道德放荡。但是它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厚颜无耻。

* * *

诡辩论者认为，感官会产生错误的和变化不定的印象。他们

^① 修昔的底斯(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编者注

的这一观点并未遭到反驳，也不能加以反驳。因为每天都有大量说明感觉不真实的明显例子证实并加强这一观点。充满智慧的人民以这样的谚语支持这一观点：各有所好。

几年前，南锡的著名物理学家布龙多向科学界宣布发现了 N 射线。人们通过磷光屏上的一个光点就能观察到它的出现。欧洲和美洲的很多科学家是擅长做实验的，他们也发现了这一射线。但是他们大概会认为这一射线是观察到它的人的视错觉。因为，尽管人们看到的太阳光芒四射，但是物理学家证明，如果飞机能够离开大气层，那么飞行员看到的太阳将是黑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了证明同一客体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不同，便让一个同时玩弄着两个或三个陀螺的丑角突然进入他在讲演的大厅，停留一分钟以后离去。然后，他要求每个在场的人，不要相互商量，而把刚才所见到的写出来。结果没有两个人对于小丑的动作和装束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另外，法庭上出席作证的耳闻目睹的证人，倘若预先没有协商，那么他们的证词便不会一致。如在龙森胡同里发生的双重谋杀案中，共有十个证人，其中六人是警察，是这方面的行家，善于在犯罪现场进行验证，但他们对画家施泰因赫尔的尸体的位置说法不一。仆人和一个邻居看到画家直躺在地上，四个警察看到的是画家跪依在门旁，而第五个警察看到画家背靠在厕所旁边的墙上，等等。当历史学家只掌握一个证据的时候，事实就会被肯定无疑地记录下来。但是，当存在好几个证据的时候，他就会对事件的细节，甚至对整个事件发生怀疑。当那么多证据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的时候，谁能把德雷福斯案件审理清楚呢？历史不是科学。

被柏拉图看作是全部真理的纯理性观念，只是大脑对感觉的解释，所以当感官提供给大脑的材料不正确时，纯理性观念就必然是错误的。康德认为是可靠的纯粹理性是非常靠不住的，需要通

过经验——“真理的唯一源泉”（按照彭加勒^①在《科学和假设》一书中的说法）对它的推论进行检验和核对。这样，不纯粹的理性纠正纯粹的理性。感官欺骗理性，理性反过来又欺骗感官。得意洋洋的夏龙说：“你们看，当内部和外表充满了错误和缺点，当这些主要部分，即科学的基本工具互相欺骗的时候，人类会有何等完美的科学和可靠性呀！”

古代的苏格拉底和皮浪以及现代的托马斯·里德和鲁瓦埃·科拉尔所依据的公众舆论和一般常识并不能使人完全信赖。因为它们是由常常有错误的感觉形成的。例如，由于人们的眼睛对太阳的大小和运行产生错觉，公众舆论和一般常识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运转，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

诡辩论者坚持认为，既然客体所引起的感觉因人而异，并且由于同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就不能创立一门事物的科学。实际上，仅仅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科学不会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它是个人的，因人而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创立者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如同勒当泰克所说的，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而且我们人类没有绝迹；因此，必须对或多或少辽阔实在的外部世界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认识，以适应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样地，必须使这种最低限度的认识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各不同种族和国家的人都建立了相类似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并朝着共同的方向发展。他们有着类似的常识，民间谚语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维科所说的，民间谚语在各国有着同样的内容，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要使世界各国具有类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常识，必须使这种最低限度的认识对

^① 昂利·彭加勒(1854—1912)——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在哲学上接近马赫主义，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编者注

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并随着人类经验的增长而得到发展。

在动物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而且会带来同样的后果。皮浪认为，这是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邻里和亲戚关系”。确实，正如诡辩论者认为的那样，尽管脊椎动物瞳孔变长的眼睛和昆虫的复眼、近视患者的凸出的角状眼和非常突出的晶体状眼同老视患者的角状眼和扁的晶体状眼对相同物体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妨碍动物和人对于外部世界有相当准确的相同认识，以获得生存、防御、保护和养育后代的手段。因为动物和人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各个器官的细胞结构也相似，并且为了生存和繁衍而积累了大量多少有些类似的经验。因此，它们会产生相同的感受，形成同样的认识。例如，动物就很可能掌握了数学的基本公理。第欧根尼^①曾说过，驴子和几何学家一样，知道到饲料槽和饮水槽去的道路走直线最短；鸽子似乎懂得 $1 + 1 = 2$ ，因为只有当母鸽生下两个蛋时，它们才去孵卵；羊有时间概念，它们和牧羊人一样知道回羊圈的时间；而母鸡并非没有纯粹理性观念，因为它们不会从搭设在高处的鸡窝中跑出来，从而证明它们有空间的概念。它们的这个空间概念是先天的，即本能的。我们从刚出生几天的小狗身上也能明显看到后天获得的品质。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动物和对相同的客体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感觉在动物和人身上所引起的智力表现却是相同的。因为，动物和人都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

既然不能否认动物和人具有最低限度的准确的认识，那么就应象弗雷西讷一样承认“外部世界和理性之间具有特殊的一致性”。巴门尼德^②在说“可能的才能被想到”这句话时，曾猜测到这

^① 西诺普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 404—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② 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编者注

点。弗雷西讷还说，“算术及其组合，即人类发明的数学用语，非常适合于表达自然的活动……人们为进行理论思维而想出的一些公式后来被发现与自然现象完全相符，并且最贴切地反映了自然现象。”谁曾料想到，球的面积与它的半径平方成正比的定律在某一天会成为重力和其他辐射力减小的定律？奇数的级数会表现物体在真空中自由跌落的连续过程中所经过的空间？两千多年前已为佩尔加的阿波洛尼乌斯提出的把一个圆锥体依中轴同以一个以不同方式倾斜的平面相交而形成的曲线的特性后来竟成为刻卜勒的天文学定律？弗雷西讷认为，“很难在这些事实中看到一种纯粹的巧合，也很难把经常出现的吻合看作是偶然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理性和自然界归属于一个总的规划之中。根据这个规划，前者令人赞叹地把后者包括在内。”^① 弗雷西讷的总规划尽管是以存在一个规划的设计者为前提的，但它只能说明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因此，能够思想的物质和天然的物质都是由同样的成分构成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人类的理性能够理解自然界。贝克莱曾不无道理地说过：“由于精神是非物质的，所以不能感知物质的客体。”但能够思维的物质却可以感知物质的客体。

人们不能否认人类的这些最低限度的认识。它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前奏。如果人类只依赖感官认识外部世界，那么人类的认识几乎不会超过动物的认识，因为动物的感官比人的更完善，只是人的触觉由于手的运用而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拿几何学为例，如果人类不曾发明用木棍来丈量土地的长度和宽度，而靠眼睛判断的话，那么几何学就不会产生。原始时期，人们每年为了给氏族或者说村庄的各个家庭分配可耕地而用于丈量的木棍，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利益，以致被赋予神奇的性质。俄

^① 弗雷西讷：《论科学的哲学》1895年版。——拉法格注。

国米尔的农民把它称为**神棍**，并把它供奉在教堂里。埃及人把分配土地的计算单位 *coudée*^① 看成是真理和正义的神圣象征，它所测量的任何结果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公平的。

自从木棍代替感官以后，测量土地的长度不再依赖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眼睛的感觉，而靠各种不变的木棍。它所测量的结果不会象用眼睛判断那样引起争议，而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公平的。

我们通过物体给予我们感官的感受来认识物体的性质和特点。感觉是我们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第一种手段。在幼年时期，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手段。野蛮人差不多仅仅使用这一手段，因此，他们的感官具有优越的地位。而物体的特性同时也对天然物发生作用。例如，物体的重量在天平上，如同在我们手上一样，可以被感觉出来。它的硬度、热量、光泽等等能够对我们这些生物发生作用，同样，也对天然物产生作用。因而，人们能够确定物体的性质或者特点，**它所具有的能够影响生物和非生物的力量。**

非生物的感受性甚至比生物更灵敏。例如，人感觉不到无线电报的电磁波，但金属锉屑管却对它有反应；如果我们只凭借感官而不使用布氏硬度测试机和基普钻，就不能测定各种不同钢铁的硬度。因此可以说，我们可以利用天然物的感受性来认识物体的特性，如利用水银柱测量温度，用石蕊试纸检验液体的酸度，等等。这样，当康德和新康德派认为我们只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时，他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提供科学认识要素的不是人的不可靠的和因人而异的感觉，而是天然物的可靠的并且始终如一的感觉。如果说我们仅求助于人的不稳定的感觉就不能准确了解大气的温度，那么，当水银稳定的感受性把大气的温度记录下来以后，就可以对它有科学的确切的认识。两个天文学家而对同一个天体所画

① 古长度单位，从肘部到中指端，约等于半米。——编者注

的天体草图通常是不一样的，而玻璃感光片——杨森称之为“科学家的视网膜”——却能把天体形象正确地再现出来。由于玻璃感光片比眼睛优越，能够成为各种个人解释中的唯一的解释，并且能够忠实地保留聚集在上面的一切印迹，因此天文学家逐步用摄影代替肉眼的观察。马诺福里埃的微型仪器主要依据与混合葡萄酒中的含水量成正比的电阻来检验酒中掺了多少水。它远远胜过了最敏锐的品酒家的味觉。而用冰点测定器对牛奶进行分析就可以通过牛奶的凝固程度测定奶中掺了多少水，并能在一定距离之外判断出奶牛的健康状况，这是最富有经验的兽医也难以做到的。每个人只是在唱机把他的声音复制出来以后，才认识到自己的噪音。而那时，他却分辨不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象其他人一样听到自己的声音而头部没有发生共鸣。

认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准确的和有效的，因为它总是同样通过以天然物代替人的感官形成的，所以医生和心理学家借助于天然物来判断人体是不是有病以及研究“自我”的心理特点。苏格拉底说，自己认识自己；现代哲学家进一步说，借助于不会思维的物质。

科学在它可能的一切地方都以天然物代替了科学家的感官。但在有一些学科里这种取代几乎是全面的。例如，化学家不能凭借自己的任何感官认识硫酸以及其它他所进行分解和再化合的物质特性。人们可以增添或减少一个感官，但不能改变对它的科学认识。因为科学认识不是会受谬误和差异影响的感性认识，而是借助于不受谬误和差异影响的非生物的对物质的认识。

过去走在科学前面的工业生产，今天却落在它的后面。当工业生产依靠人的感官来进行管理时，就会是不稳定的，而且，它所普遍遵守的常规并不能对习惯做法和错误的制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工业生产只有在采用了各种形式的自动记录仪表（从最简单

的温度表、气压计,直到比较复杂的电表、计时器、高温计、瓦斯分析表、量热器等)以后,才会变得稳定。

用天然物的感受性代替人体的感觉,使人们能够通过温度计上的水银柱的度数认识温度,通过一秒钟的振动次数辨别声音,等等,这样就把对人而言的质量变成对物而言的数量。这种转变使得有可能在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确立一种数字上的联系,并且改变认识的性质。对于一个客体的质的认识是人的认识,而对于一个客体的量的认识是其他客体的认识。因此,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衡量客体的尺度是客体。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即主观的原则被客观的原则所代替。

感官即使不发生错误,它们所能认识的事物也是极端有限的,它们只能显示事物的有限的性质。例如,眼睛只能感觉到十分之一的太阳光,它的感光能力大大低于天然物;天文学家的眼睛穿不透的黑暗——赫舍尔把这种黑暗称为“煤口袋”——在溴化银乳剂感光片上显现出一些新的星团和弥漫的宇宙物质。随着玻璃感光片的感光性的增强,天文学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我们不知道天然物的感受性的限度,而科学工具的感受性是有限的,但它们在日益完善和发展。例如温度计目前刚刚能够测出百分之一度的热度,我们还不能知道通过测辐射热器能知道的现象。测辐射热器这个工具是建立在受热量影响的金属的电阻基础上的。它能测出百万分之一度的热度,因而揭示了太阳光辐射范围比人们想象的更广阔。科学认识的提高不是由于人类感官的改善,而是由于利用天然物的感受性的手段的普及和研究以及控制工具数量的增加和敏感性的增强。

但是,由于人类的感官以及代替它的工具是不完全的,并且人们为了研究事物所采取的手段也是不完善的,所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不全面的。

客体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由先前的以及同时出现的无数事实的会合决定的。它永远不与自己相同。由于受到周围无数物体的影响，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我们要研究它，就应把它从它所处的环境中抽象出来，把它看作是不变化的，并且分别地考察它的各种特性，而不考虑这些事物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抽象科学的起源也是同样的；它们把研究的对象从周围的环境中提取出来，抽象出来，去掉它们的属性，把它们变成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只存在于进行思维的大脑中的理性客体、即想象的客体，例如点、线、面、数等等^①。

由于这个原因，数学家的思辨推理既没有突出感觉，也不受感觉所造成的错误的影响。而当这些推理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时，它们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们符合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例如，欧几里得、黎曼和洛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虽然是矛盾的，但是被数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命题在逻辑上是互相有联系的。

物理科学以非生物取代人的感觉，它与抽象科学一样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科学家们并不去分析他们的感觉，不研究物体留给他们感官的印象，而是研究这些物体对其他物体的影响。

^① 野蛮人把数和物放在一起考虑：大姆指代表一，食指代表二，一只手代表五，大姆指再加一只手代表六，两只手代表十。罗马数字证实了这种计数法：I 是大姆指，V 是一只手的大姆指和小姆指伸直，中指弯曲，X 是两只手相背。当他们把所有的手指都拨弄完并给它们定上所表示的数字的名称之后，便转到脚趾：一只脚和两只手代表十五，两只脚和两只手代表二十或一个人。如同文明人认为光、热、电等等是物体的属性一样，野蛮人把数字看作是物体的属性。然后他们把这种属性从物体中分离出来，把它变成理性客体，这种理性客体被说成是物。而点、线、面也是从它们代表其属性的物体中分离出来的。点脱离了物体的三维；线脱离了两维，而脱离了一维。数学家正是根据这种通过思维逐渐形成的想象的客体而进行工作，把它们进行组合，再分解它们的组合。这就象化学家把自然界提供的元素进行化合、再把化合物进行分解一样。

——拉法格注

他们把这些影响记录下来,加以分类,以便从中得出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是合乎逻辑的推理,那么它们对每个人来说就或多或少是正确的、有效的。科学家们不考虑物体对他们的感官的影响,而研究这些物体对其他物体的作用。当认识建立在感官提供的材料基础上的时候,它是主观的。而当认识建立在物体提供的材料基础上时,它就变成为客观的。希腊诡辩论者破坏了主观认识的基础,但他们的尖锐的、无可辩驳的批判对客观认识并不起作用。

无所畏惧地推翻了主观认识的诡辩论者尽管对人的认识提出异议,但又极端荒谬地把人看作是万物的尺度,并且为了拼凑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哲学而抛弃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而确立了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诡辩论者所轻视的古代哲学的重新研究,为我们时代创立了一门新的宏伟的宇宙哲学。

译自拉法格《认识问题》1910年巴黎法文版。

(陈双范译 李兴耕校)

报 刊 索 引

B

- 《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第 I*116、269、312 页。
《布鲁塞尔自由报》(La Liberté de Bruxelles)——第 I 21 页。

D

- 《灯笼报》(La Lanterne)——第 II 203 页。

F

- 《法兰西报》(La France)——第 II 42 页。
《费加罗报》(La Figaro)——第 I 314、336; II 21 页。

H

-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第 II 257 页。

J

- 《解放报》(La Emancipation)——第 I 22、23 页。

K

- 《口令报》(La Mot d'Ordre)——第 I 65 页。

L

-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第 I 116、335 页。

N

- 《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第 II 231 页。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第 II 270 页。

* I 代表上卷, II 代表下卷。——编者注

P

《平等报》(L'Egalité)——第 I 21, 39, 45, 53, 60, 68, 99, 115, 116, 118, 120, 122, 124, 263, 275, 277, 279, 283, 284, 287, 288, 290—292 页。

Q

《权威报》(L'Autorité)——第 II 31 页。

R

《人道报》(L'Humanité)——第 II 357, 358 页。

《人权报》(Les Droits de L'Homme)——第 I 290 页。

S

《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第 I 22 页。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第 I 33 -35, 283, 287; II 207 页。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第 II 211 页。

《时报》(Le Temps)——第 II 37, 216 页。

《世纪报》(Le Siècle)——第 I 66 页。

T

《太阳报》(Le Soleil)——第 II 40 页。

《泰晤士报》(The Times)——第 I 65; II 129 页。

W

《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第 I 115—118, 290—292 页。

X

《小报》(Le Petit-Journal)——第 I 315 页。

《小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que)——第 II 42 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第 I 311, 314; II 294, 325 页。

《喧闹报》(Le Chambard)——第 II 42 页。

Z

《正义报》(La Justice)——第 I 117 页。

人名索引

A

- 阿波洛尼乌斯(Apollonius)——第 II 377 页。
- 阿德尔,詹姆斯(Adairs, James)——第 II 93 页。
- 阿尔伯(Albert 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第 II 202 页。
- 阿尔梅尔(Harmel)——第 I 77 页。
- 阿尔西达马斯(Alcidamas)——第 II 370 页。
- 阿弗兹(Avez)——第 II 39 页。
- 阿加西斯,路易·让·鲁道夫(Agassiz, Louis-Jean-Rudolphe)——第 I 157 页。
- 阿科拉(Acollas)——第 I 83 页。
- 阿克拉奥斯(Archélaüs)——第 II 54, 369 页。
-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第 I 70, II 372 页。
-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第 II 303 页。
- 阿萨拉(Azara)——第 II 64 页。
- 阿梯拉(Attila)——第 II 220 页。
- 埃德,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Eudes, Émil-Désiré-François)——第 I 292 页。
- 埃奈西德姆(AEnesideme)——第 II 365 页。
- 埃沙尔(Essars)——第 II 276 页。
-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第 II 342 页。
- 安德里厄(Andrieux)——第 II 21 页。
- 安蒂帕特洛斯(Antipatros)——第 I 80 页。
- 安东尼(Anthony)——第 II 315 页。
- 安东涅利,贾科莫(Antonelli, Giacomo)——第 I 99, 107 页。
- 安尼杜斯(Anytus)——第 II 372 页。
- 安凡丹(Enfantin)——第 II 135 页。
- 安塞尔,爱德华(Anseele, Eduard)——第 II 32 页。
- 安条克(Antiochus)——第 I 142 页。

- 昂利, 艾米尔(Henry, Emile)——第 II 38 页。
 奥迪埃(Odier)——第 II 134 页。
 奥迪隆(Audilon)——第 I 2 页。
 奥尔良王朝(Orléans)——第 I 1—3, 269; II 11 页。
 奥发(Offa)——第 II 99 页。
 奥古斯丁, 奥略里(Augustin, Aurelius)——第 II 299, 344 页。
 奥肯, 罗仑兹(Oken, Lorenz)——第 I 160 页。
 奥里(Orry)——第 II 200, 203, 205 页。
 奥利维耶, 艾米尔(Ollivier, Émile)——第 I 50; II 68, 139 页。
 奥萨(Ossat)——第 I 81 页。
 奥塔维尔(Ottavaere)——第 I 88 页。
 奥肖阿, 加斯帕尔(Ochoa, Gaspar)——第 II 239 页。

B

- 巴伯雷(Barberet)——第 I 290, 292 页。
 巴布莱(Babled)——第 II 227 页。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第 I 291, 323, 324, 328—
 331, 336, 342, 343, 355, 357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第 I 118, 291 页。
 巴克斯,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Bax, Ernest Belfort)——第 II 308 页。
 巴拉斯(Barras)——第 II 134 页。
 巴利, 艾米尔·约瑟夫(Basly, Émile-Joseph)——第 II 17 页。
 巴隆(Barron)——第 I 2 页。
 巴门尼德(Parmenides)——第 II 376, 377 页。
 巴斯噶(Bascal)——第 II 26, 262 页。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第 I 97, 188, 201 页。
 巴赞, 弗朗斯凡·阿希尔(Bazaine, François-Achille)——第 I 289 页。
 拜特洛, 比埃尔·欧仁·马塞兰(Berthelot, Pierre-Eugène Marcelin)——
 第 II 316, 325 页。
 鲍狄埃, 欧仁(Pottier, Eugène)——第 I 289 页。
 鲍埃尔(Powell)——第 II 264 页。
 鲍卡尔(Bourcart)——第 I 88 页。
 贝多(Beddoe)——第 I 68 页。

- 贝尔(Baer)——第 II 217 页。
- 贝尔纳, 克劳德(Bernard, Claude)——第 I 203, 327; II 210 页。
- 贝尔纳, 赛米尔(Bernard, Samuel)——第 II 136 页。
- 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 雅克·昂利(Bernadin de Saint-Pierre, Jacques-Henri)——第 I 57 页。
- 贝尔特, 保尔(Bert, Paul)——第 I 210—212 页。
- 贝克莱, 乔治(Berkeley, George)——第 II 361, 377 页。
- 贝魁尔, 康斯坦丁(Pecqueur, Constantin)——第 I 262, 263 页。
- 贝莱哥(Perregaux)——第 II 134 页。
- 贝朗热(Béranger)——第 I 154 页。
- 贝利耶(Berryer)——第 II 138 页。
- 贝列拉, 艾米尔(Péireire, Émile)——第 I 348, 349; II 136, 159, 197, 279, 341 页。
- 贝列拉, 伊萨克(Péireire, Isaac)——第 II 63, 159 页。
- 贝热瑞(Bergeret)——第 I 15 页。
- 贝西埃尔, 康拉德(Bessiel, Conrad)——第 II 285 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第 II 21, 153 页。
- 蓓尔, 柯拉(Pearl, Cora)——第 I 222 页。
- 崩讷(Bonnet)——第 I 77, 222 页。
- 崩图, 保尔·欧仁(Bontoux, Paul Eugène)——第 I 155, 344, 348 页。
- 比埃特里, 约瑟夫·玛丽(Piétri, Joseph-Marie)——第 I 5 页。
- 比尔多(Burdeau)——第 II 39, 46 页。
- 比内(Pinet)——第 I 77 页。
- 比诺, 让·马蒂亚尔(Bineau, Jean-Martial)——第 II 135 页。
- 比乔洛, 波尔特内(Bigelow, Poultney)——第 II 220—222 页。
- 比约(Biot)——第 I 96 页。
- 俾斯麦, 奥托(Bismarck, Otto)——第 I 9, 45, 53, 54, 63, 65, 93, 122, 136, 147, 209, 210, 267, 283, 298; II 27, 36, 293, 299, 301 页。
-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第 I 32, 98; II 248 页。
- 波尔塔利, 阿尔伯·爱德华(Portalis, Albert-Édouard)——第 I 346 页。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第 I 44, 136, 181, 183, 255, 257; II 4, 7, 202 页。
- 伯恩施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第 II 208 页。
- 伯塞利于斯(Berzélius)——第 I 232 页。

柏拉图(Platon)——第 I 22, 32, 96—98; II 52, 54, 69, 83, 88, 108, 208, 225, 248, 303, 327, 340, 367, 368, 370, 373, 374 页。

博丹, 欧仁(Baudin, Eugène)——第 I 296; II 17 页。

博丹, 比埃尔(Baudin, Pierre)——第 I 324; II 203 页。

博克(Bock)——第 II 244 页。

博克尔(Bocker)——第 I 54, 55 页。

博肯埃, 雅克·伯尼涅(Bossuet, Jacques-Bénigne)——第 I 141—143, 145; II 299, 302 页。

布尔茹瓦, 莱昂(Bourgeois, Léon)——第 II 43 页。

布津内利埃尔(Brunellière)——第 II 205 页。

布拉柴(Brazza)——第 I 87, 169; II 94 页。

布莱特, 杰科布(Bright, Jacob)——第 II 349 页。

布莱希勒德, 格尔森(Bleichroeder, Gerson)——第 I 147, 209, 214, 231 页。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第 I 12, 47, 49, 74, 76, 254, 267, 269, 284; II 4, 68 页。

布朗热, 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 George-Ernest-Jean-Marie)——第 I 267, 269, 270, 295, 309; II 14, 15 页。

布里索, 雅克·让·比埃尔(Brissot, Jacques-Jean-Pierre)——第 II 5 页。

布龙多(Blondot)——第 II 374 页。

布洛克, 莫里斯(Block, Maurice)——第 I 197, 198, 200—204, 207, 396; II 154 页。

布洛利(Broglie)——第 I 92 页。

布吕纳蒂埃尔, 斐迪南(Brunetiere, Ferdinand)——第 II 342 页。

布赖恩, 威廉·詹宁斯(Bryan, William-Jannings)——第 II 218 页。

布鲁斯, 保尔(Brousse, Paul)——第 I 116—118, 123, 258, 287, 290—292 页。

布瓦埃, 安都昂(昂蒂德)(Boyer, Antoine “Antide”)——第 I 296 页。

布西珂(Boucicaut)——第 I 98 页。

C

查理(Charles)——第 II 67 页。

D

达尔林普尔(Dalrymple)——第 II 121, 122 页。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第 I 27, 32, 46, 68, 146, 152, 153, 155, 156, 160, 162, 165, 167, 173, 184, 186, 327, 424; II 24, 83, 296, 315, 332, 342 页。
- 大流士(Darius)——第 I 144 页。
- 大卫(David)——第 I 143 页。
- 戴鲁累德, 保尔(Déroulède, Paul)——第 I 210, 213; II 27, 211 页。
- 丹尼尔(Daniell)——第 I 39, 40 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第 I 339 页。
- 道比尼(d'Orbigny)——第 II 56 页。
- 道尔顿, 约翰(Dalton, John)——第 II 295 页。
- 德·比朗, 梅恩(de Biran, Maine)——第 II 342 页。
- 德尔克律兹, 马尔克·路易·阿尔弗勒德(Delcluze, Marc-Louis-Alfred)——第 I 303 页。
- 德尔图良, 昆图斯·塞普蒂米乌斯·弗洛伦斯(Tertullien,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第 II 299, 344 页。
- 德·吉莱丁, 艾米尔(De Girardin, Emile)——第 II 139 页。
- 德·科克, 保尔(de Kock, Paul)——第 I 73 页。
- 德拉克鲁瓦(Delacroix)——第 I 201 页。
- 德雷尔, 西蒙(Dereure, Simon)——第 I 289, 303 页。
- 德雷克(Dracke)——第 II 238 页。
- 德·累塞普斯, 斐迪南(de Lesseps, Ferdinand)——第 I 347 页。
- 德利尔, 列奥波特(Delisle, Léopold)——第 II 119 页。
- 德莫连, 埃德蒙(Demolius, Edmond)——第 I 363, 378, 382, 383, 387 页。
- 德·梅斯特尔, 约瑟夫(de Maistre, Joseph)——第 II 299 页。
- 德漠克利特(Démocrite)——第 II 295, 296, 365 页。
- 德穆兰, 卡米尔(Desmourens, Camille)——第 II 45 页。
- 德尼, 皮埃尔(Denis, Pierre)——第 II 13 页。
- 德·普雷桑塞(de Pressensé)——第 I 211 页。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都昂·路易·克劳德(Dessta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第 I 188 页。
- 德夏内尔, 保尔(Deschanel, Paul)——第 II 44, 47 页。
- 德·谢尔, 奥利维耶(De Serres, Olivier)——第 II 170, 260 页。
- 狄奥多洛斯(Diodorus)——第 II 101 页。
- 狄德罗, 德尼(Diderot, Denis)——第 I 67, 199, 207; II 53, 308, 342 页。

- 迪茨-莫南(Dietz-Monin)——第 I 210 页。
- 笛卡儿, 勒奈(Descartes, René)——第 I 68; II 49, 53, 361, 366, 373 页。
- 蒂拉尔(Tirard)——第 I 92 页。
- 第欧根尼(Diogenes)——第 II 376 页
- 东布罗夫斯基(Dombrowski)——第 I 10, 15—18 页。
- 杜邦鲁(Dupanloup)——第 I 97 页。
- 杜毕伊, 沙尔·亚历山大(Dupuy, Charles-Alexandre)——第 II 37, 38, 41, 42, 44—46 页。
- 杜尔哥, 安·罗伯尔·雅克(Turgot, Anne-Robert-Jacques)——第 I 207, 395; II 342 页。
- 杜弗尔(Dufaure)——第 I 87, 92 页。
- 杜林, 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第 II 208 页。
- 杜普拉(Duprat)——第 II 131, 133 页。
- 杜瓦尔, 艾米尔·维克多(Duval, Émile-Victor)——第 I 14, 44 页。
- 多耳富斯, 让(Dollfus, Jean)——第 I 74, 126, 209—210 页。
- 多尔莫瓦, 让(Dormoy, Jean)——第 II 23 页。

E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第 I 27—29, 34, 152, 153, 168, 176, 179, 180, 184, 262, 263, 283, 284, 288, 314, 360, 363, 382, 389; II 5, 7, 10, 24, 30, 107, 177, 178, 208, 210, 293, 294, 363 页。

F

- 法贝罗(Faberot)——第 II 200 页。
- 法夫尔, 茹尔(Favre, Jules)——第 I 13, 17, 255, 288; II 10 页。
- 法拉第, 迈克尔(Faraday, Michael)——第 II 342 页。
- 法利埃(Faillières)——第 I 318 页。
- 法森, 劳里默(Fison, Lorimer)——第 II 81, 99 页。
- 法伊埃(Faillet)——第 I 64 页。
- 菲迪亚斯(Phidias)——第 I 70 页。
- 菲尔丁, 亨利(Fielding, Henry)——第 I 323 页。
- 菲力巴(Philiba)——第 I 348 页。
- 菲利浦斯(Phillips)——第 II 254 页。
- 菲洛尔(Fillol)——第 II 200 页。

- 菲洛劳斯(Philolaus)——第 II 248 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第 I 201 页。
- 费雷, 泰奥菲尔·沙尔(Ferré, Théophile-Charles)——第 I 60 页。
- 费里, 恩利科(Ferri, Enrico)——第 I 210 页。
- 费里, 茹尔·弗朗斯瓦·卡米尔(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第 I 92, 253, 255, 269, 270, 294, 296; II 27, 42 页。
- 费鲁耳, 约瑟夫·安都昂·让·弗雷德里克·厄内斯特(Ferroul, Joseph-Antoine-Jean-Frédéric-Ernest)——第 I 296, 303, 405; II 17 页。
- 福尔, 塞巴斯蒂安(Faure, Sebastian)——第 II 25 页。
- 福尔邦奈, 弗朗斯瓦·维隆·杜韦尔瑞·德(Forbonnais, François-Véron-Duverger de)——第 I 417 页。
- 福莱尔(Forel)——第 I 171, 173 页。
- 福楼拜(Flaubert)——第 I 329, 339 页。
- 富歇(Fouché)——第 II 134 页。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第 I 28, 105, 153; II 51, 207, 225, 308, 328, 342 页。
- 符尼埃尔, 约瑟夫·欧仁(Fournière, Joseph-Eugène)——第 II 207, 208 页。
- 弗雷佩尔(Freppel)——第 I 156, 210 页。
- 弗雷蒙, 雅克(Frémon, Jacques)——第 I 25 页。
- 弗雷西讷(Freycinet)——第 I 92; II 301, 376, 377 页。
- 弗里布尔(Fribourg)——第 II 13 页。
- 弗路德(Froude)——第 II 297 页。
- 弗路朗斯, 古斯塔夫(Flourens, Gustave)——第 I 14, 44 页。
- 弗洛凯, 沙尔·托马(Floquet, Charles-Thomas)——第 I 50, 66, 270, 275, 305 页。
-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第 I 32, 37, 42, 183, 303, 356; II 4, 6, 7, 12, 13, 304, 310, 320 页。
- 富尔德, 阿希尔(Fould, Achille)——第 II 136, 159 页。
- 富格(Fouquet)——第 II 132 页。
- 富兰克林, 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第 I 391; II 77 页。

G

- 盖得, 茹尔(Guesde, Jules)——第 I 33, 125, 139, 275, 276, 278, 281, 284, 288, 290—293, 296, 297, 303; II 16, 23, 44, 200, 203 页。

- 盖尔尼埃(Guernier)——第 II 358 页。
- 甘必大, 莱昂(Gambetta, Léon)——第 I 50, 65, 66, 85, 93, 118, 147, 156, 262, 284, 287, 288, 335, 336; II 15, 27 页。
- 高尔吉亚(Gorgias)——第 II 368, 369 页。
-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 Cristoforo)——第 I 112; II 296 页。
- 哥姆(Gomme)——第 II 102 页。
- 哥提埃, 艾米尔(Gautier, Émile)——第 I 201, 287 页。
-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Goethe, Johann Wolfgang)——第 I 328 页。
- 戈尔曼, 赛米尔(Gorman, Samuel)——第 II 87 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第 I 210, 386; II 287 页。
- 格兰特(Grant)——第 I 269; II 286 页。
- 格朗热, 厄内斯特·昂利(Granger, Ernest-Henri)——第 I 292, 296, 311 页。
- 格雷波, 让·路易(Greppo, Jean-Louis)——第 I 136 页。
- 格雷哥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Gregorio VII “Hildebrand”)——第 I 100 页。
- 格雷维, 茹尔(Grevy, Jules)——第 I 294, 304, 343 页。
- 格林(Grimm)——第 II 261 页。
- 格鲁伯(Gruber)——第 II 342 页。
- 格罗夫, 威廉·罗伯特(Grove, William Robert)——第 I 200 页。
- 格罗斯克佩(Grosscup)——第 II 292 页。
- 格罗特(Grote)——第 II 367 页。
- 古德肖, 米歇尔(Goudchaux, Michel)——第 II 7, 201 页。
- 古耳德, 杰伊(Gould, Jay)——第 I 209, 231 页。
- 古赞-蒙多邦, 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Cousin-Montauban, Charles-Guillaume-Marie-Apollinaire-Antoine)——第 I 74, 313 页。
- 果丹(Godin)——第 II 6 页。

H

- 哈夫迈耶(Havemeyer)——第 II 283 页。
- 哈罗德(Harold)——第 II 99 页。
- 哈特曼(Hartmann)——第 I 214 页。
- 哈瓦斯, 奥古斯特(Havas, Auguste)——第 II 43 页。

- 海耳曼(Hermann)——第 I 201 页。
- 海克尔, 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 Ernst Heinrich)——第 I 203, 211, 327;
II 24, 325 页。
- 海克威尔德(Heckewelder)——第 II 69, 86, 92, 98 页。
- 海西奇乌斯(Hesychius)——第 II 370 页。
- 汉纳, 马克(Hanna, Mark)——第 II 247, 291, 293 页。
- 豪伊特, 阿尔弗勒德·威廉(Howitt, Alfred William)——第 II 81 页。
- 荷克(Hoeck)——第 II 88 页。
- 赫尔里格尔(Hellriegel)——第 II 316 页。
- 赫尔姆霍茨, 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Helmholtz, Hermann Ludwig
Ferdinand)——第 II 297 页。
- 赫拉克利德(庞丁的)(Héracléides “Pontius”)——第 II 88 页。
- 赫拉克利特(爱非斯的)(Héracléitos “Ephésios”)——第 II 365, 371 页。
- 赫舍尔(Herschel)——第 II 380 页。
-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第 I 213 页。
- 赫希柏格, 卡尔(Höchberg, Karl)——第 II 208 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第 I 150, 152, 184, 360; II 51, 52, 62, 165, 193, 207—209, 300, 303, 304,
321, 363, 367 页。
- 亨利(Henri)——第 I 81, II 26 页。
- 洪堡, 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第 II 96 页。
- 华德, 阿尔特姆(Ward, Artemus)——第 II 337 页。
- 霍布斯, 托马斯(Hobbes, Thomas)——第 I 372 页。
- 霍登西乌斯, 昆图斯(Hortensius, Quintus)——第 I 144 页。
-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Holbach, Paul Henry)——第 II 342 页。
- 霍奇森(Hodgson)——第 II 105 页。

J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cois-Pierre-Guillaume)
——第 I 2 页。
- 吉芬, 罗伯特(Giffen, Robert)——第 I 213, 214 页。
- 吉尔斯(Giers)——第 I 213 页。
- 吉罗, 雅克(Girault, Jacques)——第 I 4, 20 页。
- 加尔涅, 热尔曼(Garnier, Germain)——第 I 55, 83, 122; II 225 页。

- 加尔涅-帕热斯(Garnier-Pagès)——第 I 58、289 页。
加尔文, 让(Calvin, Jean)——第 I 63 页。
加里(Gary)——第 II 250 页。
加利阿尼, 斐迪南多(Galiani, Ferdinando)——第 I 207 页。
加利费,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第 I 92; II 205、211 页。
加利拉(Galliera)——第 II 136 页。
加利文(Galliwin)——第 I 199 页。
加特曼(Гартман)——第 I 65 页。
杰维尔, 加布里埃尔(Deville, Gabriel)——第 I 140、193、277、284、292、297; II 152 页。
杰文斯, 威廉·斯坦利(Jevons, William Stanley)——第 II 163 页。
居维叶, 若尔日(Cuvier, Georges)——第 I 26、152、163; II 315、316、342 页。
居鲁斯(Curios)——第 I 92 页。
居林(Culine)——第 I 313 页。

K

- 卡巴尼斯(Cabanis)——第 II 342 页。
卡贝, 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第 II 286 页。
卡尔诺(Carnaud)——第 II 200 页。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第 I 13、267; II 202 页。
卡菲埃罗, 卡洛(Cafiero, Carlo)——第 II 152 页。
卡季米尔-佩里埃, 让·保尔·比埃尔(Casimir-Périer, Jean-Paul-Pierre)——第 II 35、38—41、43 页。
卡拉瑟(Gallace)——第 II 25 页。
卡莱尔(Carlyle)——第 II 234、283 页。
卡罗(Caro)——第 I 97 页。
卡诺, 玛丽·弗朗斯瓦·萨迪(Carnot, Marie-François-Sadi)——第 II 22、26、38 页。
卡梅利纳, 泽菲兰(Camélinat, Zéphirin)——第 II 17 页。
卡内基(Carnegie)——第 II 284 页。
卡桑尼亚克(Cassagnac)——第 I 93; II 31 页。

- 卡斯提耳奥, 卡诺瓦斯·德尔(Castillo, Canovas del)——第 II 186 页。
- 卡特林(Catlin)——第 II 91, 94 页。
- 卡通(Caton)——第 I 260 页。
- 卡托(Cato)——第 I 144, 265; II 78 页。
- 卡泽里奥(Cazelliau)——第 II 22, 26, 41 页。
- 凯撒(Caesar)——第 I 69, 149; II 15, 92, 98, 101, 104 页。
- 凯斯特内尔(Kestner)——第 I 74 页。
- 凯特洛(Kettelau)——第 I 427 页。
- 凯维多(Quevodo)——第 I 82 页。
- 坎伯尔, 乔治(Campbell, George)——第 I 69; II 107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第 I 164, 184; II 207, 208, 301, 361, 363, 364, 374, 378 页。
- 康格里弗, 理查(Congreve, Richard)——第 II 28 页。
- 康帕内拉, 托马佐(Campanella, Tommaso)——第 II 69 页。
- 柯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Colbert, Jean-Baptiste)——第 II 116, 132, 132—133, 170 页。
- 柯鲁美拉(Columelle)——第 II 170, 260 页。
- 科布伦茨, 崩斯·德(Coblentz, Boumes de)——第 I 10 页。
- 科尔崩, 克劳德·昂蒂姆(Corbon, Claude-Anthime)——第 I 50 页。
- 科克西(Coxey)——第 II 285 页。
- 科林(Colin)——第 I 262, 263 页。
- 科佩(Coppée)——第 II 211 页。
- 克尔克(Koeurc)——第 I 28 页。
- 克拉尔, 鲁瓦埃(Collard, Royer)——第 II 375 页。
- 克拉姆普斯, 维(Cramps, W.)——第 II 254 页。
- 克莱, 亨利(Clay, Henry)——第 II 244 页。
- 克莱米约, 阿道夫(Crémieux, Adolphe)——第 I 275 页。
- 克劳狄乌斯(Claudius)——第 I 110 页。
- 克里佐斯托姆, 圣·让(Chrysostome, Saint-Jean)——第 II 58 页。
-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杰明(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第 I 50, 79, 210, 270, 281, 283, 289, 316; II 356 页。
- 克娄巴特拉(Cléopâtre)——第 I 223 页。
-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第 II 24, 161 页。

- 克虏伯, 阿尔弗勒德(Krupp, Alfred)——第 I 209, II 268 页。
- 克吕泽烈, 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 Gustave-Paul)——第 I 15、16、19、296 页。
- 刻卜勒, 约翰奈斯(Kepler, Johannes)——第 II 377 页。
- 孔德, 奥古斯特(Comte, Auguste)——第 I 26、28、30、36、73、213、220; II 59、60、221、304 页。
- 孔狄亚克, 埃蒂耶纳·博诺·德(Condillac, Étienne-Bonnot de)——第 II 53 页。
- 孔斯坦, 让·安都昂·厄内斯特 (Constans, Jean-Antoine-Ernest)——第 I 298、299、303—305、309—312 页。
- 库尔塞尔-塞纳伊, 让·古斯塔夫(Courcelle-Seneuil, Jean-Gustave)——第 I 148 页。
- 库尔图瓦(Courthuva)——第 I 55 页。
- 库辛, 维克多(Cousin, Victor)——第 I 97、162 页。
- 魁奈, 弗朗斯瓦(Quesnay, François)——第 I 207 页。

L

- 拉·布鲁伊尔(La Bruyère)——第 I 74 页。
- 拉巴尔迪(Rabardy)——第 II 38 页。
- 拉波波特, 沙尔(Rappoport, Charles)——第 II 207、208、209 页。
- 拉伯雷, 弗朗斯瓦(Rabelais, François)——第 I 67、82、92、129、158 页。
- 拉比斯基埃尔, 让(Labusquière, Jean)——第 I 277、287 页。
- 拉德米罗, 路易·勒奈·保尔·德(Ladmirault, Louis-René-Paul de)——第 I 18 页。
- 拉杜罗(Laduro)——第 I 38 页。
- 拉法格, 保尔(Lafargue, Paul)——第 I 5、21、25、28、29、68、89、90、125、139、253、264、271、272、277、284、292、303、313、363、378、382、383、408、421; II 17、20、23、42、43、49、72、154、199、201、203—205、355、358 页。
- 拉菲特, 皮埃尔(Laffite, Pierre)——第 I 28、213 页。
- 拉斐尔·桑蒂(Raffaello Santi)——第 I 201、202 页。
- 拉弗勒, 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 (Laveleye, Emile-Louis-Victor de)——第 I 55、56、58、116、122、181、188、201; II 155 页。
- 拉马克, 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Lamarck, 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第 I 153、155、184; II 51 页。

- 拉马克, 马克西米利安(Lamarque, Maximilien)——第 I 315 页。
- 拉梅耐, 费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第 II 328 页。
- 拉美特利, 茹利安(Lamettrie, Julien)——第 II 342 页。
- 拉摩里西尔, 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第 II 202 页。
- 拉佩鲁兹, 让·弗朗斯瓦(La Pérouse, Jean-François)——第 II 85 页。
- 拉普, 乔治(Rapp, Georges)——第 II 285 页。
- 拉普拉斯, 比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第 I 184, II 326, 327 页。
- 拉萨尔, 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第 I 181, 182, 262, 316; II 16, 136, 155 页。
- 拉斯拜尔, 弗朗斯瓦(Raspail, François)——第 I 402 页。
- 拉瓦尔(Lavoil)——第 I 365 页。
- 拉瓦锡, 安都昂·罗朗(Lavoisier, Antoine-Laurent)——第 I 155, 417 页。
- 拉维涅, 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Lavergne, Louis-Gabriel-Léonce Guilhaud de)——第 I 417; II 121 页。
- 拉翁登(Lahontan)——第 II 94 页。
- 拉沃肖尔(Ravachol)——第 II 26 页。
- 拉希兹, 让·贝努瓦(费里克斯)(Lachize, Jean-Benoît “Félix”)——第 I 296 页。
- 莱布尼茨, 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第 II 301 页。
- 莱喀古士(Lycurgus)——第 II 89 页。
- 莱曼(Reimann)——第 II 301 页。
- 莱斯利, 托马斯·爱德华·克利夫(Leslie, Thomas Edward Cliffe)——第 I 184 页。
-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第 I 68 页。
- 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第 I 255, 257, 289; II 201 页。
- 赖纳克, 雅克(Reinach, Jacques)——第 II 211 页。
- 兰克, 阿尔图尔(Ranc, Arthur)——第 I 210 页。
- 隆, 弗雷德(Long, Fred)——第 II 280, 281 页。
- 朗格卢瓦(Langlois)——第 I 94, 119, 136 页。

- 朗凯斯特, 爱得文·雷伊(Lankester, Edwin Ray)——第 I 166 页。
- 劳埃德, 亨利·德马雷斯特(Lloyd, Henry Demarest)——第 II 233 页。
- 勒博恩, 古斯塔夫(Le Bon, Gustave)——第 II 263、264 页。
- 勒当泰克, 费利克斯(Le Dantec, Félix)——第 II 364、375 页。
- 勒费夫尔(Lefebvre)——第 I 10 页。
- 勒费夫尔, 安得列(Lefèvre, André)——第 II 203 页。
- 勒克律, 让·雅克·埃利泽(Reclus, Jean-Jacques-Elisée)——第 II 24 页。
- 勒卢阿·博利约, 比埃尔·保尔(Leroy-Beaulieu, Pierre-Paul)——第 I 57、73、89、181—184、186—197、206、396; II 142、154、155 页。
- 勒南, 厄内斯特·约瑟夫(Renan, Ernest-Joseph)——第 II 336、347 页。
- 雷博, 路易(Reybaud, Louis)——第 I 76、90; II 137 页。
- 雷纳耳, 戴维(Raynal, David)——第 II 24 页。
- 雷纳尔, 维克多(Renard, Victor)——第 I 313; II 46 页。
- 累塞普斯(Lesseps)——第 II 307 页。
- 黎曼(Riemann)——第 II 381 页。
- 李比希, 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第 I 146 页。
- 李嘉图, 大卫(Ricardo, David)——第 I 188、201、202、389、391、394、395; II 156、165、166、333 页。
- 莱喀古士(Lycurque)——第 II 89、91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Liebknecht, Wilhelm)——第 I 270; II 21、32、153 页。
- 李特列, 埃米尔(Littré, Émile)——第 I 199 页。
- 里德, 托马斯(Reid, Thomas)——第 II 375 页。
- 利科芬(Lycophon)——第 II 370 页。
- 利穆津, 沙尔(Limousin, Charles)——第 I 58、118; II 11 页。
- 利特尔菲尔德(Littlefield)——第 II 214、215 页。
- 利文斯顿(Livingstone)——第 I 87 页。
- 列马尔(Lemar)——第 I 63 页。
- 林肯(Lincoln)——第 II 286 页。
- 留基伯(Leucippe)——第 II 295 页。
- 龙格, 沙尔(Longuet, Charles)——第 I 288; II 34 页。
- 卢塞莱(Ruccellai)——第 II 132 页。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第 I 207、339; II 152、342 页。
- 鲁艾, 欧仁(Rouher, Eugène)——第 II 11 页。
- 鲁瓦奈, 古斯塔夫·阿尔芒(Rouanet, Gustave-Armand)——第 I 410; II

- 21、45、204页。
- 鲁维埃，莫里斯(Rouvier, Maurice)——第II 46、47、62页。
- 路日里尔(Lorgeril)——第I 92、98; II 126页。
- 路特希尔德(Rothschild)——第I 46、91、126、149、209、214、249、347、348、420; II 46、135、138、142、195、215、238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第I 2、7、8、31、266; II 2、4、7—9、138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第I 143页。
- 罗伯斯比尔，奥古斯丹(Robespierre, Augustin)——第II 208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第II 326页。
- 罗宾(Robin)——第I 206页。
- 罗得斯，塞西尔·约翰(Rhodes, Cecil John)——第II 339页。
- 罗德戴尔，詹姆斯(Lauderdale, James)——第I 202页。
- 罗凯(Roques)——第II 299页。
- 罗朗(Laurent)——第I 246页。
- 罗慕洛(Romulus)——第II 89页。
- 罗斯福(Roosevelt)——第II 219、291页。
- 罗什，厄内斯特(Roche, Ernest)——第I 311; II 44页。
-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 Henri)——第I 269、312页。
- 罗西，佩莱格里诺·鲁伊治(Rossi, Pellegrino Luigi)——第I 198页。
- 洛巴切夫斯基(Лобачевский)——第II 301、381页。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第I 181页。
- 洛克，约翰(Locke, John)——第II 53、54、57页。
- 洛克菲勒，约翰·戴维逊(Rockefeller, John Davison)——第II 216、217、234、238、239、249、250、253、255、264、268、283、350页。
- 洛克鲁瓦，爱德华·埃蒂耶纳·安都昂·西蒙(Lockroy, Edouard-Étienne-Antoine Simon)——第I 275页。
- 洛里亚，阿基尔(Loria, Achille)——第I 197页。
- 吕利埃，厄内斯特·沙尔(Lullier, Ernest-Charles)——第I 13、93页。

M

- 马蒂内(Martinet)——第II 21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第I 32、82、

- 154、156、165、167；II 106、296 页。
- 马丁(Martin)——第 II 262 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第 I 12、24、27、28、34、140、151、153、165、168、177、181—192、195—197、200、201、203、207、262、263、284、288、292、306、314、357、359—361、363、382、389、390、394、398、425、431；II 5、10、13、24、30、50、53、54、60、78、80、99、109、151—159、161—167、176、177、179、195、197、207—209、212、216、239、267、280、293、294、296、297、311—313、322、323 页。
- 马拉，让·保尔(Marat, Jean-Paul)——第 I 60 页。
- 马雷，昂利(Maret, Henry)——第 I 66、213、289 页。
- 马隆，贝努瓦(Malon, Benoît)——第 I 116、118、182、259、262、263、284、287；II 11、16、208 页。
- 马鲁克，维克多(Marouck, Victor)——第 I 277 页。
- 马诺福里埃(Maneuvrier)——第 I 303；II 379 页。
- 马萨尔(Massard)——第 I 60、260、277 页。
- 马塞尔，埃蒂耶纳(Marcel, Etienne)——第 I 384；II 67 页。
- 马塞奥斯(Maceos)——第 II 186 页。
- 马提诺，哈里埃特(Martineau, Harriet)——第 I 201 页。
- 马西森，查理·弗(Mathewson, Charles F.)——第 II 221 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第 II 10 页。
- 迈尔西埃，路易·塞巴斯蒂安(Mercier, Louis Sébastien)——第 II 208 页。
- 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保尔·比埃尔(Mercier de la Rivière, Paul-Pierre)——第 I 390 页。
- 迈耶尔(Meyer)——第 I 292 页。
- 迈伊里克，赫伯特(Myrick, Herbert)——第 II 244 页。
- 麦凯，约翰·威廉(Mackay, John William)——第 II 61 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第 I 198；II 166 页。
-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 Maurice)——第 I 9、18、19、155；II 14 页。
- 麦金利，威廉(Mac-Kinley, William)——第 II 218、219 页。
- 曼宁，亨利·爱德华(Manning, Henry Edward)——第 I 209、213 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第 I 210 页。

- 毛勒,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第 I 181、184 页。
- 梅迪契, 让·德(Médicis, Jean de)——第 II 132 页。
- 梅恩, 亨利·詹姆斯·萨姆纳(Maine, Henry James Sumner)——第 I 181、384、425, II 56、308 页。
- 梅恩, 乔治(Maine, George)——第 I 175 页。
- 梅利纳(Méline)——第 II 258 页。
- 梅纳尔-多里昂(Ménard-Dorian)——第 I 212 页。
- 梅契尼柯夫(Metschnikow)——第 II 338 页。
- 梅松尼埃(Meissonnier)——第 II 61 页。
- 蒙尼埃, 昂利·博纳温土尔(Monnier, Henri Bonaventure)——第 I 149 页。
- 米尔瓦, 律西安(Millevoye, Lucien)——第 II 27 页。
- 米格(Mieg)——第 I 74 页。
- 米拉波(Mirabeau)——第 I 199 页。
- 米莱(Millet)——第 I 201、338 页。
- 米勒兰,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Millerand, Alexandre-Étienne)——第 II 40、42、44、45、199、201—203、205 页。
- 米勒斯, 茹尔·伊萨克(Mirès, Jules-Isaac)——第 I 348、349, II 159 页。
- 米希勒(Michelet)——第 II 234 页。
- 密勒(Miller)——第 II 102 页。
- 缪勒尔(Moeller)——第 II 241 页。
- 摩根, 约翰·皮尔庞特(Morgan, John Pierpont)——第 II 215、217、219、239、248、250、251、253—255、264、268、270、271、280、283、290 页。
- 摩里, 赛米尔(Morley, Samuel)——第 I 209 页。
- 莫泊桑, 昂利·勒奈·阿尔伯·居伊·德(Maupassant, Henri-René-Albert-Guy de)——第 I 345 页。
- 莫尔, 托马斯(More, Thomas)——第 I 32, II 69 页。
- 莫尔尼(Morny)——第 II 136 页。
- 莫拉哥-冈萨雷斯, 托马斯(Morago Gonzáles, Tomás)——第 I 65 页。
-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Molière, Jean-Baptiste)——第 II 57、166 页。
- 莫利纳里, 古斯塔夫(Molinari, Gustave)——第 I 122、182、377, II 158 页。
- 莫罗, 艾米尔·安得列(Moreau, Émile-André)——第 II 201 页。
- 莫希(Mouchy)——第 II 136 页。
- 穆迪, 约翰(Moody, John)——第 II 213—215、247 页。
- 穆瓦兰, 茹尔·安都昂(托尼)(Moilin, Jules-Antoine “Tony”)——第 I

44页。

N

拿破仑(Napoléon)——第 I 45、50、72、222、267、270; II 1、9、152、173、195、221、320 页。

纳多, 马丁(Nadaud, Martin)——第 I 50 页。

奈阿尔科斯(Nearchos)——第 II 101 页。

奈克尔(Necker)——第 II 119 页。

尼采, 弗里德里希(Nietzsche, Friedrich)——第 II 369、370 页。

尼古拉, 弗里德里希(Nicolai, Friedrich)——第 I 324 页。

诺代(Naudet)——第 II 20 页。

O

欧几里得(Euclide)——第 II 302、381 页。

欧斯曼, 若尔日·欧仁(Haussmann, Georges-Eugène)——第 I 7 页。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第 I 32、157、183; II 6、285 页。

P

帕弗尔斯(Pawels)——第 II 38 页。

帕雷托, 维尔弗雷多(Pareto, Vilfredo)——第 II 151、154—168、170—172、174、175 页。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第 II 152 页。

帕涅尔, 查里·斯图亚特(Parnell, Charles Stewart)——第 I 210 页。

帕索斯, 约翰·多斯(Passos, John dos)——第 II 219、224 页。

帕西, 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 Hippolyte-Philibert)——第 I 74、88; II 276 页。

佩尔坦, 比埃尔·克利芒·欧仁(Pelletan, Pierre-Clément-Eugène)——第 I 50 页。

佩雷菲克斯(Péréfixe)——第 I 81 页。

彭加勒, 昂利(Poincaré, Henri)——第 II 301、375 页。

皮阿, 费里克斯(Pyat, Félix)——第 I 66、119、289 页。

皮埃隆(Pieron)——第 II 327 页。

皮卡尔(Picard)——第 I 5 页。

- 皮浪(Pyrrhon)——第 II 362、368、375、376 页。
- 皮洛士(Pyrrhus)——第 I 347 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第 I 29、64、65、94、119、122、123、181、183、212、273—274、280、288、360; II 5、11、12、107、153、258、287、321 页。
- 蒲斯(Booth)——第 II 327 页。
- 普雷沃—帕拉多耳, 律西安·安那托尔(Prévost-Paradol, Lucien-Anatole) ——第 I 2 页。
-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сентинович) ——第 I 264 页。
- 普雷斯科特(Prescott)——第 II 95 页。
- 普卢塔克(Plutarchos)——第 II 78、88、91 页。
-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第 II 365—367、372 页。
- 普律唐塞(Prudence)——第 II 371 页。
- 普野—克尔蒂约, 奥古斯丹·托马 (Pouyer-Quertier, Augustin-Thomas) ——第 I 46、77、222; II 139 页。

Q

- 乔治·桑(George Sand)——第 I 323 页。
- 切尔斯(Celse)——第 I 171 页。
- 邱吉尔, 伦道夫·亨利·斯宾塞 (Churchill, Randolph Henry Spencer) ——第 I 209 页。

R

- 饶勒斯, 让(Jaurès, Jean)——第 I 410; II 36、39、42、44、45、47、49、50、52、53、56、59、200、201、205、206、208、233、357、358、359 页。
- 热尔明尼, 欧仁(Germiny, Eugène)——第 I 58、73 页。
- 热拉尔(Gerhardt)——第 I 232 页。
- 热朗多(Gérando)——第 II 342 页。
- 热纳维埃夫(Geneviève)——第 II 299 页。
- 日拉丹(Girardin)——第 I 79 页。
- 茹尔德, 安都昂(Jourde, Antoine)——第 I 117; II 17、40 页。
- 若安迪(Joindy)——第 II 203 页。
- 若昂纳尔, 茹尔(Johannard, Jules)——第 I 16 页。

若夫兰, 茹尔·弗朗斯瓦·亚历山大 (Joffrin, Jules-Francois-Alexandre)
——第 I 258、287、291 页。

若弗卢瓦·圣伊雷尔, 埃蒂耶纳 (Geoffroy Sain-Hilaire, Étienne)——第
I 152、155、158—160、163、170、184、206、324、328; II 51、258、314—315、
323、342 页。

S

萨尔丁尼, 齐比奥 (Sardini, Scipion)——第 II 132 页。

萨耳维安 (Salvianus)——第 I 69; II 94 页。

萨利, 马克西米利安·德·比顿 (Sully, Maximilian de Béthune)——第
II 132 页。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第 I 91、198、389、391、392、
394、395、397、398; II 166 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第 I 82、323、339 页。

塞维尼 (Scuigné)——第 II 133 页。

色诺芬 (Xénophon)——第 II 90、91、367、368 页。

沙多勃利昂,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第 I
159; II 207—208、326 页。

沙耳曼尔-拉库尔, 保尔·阿尔芒 (Challemel-Lacour, Paul-Armand)——
第 I 367 页。

沙列乌阿 (Charlevoix)——第 II 55、69、94 页。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第 I 330 页。

舍尔比利埃 (Cherbuliez)——第 I 76 页。

舍伐利埃, 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第 I 64 页。

舍马勒 (Schémalé)——第 II 11 页。

圣拉伯雷 (Saint-Rabelais)——第 I 32 页。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第 I 33、62、183、348; II 4、6—8、
12、13、135、143、197、269、310、320 页。

施蒂纳, 麦克斯 (Stirner, Max)——第 II 369 页。

施利曼 (Schliemann)——第 II 86 页。

施米特, 康拉德 (Schmidt, Conrad)——第 II 177 页。

施奈德, 欧仁 (Schneider, Eugène)——第 I 46、78、98、126、210; II 268 页。

施泰因赫尔 (Steinheil)——第 II 374 页。

- 施瓦伯, 查理 (Schwab, Charles)——第 II 228, 249, 250, 252—255, 276, 284 页。
- 施瓦伯, 约瑟夫 (Schwab, Joseph)——第 II 250 页。
- 叔本华, 阿尔都尔 (Schopenhauer, Arthur)——第 I 214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第 I 275; II 8 页。
- 斯巴达克 (Spartacus)——第 I 108 页。
-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第 I 30, 209, 211, 327, 382, 423—432; II 24, 59, 60, 304 页。
- 斯蒂芬 (Stephen)——第 II 87, 101 页。
- 斯蒂芬逊, 罗伯特 (Stephenson, Robert)——第 II 319 页。
- 斯克里夫 (Scribe)——第 I 72 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第 I 188, 201, 389—392, 394, 395; II 166, 333 页。
- 斯坦利, 亨利·摩尔顿 (Stanley, Henry Morton)——第 I 87, 169; II 94 页。
- 苏培兰 (Soubeyran)——第 I 209 页。
- 苏格拉底 (Sokrates)——第 II 54, 303, 308, 341, 365, 367, 368, 370, 372, 375, 379 页。
-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第 I 53 页。
- 梭伦 (Solon)——第 II 104 页。
- 所罗门 (Solomon)——第 I 143, 173 页。
- 索耳斯贝里, 罗伯特·阿瑟·托尔伯特·加斯科因-塞西耳 (Salisbury,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第 I 209 页。
- 索列尔, 若尔日 (Sorel, Georges)——第 I 323 页。

T

- 塔西伦 (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伦)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第 I 69; II 93, 94 页。
- 泰奥多罗维奇, 库兹曼 (Teodorovič, Kusman)——第 I 35 页。
- 泰奥尼斯 (Théognis)——第 II 83, 335, 339, 346, 372 页。
- 唐·罗德里戈 (Don Rodrigo)——第 I 82 页。
- 唐热 (Tanger)——第 II 357 页。
- 唐森 (Townshend)——第 I 76 页。

- 特拉里厄(Trarieux)——第II 211页。
- 特里东, 埃德姆·玛丽·古斯达夫(Tridon, Edme-Marie-Gustave)——第I 13页。
- 特罗胥, 路易·茹尔(Trochu, Louis-Jules)——第I 14、16、17页。
- 梯尔曼(Tillman)——第II 222页。
- 梯特·李维(Tite-Live)——第I 96页。
- 梯也尔, 阿道夫(Thiers, Adolphe)——第I 2、5、9、10、12、13、15、18、19、67、74、136、155、266、270、273、288; II 2、3、7、21、63、139、319、321页。
- 提夫里埃, 克利斯托夫(Thivrier, Christophe)——第I 296; II 34页。
- 图伦, 昂利·德·拉·图尔·多韦尔尼(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Anvergne)——第I 44、347页。
- 托德, 詹姆斯·亨索恩(Todd, James Henthorn)——第II 167页。
- 托马, 克列芒(Thomas, Clément)——第I 14页。
-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第I 64页。
- 托伦, 昂利·路易(Tolain, Henri-Louis)——第I 50、119; II 11、13页。

W

- 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Rousseau)——第II 202、205页。
- 瓦尔兰, 路易·欧仁(Varlin, Louis-Eugène)——第I 13、44; II 11页。
- 瓦累斯, 茹尔(Vailès, Jules)——第I 85页。
- 瓦特兰(Watrin)——第I 294页。
- 瓦扬, 爱德华·玛丽(Vaillant, Édouard-Marie)——第I 13、272、292、296、297; II 22、24、25、30、38、44页。
- 瓦扬, 奥古斯特(Vaillant, Auguste)——第II 26页。
- 万德比尔特, 威廉·亨利(Vanderbilt, William Henry)——第I 209、214; II 215、219页。
- 万-哥尔恩, 威廉(Wan-Horn, William)——第II 253页。
- 万-科尔, 亨利克(Van Kol, Henrik)——第II 32页。
-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Vandervelde, Émile)——第II 308页。
- 威尔法特(Willfarth)——第II 316页。
- 威金逊, 杰米纳(Wilkinson, Jemina)——第II 285页。
- 维尔第(Verdi)——第II 56页。
- 维科, 卓万尼·巴蒂斯塔(Vico, Giovanni Battista)——第I 142; II 50、79、248、308、309、311--313、321、329、375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Vittorio Emanuele)——第 I 99,100 页。
 维克莱夫(Wicklef)——第 II 350 页。
 维吉尔(Virgile)——第 I 70 页。
 维莱尔梅(Villermé)——第 I 74,75 页。
 维努亚, 约瑟夫(Vinoy, Joseph)——第 I 10,12,18 页。
 魏兹(Wise)——第 II 222 页。
 翁得加多, 波罗(Ondegardo, Polo)——第 II 95,96 页。
 沃尔克曼(Wolkmann)——第 II 207 页。
 沃尔弗(Wolf)——第 II 225 页。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第 II 120 页。
 乌弗拉尔(Ouvrard)——第 II 134 页。

X

- 希尔施, 卡尔(Hirsch, Karl)——第 I 276 页。
 希罗多德(Hérodote)——第 I 95,96; II 85,225,310 页。
 西里耳(Cyrille)——第 II 225 页。
 西蒙, 茹尔(Simon, Jules)——第 I 50,65,66,73,76,97,231 页。
 西内西(Synesius)——第 II 310 页。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Cicero, Marcus Tullius)——第 I 80,97,371 页。
 夏果(Chagot)——第 I 78 页。
 夏龙(Charron)——第 II 362,375 页。
 肖莱马, 卡尔(Schorlemmer, Carl)——第 I 203 页。
 谢夫莱, 阿尔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第 I 181,189; II 142 页。
 谢尔(Scherr)——第 I 159,206 页。
 谢尤(Chaillu)——第 I 87 页。
 休谟, 大卫(Hume, David)——第 II 361 页。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第 II 104,373 页。
 薛尔曼(Sherman)——第 II 218,229 页。

Y

- 雅克拉尔, 沙尔·维克多(Jaclard, Chaler-Victor)——第 I 13,14 页。
 亚历山大(Alexandre)——第 I 70,142,144 页。

亚里士多德(Aristote)——第 I 70、97、98、160、201、202、364、382；II 90、105、310页。

亚里斯提卜(Aristippe)——第 II 365 页。

耶尔克斯(Yerkes)——第 II 254 页。

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第 II 335、370 页。

于贝尔(Hubert)——第 I 172 页。

雨盖，克洛维斯(Hugues, Clovis)——第 I 121、122 页。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第 I 73、240 页。

约翰逊(Johnson)——第 II 286 页。

Z

张伯伦(Chamberlain)——第 I 209 页。

芝诺(Zenon)——第 II 370 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ue, Friedrich Adolph)——第 II 205页。

左拉，艾米尔(Zola, Emile)——第 I 143、323—328、333、335—346、349、350、353、355—359、360—362页。